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

晚清学术书系

邹振环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以 1815 至 1911 年
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

晚清学术书系

邹振环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晚清学术书系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以 1815 至 1911 年西方地理学
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

邹振环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5 字数 380,000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25-2719-0

K·301 定价: 24.40 元

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

——序《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周振鹤

20世纪,由于语言学的发展,若干认知模式和方法论导致了其他学科,例如哲学、人类学、文学等等的转向,以至有linguistic turn(语言学引起的转向或语言学导向)这样的术语产生。这一术语生动地说明了语言学在本世纪一度出现过的先行学科的作用。地理学在今天显然不是先行的学科,对其他学科也没有产生像语言学那样的导向作用。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西方,地理学曾被看作是“科学之母”,许多学科都从其中分离出来;二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科对于中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先行学科的作用。先进的中国人,就是从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才打破了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的旧观念,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进而充分理解到自身的缺陷,产生向西方学习的念头,出现各种变革的观念,引起了延续一个多世纪的思想革命历程。

早在明清之际,接踵而来的耶稣会士就给中国士大夫带

来了关于世界地理的最新知识。利玛窦的《坤輿万国全图》与艾儒略《职方外纪》等图书在传教士的著作中占有最重要的份量。当天朝大国的臣民发现这个大国只不过占据地球一小部分的时候,可以想象他们所受到的震撼有多大。我很怀疑,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某些人放弃旧有的信仰,而皈依基督教的营垒。虽然与耶稣会士接触的大部分士大夫保持了原有的信仰,但这种震撼显然让他们感受到西方学术的先进性,进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问题是出现这种变化的范围还很小,由于中国对传教所采取的严格限制,能够了解到西方地理学成就的中国知识精英并不多,至于一般人更是未受影响地保留原有的传统观念。对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产生影响的西方地理学知识主要是在 19 世纪传播开来的。这个世纪无论对西方地理学还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17 世纪末,在西方,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都分别脱离自然哲学而另立门户。到了 19 世纪,各人文学科包括地理学(地理学兼有自然与人文两个领域)和历史学也同样自成体系。对于西方地理学而言,19 世纪更有特殊意义,因为这一世纪不但是古典地理学与新地理学的交替时期,而且也是西方大学正式将地理学作为大学课程的开始,而对中国来说,19 世纪意味着康乾盛世的全面过气,社会衰落腐败的征兆到处冒头,思想敏锐的精英们已在酝酿一种改革的思潮,这种思潮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而更加强烈。而在这个当口,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再次叩击中国的大门,将基督教义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知识一起输入中国。这次进入中国的主要是新教传教士,在 19 世纪上半叶,他们还只是在中国外围及

沿海地区施加影响,而在40年代以后则是偕枪炮俱来,公然而且正式,因此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大大超过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到了20世纪初,由于留日学生大量地理学译著的行世,西方地理学的传播又出现另外一个高潮。

邹振环这本《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正是向我们展示了1815至1911年间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与影响程度。也许就一般的认识而言,不大会感觉到地理学的传播于近代学术思想有若何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或许就可以说明这种作用的力度。1890年,梁启超说自己入京参加会试之后,归途经由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瀛环志略》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地理学直接影响下的产物,而此时去《志略》之出版已四十二年矣。换句话说,在鸦片战争之后近半个世纪里,已经是举人的梁启超还不知五大洲为何物。那么一般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可想而知。而梁启超正是在知道了五大洲以后,才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凡百不如西方,如不维新即无出路。

世界地理知识在今天真是普通极了的东西,但在150年前却完全两样。中国因为闭关自守,从来只有天下的意识,并不知天下之外还有世界这个概念。所谓天下就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加上四夷的地域范围。鸦片战争爆发时,朝野上下都不知道敌手英吉利是何方土地,后来才晓得是七万里以外一个面积只相当于台湾、海南二岛的蕞尔小夷。这一来激起了一些思想先进的官员认识世界的强烈欲望,先是林则徐请人将西洋人所著的《地理大全》翻译为《四洲志》,但这本书从未刊刻过,一般人无由读到。后来林则徐又请当时的名士魏源,以此书为基础编辑《海国图志》,后来又有上面提到的徐继畲

《瀛环志略》问世。这两部经典式的世界地理著作的产生,表明了先进的中国人的一个基本思路:如果对西方的存在尚且不知,又从何了解其底细,以采取对策?

西方传教士也深刻理解到这种作用,所以在他们所办的中文杂志上,地理知识的传播是头等重要的内容。郭实腊在筹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时,就宣布了其宗旨。郭实腊编纂这样一份杂志,其目的十分明显,是要传西学入中国,表明西方文化是与东方文化并存于世的两大文化,而不是中国人所想象的蛮夷之俗。而这样做的最终目的,便是以此来开化中国人,使之不致影响到在华的外国人的利益。他在出刊前的一个多月就曾写过一份出刊缘起,明白无误地说:“虽然我们与他们(指中国人)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本月刊的)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知道我们的技艺、科学和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可有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但是要让中国人知道西方文化,首先就要让中国人懂得外国历史与地理。因此毫无例外,从1815年传教士所编辑的第一份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就以地理知识为主要内容。而这个杂志的创刊年份就是邹振环此书研究的时间起点,这是有标志意义的。

从学科性质方面说来,地理学恐怕是唯一的一门跨越自然与人文科学两大领域的特殊学科,有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 and 一整套专门的名词术语,这些知识与术语绝大多数都是中

国传统文化所不具备的,因此全面研究西方地理学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可能在一本著作里得到圆满的解决。本书于是以地理学的译著为中心而展开,这样的角度显然使读者更直观地理解传播的过程与影响的深度。但即使是以地理学译著为中心,也仍然面临着文献资料数量庞大,蒐集不易,整理费时等困难。尤其是读者在本书中可以看到,作者所做的是一种穷尽式的研究,几乎将一百年间的所有地理学译著一网打尽,其中大部分文献并非经典性著作,只是一般的笔记、文集,有些甚至只是用完即弃的教科书,存世极其稀少,至于某些译著如《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之类,更是罕见之物,而全书即此一端,已可见作者用心之专,用力之勤。好在邹振环历来长于发掘史料,善于利用不被当成史料的文献,所以能见人所不能见,对西方地理学的传播过程与影响作出有坚实根据的论述与判断。

虽然本书是邹振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但与大多数博士论文都是该博士的处女作这一普遍情况不同,这篇论文并不是邹振环的第一本著作。在此之前,邹振环在出版史、翻译史方面的研究已经有相当丰厚的积累,除了数量颇丰的论文以外,还出版有《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与《江苏翻译出版史略》这样有份量的著作。由于有这样的基础,所以在攻读在职博士期间,尽管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他依然能游刃有余地写下这部三十多万字,而且几乎是字字有来历的厚重的著作。读者可以从本书看到西方地理学知识在明清之际以及晚清是如何由微而著,由点滴而全面地在中国传播开来的全过程,也同时看到这种传播所产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本来,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地理学一直是历史学的附庸,到了晚明,因为徐霞客和王士性的两大著作,即《徐霞客游记》与《广志绎》的行世,才使地理学脱离附庸地位而独立。这是中国自身学术发展而形成的必然结果。但在世界地理知识方面,中国当时仍然停留在天下四夷观的层面上,因此在明清之际与晚清时期,世界地理知识的引进,就似乎使历史与地理的关系颠倒过来,是靠西方地理来引路,才进而了解西方的历史,才走出天下而进入世界。当然西方地理学并不只有地理大发现以后产生的世界意识,更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时期所说的地理学实际上囊括了今天所说的整个地学领域,自然地理学的全部内容以及地质学都包括在内,甚至连生物学也往往涵泳其中。而所有这些内容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组成部分,除了个别先行者的个别著作外,在中国的传统学问中都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两个时期地理学的传播情况变成是中西文化接触的重要与前沿的问题。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本书所揭示的内容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课题,而且具有学术史与思想史内涵的研究。

本书还有一章必须作为重点提出,这就是第四章“晚清地理学文献中西方自然地理学新词”。这是以往同类著作中少见的发明。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制度名物以及意识观念的输入,有赖于新词语的创造,或者说,是以语言接触为前提的。许多中国学术史、科学史上所没有的新概念如何表达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一方面研究本身是另一个课题的范围,不能在这本书里解决,但极为难得的是邹振环花了很大力气,将自然地理方面的新词一个一个从文献中摘出,找出其最早出现的地方,以探索这些新概念到底在何时进入中国。这不

但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冒险的事,因为做学问的最大难处之一就是说有易,说无难。因此不能保证这些新词首次出现的地方绝对无误,但这样的工作显然为科学史与学术史做了极其有用的基础工作,是应该表彰的一种研究态度。现在,在国际学术界已有不少机构(主要是在大学)将中国近现代学术用语的形成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相信在本国,这一研究也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当然,我同时也相信邹振环此书的出版将会与他的其他著作,如《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一样,成为有关学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籍,而且将会对学术史的发展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目 录

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周振鹤)	1
引言	1
一、地理知识与地理学——研究范围	1
二、边缘史的清晰度——资料与先行研究	3
三、知识传播与思想变革——方法及其意义	9
第一章 明末清初地理学汉文西书与新知识点的引入.....	17
一、明末清初东传的主要地理学汉文西书	17
二、地理学汉文西书引入的新知识点	23
三、明末清初地理学汉文西书的传人与中国士大夫的 “世界意识”	40
四、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学术挑战与中国士大夫的 非学术应战	46
第二章 19世纪西方传教士作为主译者绘制的 地理学知识线	61
一、风从南洋来——19世纪初南洋地区出版物传入的西方 地理学知识	64
二、郭实猎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71
三、裨治文与第一部中文版美国地志的编纂	79

四、裨理哲的《地球图说》与《地球说略》	85
五、慕维廉与《地理全志》	89
六、《遐途贯珍》和《六合丛谈》中的地理学译著	104
七、傅兰雅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地理学译著	115
八、艾约瑟及其西学地理学的启蒙	124
九、19世纪中国“地理大发现”的文化意义	134

第三章 戊戌到辛亥近代西方地理学思想与知识体系

<input type="checkbox"/> 的输入	158
<input type="checkbox"/> 一、留日学生运动的掀起与日文地理学西书的翻译	159
<input type="checkbox"/> 二、广智书局的地理学译著	168
<input type="checkbox"/> 三、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译著及其影响	175
<input type="checkbox"/> 四、作新社、金粟斋、新学会社及其地理学译著	182
<input type="checkbox"/> 五、会文学社与《普通百科全书》中的地理学	192
<input type="checkbox"/> 六、学部编译图书局的世界区域地志译著	199
<input type="checkbox"/> 七、近代西方地理学思想与知识体系的输入及其影响	206

第四章 晚清地理学文献中西方自然地理学新词

<input type="checkbox"/> 一、晚清开始广泛受到重视的明末清初的地理学新词	235
<input type="checkbox"/> 二、19世纪汉译地理学文献中的地理学新词	239
<input type="checkbox"/> 三、20世纪初地理学新词中来自日本的译语	242
<input type="checkbox"/> 附表：《晚清西方自然地理学新词表》	252

第五章 清末的地理学教育与近代地理学教科书

<input type="checkbox"/> 的编纂	266
<input type="checkbox"/> 一、教会学校中的地理学教育	267
<input type="checkbox"/> 二、清末近代学制的变迁和地理学教育体系的确立	273
<input type="checkbox"/> 三、清末民营出版社地理学教科书的编纂	282

四、清末乡土地理教科书的编纂与民族自尊自信意识 的重铸	295
第六章 清末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与近代中国地理 学的学术转型	309
一、中国近代地理学确立的时间和标志	309
二、晚清非体制化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	312
三、以《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为中心的交流网络	316
四、邹代钧与清末体制化地理学共同体的初建	322
五、张相文与中国地学会	330
六、中国地理学从传统到近代的学术转型与近代地理学 的确立	336
附录一：晚清西方地理学译著知见录	353
一、地理学通论与教科书	354
二、地球与地文学	366
三、气象与气候学	373
四、文化与政治地理学	376
五、区域地志	380
六、商业地理学	392
七、交通与旅游地理学	395
八、军事地理学	399
九、地图册与地图解说	403
附录二：晚清中国人编纂的地理学教科书书目	407
一、童蒙读物与小学教材	407
二、中学教材	413
三、师范专科教材	414

四、大学教材	415
五、参考图册类	416
附录三：晚清地理学译著与教科书出版年代分类	
统计表	417
附录四：引用文献	421
后记	441

引 言

一、地理知识与地理学——研究范围

地理知识是人类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包括地理名称、地理数据、地域分布、地理景观等各种地理事实材料。地理知识是与人类的“空间知觉”同时产生的,^①随着文字的出现,地理知识形成了地理文献,地理文献的积累和增长,形成了最初的地理学。地理学是在地理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条理化的结果,如地理规律、地理成因等的推理和概括。地理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领域,它所研究的地理环境,是地球表面自然、技术、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综合系统。在地理学史的研究上,研究者考察地理知识和地理学的进展,往往从地理发现、地理文献、地理学思想三者入手,本文有关传播与影响的研究,是以晚清西方地理学译著的形成和流传为中心,以东传的西方地理学知识与思想为线索。

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地域居住的不同民族,形成了他们各自对周围世界的不同看法。古代中国和西方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不同的地理认识。古代西方的地理学曾被视为“科学之母”,因为在古代科学分化不明显的时期,它是一个包罗广泛的领域。近代科学的发展,使许多同地理学相邻的学

科,如地质学、气象学、水文学相继独立,17到19世纪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经济学的进步,又为近代地理学向一门科学迈进,提供了重要的前提。16世纪的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也产生了飞跃的进步。地理知识与欧洲资本主义海外贸易和航海事业是同步前进的。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和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出现了绘有美洲和南极大陆的新的世界地图,西方有关地球形状、海陆分布、气候差异以及各国地理情况的认识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新的地理认识通过文献的形式将所总结事实上升为理论与体系,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和学派。16世纪末西方耶稣会士在地理大发现这一背景下从欧洲来到中国,为中国人带来了地理大发现后形成的地理学汉文西书。^②虽然,本书是以1815至1911年引进的西方地理学译著为考察的中心,但从文化输入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追根溯源,利用学术界先行研究成果,简要地论述一下明末清初传人的西方地理学知识点。

在近代科学中,地理学是一门内容庞杂的学科,直至19世纪形成的近代地理学,才逐渐摆脱古代地理学半科学、半文学的状态,开始吸收近代科学的成果,形成了自己学科的一套范式和工作模式。以洪堡和李特尔为代表,对地球表面各种现象进行条理化描述,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一般性解释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同一时期,西方地理学的知识线在19世纪初通过作为主译者的新教传教士再度东传,特别是20世纪初的十余年间,由于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地理学译者群体的出现,以及大量民营出版机构介入地理学译著的出版发行,使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无论是从传播内容与规模、传播方式与渠道上,还是影响的范围和深度上,都

大大超过了明末清初,为近代中国引进了一整套西方地理学知识体系和专业术语,初步建立了能提供在概念与方法上进行传授的地理学教育体系,形成了非体制化和体制化的地理学共同体的交流网络,经过与中国传统地理学的碰撞与交融,使中国地理学在晚清发生了传统到近代的学术转型。

二、边缘史的清晰度——资料与先行研究

本书所作的这一研究属于中国近代地理学史的范围,然而,由于着眼点在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因此又走到了中外地理学交流史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边缘。作为一项文化边缘史的研究,本书所依据的资料与先行成果相当驳杂与广泛,涉及了中国近代地理学史、中外地理学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文献学等范围,这里笔者只能就相关的前行成果,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举要叙述。

最早注意西方地理学译著的是清末学者王锡祺,1877至1897年他分三次编成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选录了部分清代国内外译者译述的各种地学书籍。1894年同康庐辑印了130卷《中外地輿图说集成》,其中收入外国的地学图说多种。20世纪初的几本西学目录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如1896年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列出了若干西方地志方面的译著,并在后附《读西学书法》一文中评价了当时出版的部分地理学译著。1899年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的卷3“地学”和1904年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卷5“地理学”分别著录了多种地学译著。

较早对中外地理学交流史进行系统研究的是1911年陶

懋立的《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一文。^③该文把中国地图学史分为三期：一为上古至唐的中国地图之时代；二为宋元至明阿拉伯地理学传人之时代；三为明末至清末欧洲地理学传人之时代，指出这一时代受西方地理学影响而完成的诸家地理学图书“皆前古所未有者”。同年陈学熙的《中国地理学家派》也是颇值得重视的一文，^④该文把19世纪中叶前的中国地理学家分为“禹贡派”、“山海派”两家，指出“山海派”中的“瀛环家”，即清末普通教育中之“外国地理学家”，如明代利玛窦、艾儒略，清代南怀仁，“游说于士大夫之门，而我国学子，始谈瀛环地理。”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接踵而至，日益昌盛”。该文还把清末的地理学者分为游记家（王锡祺）、新化家（邹代钧）、中国地理学家（龚柴、张相文、屠寄、马晋羲）、外国地理家（龚柴、谢洪赉）、自然家（沈仪熔、奚若、叶瀚、张相文）五家，认为即使在世界地理发明方面，中国也是最早最盛的。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从学术史的角度研讨了明末以来西方地理学译著东传与清代学术的关系，1923至1925年他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一章中指出了“言世界地理者”始于明末清初的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和蒋友仁，以后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又先后成书，使中国士大夫开始有了世界地理知识，并指出邹代钧“自制中国舆地尺”以“绘世界全图”，大大促进了清代制图学的进步。^⑤徐家汇圣教杂志社1926年出版的徐宗泽《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分六部分介绍了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对舆地学、天文学、数学、炮术、神哲学传入中国初期的贡献和经过情况，以及明清两代朝廷对西

学的态度。

30年代应当提及的几部通论性著作有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和《中西交通史》(中华书局1934年),两书均有专章论述“明清之际之耶稣会士与西学的关系”,后者还讨论了鸦片战争之后西学的输入。向达指出“西洋的地理学传入中国,使中国人对于空间上得一新观念”。^⑥张星烺不仅编著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平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六册史料集,还撰写了《欧化东渐史》,分三章简要地论述汉代至清末二千余年欧洲文化东渐的途径、媒介,西方物质文明(科技)和思想文明(宗教、伦理、学术等)的东传。由于受体例和资料的局限,上述这些著述对西方地理学东传的研究显得比较简略。这一时期在中外地理学交流史方面最突出的成果是有关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1936年的《禹贡》第5卷第3、4合期上刊出了“利玛窦世界地图专号”,其中有洪业的《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和陈观胜《利玛窦对于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二文,对世界地图的中国藏本作了系统的分析,至今仍是研讨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典范之作。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在1936年先后发表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载《地球》第26卷第4号)、《〈月令广义〉所载之〈山海輿地全图〉及其系统》(载《地理学》第12卷第10号),澄清了《两仪玄览图》的刊刻者是李应试,补正了洪业一文之缺。^⑦1938年德国卫礼贤以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藏本为主,加上世界各地的抄本,完成了意大利文版的《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梵蒂冈教廷图书馆1938年版),该书将前人的研究成果全部采入,并著录了中国、日本、伦敦、巴黎所藏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照片。^⑧

1938年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收入了王庸的

《中国地理学史》，该书分原始地理图志及其流变、地图史、地志史、近代地理学之进步四章，该书认为：“除掉地图和西方科学输入以后的地学之外，在中国学术史上实在是很少可以称为地理学的。”^⑨该书是一部以地理图籍为中心的地理学史，其中地图史一章中“利玛窦世界地图及其影响”一节基本上是根据洪业、陈观胜两文编写的。该书作为第一部中国地理学史，在对清代西学测绘地图学及其影响的论述方面，在有关近代地理学的研讨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后来的中国地理学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资料基础和线索。该书1955年又再版，表明历经18年，有关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以后作者又据该书中有关地图的两章加以扩充，经顾颉刚等人整理成《中国地图史纲》一书，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专门讨论了纬度测量和利玛窦世界地图、第一次中国地图的测绘和近代中国地图的测绘。30年代周昌寿的《译刊科学书籍考略》一文首次对清末地理学译著进行了统计，指出从1872至1911年的39年间出版的地理学译著（包括地质、地文和测绘）共58种，^⑩平均每年1.5种，这一统计，在80年代乃至最新的一些博士论文仍在沿用。^⑪

40年代方豪推出了《中外文化交通史》（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就明末七千部西书流入中国、明清间译著的底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53年开始，他陆续推出《中西交通史》，其中第4篇集中讨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1954年由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印行。其中第4篇第6、7两章专门讨论地理学，第6章全面、系统地分析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影响与贡献、艾儒略《职方外纪》与《西方答问》中地理问题、徐霞客与西洋传教士的关系；第7章论述了南怀仁的《坤輿图

说》与《坤輿外纪》、康熙时西方传教士的测绘工作和测绘方法、蒋友仁的《坤輿全图》及传入的地动学说,并研讨了明清学人对西方地理学的反应。作者擅长从浩如烟海的中外文献中爬梳原始资料,取材广泛、考证缜密,在研究上大大超过了前人。可惜由于两岸的学术交流长期隔绝,直至1987年岳麓书社重印后,该书才在大陆学术界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196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在讨论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学在水利事业的应用和制图学方面,未能充分地利用方豪的研究成果。

80年代以来,随着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兴起,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也愈来愈受到学界的重视。1984年科学出版社推出了《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和金应春、丘富科的《中国地图史话》,涉及了明清直至近代的测量与制图、边疆和域外地理的考察等内容,为明清时期的中西地理学交流史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同年测绘出版社推出了卢志良的《中国地图学史》,该书用专章分析了明末西洋制图学的输入与清初全国地图的测绘。198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谭其骧主编的《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其中第1部分“通论”收入了清代学者为一些明末以来的若干西方地理学译著所写的序跋,第8部分“外纪和边防”中选收了不少清代地理学者有关俄罗斯、安南和欧洲等国的考释,以及有关西方地理学译著的序跋,为学者查阅清人地理学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一书,鉴于当时出版的中国地理学史大多只论述古代,而对近代部分则付阙如的不足,该书用了50多页的篇幅,研讨了1894至1949年西方地理学东传和近代地理教育措施及研究机构

的设置,但主要用力处是在 20 世纪初民国时期的地理学。1989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杨吾扬的《地理学思想简史》,把中国地理学思想的发展作为整个世界地理学思想演变的一部分来考察,该书第 5 章为“中国近代和现代地理学思想”,考察了鸦片战争之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可惜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仅仅论述了西方探险家对中国的考察,未能述及西方地理学译著东传的史实。^⑫1990 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一书,也注意从整个世界地理学思想演变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其中也有若干篇幅涉及晚清西方地理学的东传及其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1990 年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有于希贤编著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该书在“中古时代晚期的地理学及近代地理学萌芽”一章中,利用新近国内的研究成果,对其师侯仁之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作了续编。80 年代西方学者中较有影响的研究有美国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明清时期的地理学研究》(载 MONUMENTA SERICAL 35,1981—1983)。总的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虽对西方地理学输入有所论述,但大都集中在明末清初,有关晚清的内容多语焉不详。

90 年代晚清西方地理学东传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1994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对晚清西学史作了总体考察,其中也采撷了不少晚清西方地理学译著的第一手资料。同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杨文衡主编的《世界地理学史》,该书在论述近代地理学方面也简要地述及了中国对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引进和吸收。1996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张岂之主编的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该书第三编第六章“近代地理学学术史研究概论”分三节讨论了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历史渊源与国势背景、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特点、中国传统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的过渡等等。有关晚清西方地理学译著的全面调查工作是由艾素珍作出的，她在《清末自然地理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清末人文地理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两文中，^③分别对 19 世纪 70 年代至 1911 年的 80 多种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译著作了分类和部分的提要，并简要地分析了它们的特点及其影响。在晚清西方地理学东渐史的研究方面，还特别应该提到郭双林的工作，他在《原学》第 1 辑、《学人》第 7 辑和第 9 辑上分别发表了《迈出传统的门槛》、《晚清西方地理学东渐述论》和《晚清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国的际遇》等文；1998 年第 4 期的《清史研究》还刊出了他的《从地理学著作的编撰看晚清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就晚清西方地理学的东传及其影响作了若干较为深入的剖析，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1998 年 12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赵荣、杨正泰著《中国地理学史(清代)》，全书分上下两篇，其中也有相当篇幅论及清代后期中西地理学的交流。1997 年 10 月，日本白帝社出版有荒川清秀的《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一书，该书首次以地理学为中心对明清以来的地理学学术用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察。

三、知识传播与思想变革 ——方法及其意义

正是在上述学界先行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笔者近两年

来对 1815 至 1911 年的西方地理学译著所做的较为系统的统计分析为基础,除了这一时代的西方地理学译著和中国人的地理学著述外,笔者还尽可能发掘和利用包括文集、笔记、日记在内的各种文献资料,旨在更清晰地表现出近百年间西方地理学译著,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哪些新的知识点;增加了哪些新的知识量;其所输入的知识线和知识体系,对中国人知识结构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有哪些重要的影响;西方地理学译著引入的新知识体系和专业术语,在晚清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和扩散中,产生了何种学术影响和社会效应;西方地理学的传播,给中国近代思想史演变提供了什么样的知识背景。笔者希望通过这一研究,给出一条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基本线索,提供一个较之前人更为全面和更为清晰的历史画面。本文着力点在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所以在方法上较多地借助了历史文献学、文化传播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注意考察晚清西方地理学译著所涵盖的知识容量,译著载体的变动与知识传播的关系,传播者与接受者相互依存的关系,西方地理学在晚清中国社会传播和扩散中产生的文化互动现象,西方地理学新知识体系和范式传播所带来的学术影响。本文力求做到的是:把对上述问题的解释建立在坚实的资料统计与分析的基础之上。

研究晚清西方地理学的知识传播,自然也把这一课题归入了思想史研究的范畴。地理知识与地理思想有区别也有联系,地理知识是同种地理信息的汇聚,是对一组地理事实的条理化的描述,它表示一个推断的或经验的结果。地理知识的初级形态是经验性空间知觉,高级形态是理论性空间知觉。高级形态的地理知识就是地理意识,是人对外部

自然与人文世界的经验、体验、理解和感知,即包含着人们对地球与人类、自然价值和人文精神的深刻认识,就是通常所说的地理思想。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指出:“知识是一种特殊的信念或意见,是精神的一种特殊状态。”笔者所说的地理知识即这一层意思,它是指客观意义上的知识,它见诸于物质载体的,不与个体共存亡的客观知识,它由人们的理论、推测、猜想的逻辑内容的各种信息积聚而成。即波普尔所说的“世界3”。^⑭没有经验性的地理知识,地理思想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而没有上升为理论性的地理思想,经验性的地理知识便无从建立起自己的秩序。葛兆光认为:“知识的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兆。”^⑮我以为西方地理学在晚清的知识传播史,研究的正是西方地理学知识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传递、变化与增长,晚清思想演变史也需要考察西学知识传播如何刺激和催发思想的变革,提供思想变革的新知识背景和新思想确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作为西方地理信息积聚的知识,它有一种很重要的属性,即可扩充性、可传输性和可扩散性。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扩散,与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地理学发展的“加速度现象”,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知识结构下形成的以华夏为“天下”、惟中国有文明的“虚幻环境”。^⑯

知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有着自己特殊的网络与系统,本文在对晚清西方地理学知识传播和近代中国人思想变革的分析中,借助了地理学中常常使用的点状、线状和面状的方法,来解说知识与知识结构的变动。

(A) 知识点。即知识的基本单元,是人们通过观察获得

的事实描述。知识点的增加,与传统知识点形成碰撞,从而升级与质变,导致知识量的不断增长。晚清西方地理学新知识点表现为地理学知识的专业术语、译作等等。

(B) 知识线。即知识系列,它由若干起重要维系作用的知识点所组成,这种形式能够记录、控制和理解各种新知识点。它有关联性和延伸性的特征,正是因为它的不断扩大和增长,形成了新的知识线,构成了一个时期一门学科知识存在与运动的方式。如 19 世纪西方地理学输入后形成了地理学通论与教科书、地球与地文学、气象与气候学、区域地志等知识线,20 世纪初又出现了文化与政治地理学、交通与旅游地理学、军事地理学、商业地理学等新的知识线。

(C) 知识面。即知识体系,是知识的理论系统,它由纵横交错的知识点与知识线所构成。通过内在网络式的交流、交换与交叉组合,形成运动的知识板块,晚清传入中国的西方地理学就是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知识世界,也是近代中国人知识结构变革的一个重要基础。

(D) 知识量。即知识的度量尺度。它由知识的各个层面,即知识点、知识线、知识面的知识含量、知识比率增长的量化表示。正是由于晚清西方地理学输入的新知识点的不断增加和裂变,知识线的不断延长和扩大,知识面的不断交换与重组,出现了本文拟要阐述的近代中国地理学发展中的“加速度现象”,从而导致了清末地理学从传统到近代的学术转型和近代地理学“范式”确立。

本书是通过六章、四个附录来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组织。从事西学东渐的研究,必定要追本溯源到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学的引进,同样要上溯到明末清初地理学汉文西书

所引入的新知识点,只有这样,才能对晚清输入西方地理学的内容作出准确的估计。本书第一章考察了明末清初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耶稣会士通过汉文西书引进的西方地理学新知识点。论证了明末清初的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仅仅局限在很小的学者圈子里,远远没有成为一般中国人的地理常识。明末清初中国人的外国地理著述,无论在资料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未能充分认识到地理学汉文西书的意义及其价值,几乎没有学者能对耶稣会士所介绍的西方地理学知识作进一步的和深一层的学术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没有能对西方地理学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应战。

第二、三两章通过夹叙夹议的方式,以译著为中心,以戊戌变法为界标,分别对 1815 至 1911 年的西方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作了比较完整的全景式的描述。第二章按十九世纪西方传教士以及编译的杂志和书籍为重点,论证了戊戌变法前新教传教士作为主译者绘制的地理学知识线,及其这些译著所形成的中国“地理大发现”,对于中国士大夫建立“地理台阶”,并在此基础上从技术科学到心理认知,一步一步理解西方文化的意义。第三章是以留学生群体和翻译出版机构为中心,考察了戊戌到辛亥近代西方地理学思想与知识体系的输入。

晚清西方地理学的传播,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哪些新的知识点;增加了哪些新的知识量;其所输入的知识线和知识体系对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有哪些重要的影响。本书把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建立在地理学文献中西方自然地理学新词、地理学教育与近代地理学教科书的编纂、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这三个基点上。这分别便是本书第四、第五、

第六章的内容,而这三方面的研究,只有很少的相关的先行成果可以凭借。因此在地理学新词和地理学教科书的资料调研方面,做得极为艰苦。本书第四章对晚清自然地理学专业新词汇的研究,第五章关于清末地理学教育与近代地理学教科书编纂的研究,虽然还只是作了最浅层的分析,但使西学东渐研究中最难把握的影响分析,建立在了实证的基础上。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导致了中国产生了传统到近代的学术转型。90年代以来学术转型问题,成了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而相关的研究大多从剖析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个案为基点,本书第六章首次提出了非体制化和体制化的“地理学共同体”的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分析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转型,从而为阐述中国近代学术传统的变革,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附录一、附录二提供了本书研究的一个资料基础,也是进入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史料索引。附录三是据附录一、附录二绘制的出版年代的分类统计表,附录四是便于读者对本书所引文献进行核查的文献目录。

注释:

- ①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人类的空间知觉不是一种感性的材料,它具有非常复杂的性质,包含着所有不同类型的感官经验的成分——视觉的、触觉的、听觉的以及动觉的成分在内。人类正是靠着这一非常复杂的思维过程,才获得了这种抽象空间的观念,使人类开辟了通向新的知识领域的道路,开辟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全新的方向。参见《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页55—56。

- ② “汉文西书”的概念主要用于明末清初,指西方传教士用汉语撰写,或在中国人帮助下编译的有关西方内容的各类图书,包括有原本参照的译著;或无原本依据,只是西方传教士依据西方概念和内容编写的各种图书。晚清的西学图书,绝大部分有可参据的原本,因此使用“译著”这一概念。
- ③ 载《地学杂志》第2年第11号(1911年2月18日)、第2年第13号(1911年4月18日)。
- ④ 载《地学杂志》第2年第17号(1911年10月11日)。
- ⑤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页467—468。
- ⑥ 向达《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页96。
- ⑦ 见《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页221。
- ⑧ 参见方豪《梵蒂冈出版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读后记》,载《方豪六十年自订稿》,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页1898—1901。
- ⑨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页1。
- ⑩ 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辑《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页434。
- ⑪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一书(页247)沿用这一统计,199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荣、杨正泰著《中国地理学史(清代)》一书(页8)也仍在沿用这一统计,该书是以赵荣的人文地理学博士论文为基础完成的。
- ⑫ 1995年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赵荣《地理学思想史纲》一书,也有一些篇幅述及西方地理学的东传与清初的地理学新思想,较其师杨吾扬一书中的相关章节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 ⑬ 两文载《中国科技史料》第16卷(1995年)第3期、第17卷(1996年)第1期。
- ⑭ “世界3”是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他把客观的物理世界称为“世界1”,把主观经验的世界称为“世界2”,把书籍、

计算机存储器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称为第三世界客体,即“世界3”。他强调“世界2”的主观知识都依赖于“世界3”,以往的知识论没有认识到这一重要的问题,忽视了客观意义上知识的存在。参见[英]波普尔著、舒炜光等译《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页78—79。

- ⑮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29。
- ⑯ “虚幻环境”(pseudo-environment)一词是W.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舆论学》(Public Opinion,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U. S. A., 1965)一书中提出的,指人们以符号为媒介在头脑中虚构的行为环境,是与现实环境即地理环境相对照的象征性环境。林珊将此词译为“假环境”。参见《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页9—10。

第一章 明末清初地理学汉文西书与 新知识点的引入

一、明末清初东传的主要地理学汉文西书

中国有着悠久的地理研究的传统,在明末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之前,也已有了自己对“海外诸国”的认识。这些认识主要来源于所谓“海客谈瀛洲”的从事中外贸易的商贩和水手以及部分“蕃图”。宋代以来,随着中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出现了第一部较全面地反映世界地理的著作《诸蕃志》。该书由在福建提举福建路市舶司任市舶提举的赵汝适所著。作者根据自己所“阅诸蕃图”,并“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蕃产。译以华言,芟其秽渫,存其事实”,^①写成两卷。上卷“志国”言诸国概况,所记国家 58 个,东至今日本、菲律宾,南止印度尼西亚各群岛,西达非洲,及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北至中亚及小亚细亚。下卷“志物”言物产,计载物产 47 种,另附记海南岛的地理与货物。明代张燮仿《诸蕃志》体例撰成《东西洋考》12 卷,记述了西洋 15 国、东洋 7 国,另附日本和荷兰。郑和七次下西洋,使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进一步得到了拓展。出现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蕃国志》,详细地记述了 30 多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和地理

情况。自东汉班固《汉书》有《地理志》始,正史中就有了以疆域政区的建置沿革为主要内容的“地理志”专篇,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这种研究方法侧重于地理沿革的考订和风土人情与社会历史的记述,而比较忽视对于地理环境本身的形态及其变化规律的探索。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与西方地理学知识的接触是在明末清初。

16世纪末西洋耶稣会士的东来,是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和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之后。东西航路的开辟拓展了欧洲人的眼界,促进了欧洲地理学的迅速发展。他们对于地球形状、海陆分布、气候差异以及各国地理情况的认识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荷兰地理学家麦卡托(C. Macator, 1512—1594)和奥代理(A. Ortelius, 1527—1598)都不止一次地绘制过世界地图。^②据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一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从1584年起在明末先后刻有不同的版本多达12种。其中以1602年李之藻刻板的增订吴中明本的《坤輿万国全图》流行最广。据该图利玛窦序所述制图之历史,该世界地图“显具十六世纪比利时地图学派之影响”。可能参考过麦卡托、奥代理、普兰息阿斯(Plancius, 1552—1622)等诸家地图,该图中细致的海水波纹,是意大利地图家的画法。1601年利玛窦献给皇帝的贡品中有《万国图志》一册,即收有各家所绘的53种地图的世界地图集。^③利玛窦不辞劳苦地一遍又一遍地译绘和增订世界地图,当然主要不在于向中国人传播最新的地理学知识,而是希望用这些世界地图来敲开中国士大夫灵魂的大门,以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但利玛窦毕竟为中国人带来当时最新的地理概念。《坤輿万国全图》绘出了赤道北地、南地半球,注明地为圆形、南北二极、赤道南北昼夜的长

短、五带；列出了五大洲的名称：欧逻巴、利未亚（非洲）、亚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南北美洲）、墨蜡泥加（南极洲与大洋洲），以及欧洲的 30 余国，如波尔杜瓦尔（葡萄牙）、以西把泥亚（西班牙）、拂郎察（法兰西）、谿厄利亚（英吉利）等。

明末还有一些宣扬天主教教义的书籍中也保留了若干西方地理学知识，如现存西班牙马德里国家图书馆的 1593 年刊出的署名“新刻僧师”的天主教士所写的《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一书，该书共分九章，前三章纯粹属于宗教方面的内容；第四章以下，虽其目的仍在论证天主之实有，但最早介绍西方生物学的知识，包括各种生物总论、世界各地草木情形、禽兽分布、禽兽饮食习性、禽兽如何知所用药自医其病等等。该书第四章以“论地理之事情”为标题，介绍了地圆说的几种根据，如在海洋中远望船只先见船桅，后见船身等，特别提到月色“借日之光以为光，且为地影冲障其中，因此下弦中弦而上弦”。月色分明所显示的圆影，很可以说明“地形之圆也，而非方也”。书中还把五带划分为六区，述及南北半球都有寒带、温带和热带的学说，并附有十重天图、月蚀时所见地球之圆形图等。^①这本书当时很少有人提及，可能影响不大。明末清初的地理学汉文西书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所撰译的《职方外纪》。

《职方外纪》是艾儒略在杨廷筠协助下，于天启三年（1623）据庞迪我和熊三拔所译写的抄本增补而成的。庞、熊二氏曾奉旨将福建税课所献得之于海舶的西文地图《万国地海全图》两幅，“悉译以中国文字，别为一书”，他们在翻译过程中补上了《中国图》及《西南方国图》两幅，同时还采用了利玛窦呈献的《万国图志》的内容，因为“其中各国图说至为详备，

又皆臣国人游学经商,耳闻目见,并无凿空驾造之说”,以使这一抄本“即四方万国地形之广狭,风俗之善恶,道术[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类之强弱,物产之怪异,具载无遗”。^⑤艾儒略在《自序》中称:“乃更窃取西来所携手辑方域梗概,为增补以成一编,名曰《职方外纪》。……兹赖后先同志,出游寰宇,合闻合见,以成此书。”谢方据此认为艾儒略增辑材料的来源,一是他自西方带来手辑的“西方流行的世界地理辑要”;二是耶稣会士邓玉函、鄂本笃所提供的有关西方对印度和中亚地区地理的最新知识。^⑥全书除卷首“五大洲总图界度解”外,共分五卷,卷一亚细亚总说;卷二欧逻巴总说;卷三利未亚总说;卷四亚墨利加总说;卷五四海总说。文字记述部分大大超过了利玛窦。1637年艾儒略的《西学问答》一书刻出,该书分上下两卷,涉及了国土、路程、海舶、海险、海奇、登岸、土产、制造、国王、西学、官职、服饰、风俗、五伦、法度、谒馈、交易、饮食、医药、人情、济院、宫室、城池、兵备、婚配、续弦、守贞、葬礼、丧服、送葬、祭祖、地图、历法、交蚀、列宿、年月、岁首、年号、西士、堪舆、数术、风鉴、择日等40多个有关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问题。^⑦

继利玛窦、艾儒略之后,又有过不少世界地图的绘制和世界地理学的撰述。1623年龙华民、阳玛诺合制了一个地球仪,彩绘在漆木构架上,直径59厘米。这架地球仪用中文详细地描绘了世界地理,记录了耶稣会士有关天体的理论和地圆的解释。亚、欧、美、非洲和南极洲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该地球仪的描述在亚洲东南部等许多方面不同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东亚和太平洋的画法有明显改进,如中国的海岸线、日本、朝鲜和大西洋上的众多岛屿。赫伦·瓦利斯(Helen

Wallis)在《到中国的教会制图学家》一文指出该地球仪“对新几内亚岛状图形绘制的精确度来看,这部分内容可能源自托利(Torre)在1606年所写的探险航行的报告;两位作者可以从艾儒略那里得到这些内容。”^⑧这是现存最早的一个在中国制造的地球仪。西洋历法新书中收入了崇祯九年(1636)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撰的《浑天仪说》五卷,其中载有汤若望绘制的“地球十二长圆形图”,该图采用以赤道为中心的断裂多圆锥图法绘制,其方法是假设有许多圆锥,按预定的间隔套在球体上,然后将球面上的经纬网投影到各圆锥体面上,再沿某一经线将各圆锥切开、展平,就产生了断裂多圆锥图。在“地球十二长圆形图”中,每一断裂面为30度,经线与赤道垂直相交,纬线对称于赤道并与经线正交,形成十二个图形。或云该书曾在清初通过昭显世子传入朝鲜,并对李朝时代的实学家安鼎福绘制的《宁古两界辽东全图》产生过直接的影响。^⑨1648年耶稣会士毕方济编绘了《坤舆全图》,该图采用椭圆形投影,将中国放在正中。作者的意图是设计一幅类似《坤舆万国全图》的简图,并根据一些新传入的西方最新地图资料作了改进。该图当时有过不少的印本,现有几幅分别收藏在梵蒂冈教廷、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比利时根特大学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图书馆。^⑩清初地理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南怀仁的作品。

大约在1674年耶稣会士南怀仁编制了《坤舆全图》,该图由东西两半球图组成,除表现五大洲、四大洋地理面貌外,兼述各地之奇禽怪兽珍鱼。图的四缘有6块椭圆形装饰的图说,左右两侧的条幅是8块用西洋纹饰镶嵌的文字,分别对地球、日月星辰、地震、人物、江河、山岳、潮汐、风云等天文地理

气象加以解释。1996年王省吾报告了他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发现的南怀仁彩绘绢本《坤輿全图》。绘本共两巨幅,各纵199厘米,横155厘米,陆地为土黄色,海水波纹青黄色,山脉深绿色,海陆动物分别以红、黄、蓝、白、绿各色表示,东西半球圆周用红色线表示,共四圈,最后一圈饰有花纹。赤道、南北回归线、河流、海岸线均用墨色。东西两半球圆周所标纬度与冬夏昼夜长时刻、赤道上经度度数、地名与注释,均用中文楷书书写。中国与小部分东南亚岛屿,均采用已熟知地名,西方各国系由西文转译,内一部分已经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所使用者。绘本不仅将陆地、海洋、山脉、海舶、水陆动物加上彩色,且所绘河流、海岸、岛屿的线条均十分精细,中文解释典雅,书写工整。王省吾据此判定,这一经过用心设计、精心绘制的作品,是为进呈康熙皇帝御览的。^①《坤輿全图》将利玛窦世界地图所采用的经曲纬平投影法改为球面投影法,以求图上所画各地接近实际形状。李孝聪认为,该图的原型,可能是1648年出版的琼·布劳的世界地图(Joan Blaeu: World map, Amsterdam),但是又根据已刊行的中国地图,对亚洲东部的面貌做了修订,故比前者更接近实际,而且带有部分中国地图的风格。此图代表17世纪欧洲半球投影制图学和天体学说对中国的影响,也是来华耶稣会士在制图学方面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一个贡献。^②

许多论著都认为,就在绘出《坤輿全图》的1674年,南怀仁又著《坤輿图说》二卷,解说同年所刻的《坤輿全图》。^③该书的上卷相当于今天的自然地理学,论述地体之圆、地震、山岳、海水之动、海之潮汐、江河、气行、风、云雨、四元行(土水火气)之序并其形、人物等。下卷相当于今天的区域地志,分亚细亚

洲、欧逻巴洲、利未亚洲、亚墨利加洲、墨瓦蜡泥加洲等,体例颇似《职方外纪》,而对地球知识和自然地理方面的描述又较前者为详。四海总说中还介绍了许多海产和动物,并有不少精美的插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称此书:“上卷自坤舆至人物,分十五条,皆言地之所生。下卷载海外诸国道里、山川、民风、物产,分为五大州,而终之以西洋七奇。《图说》大致与艾儒略《职方外纪》互相出入,而亦时有详略异同。”^④几乎没有学者注意到,就在1674年南怀仁还出版过《坤舆格致略说》一书,该书内容与《坤舆图说》大致相同,分坤舆部分和格致部分,前者收录《坤舆图说》下卷的内容,后者收录《坤舆图说》上卷的内容。该书刻印比较粗糙,结构没有《坤舆图说》合理,全书无插图。从一般著作总是由粗到精的规则来看,《坤舆格致略说》很可能成书在《坤舆图说》之前,显然是一部独立的地理学著作,恐怕未必仅仅是《坤舆全图》的解说。

二、地理学汉文西书引入的新知识点

明末清初传入的地理学汉文西书给中国人带来的新地理学知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地圆说”与地球知识

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了“天圆地方”的概念。《周礼·大宗伯》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称:“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⑤古代作为贯通天地象征的玉琮,就是一种外方内圆、柱形中空的玉器,它的外部被雕成方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大地相同,而

它的内部又是圆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天穹相似,它的中间是空的,能够象征天地上下相通,所以在祭祀时被用来供奉天地,拥有接引神鬼的神秘力量。^⑥大地的形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基本上是“天圆地方”或“天圆地平”的概念。中国古代宇宙观念中流行的“盖天说”,即西汉年间成书的《周髀算经》中一种对天的解释:天是一个覆在地上的半球,天地之间相距八万里,北斗星居天之中,雨水落地,向下流到四个边缘,形成边缘的海洋。地的边缘处,天高两万里,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像个覆碗,天穹载着日、月,像磨一样由右向左旋转不停。并给天和地规定了数值:“极下者,其地高人所居六万里,滂沲四隤而下,天之中央亦高四旁六万里。”“天离地八万里。”^⑦《晋书·天文志》中曾对这一派学说作过简要的概括:“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即周髀家说的:“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⑧浑天说是在盖天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般认为它始于东汉的张衡,其主要内容是:“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也。”^⑨浑天说似乎和西方的地圆说相类似,其实这仍只是一种凭天文上的经验推出的和事实差距不大的说法,是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的认识。中国天文学上包括浑天家这一派,从南北朝的祖冲之到元代的赵友钦都没有把浑天说当成地圆解释,相反仍将它理解为“天圆地平”。因为盖天说以寸差千里的假设计算天地的尺寸,在计算时基于勾股测量,把大地当成了平面。浑天说继承了这一看法,于是出现了地是平的又像

蛋黄那样居于天内的矛盾。^②西方地圆说传入之后,清代王夫之的《思问录·外篇·俟解》中仍极力反对浑天说为地圆说,认为:“浑天家言天地如鸡卵,地处天中犹卵黄。(黄)虽重浊,白虽轻清,而白能涵黄使不坠于一隅尔,非谓地之果肖卵黄而圆如弹丸也。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遂谓地形之果如弹丸,因以其小慧附会之,而为地球之象。”^③由此不难看出,“天圆地方”说与“天圆地平”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多么地根深蒂固。

元初阿拉伯地为球形的知识曾经传入中国。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即拉施特《史集》中所说的札马刺丁, Jamal al-Din)造“西域仪象”即各种天文仪器,带来了伊儿汗国马拉盖天文台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有“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④“苦来亦阿儿子”是阿拉伯原文 Kura-i-ard 的音译,即地球仪,但当时新大陆尚未发现,这一地球仪所述地球知识达到何种程度,至今仍是一个谜。而且其影响显然不大,因为直到耶稣会士人华时为止,中国人似乎一直没有制造过这种地球仪。^⑤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地圆说”和地球经纬图首先是由利玛窦引入中国的,清初刘献廷就说过:“天文实用及地球经纬图,皆利氏西来后始出。”^⑥利玛窦是这样介绍西方地圆观念的:“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故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为南道;赤道而北

二十三度半为北道。按中国在北道之北,日行赤道则昼夜平,行南道则昼夜短,行北道则昼夜长,故天球有昼夜平圈列于中,昼短昼长二圈列于南北,以著日行之界……夫地厚二万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百分里之三十六分,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盖在天之内,何瞻非天?总六合内,凡足所伫即为下,凡首所向即为上,其专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且予自大西浮海入中国,至昼夜平线已见南北二极,皆在平地,略无高低;道转而南过大浪山,已见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大浪山与中国上下相为对待矣。而吾彼时只仰天在上,未视之在下也。故谓地形圆,而周围皆生齿者,信然矣。”^⑤尽管元代以前中国已经有了纬度和子午线长度的测量,但“天圆地方”的观念使测量的结果仅仅只是为了从天文角度了解地面方位,与地图绘制关系不大。利玛窦在来中国途中就沿途测量经纬度,在赤道处观测南北极与地平交角。并实测了北京、南京、大同、广州、杭州、西安、太原、济南等城市的经纬度,这为中国地图学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利玛窦以其所谓量天尺(astrolable)测各地的纬度,又利用日月蚀以测经度,所得结果与现今所测者相差无几,是中国地理学上空前之工作。^⑥《坤輿万国全图》以赤道为中心,平分地球为南北两半球,并画了南北二回归线,南北二极圈线。相应地把气候分为一个热带、两个温带、两个寒带。后世的地理课本中都采用了这一地面气候划分法。

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卷首也明白无误地指出:“地既圆形,则无处非中。所谓东西南北之分,不过就人所居立名,初无定准。”并以地心说阐述了地球自转的原理:“地度上与天度相应。天有南北二极,乃运动枢。两极相距之中界为赤道,平

分天之南北。其黄道斜与赤道相交,南北俱出二十三度半。日躔黄道,一日约行一度,自西而东。”说明了实际地球绕日一年360度,每日向东推进1度。该书还谈到了季节:“日轮正交赤道际为春秋二分规,南出赤道二十三度半为东[冬]至轨,北出赤道二十三度半为夏至轨。”提出了日绕地球过程中太阳有时直射北半球、有时直射南半球。同时还讨论了五带的气候:“赤道之下与南北二极之下,各二十三度半也。又两极二至规外,四十三度也,分为五带:其赤道之下,二至规以内,此一带者,日轮常行顶上,故为热带。夏至规以北至北极规,冬至规之南至南极规,此两带者,因日轮不甚远近,故为温带。北极规与南极规之内,此两带者,因日轮止照半年,故为冷带。”^②

对地球知识介绍最详细的是南怀仁的《坤輿图说》。该书开篇就指出:“《坤輿图说》者,乃论全地相联贯合之大端也。如地形、地震、山岳、海潮、海动、江河、人物、风俗、各方生产,皆同学。”自称此书是在吸收了利玛窦、艾儒略、高一志、熊三拔等人所撰西书的基础上,“撮其简略,多加后贤之新论,以发明先贤所未发。”该书认为地圆说是“大地之真理”,“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在“地体之圆”一条中指出:“世谓天圆而地方,此盖言其动静之义、方圆之理耳。非言其形也,今先论东西,次论南北,以证合地圆之旨。”为了形象化地说明“地圆”观念,该书用图示的方法,指出:“日月诸星虽每日出入地平一遍,第天下国土,非同时出人,盖东方先见,西方后见,渐东渐早,渐西渐迟。”并举日行天体、月食等现象为证:“又地周三百六十度,每度二百五十里,其周围实独有九万里,令地为方四面,其一面应得二万二千五

百里,人居一面地平之上,其二万二千五百里之内,并宜见之,乃今目力所及大略能见三百里,即于最高山上未能见四五百里者,则地之圆体突起于中能遮两界故也。地水同为一圆球,以月食之形可推而明之。夫月食之故,由大地在日月之间,日不能施照于月,故地射影于月面,亦成圆形,则地为圆可知。”该书假设有人提出:“大地如圆球,则四旁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撰者以重心、吸力、斥力作解释:“物重者,各有体之重心,此重心者在重体之中。地中之心为诸重物各重之本所。物之重心悉欲就之,凡谓下者必远于天而就地心,凡谓上者必就天而远于地心。而地之圆球悬于空际,居中无着,常得安然,而四方土物皆愿降就于地心之本所。东降欲就其心而遇西就者不得止,南降欲就其心而遇北就者亦不得止。凡物之欲,就者皆然。故凡相遇之际皆能相冲相逆而凝结于地之中心,即不相及者,以欲就故,亦附离不脱,致令大地悬居空际也。”^②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引入的西方地圆观念和地球知识给传统中国地理学输入了许多新的知识点,这些新的知识元素与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和“天圆地平”说发生了碰撞,刺激了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传统宇宙理论的反省,这些对于重新研讨已被淹没的含糊的传统宇宙理论,产生了有效的推力。

(二) “五大洲”的新天下观

中国古代对世界的认识有一个随着时间的延伸,在空间上不断得到拓展的曲折过程。先秦时期,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很有限的,所谓“普天之下”、“率土之滨”,^③就是指“中国”及四周的“蛮夷”,而“中国”则仅指黄河中下游属于中原的这

部分；“蛮夷”也没有超出今天中国的北方和长江中下游一带。战国时代的“天下”的区域逐步扩大。秦始皇统一中国，天下的范围延伸到了“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④即东至渤海、黄海、东海，南至越南北部，西至青海东部，北至内蒙古。这就是汉代以前中国人认识的“天下”。

汉代由于丝绸之路贸易交通的发达，出现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大飞跃。陆路上由于张骞的“凿空”，使人们的眼界大开，不但西越沙漠和帕米尔高原，而且远至中亚、南亚。班超和甘英的“远征”，更使人们知道了在亚洲西部、欧洲东南部和非洲东北部的罗马帝国东方的领土（大秦、骊轩）。海路上汉代和东方的日本已经有了密切的往来。但海洋世界的拓展，最重要的还是通向印度洋新航路的开辟。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时的海上丝路，已有了从南部港口徐闻、合浦，经过南中国海，向西到达印度南部黄支国的航线。^⑤但此后直到明代中叶的1300多年间，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认识进展甚微，基本上仍停留在这一区域。期间虽出现过不少伟大的旅行家和航海家，如法显、玄奘、义净、杜环、汪大渊、郑和等，但其活动范围仍未越出这一区域。唐代和宋代与阿拉伯国家交往频繁，有很多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中国不断得知非洲北部和东部的许多信息，但极少有人去过这一地区。明初郑和船队曾远航东非，《郑和航海图》也记录了东非的航路，使中国人对印度洋新航路有了比较确切的认识。但由于当时缺乏科学的测量技术，因此，在地图上反映出来的，多是根据实际见闻的地理知识的映象，出现在地图上标识往往不成比例，有些不曾到达过的山岭荒漠及汪洋大海因为所知甚少，不免画得非常简

略和狭小。特别是郑和以后,中国于非洲的往来又告中断,因此,中国人不可能有世界意识的“洲”的概念,那些西方的“绝远”地区仍是模糊不清的。

最早把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介绍到中国的是利玛窦。利玛窦的《坤輿万国全图》用圆锥投影的方法在地图上绘出了南北二极、赤道南北昼夜的长短、五带;并把当时最新、最高水准的地理知识“五大洲”概念引入了中国。他把当时已探知的地球上的大陆用中文写道:“以地势分輿地为五大洲,曰欧逻巴,曰利未亚(非洲),曰南北亚墨利加(南北美洲),曰墨瓦蜡泥加(南极洲与大洋洲)。若欧逻巴者,南至地中海;北到卧兰的亚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河的湖;西至大西洋。若利未亚者,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东西至红海、仙劳冷祖岛;西至河折亚诺沧。若亚细亚者,南至苏门答腊、吕宋等岛;北至新曾白腊及北海;东至日本岛,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湖;西至红海、小西洋。若亚墨利加者,全为四海所围,南北以微地相联。若墨瓦蜡泥加者,其界未审何如,故未敢订之。”其中欧洲绘出的有 30 余国,如波尔杜瓦尔(葡萄牙)、以西把泥亚(西班牙)、拂郎察(法兰西)、谙厄利亚(英吉利)等。该图对南北美洲作了如下的介绍:“南北亚墨利加并墨瓦蜡泥加,自古无人知有此处,惟一百多年前,欧逻巴人乘船至其海之地方知。然其地广阔而人蛮滑,迄今未详审地内各国人俗。”亚洲介绍了应第亚(印度)、曷刺比亚(阿拉伯)、如德亚(犹太)、北地(西伯利亚)、鞑靼、女真、古丘兹国、日本、朝鲜等。

明末清初对于五大洲作出系统介绍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该书分五卷,卷一亚细亚,对《大明一统志》诸书中已详载的内容多“不复赘”,而“略撮职方之所未载者于左”。^④卷

二欧逻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指出这是“天下第二大洲”,“共七十余国”。^③书中极为详细地介绍了西班牙、法兰西、意大利、德国、法兰德斯、波兰、乌克兰、丹麦、希腊、莫斯科以及地中海诸岛国。卷三利未亚,这也是中国人不熟悉的“天下第三大洲”,“其地中多旷野,野兽极盛。有极坚好文彩之木,能入水土千年不朽者。”称该洲多“异兽”,“因其处水泉绝少,水之所滞,百兽聚焉,更复异类相合,辄产奇形怪状之兽。”^④卷四南北亚墨利加和墨瓦蜡尼加,在“亚墨利加总说”中特别指出:“初,西土仅知有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三大州,于大地全体中止得什三,余什七云是海。至百年前,西国有一大臣名阁龙者,素深于格物穷理之学,又生平讲习行海之法,居常念天主化生天地,本为人生据所,传闻海多于地,天主爱人之意恐不其然,毕竟三州之外,海中尚应有地。……一日行游西海,嗅海中气味,忽有省悟,谓此非海水之气,乃土地之气也,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国土矣。因闻诸国王,资以舟航粮糗器具货财,且与将卒,以防寇盗,珍宝以备交易。阁龙遂率众出海,展转数月,茫茫无得,路既危险,复生疾病,从人咸怨欲还。阁龙志意坚决,只促令前行。忽一日舶上望楼中人大声言有地矣,众共欢喜,颂谢天主,亟取道前行,果至一地。初时未敢登岸,因土人未尝航海,亦但知有本处,不知海外复有人物。且彼国之舟向不用帆,乍见海舶既大,又驾风帆迅疾,发大炮如雷,咸相诧异,或疑天神,或谓海怪,皆惊窜奔逸莫敢前。舟人无计与通,偶一女子在近,因遗之美物、锦衣、金宝、装饰及玩好器具,而纵之归。明日,其父母同众来观,又与之宝货。土人大悦,遂款留西客,与地作屋,以便往来。阁龙命来人一半留彼,一半还报国王,致其物产。”^⑤这是

目前所知汉文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意大利人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记述。后文讲到：“亚墨利哥者，至欧逻巴西南海，寻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即以其名名之，故曰亚墨里加。”^④这也是首次有关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航行到南美，肯定此为新大陆，后人以其名字命名新大陆的史实记述。该书中每洲都各先有总说，除墨瓦蜡尼加外，后均分国别和地区进行介绍，卷五四海总说，介绍分布在地球上的海洋世界。《职方外纪》书名的命题，即旨在打破传统的夷夏观念。《周礼·夏官·司马》记周官制中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⑤艾儒略想藉此告诉中国读者，在“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外，有许多不向中国朝贡的国家，还有着—个远较中国本土更为辽阔的世界。

（三）西方人文地理知识点的初步介绍

《职方外纪》和《坤輿图说》中不仅包含了有关整个世界的自然地理的大量新信息，也为中国人展示了一幅西方人文世界的壮丽图景。在文化景观和文化制度方面，两书表述的内容比重最大，包括了服饰礼仪、饮食起居、建筑特色、生产活动、婚丧习俗、法律教育、宗教信仰、社会保障、文化人物等等。《职方外纪》中对欧洲的介绍特别详细，称：“君臣冠服各有差等，相见以免冠为礼。男子二十已上概衣青色，兵士勿论。女人以金宝为饰，服御罗绮，佩带诸香，至四十及未四十而寡者即屏去，衣素衣。酒悉以葡萄酿成，不杂他物。其酒可积至数十年，当生子之年酿酒，至儿三十娶妇时用之，酒味愈

美。……其国俗虽多酒，但会客不以劝酒为礼。偶犯醉者，终身以为诟辱。饮食用金银玻璃及磁器。天下万国坐皆席地，惟中国及欧逻巴诸国知用椅桌。其屋有三等，最上者纯以石砌，其次砖为墙柱，木为栋梁，其下土为墙，木为梁柱。石屋砖屋筑基最深，可上累六七层，高至十余丈。地中亦有一层，既可窖藏，亦可除湿。瓦或用铅，或轻石板，或陶瓦。凡砖石屋皆历千年不坏。墙厚而实，外气难通，冬不寒而夏不溽。”欧洲“土多肥饶，产五谷，米麦为重，果实更繁。出五金，以金银铜铸钱为币。衣服蚕丝者，有天鹅绒织金段之属，羊绒者，有毡罽锁哈刺之属。又有苧麻之类名利诺者，为布绝细而坚，轻而滑，大胜棉布，敝则可捣为纸，极坚韧，今西洋纸率此物。”生产制作分为“木工、石工、画工、塑工、绣工之类，皆颇知度数之学，制造倍极精巧。凡为国工者，皆考选用之。”该书指出欧洲国家“国主互为婚姻”，婚娶“男子大约三十，女子至二十外，临时议婚，不预聘通。国之中皆一夫一妇，无敢有二色者。”^⑧

《职方外纪》是这样介绍欧洲法律制度的：“欧逻巴诸国赋税不过十分之一，民皆自输，无征比催科之法。词讼极简，小事里中有德者自与和解；大事乃闻官府。官府听断不以己意裁决。所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至详至当。官府必设三堂：词讼大者先诉第三堂；不服，告之第二堂；又不服，告之第一堂；终不服，则上之国堂。经此堂判后，人无不听于理矣。讼狱皆据实，诬告则告者与证见即以所告之罪坐之。若告者与诉者指言证见是仇，或生平无行，或尝经酒醉，即不听为证者。凡官府判事，除实犯真赃外，亦不事先加刑，必俟事明罪定，招认允服，然后刑之。官亦始终不加骂詈，即词色略有偏向，讼者亦得执言不服，改就他官听断焉。吏胥饬

廩虽亦出于词讼,但因事大小以为多寡,立有定例,刊布署前,不能多取。故官府无恃势剥夺,吏胥无舞文诈害。此欧逻巴刑政之大略也。”有关欧洲教育该书这样写道:“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小学选学行之士为师,中学、大学又选学行最优之士为师,生徒多者至数万人。其小学曰文科,有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种诗文,一文章议论。学者自七、八岁学,至十七、八学成,而本学之师儒试之。优者进于中学,曰理科,有三家。初年学落日加(拉丁语 Logica,逻辑学的音译),译言辩是非之法;二年学费西加(拉丁语 Physica,物理学的音译),译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学默达费西加(拉丁语 Metaphysics,形而上学的音译),译言察性理。以上之学总名斐录所费亚(拉丁语 Philosophia,哲学的音译)。学成,而本学师儒又试之。优者进于大学,乃分为四科,而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疗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皆学数年而后成。学成,而师儒又严考阅之。”在这“四科大学之外”,还有“度数之学(数学)”,“数者立算法家(即代数学家),度者立量法家(测量学家)”,“数者在音相济为和,立律吕家(即乐理学家)”,“度者在天迭运为时,立历法家(即天文学家)”,等等。^③

《职方外纪》还相当详细地介绍了欧洲人的宗教:“欧逻巴国人奉天主正教,在遵持两端:其一,爱敬天主万物之上;其二,爱人如己。爱敬天主者,心坚信望仁三德,而身则勤行瞻礼工夫。其瞻礼殿堂自国都以至乡井,随在建立。复有掌教者专主教事,人皆称为神父,俱守童身,屏俗缘,纯全一心,敬事天主,化诱世人。其殿堂一切供亿,皆国王大臣民庶转输不

绝,国人群往归马[焉]。每七日则行公共瞻礼,名曰弥撒。此日百工悉罢,通国上下往焉,听掌教者讲论经典,劝善戒恶。女妇则另居一处听讲,男女有别。其爱人如己:一是爱其灵魂,使之为善去恶,尽享天生之福;二是爱其形躯,如我不慈人,天主亦不慈我。”正是在这一宗教的熏陶下,欧洲人有着比较完备的慈善机构和社会保障机制:“欧逻巴人俱喜施舍,千余年来,未有因贫鬻子女者,未有饥饿转沟壑者。在处皆有贫院,专养一方鳏寡孤独。处其中者,又各有业,虽残疾之人亦不废。如瞽者运手足,瘖者运耳目,各有攸当,务使曲尽其才,而不为天壤之废物。又有幼院,专育小儿,为贫者生儿举之无力,杀之有罪,故特设此院,令人抚育,以全儿命。”病院(医院)“大城多至数十所,有中下院处中下人,有大人院处贵人。凡贵人若羁旅、若使客,偶患疾病,则入此院。院倍美于常屋,所需药物悉有主者掌之,预备名医,日与病者诊视,复有衣衾帷幔之属,调护看守之人。病愈而去,贫者量给资斧。此乃国王大家所立,或城中人并力而成,月轮一大贵人总领其事,凡药物饮食皆亲自验视之。”另外还设有失物招领处,“人遇道中遗物或兽畜之类,必觅其主还之,弗得主则养之。国中每年数日定一公所,认识遗畜,失者与得者偕来会集。如遇原主,则听其领去,如终弗得主,则或宰肉或卖价,以散贫人。若拾金银宝物,则书于天主堂门外,令人来识。先令预言其状,如一一符合,即以还之,不得主,亦散于贫乏。”^⑩

欧洲各国中,《职方外纪》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介绍最为详细,这可能与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所据的原本和抄本和这两个国家有相当的关系,福建税瑯所献的世界地图可能得之西班牙海舶,故该书中的许多地名译法与利玛窦的地名译

法很不一样,如德国(拉丁语 *Aleman*),利玛窦译“入尔马泥亚”,艾儒略译“亚勒玛尼亚”;丹麦(拉丁语 *Dinamarca*),利玛窦译“第那玛尔加”,艾儒略译“大泥亚”。^④抄本的作者一是西班牙人庞迪我,一是意大利人熊三拔。因此该书中对两国的城市的景观描写特别生动。如称西班牙“国中有二大名城;一曰西未利亚(*Sevilla*,今译塞维利亚),近地中海,为亚墨利加诸舶所聚,金银如土,奇物无数,又多阿利秣果,有一林长五百里者。一名多勒多城(*Toledo*,今译托莱多),在山之巅,取山下之水以供山上,其运水甚艰。近百年内有巧者制一水器,能盘水直至山城,而绝不赖人力,其器昼夜自能转动也。又有浑天象,其大如屋,人可以身入其中,见各重天之运动,其度数皆与天合。相传制此象者注想十七年,造作三年,曾未重作一轮。其境内有河,曰寡第亚纳,伏流地中百余里,穹窿若桥梁,其上为牧场,畜牛羊无算。有塞恶未亚城(*Segovia*,今译塞哥维亚),乏甘泉,遥从远山递水,架一石梁,梁上作水道,擎以石柱,绵亘数十里。又一都城,悉皆火石砌成。故本国有言:以西把尼亚有三奇,有一桥万羊牧其上,有一桥水流其上,有一城以火为城池也。”对托莱多城的天主教堂有很详细的描述:称其“创建极美,中有金宝祭器不下数千。有一精巧银殿,高丈余,阔丈许,内有一小金殿,高数尺,其工费又皆多于本殿金银之数。其黄金乃国人初通海外亚墨利加所携来者,贡之于王,王用以供天主耶稣者。近来国王又造一瞻礼大堂,高大奇巧无比,修道之士环居焉,其内可容三国之王,水泉四十余处。堂前有古王像六位,每位高一丈八尺,乃黑白玉琢成者。堂内有三十六祭台,中台左右有编箫二座,中各有三十二层,每层百管,管各一音,合三千余管,凡风雨、波涛、呕吟、战斗,与夫

百鸟之声,皆可模仿,真奇物也。又有书堂,阔三十步,长一百八十步,周列诸国经典书籍,种种皆备,即海外额勒济亚国(希腊)之古书,亦以海舶载来,贮于此处。”对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城市景观,艾儒略有身临其境的描述:“城周一百五十里,地有大渠,名曰地白里,穿出城外百里,以入于海。四方商舶悉输珍宝骈集此渠。自古名贤多出此地。曾建一大殿,圆形宽大,壮丽无比,上为圆顶,悉用砖石,砖石之上,复加铅板。当瓦顶之正中,凿空二丈余以透天光,显其巧妙,供奉诸神于内。”这就是著名的罗马万神殿。他还提及了罗马贵族的避暑胜地弗拉斯卡蒂和圣彼得大教堂,前者在苑“中造流觞曲水,机巧异常,多有铜铸各类禽鸟,遇机一发,自能鼓翼而鸣,各有本类之声。西乐编箫,最有巧音,然亦多假人工风力成音。此苑中有一编箫,但置水中,机动则鸣,其音甚妙。此外又有高大浑全石柱,外周画镂古来王者形象故事,灿然可观。其内则空虚,可容几人登阶上下,如一塔然。”后者“悉用精石制造,花素奇巧,宽大可容五六万人,殿高处视在下之人如孩童然。”^④

在文化景观的描述上,应该特别提到《坤輿图说》卷下有关世界七奇的记述:一为亚细亚洲巴必鸾城,即著名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城池形势矩方,每方长五十里,周围计二百里,城门通共一百,皆净铜作成。城高十九丈,阔厚四丈八尺,用美石砌成。城楼上有园圃树木,景致接山水,涌流如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万。”二为铜人巨像,即爱琴海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高三十丈,安置于海口,其手指一人难以围抱,两足踏两石台,跨下高圻能容大舶经过,右手持灯,夜间点照,引还舶认识港口丛舶。铜人内空通,从足至手有螺旋梯升上点灯。造工者,每日千余人作十二年乃成。”三为利未亚洲厄日

多国孟斐府尖形高台,即埃及金字塔,“多禄茂王建造,地基矩方,每方一里,周围四里,台高二百五十级,每级宽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皆细白石为之。自基至顶计六十二丈五尺,顶上宽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万。”四为亚细亚洲嘉略省茅索禄王茔墓,即摩索拉斯陵墓,“亚尔德弥细亚后追念其夫,建造茔墓,下层矩方,四面各有贵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廊圆拱各宽七丈余,内有石梯至顶,顶上铜辇一乘,铜马两匹,茅索禄王像一尊。其奇异一在制度,二在崇高,三工精,四质料纯细白石,筑造将毕,王后忆念其夫王,怅闷而殁。”五为亚细亚洲厄弗俗府供月祠庙,即小亚细亚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安丽奇巧,基址建在湖上,一免地震摧倒,高四十四丈,宽二十一丈,内有细白石柱共一百五十七株,各高约七丈,庙内甚多细石绝巧人像。庙外四面各有桥梁一道,以通四门,桥最宽阔,细白石作成。正门前安置美石精工神像。筑工者至二百五十年乃成。”六为欧逻巴洲亚嘉亚省供木星人形之像,即希腊奥林匹亚宙斯像,“斐第亚天下名工,取山中一块最硬大石,雕刻木星人形之像,身体宏大,工精细巧,安坐庙中。时有讥笑者对工师曰:‘设使这宏大之躯起立,岂不冲破庙宇乎?’工师答曰:‘我已安置之,万不能起立。’”七为法罗海岛高台,即埃及法罗斯灯塔,“高台基址起自邱山,细白石筑成,顶上安置多火炬,夜照海艘以便认识港涯丛泊。”除古代世界七大奇迹外,南怀仁还特地加上了第八大奇迹“古罗马斗兽场”：“罗马府营建公乐场一埏体,势椭圆形,周围楼房异式,四层高二十二丈余,俱用美石筑成。空场之径七十六丈,楼房下有畜养诸种猛兽多穴,于公乐之时,即放出猛兽在场相斗,观看者坐团圆,台级层层相接,高出数丈,能容八万七千人座位,其间各

有行走道路，不相逼碍。”八大奇迹均附有插图。^⑬

值得注意的是《职方外纪》在明末最早提到了一批欧洲重要的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如介绍希腊时提到了埃维亚的海潮一天有七次，“名士亚利斯多（即亚里士多德）遍穷物理，惟此潮不得其故，遂赴水死。其谚云：‘亚利斯多欲得此潮，此潮反得亚利斯多。’”^⑭在介绍意大利时称古希腊西西里岛人亚而儿墨得（即阿基米德）有“三绝”：“尝有敌国驾数百艘临其岛，国人计无所出，已则铸一巨镜，映日注射敌艘，光照火发，数百艘一时烧尽。又其王命造一航海极大之舶，舶成，将下之海，计虽倾一国之力，用牛马骆驼千万，莫能运舟。儿墨得营运巧法，第令王一举手，舟如山岳转动，须臾下海矣。又造一自动浑天仪十二重，层层相间，七政各有本动，凡日月五星列宿运行之迟疾，一一与天无二。其仪以玻璃为之，重重可透视，真希世珍也。”^⑮在介绍丹麦时谈到了著名天文学家地谷白刺格（即第谷），称其“酷嗜玛得玛第加（即数学）之学。尝建一台于高山绝顶，以穷天象，究心三十余年，累黍不爽。其所制窥天之器，穷极要妙。后有大国王延之國中，以传其学，今为西土历法之宗。”^⑯在介绍西班牙“共学”（即指大学）时提到了“名贤”多斯达笃，称其“著书最多，寿仅五旬有二，所著书籍就始生至卒计之，每日当得三十六章，每章二千余言，尽属奥理。后人绘彼像，两手各持一笔，章其勤敏也。”谢方校释中未能注出。^⑰杨绛顺藤摸瓜，据《堂吉诃德》一书中考证出这位主教 el Tostado 是阿维拉（Avila）主教堂阿朗索·李贝拉·台·马德里加尔（Don Alonso Ribera de Madrigal, 1400? —1455），“多斯达笃”是个绰号，因为他混有吉普赛人的血统，面色焦黄，所以绰号“焦黄脸儿”，后在西班牙多用来称呼多产的作家。“多

斯达笃”是中国文献里最早出现的西班牙作家。^④

这些西方人文地理的资料足以向中国人表明,在远离中华文化的“绝域”,同样有着完全可以和中国的声教仪章相媲美的礼乐教化。

三、明末清初地理学汉文西书的传入与 中国士大夫的“世界意识”

中国历史上有过漫长的“自我为中心”的时代,中国士大夫一直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普天之下最高的文明的样式。宋代理学家石介的《中国论》很能代表中国士大夫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明优越感和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轻视:“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⑤这种“天下观”的形成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最东部,西北是荒野沙漠、西南是高山深谷、南面热带丛林、东临汪洋大海,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在中国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特殊的文化体系——夷夏传统。所谓“夏”是指孕育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夷”则是指处于这个中心四周的部族,是不知华夏文明、未受礼仪熏沐的少数民族,依其与中原所处的方位,分别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四方的部族,在中国士大夫的眼中,是处在没有声教礼仪的野蛮状态。从汉代到明初郑和七下西洋的1300多年间,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认识进展非常地缓慢,使“四海之内”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不断地强化为一种“虚幻环境”,这在中国历代刻印的“华夷图”、“广舆图”

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从北宋神宗时所做的《华夷图》碑到罗洪先的《广舆图》，都把周边国家的位置标得模糊不清，中国的区域画得颇大，而汪洋大海却绘得很小。利玛窦一踏上中国土地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中国人认为他们辽阔领土的范围实际上是与宇宙接壤的。与他们国家相邻接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一顾的。”他这样评论明代人绘制的舆地全图：“据说是表示整个世界，但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个省，在它四周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加在一起还不如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羨。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⑩利玛窦没有将中文版的《山海舆地图》献呈万历，主要也是担心皇帝看到世界地图中的“大明”这么小会大发雷霆，会责怪利玛窦藐视中国人。但出人意料的是，利玛窦送给太监的中文版世界地图由太监进呈给万历后，这位不上朝的皇帝竟然非常喜欢，并传旨命献六轴十二幅绸印的世界地图，并把这些绘制精美的地图赏赐给太子和皇亲，让他们装饰住宅。并要求利玛窦继续复制。利玛窦认为：“皇帝这样优渥看待我们的一件作品，并不是不足道的事情，既然当时许多人予以小看，而且根本不相信……特别是在谈起基督教、驳斥其他教派的谬误的时候。这些地图恒常放在皇宫大殿里，于是，我们可以指望皇上或太子或其他皇族成员会凑巧来好奇地询问我们

的神圣信仰。事实上,我们也只有这一个办法同他们沟通,既然他们不与外界有任何交往。此外,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国家比起许多别国来是那么小,骄横可能会打掉一些,会屑于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⑧应当说,利玛窦的这一努力取得了成果。

明末清初地理学汉文西书传人的新知识点使中国士大夫开始反省自己的天下观,他们在清楚划分的五洲、分明的经纬度和到处写满了国名的世界地图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他们从惊羨、好奇到反感、拒斥,而最终产生了对原有“虚幻环境”的深深疑虑。“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他们不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还这样写道:“在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全图。有学识的中国人啧啧称羨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和说明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图。……当他们听说中国仅仅是大东方的一部分时,他们认为这种想法和他们的大不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求能够加以研读,以便作出更好的判断。”^⑨确实有不少中国士大夫由于接触了西方地理学图书而逐渐接受耶稣会士带来的这种“世界意识”。如徐光启最初就是1600年春在南京先后接触了赵可怀和吴中明两位进士所刻的利玛窦的世界地图,^⑩渐渐为利玛窦所吸引,认为:“西泰子之言天地圆体也,犹二五之为十也。”并为地圆说作了正、戏、别三论详细地加以解说。^⑪李之藻《刻职方外纪序》说自己在1601年“从寮友数辈访”利玛窦,“其壁间悬有大地全图,画线分度甚悉”。以后便醉心于西方的制图学,指出

中国传统图学的缺陷,“余依法(利玛窦教授的西法)测验,良然。乃悟唐人画方分里,其术尚疏。”叶向高《职方外纪序》称利玛窦当年“画为《舆地全图》,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人愈异之。……其言舆地,则吾儒亦有地如卵黄之说,但不能穷其道里、名号、风俗、物产,如泰西氏所图记。”⁶⁹利玛窦说有些士大夫“头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地图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拿它开心,但更有教育的人却不一样,特别是当他们研究了相当于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时。再者,他们得知五大地区的对称,读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风俗,看到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这时候他们承认这张地图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从此之后,他们对欧洲的教育制度有了更高的评价。”这些西书对于中国士大夫来说,的确是全新的东西,传教士们“把附有描述性地图的书或者用图表和草图说明的建筑模型拿给这些人看时,他们都感到高兴和惊诧。整个国家连同城市、宫殿、高塔、拱门、桥梁、大庙等等在一本书中一览无遗,这种概念他们简直惊奇不已。他们对能够目睹这些分散那么广而彼此相距那么远的光辉事物,而且能够在自己家里饱览它们,真是惊叹不已。”“他们终于开始明白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真正区别”而抛弃了“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的“错误看法”。⁷⁰

这种对“自我为中心”的“虚幻环境”的疑虑和对“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世界意识”的认同突出地表现在一些士大夫为《职方外纪》所写的序言里。杨廷筠《职方外纪序》写道:“西方之人,独出千古,开创一家,谓天地俱有穷也而实无穷,以其形皆大圆,故无起止,无中边。最轻清者为天,天体多重,迥出

地外；最重浊者为地心，恰恰正在天中，以其为重浊，本所有形有质者，皆附就之。此外上下四傍，皆系轻清，重地不能就轻，自不能倒落一处。……遍地周遭皆人所居，不得以地下之人与我脚底相对，疑其有倾倒也。”称赞该书“考图证说，历历可据，斯亦奇矣！”李之藻在《刻职方外纪序》中认为该书“种种咸出俶诡，可喜可愕，令人闻所未闻。然语必据所涉历，或彼国旧闻征信者。”并感慨地记下了艾儒略告诉他的话：“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处。”其中犹以瞿式谷的《职方外纪小言》最为突出，他指出：“邹子九洲之说，说者以为阔大不经。彼其言未足尽非也。天地之际，赤县神州之外，奚啻有九？则见犹未堕方隅。独笑儒者未出门庭，而一谈绝国，动辄言夷夏夷夏。若谓中土而外，尽为侏离左衽之域，而王化之所弗宾。呜呼，是何言也！”他认为从地理学汉文西书中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戈戈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并蛙之诮乎！曷征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踏矣。且夷夏亦何常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汨汨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其可以地律人以华夷律地而轻为訾诋哉！”认为《职方外纪》一书足以“破蜗国之褊衷”。^⑦

地理视界的拓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眼界的拓展。明末清初的一些士大夫开始跳出“虚幻环境”，用一种平等的眼光来审视中西文化的短长，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许对西学并无太多的认识，但由于与异域文化的接触，使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健康

和开放的心态。如明末学者谢肇淛的《五杂俎》一书中写道：“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⑤是否通晓文理、温文尔雅历来是中国士大夫用来区别文野的标准，此时谢氏将其用之描述远在佛国之西的天主教国家，实际上已把天主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了。米嘉穗在为刻于1637年的艾儒略《西学答问》所撰的序文中这样说道：“吾人睹记所及，尝不若所未及。《中庸》语道之至，至人所不知，所不能，非其心思域之，抑亦耳目限之也。学者每称象山先生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之说，然成见作主，旧闻塞胸，凡纪载所不经，辄以诡异目之。抑思宇宙大矣，睹记几何？于瀛海中有中国，于中国有我一身，以吾一身所偶及之见闻，概千百世无穷尽之见闻，不啻井蛙之一窥，萤光之一照也。乃沾沾守其师说，而谓六合内外，尽可不论不议，此岂通论乎？”^⑥这种对于不同于旧闻的外来事物，不是采取简单地斥之为诡异而一概否定，而是主张不固守师说的虚怀若谷的境界，读来令人赞叹不已。17世纪的地理学家孙兰在1693年完成的《柳庭舆地隅说》自序中写道：“吾中国土地在大地中止东南一隅，合华裔而统计之，才八十一分一耳。”他将全球划分为三个大区域，即“三大殊方”，“谓南极、北极与赤道也。”并具体描述了其气候与地文特征。在《大地山河图说》中还以图文并用的形式传播了西方的地圆说等地理知识。^⑦即使一些保守的士大夫对西方传人的地理学也抱着疑信参半的心态，《明史·意大利亚传》称利玛窦的《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认为“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⑧这种冷眼鄙视，却又不得不正眼看待的心态，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撰者的笔下，显得尤为突出。如总纂纪昀一方面在评论

《坤輿图说》是中有关罗得岛上的铜人巨像“跨海而立,巨舶往来出其胯下者”,是属于东方朔的《神异经》之流,但也指出“核以诸书所记,贾舶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存广异闻,固亦无不可也。”^④对《西学凡》的评论则显得更为典型:“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人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知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⑤在纪昀看来,西学是一种全然不同于儒家文化的知识形态,但这种“异学”却又不可小觑。正是在他的观点的支配下,《四库全书》虽未收入《西学凡》,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承认它是一种知识,归类于子部杂家类。纪昀的评论约写于18世纪下半叶,可见明清之际,西学作为一种新知识点,已被中国士大夫所认可,并企图把它们整合到传统的知识体系之中。

四、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学术挑战与中国士大夫的非学术应战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把一种文明生长和解体过程的兴盛与衰落,理解为这种文明能否对于不断出现的新挑战成功地进行胜利的应战。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尚未面对来自西方的政治与军事的真正挑战,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一次人类文明史上知识和智慧的交锋。在明末清初汉译西

方地理学图书所引入的新知识点中,尽管耶稣会士出于向中国人传教的需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他们的故乡欧洲的社会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美化,以告诉异教徒在那些信奉天主的国度里有着怎样一种人间乐园,但在自然地理的描述和人文地理的分类层面上,这些知识成果是取得了大大超过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成就。地理学汉文西书所引入的新知识点,对于中国地理学无疑在思想史上是一次重大的学术挑战。

在明末至清中期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仅仅局限于很小的学者圈子里,远远没有成为一般有知识的中国人的地理常识。耶稣会士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也只是停留在打破中国人的“自我为中心”的“虚幻环境”这一层面上,以便有利于他们的传教活动,而没有在地理学的学术层面上与中国学者进行过交锋。1708年至1717年间康熙发起和主持的《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活动,是当时世界水平的一次测绘活动,但并不属于中国地理学者与西方传教士的科学合作,而只是西方传教士为使康熙改信天主教而满足其个人科学兴趣、同时也符合派出国科学需要所进行的一次测绘工作。一些在钦天监学习过数学、测量的中国喇嘛和理藩院官员所绘的西藏新图,显然是不准确的,只是因为此图“出自钦天监出身的喇嘛之手,不敢过分批评,便据以成图。”中国学者除何国栋、索柱、李英等少数几人外,其他参与实测人员根本不见于史料记载。尽管《皇舆全览图》以后有过多种版本,但其实际上真正被中国地理学者所利用是在19世纪初。^④1703年2月10日,来华一年多的法国耶稣会士沙守信在给勒·戈比安的信中,描述了自利玛窦在肇庆绘制出第一幅世界地图的一百一十多年后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似乎仍停留在西方地

理学知识东传的最初阶段。他说中国人经常问他“欧洲是否有城市、村庄和房屋。我亲眼见到他们看到世界地图万分惊讶和困惑的神态,真令人忍俊不禁。有九、十个中国文人求我让他们看看这张地图,他们不知中国在哪个方位,在地图上找了好久。他们把包括欧洲、亚洲、非洲的东半球都当作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不可想象世界上竟还有美洲存在。我故意不纠正他们的错误,直到其中有一人开口要求我解释地图上的字母和名称,我才开口道:‘你们瞧,这是欧洲、非洲和亚洲,这是波斯、印度、中国所在的鞑靼。’‘中国在哪里?’他们异口同声叫起来。‘就在这个小角落’,我答道,‘这是中国的边界。’他们惊讶万分,面面相觑,用中国话喃喃说道:‘小得很。’”^⑥

“没有像挑战一样的应战,就不会产生创造性的火花。”^⑦自明末以来,除了极个别中国学者,如李之藻、方以智、孙兰那样能在地理学的层面上对西方地理学作出若干对话外,绝大部分的学者仅仅只是初步的吸纳而已,还谈不上对西方地理学的学术应战。而还有更多的是属于维护道统的辱骂,其重心仍不外旨在维护天朝为中心的“虚幻环境”。魏瀚的《利说荒唐惑世》一文称:“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舆地全图》及泐洋窅渺,直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听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⑧甚至一些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还根本不信地圆说,如《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就反对西方的地圆说,曾为利玛窦《交友论》一书作润饰的江苏学者王肯堂,虽然也同意利玛

窠的地圆说,并把“西域人利玛窠言日体大过于地”作为“确乎不可易”之论写在自己的笔记中,但在地理概念上仍把欧罗巴与西域混为一谈。^⑧王夫之对之抨击更为激烈:“利玛窠至中国而闻其说,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遂为地形之果如弹丸,因以其小慧附会之,而为地球之象。……则地之欹斜不齐,高下广衍,无一定之形,审矣。而利玛窠如目击而掌玩之,规两仪为一丸,何其陋也!”^⑨没有在地理学层而上作出应战的根本原因,是明末清初的大部分学者对欧洲的存在始终将信将疑,因为对西方地理学的认可,有可能会从物质技术到社会规范的一系列的认同,进而会对中国传统的心理认知系统产生挑战。

正如张维华所指出的:“明人于欧西地理始终不明,而于西士所言及其著述,亦始终疑为伪妄。”^⑩清初同样如此,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纪昀等校订的《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八《四裔考》六“意达里亚”批评《职方外纪》:“以千余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又其所自述彼国风土物情政教,反有非中华所及者,虽荒远犷獠,水土奇异,人性质朴,似或有之;而即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在《四裔考》的“博尔都噶尔亚(即葡萄牙)”中又称:“自利玛窠始为全图,流传中国,厥后庞迪我翻刻西洋地图,衍为图说,艾儒略辑为《职方外纪》,其言未免夸张,正《庄子》所云存而不论者。”^⑪有的清代学者甚至还认为利玛窠的《万国全图》把中国所处之地译为“亚细亚”,西洋译为“欧逻巴”是居心险恶,因为“欧逻巴”“必夸大之语”;而“亚”者,《尔雅·释诂》云:次也;《说文解字》云:丑也;《增韵》云:少也。“细”者,《说文解字》云:微也;《玉篇》云:少也;可见“亚细

亚”的中文则为“次小次洲也”。认为“明人甘受利玛窦之侮慢而不之觉,曾无一人悟其奸者。”^②这些完全抹杀客观事实所作出的简单结论乃至接连不断的辱骂,显示了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士大夫一直没有能像对待西方几何学一样的心态去面对西方地理学,因此也就不能像梅文鼎、李鹗培那样用传统的中算来面对《几何原本》一样,在地理学的学术层面上对地理学汉文西书进行应战。

明末修订《崇祯历书》时,哥白尼的日心说已经传入中国。席泽宗、江晓原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崇祯历书》共译出了《天体运行论》中 11 章的内容,引用了哥白尼 27 项观察记录中的 7 项。汤若望等人在《崇祯历书·五纬历指》卷 1 中有一段话几乎直接译自《天体运行论》I 8 的 519 页,其内容是用地球自转来说明天球的周日视运动。^③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1767 年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皇帝献上了他 1761 年手绘的《坤輿全图》,该图宽 13~14 尺,高 6 尺,为两半球图。在《耶稣会士通讯集》第四册收入的蒋友仁书信中曾述及此图附有说明,介绍关于地动及行星运动的最新学说。^④这些最新学说包括(一)确认地球为椭圆柱体。(二)介绍了刻卜勒关于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三)引入了行星和卫星都有公转和自转的概念,指出七大行星“一循行其本轮,一旋转于本心。”(四)介绍了宇宙体系的四派学说:多禄亩(即托勒密)、的谷(即第谷)、玛尔象、哥白尼的体系。该书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指出:哥白尼体系“置太阳于宇宙中心”,“歌白尼论诸曜,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人初闻此论,辄惊为异说,盖止恃目证之故。”“今精求天文者”刻卜勒、牛顿、卡西尼等都是哥白尼的拥护者。^⑤蒋友仁在该书稿的跋中写

道：“本朝圣祖仁皇帝屡遣使臣，往穷河源等处，测量地度，绘入舆图，……友仁以观光陪臣，幸逢盛际，谨取新辟西域诸图，联以西来所携手辑疆域梗概，增补《坤輿全图》，或以供有识卧游之万一也。若夫诸曜远近之次，各方经纬之度，浑天仪之新制，以及日月五星之体象，与夫轮心、轮径之比例，西士屡经测验，古疏今密，其立论不同之大略，书于图之各旁，以俾览此图者，因象以究其理，亦未必无小补云。”^⑥遗憾的是这部详细而明确地介绍了欧洲近代科学重要标志的哥白尼日心说的图说，未能引起正在热心筹划编修《四库全书》的乾隆皇帝的兴趣，该书在深宫禁院中整整躺了三、四十年，才由钱大昕详加润饰，把稿子定名为《地球图说》，并让其学生李锐按照文意补绘了两幅地图和十九幅天文图，附在书后正式出版。^⑦这一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地理学文献，在清中期的知识界未能引起一些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的重视，更谈不上学术层面的回应。为此书润饰的著名学者钱大昕也未认识到此书的认识价值，他在给戴震的信中认为西方学者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不断改变对地球与太阳的看法是不慎重的：“只此百年之中，已不能守其旧率，”以为第谷那一套“本轮、均轮本是假象，今已置之不用，而别创一椭圆之率。椭圆亦假象也”，关键还在于“推算与测验”。^⑧以学识渊博著称的阮元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竟然说：“是说也，乃周公、商高、孔子、曾子之旧说也，学者不必喜其新而宗之，亦不必疑其奇而辟之可也。”^⑨他在《畴人传》中甚至指责哥白尼等“无识之徒，以其能言盈缩、迟疾、顺留伏逆之所以然，遂误认苍苍者天果有如是诸轮者，斯真大惑矣。”日心说“谓为地球动而太阳静”，是“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⑩由这些完全缺乏学术见解的回应，我们不

难理解为什么在曾经组织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地图测绘的中国,却在后来官方绘制的《西域图志》中仍不绘经纬线,民间个人绘制的《西藏图考》、《西招图略》、《卫藏图识》不仅不绘经纬线,甚至连比例尺也不受重视了。^④清代中期以后的百余年间,中国学者几乎已经无法理解中国之外有着辽阔的五大洲,直到光绪年间的王之春还把“大地之土……泰西人分为四土……中华仅得亚细亚四分之一”作为自己的重大发现写人自己的《椒生随笔》一书。^⑤知识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进步的想法只是人们的一相情愿,如果一个社会的知识成果不能有效地得到积累,那么,社会总体知识水准往往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晚明至晚清的地理学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明末至清末的三百余年间,中国学术界尚未形成西方地理学得以根植的土壤,特别是清初满族人主中原,汉族士大夫的华夷观念伴随着抗清运动进一步得到了有意识的强化,顾炎武在《徙戎》一篇中就典型地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严夷夏之大防意识,认为夷狄一旦学习了中国的统治方法,熟习中国的礼仪风俗后,“而狼子野心,旋生于异日。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由于此”。主张采用古代圣贤的馭夷之法,不能“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要把夷狄与中国文化隔离开来。^⑥原来还尚未完全形成的“世界意识”被异族入侵后兴起的强烈民族意识彻底挤压掉了。像顾炎武这样有学问的人竟然在世界地理方面表现得非常无知,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佛郎机国在爪哇南,古无可考,……素不通中国,正德个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銃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先年潜遣火者亚三假充满刺加国遣礼使臣,风飘到澳,往来窥伺,熟我道途,略买小儿,烹而食之。”^⑦地理学汉文

西书一直未能真正用于研究西方这一陌生的世界,“世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仍是一片混沌。没有一批学者有效地去利用这批知识资源,康熙二十二年(1683)陆次云的《八纘译史》虽在外国部分中抄录了《职方外纪》的内容,但该书以中国为中心的叙述周边东南西北的基本结构是中外混杂,地理方位错误百出,表明基本上没有读通《职方外纪》。康熙五十四年(1715)图理琛完成的《异域录》完全没有采用利玛窦、艾儒略等人的西方地理译名。1730年著名的地理学家陈伦炯写成的《海国闻见录》仍是用《东洋记》、《东南洋记》、《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和《昆仑》等篇章来记述外国地理,这种“五洋”仍不脱天朝为中心的阴影。他所绘的世界地图甚至没有南北亚墨利加洲,上述这些中国人的外国地理著述,无论在资料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较《职方外纪》落后了大大的一截。^⑤1782年遍历亚、欧、非、美诸国14年的谢清高所著、由杨炳南述的《海录》表明,著述者都未读过《职方外纪》等地理学汉文西书,书中有关译名,“所述国名悉操西洋土音或有音无字,止取近似者名之。”书中虽记录了有关“咪利坚”的新资料,但整部书仍是以西南海、南海、西北海来描述世界地理的。^⑥因此,乾隆八年(1743)成书的《大清一统志》根本不研究耶稣会士所编的世界地图,一会儿说西洋在印度洋附近,一会儿又说西洋在西南海中,又说苏门答刺、爪哇、佛郎机、荷兰,也在西南海中。

不能认识到地理学汉文西书的意义及其价值,因而也没有人能对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地理学知识作深一层的学术研究,因此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应战,这部分异质知识点无法有序地联成知识线,更谈不上建立文化认识上的“地理台

阶”。^⑤而“地理台阶”恰恰正是知识结构产生变动的重要的基础。不能建立起这一“地理台阶”，对异域文化的认识就无法踏上物质技术的层面，进而深入社会规范和心理认知的层面。即使已经传入的新知识点，也会由于缺乏可以凭借的“地理台阶”的依托，很快被淹没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里。这部分地理知识资源的再度受到重视，那已是 19 世纪中期中国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了。当然，这批地理学汉文西书对于晚清以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家来说，其意义犹如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一样的重要。

注释：

- ① 赵汝适《〈诸蕃志〉序》，载《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 1996 年，页 1。
- ② 麦卡托投影法是一种正轴等角切圆柱投影方法，其特点是任何经纬线都是呈直角相交的平行直线。经线的间隔相等，纬线的间隔随纬度的增高而加大。该投影没有角度变形，距离变形和面积变形都是从赤道向两极增大。在该投影绘制的地图上，长度和面积的变形都是很显著的。但是，由于它具有各个方向均等扩大的特性，因而就保持了方向和相互位置的正确。中国地图是以大地为平面利用方格制图的经验方法来绘制的，直到利玛窦将麦卡托科学投影法传入，才使得经纬度投影地图学在中国产生。（参见张奠坤、杨凯元编著《地图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页 60—61；卢志良《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 1984 年，页 76—77。）
- ③ 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载《禹贡》第 5 卷（1936 年），第 3、4 期合刊。
- ④ 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 1987 年，页 788—789、818—822。
- ⑤ 《奏疏》，载[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 1996 年，页 17—18。

- ⑥ [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 1996 年，页 3—4。
- ⑦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 1949 年，页 300。
- ⑧ 参见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6 年，页 4；《地理杂志》（伦敦）1975 年第 12 期，页 751—759。
- ⑨ 参见卢楨埴《韩国的古世界地图研究》，韩国晓星女子大学博士论文，1992 年，页 79—84。
- ⑩ 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6 年，页 8—9。
- ⑪ [澳]王省吾《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所藏彩绘绢本南怀仁〈坤輿全图〉》，纪念谭其骧先生八十五周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1996 年复旦大学。
- ⑫ 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6 年，页 11。
- ⑬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 1949 年，页 318；[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称《坤輿图说》有 1672 年的北京刻本，中华书局 1995 年，页 356。现藏上海图书馆的《坤輿图说》本无出版时间，前有莫棠的题签，称“是本殆原刻，不恒见”。该本前有艾儒略序，南怀仁（1623—1688）是 1659 年至中国，其时艾儒略（1582—1649）已去世 10 年。莫棠的解释是“南怀仁著书时尤未入国朝也”。艾儒略去世那年，南怀仁只有 26 岁，尚未决定来华传教，能否写出如此有份量的地理学汉文西书，这实在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
- ⑭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
- ⑮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 1979 年，页 762。
- ⑯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年，页 86。
- ⑰ 赵君卿注、周甄鸾重述、李淳风注释《周髀算经》卷下，载《景印文渊

- 阁四库全书》第 786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页 40—41。
- ⑮ 《晋书》卷 11《天文志》,载《二十五史》第 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年,页 1274。
- ⑯ 张衡《浑天仪图注》,载洪颐煊撰录《经典集林》卷 27,陈氏慎初堂影印本。
- ⑰ 刘金沂、赵澄秋《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年,页 113、116。
- ⑱ 王夫之《思问录内外篇》,同治四年(1865)湘乡曾氏刊本,页 34。
- ⑲ 《元史》卷 48《天文志·西域仪象》,载《二十五史》第 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年,页 7 359;参见江晓原著《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页 183—185。
- ⑳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 1976 年,页 228。
- ㉑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 1957 年,页 99。
- ㉒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禹贡学会 1936 年影印本。
- ㉓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上海书店 1984 年影印本,页 107—108。
- ㉔ [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 1996 年,页 27。
- ㉕ [法]南怀仁撰《坤舆图说及其他一种》,商务印书馆 1937 年,页 5—20。
- ㉖ 《左传·昭公七年》;《诗经·小谷北》。
- ㉗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五史》第 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年,页 30。
- ㉘ 《汉书·地理志》,载《二十五史》第 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年,页 524。
- ㉙ [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 1996 年,页 33。
- ㉚ 同上,页 67。

- ⑳ 同上,页 105。
- ㉑ 同上,页 119—120。
- ㉒ 同上,页 120。
- ㉓ 《周礼注疏》,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79 年影印本,页 861—862。
- ㉔ [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 1996 年,页 67—68。
- ㉕ 同上,页 69—73。
- ㉖ 同上,页 70—72。
- ㉗ 同上,中华书局 1996 年,页 3、93、97。
- ㉘ 同上,页 76—78、84—85。
- ㉙ [法]南怀仁撰《坤舆图说及其他一种》,商务印书馆 1937 年,页 217—232。
- ㉚ [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 1996 年,页 98—99。
- ㉛ 同上,页 87。
- ㉜ 同上,页 97。
- ㉝ 同上,页 76、80。
- ㉞ 杨绛《〈堂吉诃德〉译余琐掇》,载《读书》1984 年第 9 期。
- ㉟ 石介《中国论》,载陈植锽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 1984 年,页 116。
- ㊱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 1983 年,页 6、179、181。
- ㊲ [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评传》,商务印书馆 1993 年,页 557—558。
- ㊳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 1983 年,页 179—180。
- ㊴ 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页 64。

- ⑤④ 《题万国二圖序》，载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页 63。
- ⑤⑤ [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 1996 年，页 6、13。
- ⑤⑥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 1983 年，页 181、216。
- ⑤⑦ [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 1996 年，页 4、6—7、9—10。
- ⑤⑧ 谢肇淛《五杂俎》卷 4《地部 2》，中华书局 1959 年，页 120。
- ⑤⑨ 《西方答问序》，载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 1949 年，页 300。
- ⑥⑩ 参见韩光辉《孙兰的地理学贡献》，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 年)第 11 卷，第 3 期。
- ⑥⑪ 《明史》卷 326《外国传·意大利亚传》；参见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页 130。
- ⑥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四》，中华书局 1981 年，页 634。
- ⑥⑬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存目二》，中华书局 1981 年，页 1080。
- ⑥⑭ 参见冯立升著《中国古代测量学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5 年，页 302—306；国内关于《皇輿全览图》的最出色研究见之汪前进《〈皇輿全览图〉的测绘》，载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页 131—174。
- ⑥⑮ 朱静编译《洋教上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页 19—20。
- ⑥⑯ [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页 425。
- ⑥⑰ 徐昌治辑《圣朝破邪集》卷 3；转引自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页 130。

- ⑥8 王肯堂《郁冈斋笔麈》，1602年刻本，第三册，页13、18、31。
- ⑥9 王夫之《思问录内外篇》，同治四年(1865)湘乡曾氏刊本，页35—36。
- ⑦0 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131。
- ⑦1 《清朝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7470—7471。
- ⑦2 平步青《霞外攬屑》，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163。
- ⑦3 参见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页62。
- ⑦4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页877—878。
- ⑦5 蒋友仁《地球图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页7—8。
- ⑦6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页880。
- ⑦7 郑文光、席泽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170—171。
- ⑦8 钱大昕《与戴东原书》，载吕友仁标校《潜研堂集》卷3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377。
- ⑦9 阮元《地球图说序》，《地球图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页2。
- ⑧0 阮元《畴人传》卷46，《蒋友仁传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页609—610。
- ⑧1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页330；清代学者陈澧《邹特夫地图序》也谈到康熙以后的中国地图渐失经纬线的问题，参见《东塾集》卷3，页16—17。
- ⑧2 王之春《椒生随笔》，岳麓书社1983年，页114。
- ⑧3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6年，页1039—1042。
- ⑧4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33册，“交趾西南夷”，页47—48；“四部丛刊三编”史部，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
- ⑧5 参见陈观胜《利玛窦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载《禹贡半月刊》第5卷(1936年)第3、4合期。
- ⑧6 参阅《海录》，载“海山仙馆丛书”。

- ⑧ 台阶原是指矿场不同的水平分层,操作者在独立的不同的分层上进行采掘。笔者这里借用这一术语来表示同一时代人们对地理的认识水准构成一种地理知识的认识台阶,同一时代的哲学的构造、政策的制订以及对域外文化的认识,往往都需要一种“地理台阶”作为依托。

第二章 19 世纪西方传教士作为主译者 绘制的地理学知识线

就在中国学者未能对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来的西方地理学作出学术层面回应的 18 世纪,在中国的瓷器、漆器、屏风和扇子传到欧洲的同时,中国的哲学、文学和绘画也传到了西方。18 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英国的著名学者哥尔斯密、威廉·琼斯、亚当·斯密,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这是一个人类历史发生根本转折的世纪。如同一场没有尽头的接力赛,在 16 世纪以前,人类的生命在漫长岁月里一直是缓缓步行的,自 17 世纪起,西方人迈开了迅速的步伐,当进入 18 世纪时,西方开始了奔跑,无论是科学技术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产生了意义重大的突破。1744 年休谟的《人性论》诞生;1748 年孟德斯鸠出版了《论法的精神》,不仅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而且较早强调了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巨大作用;1751 年狄德罗出任《百科全书》的主编;1762 年卢梭发表了惊世骇俗的《民约论》;1769 年瓦特发明蒸汽机,这一划时代的发明,使人类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代;1776 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标志了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帝王而由人民选举总统的国家诞生;同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

密发表了古典经济学名著《国富论》；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发表了体现卢梭民约论思想的《人权宣言》，1792年法国改建为共和国。欧洲工业革命在几十年中创造的财富，抵得上人类几千年的共同积累。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工业革命催化了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中，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

闭关锁国只是清王朝一相情愿的政策，18世纪的国际经济、军事、文化的交往密度日益增大，范围也日益加广，中国无法使自己置身于世界交往和国际冲突之外。闭关政策能够阻止中国的商船出海，但无法阻止欧洲商船的东来。1792年9月，英使马戛尔尼率领了七百多人的庞大使团，经过十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6月到达了澳门，企图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敲开与中国通商贸易的大门。一个自认为是“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天朝”怎么可能与一个在地理上仍概念模糊的“英夷”来“以通有无”呢？^②

马戛尔尼使华是18世纪末中英外交史上第一次正式的交往，英国的这次声势浩大的外交活动虽然失败了，但英国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有关中国的情报，内容涉及到中国的自然资源、政府制度、风俗习惯、宗教观念、对外贸易、军事海防等等。回国之后，不少使团成员撰写了访华实录，大大刺激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而与此相反，几乎在同一个时代，英国的

地理位置在哪里,英国人要经过哪些地方方可到达中国,在大清朝廷中已很少有人搞得清楚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曾谕浙东钦差大臣奕经向所俘英国军官擗布耳“详细询以啖咭喇国距离内地水程”及“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同年四月甲申,又谕台湾镇总兵达洪阿询问英国“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及“啖咭喇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与俄罗斯是否接壤?”^③显然这不仅仅是中、英地理知识上的一个差距。

16世纪末至18世纪西方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地理学著作,如1544年德国明斯特尔的《宇宙志》、1649年瓦伦纽斯完成的传世之作《普通地理学》。18世纪中叶,俄国科学界的巨擘罗蒙诺索夫先后完成了《精确的航道》、《北冰洋冰山形成的精确过程》和《地层学》等;孟德斯鸠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康德的二元论,均成为近代地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近代西方地理学的成就通过译著由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陆续介绍到中国。笔者把晚清西方地理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笔者统计到的1898年前出版的51种西方地理学译著中,除去2种为日本人的汉文著述外,有39种是由西方传教士为主译者完成的,占总数的76.5%,中国人译述的有10种,占总数19.6%。这些译著主要集中在地理学通论与教科书、地球与地文学、气象与气候学以及区域地志这几个方面,有关“地理学通论与教科书”的15种、“地球与地文学”的10种和“气象与气候学”的4种,全部都由西方传教士充当主译者(参见附录一)。由此可见,19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方地理学知识线,主

要是由西方传教士为主体绘制的。

一、风从南洋来——19 世纪初南洋地区 出版物传入的西方地理学知识

李志刚的研究表明,1811 至 1842 年间基督教传教士的中文著述的出版地点有广州、马六甲、巴达维亚(Batavia,今名雅加达)、澳门、槟榔屿、新加坡等六处,广州严禁出版传教书籍,澳门、槟榔屿的出版物为数甚少,因此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出版中文书刊的地点是以南洋的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为中心的。^④换言之,晚清最初的地理学欧风是从南洋东来的。

就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后的 1795 年,英国教会与长老会、公理会合作成立了伦敦传教会。1804 年,伦敦会物色到了一位 22 岁的青年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他后来成了派赴中国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1807 年 9 月马礼逊抵达广州,但他无法公开他的传教士身份,他为教会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从事《圣经》的译述和《华英字典》的编纂。他在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的帮助下,1815 年在南洋马六甲建立了一座印刷所和开办了培养到中国去当拯救灵魂的福音先驱的学校——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马礼逊和米怜在广州所经历的终日蜚居的日子,使他们对中国官方直至民间的“天朝自大”(Ethnocentrism)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礼逊居于广州十三行的夷馆内,因靠江岸,地势低洼泥泞,常常会为水淹所困。洋行所雇傭仆,皆须为洋行所准,洋人既不能坐轿出行,又不得在江中划船运动。西妇不能在广州逗留,马礼逊个

人在广州,深受与家庭分离的孤寂之苦。他说自己“孤独,完全处在陌生人当中,没有朋友却有许多敌人。”^⑤要让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基督教,首先得让他们了解产生基督教的地方,要使他们懂得那里所产生的并不低于中国的文明。口头说说不解决问题,中国的方言太多,只有利用中文出版物,因为中国的书面文字是统一的。1815年8月5日,由马礼逊筹办、米怜负责编辑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英文名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在马六甲正式创刊。这是近代第一份中文杂志,主要是宗教,其次才是世俗的内容。米怜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中说得很明白:“要进学者不可不察万有后辨明其是非矣,总无未察而能审明之理。所以学者要勤功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是非善恶也。看书者之中有各种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达、智昏皆有。随人之能晓,随教之以道。故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随道之重遂传之。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国俗,是一样多讲,其余随时顺讲。”^⑥马礼逊和米怜正在翻译的《圣经》就成了该刊宗教内容的主要材料来源。

该刊从第二年开始刊载了一些有关地理学的内容,如八九月刊有长文《天文地理论》。该文分五回,第一回论日居中;第二回论行星;第三回论侍星;第四回论地为行星;第五回论地周日每年转运一轮。该文开篇就着力宣传基督教的“神创论”,指出:“大地万物,皆非从永远而有,又非自然而生,又非偶然而来,乃是止一真活神所创造。而斯神总不被造,乃从永远至永远,无始无终,自然而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者也。天地虽宽大,万物虽盛多,在神皆无不容易造,因其无所不能故也。欲学天文地理者,不可不知此道理,盖其为万

理之根基也。”不过该文介绍了不少西方近代天文地理学的知识,文中阐述的已不是托勒密的地心说,而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夫天地星辰虽相离,皆有相属矣。日住当中,而周发其光也。日象圆如球也,有数大星周围日而环运行也。日者,光热之源也。……将日与地比较,则日之大胜于地之大约九亿余倍矣。”(《论日居中》)地球与其他“行星体皆暗,非自本有光,乃托日受光。故环运行时,其一边向日者受光于日,那一边未环运向日者暗无光。……行星中,有的大过地,有的小过地,有的半个时辰,月行得三亿一十五千余里。”(《论行星》)作者又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地为圆体说,一是“人立海岸上,看船自远来者,常先看得船之高桅,然后船渐近岸来,可见其全身也。夫船身比船桅更大,而若地象为平,则立岸上者,必或一下见身连桅,或先见船身,因其身比桅为大也。再者,行船上来至岸者,不先看得岸,乃先看得高山顶、高树、高塔等,然后近到时,看得屋,看得岸也。因此知地象非平乃圆如球。”二是“人越向东去,必见日越早而出,又越向西去,必见日越迟而落焉。”三是“向来西边祖家有高见贵臣数名,奉其国君命,特行船寻察未显出之地,而其皆周围地体行过船了,其既离本国则常向西而行海路,虽然常只向西行,并不回头,过了多少地方,约二年半后,仍旧到本国来也,此是地圆。”四是“月食时人常看得圆影在月之面上,此乃地之影也。盖月食是因地过来日月之中间而遮日之光不到月,故地之影显于月之面上,而此影常常圆,不为方也。”(《论地为行星》)地为圆体,又常“环运转行”,就自然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人住地而者,必一会在上,一会在下,又上而者与下面者,必定脚对脚,又这人之首向上,而那人之首向下,如此,岂不是在下面者立不稳当,将落下

离地而去乎？”作者用万有引力作了准确的解释：“万物之性有二般，贤者所谓引性、向性是也。引性者，各物之中会引扯凡属之之到己来，如磁石会引扯针到己来然。向性者，各物自本会聚向其中去，如水会共向海去然。盖万物有这二般性，故所存守海之水于其涯之内，所存守各星于其道，所存守各人各物于地面上不离地去；所存守宇宙，常结构整齐不落于乱者，即引性、向性所使然也。因此，就可知人稳当立地，而不落下之缘故矣。”（《论地周日每年转运一轮》）

米怜在该刊上还发表了名为《全地万国纪略》的连载文章，卷六有《论有罗巴列国》、《论亚西亚列国》、《论亚非利加列国》、《论亚默利加列国》等。在《论亚默利加列国》一文中，作者介绍了美洲的地理，并特别表彰了哥伦布的功绩：“亚默利加分之地乃约长三万三千余里，而宽一万一千余里也。此地之分为甚大，差不多有全地之一半，然其中旷无人居之地亦甚大也。此亚默利加分称得新世界，因为古人总不知有此地。至明朝，约在成化王之时，有一个古奴亚国人，事大吕宋工[王]，而名叫戈龙布士，为个大明晓海道与天文者，因看地之形为圆如球，所以其心中思想，五印度与中国虽在有罗巴列国之东，然若由有罗巴开水路而向西直行，则船可到五印度等国。王意既定，乃以三只船而开行，不上三十三日其却偶见山地，其近前而上岸，见有居人住之。其地名巴下马岛。戈龙布士又进水路，而行不数日再见山与旱地。近前上岸时，见其地为盛，其民为和，乃名之曰希士板以阿拉岛也。……夫戈龙布士之名，与其所遇各新地之事，既扬闻于有罗巴列国人中，则伊等亦发那去寻新地之意，故当时大西洋国人，亦寻着了百耳亚西勒地，今为伊最盛之地者，而在彼开地、筑城、立国。又英

吉利国之一人名加不者,行船而寻着亚默利加之北边,且英吉利国之人亦在彼开地筑城也。又意大利亚国之□□耳言士城,有个大谋之商人,行船至亚默利加之南边,而他虽实非为初寻着亚默利加之人,然因其为伶俐,所以使众人想他是初遇着亚默利加之地者,故以他之名而呼此地。盖他之名曰亚米利我,所以名其新地曰亚默利加也。”在卷七《论北亚默利加之列国》一文中还第一次较准确地介绍美洲“新国”美利坚合众国:“花旗国,其京曰瓦声顿。此国原分为十三省,而当初为英国所治。但到乾隆四十一年,其自立国发政,而不肯再服英国。……盖初立国时,其人数未有三百万口,而至今其人数却约有八百万之口。在四十五年之间,此算得为甚大之加增也。花旗国今分为南、北、中三地,而共有十八省也,日后此国谅必为亚默利加全地之最大者。盖其人有智有力,其今所有之地为宽大,好为耕种,又盛生各物,又其海边之港为多。”^⑦这种据地理环境对美国的未来所作的估计,今天看来也是颇富远见的。

由于稿件不署名,哪些人参与撰稿现在已难澄清。主要撰稿人为米怜,马礼逊、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 1796—1856)和中国人梁亚发也参与了撰稿。该刊初印 500 本,至 1819 年初每期增至 1000 本,后再增至 2000 本。至 1819 年 5 月共印 3 万余本,曾印有合订本。阴历月初出版,免费赠阅。愿读者可于初一至初四日间来米怜处领取,外地华人需要,函索即寄。^⑧据说“每逢粤省县试、府试与乡试时,由梁亚发携往考棚,与宗教书籍一同分送;余则藉友人游历船舶之便利,销售于南洋群岛、暹罗、交趾支那各地华侨荟萃之区。”^⑨米怜在该刊的编辑上是耗费了心机,1821 年他的肺病加重,

不能继续工作,麦都思也已离开了马六甲,《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同年停刊,共出七卷,历时七年之久。米怜病逝于该刊停刊的第二年6月,年仅37岁。

米怜逝世后,麦都思成了伦敦会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人物,1823年他继《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之后,在巴达维亚创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纪传》(英文名 Monthly Magazine),该刊序言说得很明白:“今继续此《察世俗》书,则易其书之名,且叫做《特选撮要每月纪传》。此书名虽改,而理仍旧矣。”刊物的宗旨、内容、式样,都与《察世俗》相仿,世俗的内容较之《察世俗》有所增加,主要内容是历史、地理和宗教。从第一期起,连载有麦都思所编的《咬啍吧总论》,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爪哇岛的地理、历史、风俗、民情,附有地图。因为刊出后在爪哇的中国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1824年麦都思又出版了单行本。^⑩在这一最早的区域地理的译著中,麦都思认为爪哇的历史不是其内在发展的结果,而是爪哇与一系列外国人,包括印度人、中国人、伊斯兰教徒和欧洲人接触的结果。他把爪哇的历史分成先后受印度人、伊斯兰教徒和西方人影响的三个时期。为引起在爪哇的中国人的兴趣,文中特别讨论了中国人在爪哇的贸易、他们和爪哇人以及与荷兰人的密切关系。为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趣味,麦都思以一种与传统中国地理著述相似的风格,从讨论爪哇历史上地名演变开始:“夫在中国之西南边,过大海,约有四千余里,或二百六十个更船,有一海屿,名曰咬啍吧。在唐山各处人常呼其地曰‘咬啍吧’,或曰‘吧地’,或曰‘吧城’,惟其本地人名之曰‘呱哑嚙’,所以其全屿名曰‘呱哑地’。”^⑪接着讨论了中国到爪哇的海路,地名是依据王大海的《海岛逸志》。作者用这部区域地志,成功地证

明了自己不仅擅长中文写作,而且精通中国的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他坚信这本书树立起的学术形象,将在未来与中国人的交往中,赢得他们对传教士和他们所宣传的基督教教理的尊重。^⑫《咬啮吧总论》在1825、1829、1833和1834年先后重印,^⑬在南洋有很大的影响。《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6年停刊,共出四卷。继《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之后,1827年伦敦会传教士纪德(Samual Kidd, 1799—1843)在马六甲创办了《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它不再是一份以宗教为主的刊物了。所载内容有中外新闻、科学、历史与宗教等,麦都思的《东西史记和合》曾刊载于这一杂志。该刊的式样也突破了过去的书本式样而改为散张,并用活字印刷。该刊维持了一年,1828年停刊。^⑭

1819年马礼逊和麦都思还各自在马六甲出版了一部介绍西方地理学的小册子。马礼逊译述的《西游地球闻见略传》(Tour of the World)是一本地理游记的小册子。以一个四川旅游者的口吻写下了他越过西藏,经印度,到达法国游历,最后从美国返回中国的故事。书中涉及了欧洲人的教育、文学,西方人的宇宙观、地理意识,以及欧洲人的节日、人种、政事、风俗和宗教等,附有一幅有文字说明的世界地图。^⑮麦都思编译的《地理便童略传》(Geographical Catechism)是一本供学生用的简明教科书。全书分8回60问,第1回论地分四分,即亚、欧、非、美四大洲;第2回论中国;第3回论印度等国;第4回论亚拉彼亚及如氏亚等国;第5回论英吉利国;第6回论友罗巴列国;第7回论亚非利加;第8回论亚默利加。书中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边界、面积、物产、人口和宗教等作了介绍,如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埃及、俄国、德国、英国、美国等。

对英美历史与政治制度的特点也有所介绍。如第8回有问：“花旗国本来如何？”答曰：“花旗国本来是旷野的地方，惟自初见知亚默利加地以后，多人从英吉利国往到那边，但凡在本国困苦、被害、想要出外者，连商贾等人，都往彼处。或这处几百人，那处几千人，耕田、筑城而住，成为十余小国。后来英吉利王要他们都纳关税，他们不肯，就合聚成一大国，自设朝廷，而不在英吉利国管下。英吉利王差兵伐他，不胜，故此到如今，他自立为一国也。”还有问：“花旗国之朝廷如何？”答曰：“花旗国之朝廷，略象英吉利之朝廷，都有两大会，治理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期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⑥米怜编译的《全地万国纪略》(Sketch of the World)的单行本1822年出版于马六甲，该书共30页，最初连载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一本简明地理读物。书中将世界分为四大洲，对各洲的面积、人口、国家、首都和语言作了介绍。^⑦这一时期，在西方地理学东传方面最有贡献的一本杂志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它是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杂志；最突出的一部著作是《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它是第一本用中文撰写的美国地理志。

二、郭实猎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郭实猎(K. F. A. Gutzlaff, 1803—1851)，这是一个中文译名上很容易混淆的德国传教士，他在中文文献中又被译成郭士立、郭甲利、郭实腊、郭施拉、居茨拉夫等。这位普鲁士东部小镇出生的铜匠学徒，早年就立志献身于宗教事业，1826年郭实猎毕业于鹿特丹神学院，并接受了荷兰布道会的派遣，到

东方荷属殖民地去传教。1829年他脱离荷兰布道会,接受伦敦会的邀请,到新加坡活动。1831年他的新婚夫人去世后,孑然一身的郭实猎,开始了他不光彩的间谍生涯。他携带了航海图和测绘仪器,改用中国人的姓名“郭士立”,穿上了中国服装,住进了中国货船水手的船舱。在经过厦门、台湾、定海、宁波、上海、天津的一路上,他记录航海路线和港口水域的情报,利用向中国人散发宗教书籍和治病的机会,了解各口岸的民俗风情和经济情报。1832年,他作为英国阿美士德使团的译员和外科医生到中国沿海作了又一次侦察航行。^⑩丰富的中国沿海的航行知识,使他很快成了鸦片商人眼中的红人,1835年他被聘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之一。他后来参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全过程,并在起草和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时,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是作为一个学者,郭实猎又是有成就的。他懂得德文、英文和荷兰文,来到亚洲后,又学习了中文、马来文、泰文和日文。他勤于著述,共留下了各种文字的著述不下于85种。其中,中文著述达61种。我们这里要研究的是他以“爱汉者”署名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及其中文地理学著述。

根据黄时鉴的研究,《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1833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1834、1835年曾两度中断,1836年全年未出,1837年复刊,约停刊于1838年底。该刊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段,前一时段是从癸巳年(1833)六月到乙未年(1835)六月号,在广州出版,编纂者是郭实猎。后一时段是从丁酉(1837)年正月复刊到戊戌年(1838)底,迁到新加坡出刊,编纂者是中国益智会。^⑪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也给郭

实猎以相当深刻的印象,1833年6月23日,他在用英文写的创刊意见书里,明确地写下了与当年马礼逊在广州时所有的相同的感受:“尽管我们与中国人有过长期的交往,但是他们仍然自称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而把其他民族视为‘蛮夷’。这种盲目自负,严重地影响了居住在广州的外国居民利益以及他们和中国人的交往。”因此,这份杂志的目的,首先是要维护居住在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的利益。“要让中国人了解我们的工艺、科学和原则,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刊物不必谈论政治,也不要任何方面使用粗鲁的语言去激怒他们。这里有一个较为巧妙的途径以表明我们并非‘蛮夷’,这就是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很多的东西。”^②西方地理知识无疑是使洋人摆脱“蛮夷”的称号和打破中国人“天朝中心主义”盲目自大心理的最佳“事实”。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介绍西方地理方面有着相当的条理性。从创刊号起,该刊就辟有“地理”一栏,较多地介绍世界区域地理知识,也有些篇介绍了地震、气候和人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剔除该刊中重复刊载的内容,我们可以找到的有关西方地理学的篇章有:1.《东南州岛屿等形势纲目》;2.《南洋洲》(以上癸巳六月);3.《吕宋岛等总论》;4.《新考出在南方大洲》(以上癸巳八月);5.《苏禄屿总论》;6.《芒佳虱大洲总论》;7.《美洛居屿等与吧布阿大洲》;8.《波罗大洲总论》(以上癸巳九月);9.《苏门答刺大洲等总论》;10.《新埔头或息力》(以上癸巳十月);11.《呀瓦大洲(附麻刺甲)》(癸巳十一月);12.《暹略罗国志略》(癸巳十二月);13.《地球全图之总论》(甲午二月);14.《列国地方总论》(甲午三

月); 15. 《葛喇吧洲总论》; 16. 《以至比多》(以上甲午四月); 17. 《亚非利加浪山略说》; 18. 《葡萄呀国京都里锡门地震略》(以上甲午五月); 19. 《天竺或五印度国总论》(乙未五月); 20. 《玛塔刺省》(乙未六月); 21. 《榜葛喇省略》(丁酉正月、二月); 22. 《孟买省》(丁酉四月); 23. 《大英痕都斯坦新疆》; 24. 《欧罗巴列国之民寻新地论》(以上丁酉五月); 25. 《破路斯国略论》(丁酉六月); 26. 《叔家答侄(北亚米利亚)》(丁酉七月); 27. 《葡萄牙国志略》(丁酉八月); 28. 《俄罗斯国志略》(丁酉九月); 29. 《露雹霜雪》(丁酉十月); 30. 《法兰西国志略》(丁酉十一月); 31. 《荷兰国志略》(戊戌二月); 32. 《教宗地方》; 33. 《地震略貌》(戊戌三月); 34. 《兰墩京都》; 35. 《瑞典国志略》(戊戌四月); 36. 《欧罗巴列国版图》; 37. 《经纬度》(以上戊戌五月); 38. 《大尼国志略》(戊戌六月); 39. 《迁外国之民》; 40. 《寻新地》(以上戊戌七月)。在上列 40 篇有关西方地理学的文章中, 有关气候与经纬度的文章各 1 篇; 有关地震的文章共 2 篇; 有关南极探险与地理考察的文章共 3 篇, 有关全球区域地理的综论性文章 2 篇; 有关东南亚、南亚和欧洲各国的区域地理的介绍性文章最多, 共 27 篇; 有关“以至比多”(埃及)、浪山(好望角)和北亚美利加(北美)的文章各 1 篇; 另有关于移民问题的文章 1 篇。此外还有地图 4 幅: 《东南洋并南洋图》(癸巳六月)、《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前有图说 1 篇, 癸巳九月)、《俄罗斯国通天下全图》(癸巳十一月)、《北痕都斯坦全图》(乙未五月)。

在《露雹霜雪》一文中, 作者借鲍、浪、曹三位朋友的交谈, 对气候的变化作了直观的描述和初步的解释, 认为露是“天清气朗之日所熏之物。夜时天凉, 气厚汤穆稠密, 渐渐落也。倘

天蒙气迷,风吹,其露不腾,则不落也。若地之暑地方,雨落有罕,其露愈浓焉。亦有一地方,历三年之久,未有落雨,草木皆以露为滋矣。细观其露滴,其美不胜矣。太阳之光回照,虽至微,却内有日头之像也。真可谓佳美超异哉。”霜“乃露所凝,然朔风凛冽,厚气严凝,遂洪涸也,不期愈增凉气。”雪是“冬时雾腾,天气霁温,其露凝结霏霏矣,就落覆地也。天气清淬,雪如暖衣,温草木也,免得冻槁矣。正消之时,润田亩,培养草木也。山溪充满,遍地润泽矣。”雹是“夏时上空中之气,内雾稠密,天气更改,先温就冷,即凝结为冰。如此甚重快落,其力甚大,不论何物,就撞倒地上,毁屋破林,即人有不知避者,皆临危也。”^①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基本沿袭了清初南怀仁在《坤輿图说》中对地震的原因所做的解释,《地震略说》一文指出:“各祸之甚重,为地震焉。地内之硫磺火物山积,常时焦焯,烟腾火炽,因此地裂火出,则为火山。倘烟火之物,不可出山,地面震动,如若巨浪千层,土落土起,率然山成湖开,倾间消解无踪也。磐裂岭破,岛出诸海,洋波涛汹,江涨海溢河涸,皆倏忽之间焉。城邑房屋田畴瞬间则荒,人物生灵率死矣。”^②并详细地描绘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月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的强烈地震。^③

对于世界地理的报导,黄时鉴已经指出了该刊大致是沿着当时中西交通的海路,有计划地从中国由近及远地进行介绍:东南亚—南亚—欧洲。在对埃及、法国、北欧诸国和梵蒂冈等国的描述方面,《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都明显地超过了明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④此外,有关俄罗斯彼得大帝的内容也颇具新意:“彼得罗就安登位,自此以后创立国之业定矣。

始操演武艺,不期募兵二万卫躬,率然攻都耳基国,取沿海之城,建战船驶黑海也。”这里说的就是1695至1696年彼得大帝攻取亚速夫海南岸土耳其要塞的史实。彼得大帝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暗离京都,陪公差赴荷兰国,亲手作工,欲学建战船之法。后过至英吉利国,巡观舟务厂。”回国后平息暴乱,“加战船,增军营,开国监,推六艺,感化庶民,援流俗而臻于善。虽然其民执古难变,然皇帝定意,强改不好风俗。彼得罗巡观欧罗巴诸国,效法恒学,为万君之魁矣。其国邦广,其权势强,战船四十余只,水手万余,仓充库实,军营超众,四方贤士来归。自此以后,俄国在欧罗巴籍势舞权,月益年增,令万国赫畏。”^⑤

笔者感兴趣的还有该刊中关于地理考察与地理探险的描述。古代西方世界地理考察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最早的地理考察的记述,不是通过科学著述,而是通过像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的故事和传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丁酉正月号题为《诗》的一文中特别提到了“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之诗词。”文称“希腊诗翁推论列国,围征服城也,细讲性情之正曲,哀乐之原由,所以人事决下天道,和马可谓诗中之魁。”说的就是他的两部史诗。^⑥在丁酉二月号题为《经书》的一文中,提到了古希腊地理学家、也是“超群卓异之史者”希罗多都(今译希罗多德);称古希腊自然地理学家“亚哩士多帝利”(今译亚里士多德)为“博物君子超群”,古罗马《自然史》的编纂者“彼利呢”(今译普林尼)为“穷理超群者”,^⑦是对这两位博学多才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所作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在《欧罗巴列国之民寻新地论》一文中提到了汉至元代的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称“元兴初年间,意大里国有二

商贾,赴于北京,其人聪明,能通五艺。所以忽必烈帝厚待之,奉龙恩归国。其人细详中国之事,令西洋人仰而异之。”^⑧从这一段记述中不难看出,作者是在说威尼斯探险家马可·波罗及其著名的旅行记,可惜未能提到他的名字。下文所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地理大发现,同样没有提及任何一个地理探险家的名字。

令人惊奇的是《寻新地》一文,第一次非常详细地给中国人描述了英国探险家库克的事迹:“英吉利农夫名谷,家贫心实,虽居穷巷,廉直不屈。雍正五年(1727)生子,自幼年纪好飘海。适有十三岁,驾船运煤炭,七年完为舵工。不幸法兰西国于乾隆十九年时与之结衅隙,而谷乘师船,常时有艰难之事,知明处当超群,如此取上司之意。屡次画海图,毫无舛错,武官知此,推荐谷。倘仰视星辰,查划度,色色相符。乾隆三十二年(1767)英国预备船只,致寻新地矣。船内有水手八十四名,回驶之儒,见多识广,愿查天之星而究草木。且谷为船主,用混天仪、量天尺,较日所出刻,量时辰,以定地方之经纬。其船驶到大洋海,前必经过亚默利加南方海出之山头。冷气迫人,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真可谓‘红楼画栋皆成粉,远水遥山尽花银’。然谷勉力查出山头之形势,以示后驾船之人等容易绕航也。后人太洋,初看许多州。丛树夭夭,其叶蓁蓁,而无人之迹矣。大洋海中有州,称为阿大希地(今译塔希提岛),其居民虽蛮,厚待远客,友然往来,互相施恩,供食物也。观金星之后,而知其周行轮转,详细录之。遂望南驶到新西兰。……绕驶其州,就望西北抵新荷兰大州。”这是库克的简要生平及其1768年开始的为时两年零九个半月的首次环球航行,发现了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东部海岸区。证实新西

兰不是南部大陆的一个组成部分。1772年,英国海军部派出了库克为首的第二个探险队。“大臣立志另备船二只,寻新地。谕曰:汝望南驶,人话有大州也。故扬帆,巡驶不遇着陆地,但见冰山而已。且风大作,水手冻冷难当也。然忍耐劳苦,不觉乏困,冒险履危,无畏非惮。毕竟望海门耽风,神情俱爽[爽],扬眉大展。再到新西兰国,与土民结友。……广览山川后,到群岛,称曰友州(今译友爱群岛,也称汤加群岛)。其上民甚爱远客。资其馈养,良辅佐船人。各水手健壮,故巡大洋,初看多岛,就画海图,加详分晰经纬度,解释波义引驶。于是海者遇着各屿,如运于掌也。回国之时,庶民仰慕高风,名扬四海。”这是库克的第二次环球航行以及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穿越南极圈的航行。1776年,英国海军部接受了库克的建议,委派他为新一轮探险的指挥官,去寻找北纬52度线以外的大洋之间的通道。“乾隆四十年(1775),内阁大臣会议遣船,四路巡查精察,而明辨冰海大洋通路,乘此可以望北而驶到中国。谷船主再往跟究,自能水落石出。先往南方大洋各处,再查明汇题矣。后航亚默利加西海,常与土民往来。其冰山甚多,履之甚危,如赴汤蹈火矣。面不改容,略无恨惧矣。就到海峡[峡],因冰塞口无通路也,故必归大洋之州。初寻着新地(即夏威夷岛),始与土民往来,彼此慈爱,忽然生异心,攻击船主而杀之。水手咸掩面挥涕,心痛胆裂矣。英国之民以高厚之感,仍铭五内,存亡感德矣。”^④这是库克的第三次航行与库克之死的简单描写。

发现了南极的陆地之后,库克在所著《南极与环球之行》一书中写道:“我不能说没有再向南前进的可能,但是这种尝试充满了危险。我敢说,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人敢于向南深

入到我已经航经过的地方,南部可能存在的那些陆地永远也不为人们所能考察和所能得知。”^⑩库克写下这些话不到半个世纪,英、法、俄等国乘帆船的南极航行探险便取得了进展。《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癸巳(1833)八月“新闻”栏对此作了综合性的报道:“夫大英及佛兰西等国,多有船只到南北冰洋,为勘察新地。乃因南边多遇冰块成为大山,不无破船,是故以先未有察悉。兹去年有船一只游弋南洋,露出一个大洲。居在亚非利加及亚米利加二大洲之南也。可惜其地只见有等鸟,名为大风鸟者(指企鹅)。此外无何生物,亦无果蔬可食。想该地极寒,恐种谷麦亦不生也。”^⑪

据伟烈亚力称,郭实猎的《万国地理全集》(Universal Geography)主要是那些发表在1833—1838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的有关西方地理学文章的汇编。^⑫这些有关西方地理学的著述,后来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枏的《海国四说》,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裨治文与第一部中文版美国地志的编纂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后一个时段的出版者是中国益智会,即1834年11月29日由在广州的外侨成立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该会的宗旨是联合英国、美国、德国、荷兰各国热心人士进行合作,以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并以出版中文报刊为主要工作。该会由玛瑟逊(James Matheson)任主席,奥里芬(D. W. C. Olyphant)掌管财务。英文秘书是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中文秘书除郭实猎外,还有一

位就是裨治文。^③

裨治文,又称高理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1826年大学毕业后就有志于到海外传教。经过三年安多弗神学院的严格训练,他被指派到中国去开辟传教事业。1830年他在澳门受到了马礼逊的欢迎与接待。在马礼逊的直接指导下,他开始学习中文。广州的一切与马礼逊20多年前到此地时没有多大的改变,外国人仍被限制在十三行中进行贸易。但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这个神秘国家的了解已今非昔比了。他们已经有能力办一份英文刊物,来向欧美介绍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这份刊物定名为The Chinese Repository,每月出版一期。这份英文刊物就是后来连续出版长达二十年的《中国丛报》,又被译为《中国文库》、《澳门月报》或《支那丛报》。^④

中国益智会有过令人兴奋的出版计划,如1835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裨治文的报告中拟推出有关历史(包括传记)、地理(包括游记)、医学、机械和自然哲学等24种书刊和地图,地理学方面有《简明世界地理》(An Introduction to Universal Geography)、《世界地图册》(An Atlas, also maps separately)、《地理学的进展和地理大发现》(Progress of Geography, and Voyages of Discovery)、《在各国引人入胜的旅行》(Entertaining Tra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Manner, Perhaps, of the Modern Traveler)等。^⑤但是直到1838年底,中国益智会仅仅出版了二卷《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没有拿出其他什么像样的出版物,惟有裨治文编纂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A 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当时似乎并未列入出版计划,出版后却是

这一时期西方地理学方面的代表作。该书是在其中国学生、广东端溪人梁植的帮助下完成的,1838年由新嘉坡坚夏书院刊出,分两册。同年就重版。^⑤该书共125页,分27卷,简要地介绍了美国地理、早期历史、独立战争、土著居民及人口、自然景观、物产、农业、工业、商业、政府、法律、语言、文学、慈善事业、生活方式与国防。1846年该书在广州重版,题为《亚美理哥合众国志略》,共75页,仍分27节,另附地图,记事迄至修订之前。^⑥另外还有一些不同的版本记录,如顾长声称另有1844年香港版,题为《亚墨理格合省国志略》。^⑦王家俭称香港版题为《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是1838年版下册的再版。^⑧杨玉圣称1844年版题为《亚美理格合省国志》。^⑨

初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笔者未能见到,据吴义雄称,收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道光十八年(1838)版共分27卷。^⑩王锡祺编辑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2帙收入了高理文著《美理哥志略》,大致反映了该书早期版本的面貌。^⑪该书分15节共36段。第1段讲述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第2、第3段叙述美国的地理位置、周边国家、英法在美洲的殖民地争夺、英国的掠夺和美国的独立战争、费城的制宪会议、华盛顿及其继任者;第4至第16共十三段分别介绍美国十三州的地理位置、气候、城市、人口、物产、商业、官制等;第17至第21段分别介绍后加入联邦的建大基(肯塔基)、亚喇罢麻(亚拉巴马)、美士细比(密西西比)、累斯安地(路易斯安娜)、典尼西(田纳西)四个州的建立经过;第22段讲述西部印地安人的生活与风俗;第23段介绍美国的人口与移民;第24段分析美国的地势与气候;第25段介绍美国的矿产;第26段主要介绍美国的机器织布业;第27段叙述美国近年来的对外贸易;第28至第

30段是美国中央到地方政治制度的介绍;第31段介绍美国的法律;第32段介绍美国的慈善事业、医院和学校;第33段简介工艺;第34至36段叙述美国的民情风俗。裨治文在当年的自序中写道:“既于粤东,领略华书数载,时与其地之文士相谈论,乃叹华人不好远游,以至我国风土人情,茫无闻见,竟不知海外更有九州也。”他希望自己这本书能在“百年之后”仍会有“不耻下观者,其将叹赏之”,使中国读者“驰观域外之士,必不方隅自封”。^③

该书的早期版本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和《合省国志》的编写,都曾参考过此书。裨治文自己也曾得意地说该书问世后,“海内诸君,谬加许可,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及《大地全图》等书,均蒙采人,又有日本人以其国语译者,一追忆之,殊觉汗颜。今垂二十余年,原板散失,杳不可寻。予又迁居沪上,索书者踵接于门,惧无以应其请也,因不得已复收初稿,与华友宋君重加删改,并创为汉字地球等图。”^④该书修订工作是在上海进行的。1847年他奉差会之命,调往上海参加修改《圣经》译本和开辟上海传教区的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裨治文作为美国驻华使馆的重要谋士,在英、法、俄等国驻华公使之间频频往来,从事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1856年上海外侨组织了一个学术性团体——上海文理学会,推举裨治文为第一任会长。该会于1858年改属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为该会的上海分会,中文名为亚洲文会,它以向欧美人介绍中国文化、接待各国学者的来访和考察为宗旨。《大美联邦志略》的修订即在这一时期。

修订版分上下两卷。上卷分18节总括全貌,每节的标题

依次是觅地原由、疆域度数、山川平地、邦都道路、天时地气、土产物类、开国原始、民脱英轭、建国立政、设官分职、理刑规制、语言文字、学馆书籍、教化说源、百工技艺、商贾贸易、善举述略、风俗人事。下卷按邦列图，各志附后。依次为缅邦、牛邦、花邦、马邦、洛邦、干邦、纽邦、鸟邦、边邦、特邦、玛邦、费邦、诺邦、叟邦、卓邦、福邦、雅邦、密邦、禄邦、德邦、耳邦、典邦、建邦、呵邦、米邦、音邦、伊邦、默邦、爱邦、威邦、梅邦、弟邦、拿邦、刚邦、印甸诸部、柳部、尔部、武部、华部、安邦、嘉邦、补馀。详细记录各邦的地理广狭和物类出产。上卷的篇幅较匀，下卷则详略不等，因为各邦政有异同，异者详之，同者略之。为了让读者明了美国地势的变化，上卷列出古今地图各一幅，又列出两球图及联邦总图，以便让人“穷求地理”。^④修订本的一大特点是明显的中国化，初版的邦名有多至五六字的，而且译音人译人殊，颇不便于中国读者。修订本特择首一字代之，如“牛含布什尔”（新罕布什尔州）名“牛邦”，“马泄朱些斯”（今译马萨诸塞州）名“马邦”。早期版本“一国之首曰‘统领’，其权如国王。立各部之首曰‘首领’，其权如中国督抚。”国会译为“议事之所”，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被译为“议事阁”和“选议处”。^⑤修订版中的“总统”被译成了“国君”，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被译成了“元老院”和“绅董院”，这些名词对受过中国传统教育者，显然减弱了理解上的困难，但又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歧义，会使那些新的外来异质概念与中国的传统名词混为一谈。

修订版的文采明显地胜过了早期版本。帮助年近花甲的裨治文完成修订工作的中国人是谁呢？1857年才与裨治文订交的江苏金陵人宋小宋称1860年“裨君有复刻邦志之意，

出其初草属删订之,书成,因就所知之大略述之以为叙。”^⑦曾受业于裨治文的梁植则称裨治文“召植曰:是书初作,尔与有劳。今垂二十余年,国事日有增益,吾将重刻新之,子盍为我校乎。植重因师命不敢辞。”^⑧据上述两位所言,宋小宋参加了该书新版的删订工作,梁植也为其师校订过新版。奇怪的是裨治文在《重刻联邦志略叙》中则称自己对修订版“窃有小补,故私喜之。会宋君梁子,均怱怱付梓,因有续刻之役。刻竟,宋君梁子,各以赠言,多过誉,予愧无以当之。”由此看来,似乎宋某、梁某的功劳都不过只是敦促付印和提供一篇称赞过分的序跋而已。笔者发现,在修订版中出过大力的是江苏上元人(今南京)管嗣复(?—1860)。管嗣复是清代文学家管同之子,字小异。王韬称其“先人异之先生有俊才,古文规法庐陵,可与桐城姚姬传相伯仲。小异禀承家学,造诣深邃。”^⑨1853年,太平军攻下了南京,他被任为军中文书,一年后他逃出来避难于苏州邓尉山,遇上了艾约瑟,两人一谈即“极相契合”,一同来到上海。可能由艾约瑟介绍,“就合信之馆”,帮助合信译书。“一载之间,著有《西医略论》、《妇婴新说》二说,俱已镌版”,后又译出《内科新说》。^⑩1859年4月15日王韬在日记中写道:“小异近于裨治文处译改《美理哥地志》,已得数卷。米利坚,新辟之地,人至者少,是编乃裨君纪其往来足迹所经,见闻颇实,倘得译成,亦考证海外舆地之学之一助也。”^⑪为什么裨治文要抹杀管嗣复的译改之功呢?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

作为第一本用中文撰译的美国地志,它为晚清的中国人提供了一幅在西方文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新兴国家的真实画面,表明了这个繁荣、富庶的国度,不仅像中国一样地大

物博,而且也有像“天朝上国”一样的文明教化。宋小宋写道:“夫联邦者,新洲中之一国也,处地球之上,与中华背相合,其地土之美,物产之富,亦彼此相等,诚海外仅有之地也。”^②王韬称赞该书“自创国至今,原本具备,于一邦之制度事实,有所考证,中国史册中所必采也。”^③称赞《联邦志略》:“即以其国之人,言其国之事,不患其不审而实,可以供将来考索。”^④《大美联邦志略》1861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后,先后编入《西学大成》、《西史汇函》等丛书中。1862年美国使臣蒲安臣来京呈递国书时曾附带呈上汉文版的《圣经》和新版《联邦志略》,^⑤可见美国政府对此书也相当看重。1897年唐才常主编的《湘学新报》连载的《史学书目提要》中专门有一条介绍《联邦志略》。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列入此书,《读西学书法》的专史类又把此书列为西史专史的代表作之一。1902年徐维则称此书“凡四十邦皆由十三邦所分,纪联邦故事及开国缘由,一一胪载,足以考见米人之治体,公会之渊源。”^⑥可见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书仍是中国人了解美国地理历史文化等资料的主要来源。

四、裨理哲的《地球图说》与《地球说略》

在早期东传的有关世界地理学的译著中,裨理哲有关全球的译著是最出色的。

裨理哲(Richard Quanterman Way, 1819—1895)是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生于乔治亚州,1844年奉派来华,7月抵澳门,8月到宁波传教。1844年长老会在澳门创办了花华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 又称华花圣经书房或华花书房), “花”指花旗国, “华”指中国。1845年长老会因宁波的费用与澳门相比比较低, 于是将活动中心移至宁波, 该印刷所也随迁宁波。^⑦ 花华圣经书房的出版业务有一个出版委员会负责管理, 主要职责是遴选书籍, 决定印数和发行, 编辑和校对, 对印刷所的发展提供建议。1852年底该书房前一任主任歌德 (Moses Stanley Coulter, 1824—1852) 病逝,^⑧ 裨理哲接着管理该印刷所至1858年。在裨理哲负责该书房期间, 印刷所的业务有了明显的增长, 出版的册数1853年为82 000; 1854年为84 700; 1855年为112 018; 印刷的页数1853年2 800 000; 1854年为4 012 800; 1855年为4 602 018。^⑨ 裨理哲还负责管理长老会在宁波所设的男童寄宿学校, 以后该校与长老会在杭州所办的学校合并为之江大学。1859年裨理哲返美。

1848年裨理哲编译了《地球图说》(Illustrated Geography) 一书, 1848年由花华圣经书房出版。该书共53页, 是一本世界地理的简明读物, 书前附有各国国旗图样。^⑩ 《海国图志》引录此书多达34处。1856年裨理哲又在中国一位李先生的帮助下, 将该书扩充, 易名为《地球说略》重新出版, 旨在让“中华之人, 与他国相贸易, 所在多有, 可知他国之人情物产及教述礼仪等。”^⑪ 《地球说略》(Illustrated Geography) 共3卷, 是《地球图说》的增订本。前有类似总论的地球圆体说、地球轮转说、地球图说、大洲图说、大洋图说。著者用先见高大树木后见小屋小艇、先见船桅后见船身、大船绕行一圈回到起点和月蚀时显示的原型这四据为证, 说明地球为圆体; 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为理论基础, 阐述了地球自转与公转、引力与吸力的道理; 解说了经纬线与五带; 介绍了六大洲和五大洋。以下依次

论说亚洲、欧洲、非洲、澳洲、南北美洲。亚细亚大洲图说分概说、大中国、蒙古、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天竺(印度)、皮路直坦、亚加业坦(阿富汗)、亚拉比亚(阿拉伯)、比耳西亚(波斯)、土耳其、大布加利亚、西比利亚、日本、亚细亚洲东南群岛等若干部分。欧罗巴大洲图说分概说、俄罗斯、土耳其西境、希腊、以大利、佛兰西、大吕宋、葡萄呀、瑞士、亚利曼(日耳曼)、阿士氏拉(奥地利)、普鲁士、荷兰、比利士、苏以天(瑞典)、挪耳回(挪威)、棣尼(丹麦)、大英国等部分。亚非利加大洲图说分概说、埃及、特力波里、土尼斯、亚利及斯(阿尔及利亚)、摩拉哥(摩洛哥)、努皮亚、亚皮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桑给巴尔、马生别给(莫桑比克)、霍丁得、大英属国、下奇尼亚、上奇尼亚、西尼降皮亚、苏但国、亚非利加大洲群岛等部分。澳大利亚大洲图说只有概说。亚美理驾大洲图说后又有北、南亚美理驾大洲图说,北部有俄罗斯属国、大英属国、合众国、墨西哥、跨地马拉、西印度群岛;南部有可仑比亚、器亚拿、比路国、玻利非亚、智利、拉巴拉他(阿根廷)、伯达加尼亚、乌拉怪、巴拉怪、巴西。书中以长短不同的篇幅介绍了上述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疆域政区、法律制度、民族人口、矿产物产、语言宗教、社会教育、人情风俗等特点,并附有各种建筑、交通工具、器物和奇禽异兽图片多幅。

该书是晚清东传中国的西方地理学译著中第一部以整个地球为描述对象的简明读物。这一地理著作的特点是分别论述了地球上各居住区域的大小、边界、陆地、山川、森林、岛屿,对于区域地理的一些部分和事实就一般和特殊、主要和次要、地文和人文等都进行了比较合适的处理。书中注意对人文地理的描述与介绍。也许是撰译者对学校、印刷出版有特殊的

兴趣,该书中对这方面的记载尤显突出。如在欧洲概说中指出:“洲内各国,俱有书院,男女皆得入院学习文艺。其大书院系成人者,或参究义理精蕴,或讨论教书精义。又有书院几所,所以教瞽目与耳聋口哑者。其教瞽者,用凸字印板,使之摸而认之,教聋与哑者,常以录写与看,使之记认。又有以手指伸缩为字形,令其习见而熟识之,真妙法也。”《佛兰西国图说》中称:“初国中书院稀少,凡入院读书大约富贵人。至今添立多处,有大书院二十六所,小书院不胜数。无论贫贱,皆得所学,至天文算法,最为精到,缘其嗜学故也。藏书之室极广大,所藏卷帙,约计数十万本。印书之局,分八十所,共计印匠三千人,或印新闻纸,或印不拘何书。”在《亚利曼列国图说》中指出:“其大书院有二十四所,小书院比比皆是。以此国人不知学习者,千人中不过一人。不能书写者,千人中不过五六十人。卖书之人,缚之背上,载之马车,周行各处以相售。城内多藏书之室,每室所藏,约有数十万卷。倘有愿读其书者,不拘何人,尽可入内披读。”《大英国图说》中写道:“是国之人,最为敏达。大小书院,不计其数。凡在院者,若天文、若地舆、若算法,皆能探究其奥,至每岁无数新刊书籍,及国之新闻纸,与外国新闻纸亦无不检阅,无不诵读,以故一切时事,俱所通晓。书院规则,男女皆准入学,以是妇女之辈,尽多敏悟,即如百音琴,与诸色乐器,各能按律谱曲焉。立局印书,其字板用摆板,便于撮用,每字以铅锡铸成,如中国聚珍版然,非呆刊梓桐统板也。其刷印之法,以两人对立於印书架旁,中放摆板数块,一搨墨,一用纸压放板上,甚为便捷。”《合众国图说》称:“国内多书院,凡民无论男女贫富,皆准入学。以故诵读之人,较他国为多,又有印书局几处,每日所印新闻纸,约得数千张,而书

籍亦印出不少。”学校和印刷出版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裨理哲不厌其烦地详细谈论这些欧美国家的学校教育和印刷出版,无非为了让中国人了解西方人决非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他们有着甚至比中国人更高的文明。如该书《大中国图说》中指出中国“国内书院颇多,其印刷书册,统以梓铜二板呆刻字样,不若外国散用铅字,以便撮印。今有西国土人,在国内设立书院,召集本处儿女人院,教以西洋国诸人所传种种事理焉。”以此力图向中国人证明,中国的文化在近代已经落后了,需要向欧美人学习。^②

1857年6月22日《六合丛谈》在“地志新书”一栏中这样介绍此书:“耶稣教士裨理哲,合众国人,甲辰入中国行教,寓居浙江宁波府,设义塾以教中国子弟。道光戊申年,作《地球图说》,复于咸丰丙辰,增删成之,名《地球说略》。其意以为天地万物,皆上帝所造。则地之有万国,其山川城邑,人民政事,亦穷理者所当知,故成是书,俾学者得扩见闻,不为方隅所囿,于以求真理而起信心,即吾教士亦有厚望焉。”^③该书还传入日本,被采用为教科书,庚申(1860)春有东都江左老皂馆出版的箕作阮甫的训点本。

五、慕维廉与《地理全志》

1842年的《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在华居住和通商的种种特权,次年,英国伦敦会决定将其设在巴达维亚的印刷所迁往上海,并派麦都思主持其事。这位具有丰富印刷和出版经验的传教士驾轻就熟地上海开办了墨海书馆。墨海书馆1843年建在上海城北的大境一带。1845年英租界开辟后,伦

教会在租界内的山东路(河南路以南)购地,作为教会基地,俗称“麦家圈”。以后在圈中大兴土木,起造教堂、教会办公楼和医院及印书馆等建筑物。胡道静认为,到咸丰十一年(1861),墨海书馆才迁入麦家圈。^④但从1849年裨治文在上海给《中国丛报》编者的信来看,至少在1849年,墨海书馆已迁至麦家圈,“并已增加了一台用畜力带动的印刷机,数小时内能印出数千张印刷品。”^⑤据熊月之统计,从1844年至1860年,墨海书馆共出版各种书刊171种,属于基督教教义、教史、教诗、教礼等宗教内容的有138种,占总数80.7%;属于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历史等科学知识的有33种,占总数19.3%。^⑥当年的墨海书馆很像是一个松散的文化社团,在墨海书馆,除了著名的传教士伟烈亚力外,“与麦君同在一处者,曰美魏茶,曰维颀,曰慕维廉,曰艾约瑟,咸识中国语言文字。”^⑦慕维廉并非墨海书馆的正式成员,但他的不少译著却是在墨海书馆出版的。

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英国苏格兰人,出生在爱丁堡。慕维廉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含辛茹苦地“竭蹶自劳”,千方百计地使慕维廉完成法律的学业。“其在学堂,晨昏不倦,非涉猎浅尝者比,学问蒸蒸日上,又为同学所不敢望。”爱丁堡城中的一些大律师都希望慕维廉去他们的事务所工作。但慕维廉却对神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毕业后他“得充牧师之选”,并受伦敦会指派,于1847年来到上海。慕维廉在“中国先生”的帮助下学习中文,甚至掌握了一些方言。他“聊解华语,即往通衢散书,劝人必读,并劝人赴礼拜堂听麦都思先生宣讲,悃款之语,娓娓动人。未几而上海土白,豁然亦通,即与麦先生轮流讲道,日以为常。厥后又学南方官话,

以求传道之宜。慕先生每登台时,高谈博辩,不特上海人听之而会心,即各省晓官话者,亦听之而快耳。盖口才为传道之要诀,慕先生已专擅其长矣。”^⑧他先后在上海、苏州、天津、牛庄等地传教。在墨海书馆的同人刊物《六合丛谈》上发表过《赎罪喻》、《总论耶稣之道》等文。1851年起,他在上海出版有《行客经历传》、《教会问答》、《来就耶稣》、《人灵之战》、《天教证略》、《天佛论衡》、《天人参对》、《救灵先路》、《古圣任罪》、《天理十三条》、《求雨劝世文》、《绝去偶像劝世文》、《天教超儒论》、《总论耶稣之道》、《赞主诗歌》、《耶稣赞歌》、《至圣指南》、《耶稣要志》、《天道实义》、《新约圣经注解》、《约翰圣经注解》等宗教文章。1890年至1891年,慕维廉出任广学会的临时总干事。广学会的年会报告中称他“在许多帮助中国的宏伟事业中总是担任领导的角色。”^⑨1894年他获得了母校爱丁堡大学授予的神学博士学位。在华53年里,他“闭门著书,朝夕不倦”,“共成大小书四十余部”。^⑩其中重要的世俗读物有在蒋敦复帮助下译出的英国历史学家托马士·米纳尔的《大英国志》,在沈毓桂帮助下译出的培根的《格致新机》,两书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⑪还有一种意义重大的译著就是《地理全志》。

在科学史界影响颇大的《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2期载有刘强《1949年前上海地理学的发展与贡献》一文,该文写道:“1858年(咸丰三年),英国人慕维廉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出版,该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写的地学文献。”接着又称:“《地理全志》由‘广学会’发行,是适应维新运动而出版的科学著作。”^⑫这一段作为该文的开篇,除了《地理全志》的编译者和书名外,几乎全部是错误的。

《地理全志》(Universal Geography)分上、下两编,共十五卷,上编封面扉页标明:“咸丰癸丑年仲春月,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印”;下编标明:“耶稣降世壹仟捌佰伍拾肆年甲寅仲秋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藏板。”可见该书的上编出版于1853年,下编出版于1854年。1853年俄国大作家冈察洛夫到达上海,麦都思曾赠给他一本《圣经》、一本《地理》和一本《伊索寓言》。^③那本《地理》,很可能就是刚出版的《地理全志》的上编。《地理全志》上编5卷,书前有慕维廉写的英文序言、创造天地万物记和中文绪言,首篇列有地理总志、地理名解、水土略分论,卷1亚西亚全志、卷2欧罗巴全志、卷3阿非利加全志、卷4亚墨利加全志、卷5大洋群岛全志。每一洲志均分为位置、界限、山脉、岛屿、海湾、河流、湖泊、矿藏、动植物、户口、教门、吏治、朝纲、文艺等,洲志后面叙述各国地理,系统而又简略。上编英文序言中慕维廉称该书是由在广州著名的鸦片商人颠地(Lancelot Dent)出资刊刻的。下编10卷,卷1地质论,分地质志、地质略论、磐石陆海变迁论、磐石形质原始论、磐石方位载物论、地宝脉络论六节,主要论陆海的地质变迁;卷2地势论,分水土比较大小论、州论、岛论、山谷论、高原论、平野论、地洞地裂论、冰山论、火山论、地震论、土倾颓渐移论十一节,主要叙述地貌学知识;卷3水论,分水质论、水气候论、水光色论、泉论、河论、湖论、洋海支派浅深论、波浪论、潮汐论、平流论、水激地体论十一节,主要论述江河湖海之水,波浪、潮汐等水文学、海洋学的知识;卷4气论,分天空气总论、风论、云雾论、雨论、雪雹露霜论、暑寒论、气候论、同热线论、雷电吸铁论九节,叙述风云雨雾、雪雹露霜等气象学和气候学的知识;卷5光论,分光性论、光色论、虹论、光环雾影论、日月重光

论、人物斜照返照论、沙尘花粉飘坠论、槁雾论、磷火论九节，论述了光环雾影、日月重光、虹等自然现象；卷6草木总论，叙述植物地理学、土壤地理学的知识；卷7生物总论，简介动物、生物、地理知识；卷8人类总论，叙述人种知识；卷9地文论，分地文志、地球论、地形椭圆广大论、空际载星论、空际能力论、行星轨道论、行星本轴论、日属行星论、昼夜论、四时论、岁月日论、暑寒道论、地球圆线论、经纬二线论、地图论十五节，是天文知识、地球知识、气候知识、地图知识等自然地理知识的大杂荟。值得提出的是该卷中介绍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和刻卜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卷10地史论，分上、中、下三节，这是一篇西方地理学的简史。慕维廉称该书受惠于玛吉士(Machis)的《外国地理备考》(Geography of Foreign Nations)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以及英文版米纳尔的《世界地理》(Milner's Universal Geography)。该书下编参考了萨默维尔(Somerville)的《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米纳尔(Milner)的《自然地图册》(Physical Atlas)和李德(Reid)的《天文地理学纲要》(Outlines of Geology and Astronomy)。^④

该书当时可能还印过其他版本。如上海图书馆藏有1854年出版的两册五卷本；另藏有1854年版的《地理全志》下编十卷本。日本安政五年(1858)有六册十卷本；1859年有柳夏新刊的爽快楼版，内有盐谷世弘1858年序。该版分上下篇。上篇10册，第1册地球全图、地理总志、地理名解、水土略分论、亚细亚洲全志；第2册欧罗巴洲全志；第3册阿非利加洲全志；第4册亚墨利加洲全志；第5册大洋群岛全志。每一洲志均分为位置、界限、山脉、岛屿、海湾、河流、湖泊、矿藏、动植物、户口、教门、吏治、朝纲、文艺等，洲志后面叙述各国地

理,系统而又简略。下篇内容如上叙述,第1册地质论、地势论;第2册水论、气论;第3册光论、草木总论、生物总论;第4册人类总论、地文论;第5册地史论。笔者多年研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从未见过有刘强所言的1858年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地理全志》一书,而江南制造局是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筹建的,江南制造局内设的翻译馆是1867年才经徐寿、华蘅芳等建议创办,怎么可能在江南制造局尚未成立的1858年先行印出《地理全志》呢?

刘强一文称《地理全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写的地学文献。”这种结论本身是含糊不清的,不知其给“地学文献”所下的界定是什么。也许他是在说有关西方地理学“地学文献”。我们这里暂且不谈明末西方耶稣会士艾儒略用中文编写的《职方外纪》和清初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就是19世纪新教传教士译出的中文地学文献,早于《地理全志》印成单行本的就有英国麦都思编译的《地理便童略传》、美国米怜编译的《全地万国纪略》、德国郭实猎译述的《万国地理全集》、葡萄牙玛吉士撰的《外国地理备考》、美国裨理哲编译的《地球图说》和美国麦嘉缔培端编的《万国纲鉴》等等,这里还未把更早发表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中文杂志中有关地学文献统计在内。据刘强一文的注释,笔者在王子贤等编著的《简明地质学史》中查到了这段结论的原型:“就目前所知,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是1853年的《地理全志》”,并认为该书的“下编很有可能像现在以矿物为中心的普通地质学。”^⑦

其实从上述列出的《地理全志》的篇目已不难看出,此书实际上是一部介绍近代西方区域地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

的百科全书。在今天看来,《地理全志》中所包含的知识显得过于庞杂,一些地志学和光学的知识也被包罗其中。这一点曾被有的学者认为是缺乏地理学专门知识所犯的^⑥错误。其实,地理学概念的庞杂是16世纪以来许多地理学著作的共同特点。如被誉为“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人”的德国地理学家克吕弗尔(1580—1622)的六大册《古今地理学引论》,就是将数理地理学、区域地理学、气候和土壤、古地貌、人种史熔为一炉的。而第一个用英文撰写地理概论的卡彭特(1589—1628?)在《分两册论述的地理学》中,同样是通过“全球的”和“区域的”两部分论述地磁、地形、地表、地球、地图、地貌、水文、气候、土相等。德国地理学家瓦伦纽斯(1622—1650)认为地理学应分两类,即普通的和专门的。普通地理学分绝对部分(研究地球的形态、大小和位置以及水陆分布、山地、树林、沙漠、水文和大气等);相对部分(研究天文原因的地球现象,如经纬度和气候);比较部分(解释各部分的比较)。特殊地理学包括的内容有天文特征、地文特征和人文特征。^⑦在他们看来,地球物理学、地质学与地理学是不加区分的。即使到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1724—1804)的时代,他仍认为组成自然地理学有五个部分:数理(地球的形状、大小及其在太阳系中的位置)、精神(人类与环境有关的风俗习惯和性格)、政治、贸易(商业)及神学(宗教的分布)地理学。这些地理学权威的理论对17、18世纪的西方地理学有着很深的影响。

“海山仙馆丛书”收入1847年葡萄牙人玛吉士所撰《外国地理备考》,分10卷,卷1、卷2论自然地理,卷1分地理志、地球论、地球循环论、地球五星序秩、日月蚀论、地圆论、寒温热道论、经纬二度论、地球时刻道论、辨四季寒暑论等二十项,

卷2分二十二项论述气、云、风、雷电、流星、虹、光环、日月重见、北晓、雨、雪、雹、露、霜、雾、冰、潮、水流、河、地震和火山等，文中附有地球循环图、四季寒暑图、经纬二度图、赤道图、黄道图、午线图、五道图、日月地球各星环道全图等16幅。卷3为邦国法度原由政治贸易根本总论；卷4至卷10为地球总论及欧罗吧全志、哑啣啣洲全志、哑啡哩啣洲全志、哑美哩啣洲全志、啊嚙啣呢洲全志。玛吉士认为：“夫地理者，地之理也。盖讲释天下各国之地式、山川、河海之名目，分为文、质、政三等。其文者，则以南北二极、南北二带、南圜北圜二线、平行上下二线、赤寒温热四道、直经横纬各度，指示于人也。其质者，则以江湖、河海、山川、田土、洲岛、湾峡、内外各洋，指示于人也。其政者，则以各邦、各国、省、府、州、县、村、镇、乡、里政事制度、丁口数目、其君何爵、所奉何教，指示于人也。此三者，地球之纲领也，不可缺其一焉。”^⑧慕维廉在《地理全志》中对地理学所下的定义明显地受到了《外国地理备考》的影响：“夫地理者，乃地之理也。察地理之士，分文、质、政三等。其文者，指地形广大旋动，及其居于空际之位，与日月星辰为比较，并其所运昼夜四季之故，与所画之圜线，推明此理。其质者，有内有外。内则指地内之形质，或至广磐石，或至细沙泥，所有之层累，及其载生物草木之遗迹，而槁壤海底，常有变迁；外则指地面之形势，如水土支派长延，或洲岛、或山谷、或高原、或旷野、或河湖与洋海，天气之性质流动，各处之燥湿，雷电吸铁之气，以及人民生物草木之种类。其政者，指地分为洲、国、州、府、县、城，以至于户口、教门、朝纲、史册、风俗、技艺、土产。此三者，固地理之志也。”^⑨这里的“文”即今自然地理总论部分的天文地理；“质”的“内”是指地质学，“外”是指地

貌、气候、植物地理等；“政”是指今人文地理。18世纪末19世纪初，地质学、气象学、海洋学、水文学纷纷独立或开始向独立的途程迈进。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的代表作《宇宙》第一卷发表在1845年，德国地理学名家李特尔的《地学通论》的前两卷出版在1817年。我们无法要求一个学法律出身的传教士能把西方最新的地理学成果完整、准确地传达出来。值得提出的是，慕维廉已注意到了19世纪初英国地理学的最新成就，如《地理全志》参考的主要英文著作中有英国自学成才的卓越女学者玛丽·萨默维尔(Mary Somerville, 1780—1872)在1839年完成的《自然地理学》，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848年，书中叙述了陆地地表形态、海洋、大气、植物和动物地理，以及作为改变地球上自然现象的力量的人。^⑩这些可能就是《地理全志》下篇地貌学、水文地理学、海洋学、气候学、土壤地理学、生物地理学、人种学方面知识的主要来源。19世纪50年代慕维廉能用中文为中国人绘制出一条描述全世界区域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各分支的地理学知识线，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地理全志》受到“概念不清、体例混乱”的指责，还因为该书卷10有长篇西方地理学发展史的描述。其实在地理通论性著作中写入地理学史同样不是慕维廉的发明，丹麦地理学家马尔特·布伦(1775—1826)在1810至1829年出版了八卷本的《通论地理概要》，该书第一卷就是地理学史的概述。《地理全志》卷10“地史论”为我们考察晚清西方地理学思想东传中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该卷分上、中、下三节，“地史论”第一节起于上古时代，下迄古希腊罗马时代：“摩西崛起商时，圣书始著五种，于时舆地之大，人鲜周知。惟于尼罗河左右，及亚喇伯沙漠西北，皆系摩西亲历能详。”直到希腊时代“周懿王

时,希腊有文士曰和墨耳,著诗史二册,迄今有名。其书论及地理,东自黑海至西西里境,北自帖类斯至埃及等地,南境虽载其名,不能深考。”“定王时,有文士曰希罗多达斯,使希腊人始明地理,言之凿凿,斐然可观。迂于远邦,始纵览地方形势、民情风俗、历代事实。先究希腊国、小亚西亚海滨群岛,舟行于他大尼里海峡,纵横黑海,亦至帖类斯、土耳其北方、小亚西亚之中、非尼西、埃及、尼罗河之瀑,亦至巴比伦等邑,后卒于以大利之南隅。其所绘舆图,纤悉备载,信而有征,真硕学之儒焉。俄罗斯、乌拉岭、咸海、西域交界、印度河北道及尼罗河南方,多恼河发原于日耳曼,分流于欧罗巴之间,其支派所至,与溯流于黑海大河,考之最悉。惟欧罗巴未详,语略有误。”还称“希罗多达斯至非尼西,论商舶绕行阿非利加之事。云此州四围皆水,惟东北隅仅有片土,地名稣士。又云其放舟之始,于红海启行,驶及印度洋,秋时登岸耕植,收其所产乃去。如是者经二年至三载,绕日巴拉大峡至埃及国,彼自言环阿非利加。”文中称他“特著一书,为后人所祖述”,显然就是指他的名著《历史》。“其人不第善考地理,亦邃深于学术,始考定地之纬度,以晷表之线取日影,实自彼创。于其所居之地,推测颇验;于潮汐往来之理,亦能指示,知为月所吸引而成。”^⑥这恐怕是继《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提及荷马、希罗多德之后,中文文献中出现的第一次详细描述和评价。在提及幼多色(今译攸多克索,BC395—BC342)、希薄克拉的(今译希波克拉底,约BC460—约BC475)、色诺分(约BC430—约BC354)、西拉斯(Scylax)等人之后指出:“更有一士曰亚立斯度德,甚立名誉,传至于今。其人荟萃前人论地之说,成为一书,以裨后学。彼以为星有见于希腊,不见于埃及,推其故,可证地体为圆之理,

亦察地四周之广大,核其里数,其数虽有不足,而其法实在精妙。厥后一千八百年,西国亦有操舟者,名可伦波,用其法以考亚墨利加之地焉。”^⑧这是中文文献中第一次从地理学家的角度论述亚里士多德。

《地理全志》还论及了古罗马的地理学,指出“是时有士大西德斯(今译塔西佗,约55—约120)著书,论此方日入之光返照,至日再出,又言北晓及永静之海,所谓高纬度是也。有士名不力呢(今译普林尼,23—79)者,始言斯干的那维及那威,以那威为岛,其民舟行至舌兰。时罗马人寻觅波罗的海至芬兰湾,未知斯干的那维本欧之一隅。”书中还特别提到古罗马的两种航海记述:“印度洋之信风,始述自希巴拉斯,知此风吹有定期,赖此东北信风,自阿非利加至印度,亦赖西南信风而回,如是舟楫往来,甚为便捷矣。此时有人名亚立安撰一书,论商舶经行之道,由巴白曼德峡至马拉巴海滨。又考察一地,人度之以为颇似中华,论中土之地理者,彼实开其端焉。”^⑨文中的“希巴拉斯”和“亚立安”,很可能就是指用于地中海的《希拉克斯的航海录》(Peripus of Scylax)和用于黑海的《阿尔里安的航海录》(Peripus of Arrian)的作者。^⑩《地理全志》特别介绍了古罗马的杰出地理学家托勒密:“古昔地輿之理,至独列米而大备。其人生于埃及,居于亚历山大,没于耶稣后一百五十年。其所著之书与斯德拉薄(今译斯特拉波,约BC64—23)之书迥异。斯德所言者,只详地政、地质,独列米言及地文,其书八册,名《地理全志》,中绘輿图,艺苑中颇著名誉。至耶稣之后一千四百年,其名益彰著。此书之意,欲明地之界限,以经纬二线测之,每线分三百六十段,今称段为度,二线前人虽用之,惟独列米以此始定经纬二度、度量之数。”^⑪给托勒密及其

《地理指南》一书以很高的评价。确实,托勒密之后,希腊人开创的地理学进入了闭塞的岁月,对地理学的重新认识,是在经历了许多世纪之后。

地史论第二节起自罗马帝国的分裂,迄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介绍和评价:“欧罗巴君因心怀忧惧,爰遣使臣至于东州。此时民之私往其地者,欲广见闻。亦有射利之徒,思购奇货,始学技艺,蒙古人待之良厚,与之财而赐之宠,使之擅名誉焉。其中有特出者,威内萨人波罗马可,彼启行在耶稣之后一千二百七十一年,其时世祖(忽必烈)据有华夏,始称元代。使臣在京都,世祖召见,优加赏赉,拜爵于朝,使臣于是服华服,循华俗,效华言。世祖屡遣之他邦,宠任特深,不过三年,荐升封疆大吏。后波罗马可欲退,世祖不许,马可乃微服隐行,私离中土。从印度群岛、印度洋、波斯湾、德比孙、君士但丁而行,后至威内萨,计其往返,约二十四年,为耶稣后一千二百九十五年。后著一书,备述闻见,士民观之,无不称异,乃更从之以探外邦形势,彼所稽考数地,近时始有人诣之,以察其言之是否。至其地而所见所闻,与书符合。……马可亦论中国之名省城,又论黄河、扬子江,及舟楫市镇,民居稠密,俗异风殊,勤于贸易,制造磁器之局,生盐之石,纸、银、蚕丝、香麝、孔雀等物;又言中国南洋及信风南朔,煤可燔炙。于其时欧邦人未知之也。独茶尚未论及,彼尝论香料芬芳之品,大约茶亦在其中。”^⑧前文已经提及,载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欧罗巴列国之民寻新地论》一文已经介绍了马可·波罗来华的事迹,可惜文中没有出现马可·波罗的名字。据李长林研究,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74年1月30日)《申报》第542号上刊出的求

知子的《询意国马君事》是目前已知最早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④这段有关的记述表明,早于《申报》20年的中文文献《地理全志》中已提到了马可·波罗及其游记。在讨论中亚的帕米尔高原的自然现象时,文中提到《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述得到了后来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的印证:“彼(指马可)云:中亚西亚巴米耳高原,燃火光不炎耀,色与常异,以之燔炙,亦逊他处。今普鲁士有名士曰洪波的,明于地理,尝涉高岭,精察之而知其言之不谬。缘地甚高,天空之气殊轻也。马可亦云,此原为天下最高之区,揆其形势,据两高山之间有一河,水甚清冽,其源出于大湖,其地生草肥美,甲于他处。瘦畜食之,十日体即丰腴,此水乃阿母河也,发源大湖即西利格湖。英之将士乌德,在耶稣后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历险至之,而证马可所言。”^⑤书中提到的“洪波的”,即当时仍在世的近代地理学奠基人洪堡(1769—1859),这很可能是中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这位德国地理学大师的名字与事迹。

1853至1854年墨海书馆版的《地理全志》是一部西方地理学的百科全书,无疑也是当时东传的西方地理学译著最杰出的代表。该书部分内容曾在《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上介绍节载,其中批评《瀛环志略》“颇为曲尽,惜其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尚留白璧之玷。”而赞扬《地理全志》“诚无微不搜、无义不穷者矣,有志地理者,于是书而考究焉,则庶其无遗义矣。”^⑥王韬论述19世纪70年代前“西儒实学”时也曾述及过此书的价值:“言舆地形质之学,则有慕维廉之《地理全志》上下编。上编纪载时事,析论情势,尤称简约详核焉。”^⑦1867年礼科掌印给事中周星誉在奏陈中指出该书对于了解西人某种动向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西人《地理全志》,作于咸丰癸丑

年,书中于日本国,记其欺侮亚墨利加触石渔船,时思报复;于安南国,极恶其稽防之严,榷税之重;于缅甸国,亦有胥吏横征之怨。识者谓诸国将有兵端,已而果然。夫能读其书,于国事兵机,已可预测,况深得其要领乎!”^⑨可惜 19 世纪 50 至 80 年代,大部分中国人的地理学知识的准备还远远不足于能接受这部地理学百科全书所带来的知识容量,还无法理解该书所包蕴的丰富的知识内涵。

在中国几十年的传教经历,使慕维廉认识到对中国人的地理学启蒙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必要的话,就像写宗教宣传读物一样,还需从最简单的层面着手。1883 年他重新改写了《地理全志》,他在新版序中写道:“今余重纂《地理全志》,其中藏略迹志之,迥非中国之谈地理,仅如地土风水、造房安葬诸般,皆为虚而无凭。此所讲之地理,只论地土形势,及水分派洋海湖河,暨万国人民风俗土产等,向中土文人略识之,亦有诸书述其大意,若《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二书颇有盛名,广行华夏。兹著是集,亦仿其意,专以外国地志为本。希中土儒林,披而获益。”^⑩1883 年版的重订本《地理全志》仿《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体例,共 143 章。第 1 章论地形、地动、地广、地线、地气生物等;另外还有地理总论、地理名解、水土略分论;第 2 至 41 章为亚西亚全志,41 至 80 章为欧罗巴全志,81 至 102 章为阿非利加全志,103 至 129 章为亚墨利加全志,130 至 143 章为大洋群岛全志。各洲志均分文论、质论、政论三部分。文论讲述洲所在的经纬度、洲界广狭;质论叙述各洲的山水、湖海、地质、气候和动植物;政论罗列洲的人口、宗教、工艺、历史、政区、学术、风俗。全书文字简约,行文流畅,颇便初学者查检阅读。下编的内容几乎全被删掉。该书

出版后的确大受欢迎,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称赞其“简而颇备”。曾多次再版,有1899年、1902年版,还编入多种丛书,如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卢梯青、王西清同辑的《西学大成》的寅编“地学”中就收入了该版《地理全志》。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二十七日孙宝瑄将重订本《地理全志》等四种西书送给懂“西国语言文字”的女优,称“汝欲通他国方言,宜先明公理,知宇宙大势乃有用。”^⑧一个曾经为中国人译辑过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的西方学者,在中国历经30年的布道传学的实践后,又转而模仿中国人的西学地理学著作,来改译自己的地理学百科全书,说起来似乎可笑,但这却是现实:中国人能接受的还只是一条区域地理学的知识线,外加一点点自然地理学的知识,而不是西方地理学完整的知识体系。

墨海书馆版的《地理全志》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成了罕见的版本了。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没有列出该版,在《读西学书法》中,他指出:“地志之书,尚无善本。《瀛环志略》相沿已久而谬误殊多,不如《地理全志》。然《地理全志》太简略,且亦太旧,近年变迁多矣。”^⑨显然这里是指益智书会本。刘强一文中有关“《地理全志》由‘广学会’发行,是适应维新运动而出版的科学著作”的结论,是照搬《简明地质学史》一书第203页中的论述。广学会的前身“同文书会”是1887年在上海成立的,1894年改称“广学会”,传教士慕维廉在19世纪50年代译著《地理全志》时,如何来预知三四十年后才掀起的维新运动并且“适应”它呢?《简明地质学史》的编著者是见过墨海版《地理全志》的,笔者以为不至会犯如此低级的“常识”错误,一定是由于与广学会密切有关的美华书馆多次再版《地理

全志》的重订本,使他们把《地理全志》的初版和重订本混为一谈而产生了错误的结论。

六、《遐迩贯珍》和《六合丛谈》 中的地理学译著

继《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之后,中国益智会(即“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在1843年初又出版过中文杂志《千里镜》月刊。^⑤1853年英国伦敦会所属的英华书院出版了《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月刊,这是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定期中文刊物。创刊于1853年8月1日。^⑥主编先后为麦都思、奚礼尔和理雅谷。虽主编三易其人,但刊物宗旨始终不变。即如《遐迩贯珍小记》所言:“是书之由……盖欲人人得究事物之颠末,而知其是非,并德识世事之变迁,而增益其闻见,无非以为华夏格物致知一助。”^⑦可见该刊仍可视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办刊思想的继续。内容包括新闻、商务、天文、地理、政治、医学、宗教等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性介绍,还有若干“喻言”等艺术作品。目的还在于改变中国人“天朝自大”、“孤陋自甘”的心理,指出“华民颇涉拘滞,安于旧典,不务新知,偏执己见,不屑他求,遂貽坐井之讥,而失致知之学,良可叹也。”该刊所载“事物之颠末,世事之变迁,与夫外国之道,山海之奇,无不展卷而在目矣,岂非格物致知之一助,亦岂非中国渐进于齐治均平之小补哉。”^⑧创刊号上章东耘“创论通遐迩,宏词贯古今。幽深开鸟道,声价重鸡林。妙解醒尘目,良工费苦心。吾儒稽域外,赖尔作南针”的题词,是对这份刊物的最好的祝愿。

该刊中所载主要地理学的译著有叙述西行见闻的《西程述概》和《地形论》(以上 1853 年 9 月第 2 号);有讲述北美洲发现经过及美国独立建国的《极西开荒建治析国源流》和简介檀香山风土民物的《阿歪希岛纪略》(以上 1853 年 11 月第 4 号);《地球转而成昼夜论》(1853 年 12 月第 5 号)叙述了地球自转公转的原理;《地质略论》(1854 年 4 月 3、4 号合刊)论述了地质学的内容;《人类五种小论》(1855 年 3 月第 3 号)简述了白种、黄种、黑种、玄种和铜种这五种“托处于地球者”;连载于 1855 年 6 月第 6 号、7 月第 7 号、9 月第 9 号的《地理撮要》,将地理学概括为数、性、事三部分,认为以数而推地理学,初学者应当掌握九点:一地形本圆,二地形略扁,三地球每日自旋一周,四地轴有南北二极,五二极之中为赤道,六东西南北为四方,七纬线定方位之南北,八经线定方位之东西,九地为一粒行星每年绕日而行一周;以性而推论地理要掌握的四方面是:一地球面为土者得全面四分之一,二土之形势有大洲、海岛、土股、土腰、土角、海滨、山岳、平原等类,三水之形势有洋海、海股、海湾、海腰、湖、河等类,四地面各处气候寒暑燥湿有异;以事而推地理要掌握八点:即国势、户口、国政、教门、风俗、土产、技艺、贸易等内容。这些内容可能是《地理撮要》一文的作者据慕维廉《地理全志》一书编写的,^⑨但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的地理学术语,如用“土股”来表示“三而有水环绕,一面与别土相连”的半岛;用“土腰”来表示“其形通连两土,或长或短”的海峡;用“土角”来表示“海边小地,横亘水中”的岬角;用“海股”来表示“海之分派,深流陆中”大湖边的海湾。^⑩1856 年 2 月第 2 号该刊还载有《地理全志节录》。另外还有讨论气候、气温表和热带生长物的《热气之理总论》,载

1855年8月第8号;《热气理论》的《论冷热表》一节,载1855年9月第9号;《论热长物》载1855年10月第10号。

除上述有关地理学的专文外,《遐迩贯珍》还刊载了不少有关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历史及人物的文章,如《英国政治制度》、《花旗国政治制度》介绍了英美两国的宪法等,《英伦国史总略》简介了英国由罗马统治到威廉王朝的历史沿革。《少年华盛顿行略》介绍了美国开国元勋在少年时代的事迹;《佛国烈女若晏记略》讲述的是法国女英雄圣女贞德的故事。有研讨东印度公司的创立经过及其贸易制度的《粤省公司原始》和《粤省公司原始后篇》等文。《西国通商溯源》讲述了中西交通和中西互市的历史,其中特别提到了马可·波罗的来华:“溯前三百至六百年间,泰西国所遣东来之众,皆由陆路抵中土。盖其时尚未知有过岌水道之通径,当日抵中土首出著名之人,名马歌坡罗,泰西各国皆称之为游行开荒之祖。乃威泥西国人,自其父与兄,生长贵族,因欲一睹东土民物山川,遂措巨舶,满载货物启程,途中复几经水行陆运,间关东迈,阅三载,值一使臣,往聘蒙古朝,遂与偕行。其蒙古即后之莅中国,创辟元朝,号至元者也。即抵其都,蒙古主待之甚厚,及返,又使使者偕行,往询罗马法王起居,并祈遣人诣彼土宣扬教法,训迪众生,迨归途历三载,道次而使臣殁逝,更越二载,复诣元都,并携同前所祈遣之人以行,而幼马歌坡罗亦与偕往。马歌坡罗抵元,元帝授以官禄。十余年间,屡任要职显秩。旋返本国,随将身所阅历,笔之于书,记述成帙,当时阅者,多以为诞,未之信也。迄今稽之,始知凡所记载,均非夸谬。”^⑧这是笔者迄今所见到的最早、最详细的有关马可·波罗来华的中文记述。

《遐迩贯珍》当时也算有一个可观的发行量,据《论遐迩贯

珍表白事款编》称,该刊“每月以印三千本为额,其书皆在本港、省城、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处遍售,间亦有深入内土。”^⑭“读者甚众,且遍及各省。”1856年5月理雅各以“办事之人,事务过繁,无法兼顾”而决定停刊,^⑮但该刊还是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影响,据说上自总督巡抚,下至工商士庶,“靡不乐于披览”。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曾将他收藏的全套《遐迩贯珍》,作为了解西学的知识读物借给他的知识界朋友。^⑯郭嵩焘1856年在上海时曾得到墨海书馆传教士所赠的《遐迩贯珍》数部,他在日记中写道:“(该刊)前格物理一二事,而后录中外各处抄报,即所谓新闻报也。”^⑰

就在《遐迩贯珍》停刊不久的1857年1月26日,墨海书馆出版了上海的第一份中文刊物《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这份月刊的主编是英国伦敦会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伟烈亚力很早就产生了去中国的愿望,并开始学习中文。他被伦敦会派赴中国负责大英圣书公会的圣经出版工作前,还在查理·瑞德公司学习了六个月的印刷。1847年8月26日到达上海,主持墨海书馆的工作。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在他主持墨海书馆的那些年里,他学习了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满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和梵文。他研读了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艺术和东亚的科学,在来华的传教士中,没有一个人能有他那样广博的中国文献的基础。^⑱他在《六合丛谈小引》中写道:“今予著《六合丛谈》一书,亦欲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月各一编,罔拘成例,务使穹苍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是以琐言皆登诸纪载,异事不壅于流传也。……疆域虽有攸别,学问要贵相

资,圣人不能无过,愚者尚有一得。以中外之大,其所见所知,岂无短长优绌之分哉。若以此书而互相效学也,尤予之所深幸也夫。”^⑩可见,伟烈亚力希望这份杂志能成为以墨海书馆为中心的中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园地。就像《遐迩贯珍》一样,《六合丛谈》也是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宗教内容并不占主要地位。大量的属于天文、地理、历史、人物传记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以及各种商情与新闻报道。如艾约瑟的《西学说》包括有关西方文具、古罗马风俗礼教的介绍,有关于古希腊哲学家基改罗(今译西塞罗)、百拉多(今译柏拉图),史学家黑陆独都(今译希罗多德)、士居提代(今译修昔底德),诗人和马(今译荷马),博物学家伯里尼(今译普利尼)的介绍,这些文章后来经过删节,编入了他的《西学略述》;有韦廉臣写的《格物穷理论》;有蒋敦复写的《海外异人传·该撒(今译恺撒)》、韩应陞的《用强说》和王韬的《反用强说》。当然也有宗教宣传的内容,如韦廉臣的《约书略说》、《真道实证》,慕维廉的《赎罪喻》、《总论耶稣之道》等等。该刊每期几乎都有新书的介绍,开始放在“杂记”一栏中,从1857年第8号起专门开出“新出书籍”一栏,介绍了一批中外新书,对于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学术起着积极的作用。《六合丛谈》似乎与《遐迩贯珍》有着某种默契,后者曾刊登过马礼逊小传,前者就推出《麦都思行略》。

该刊中所载地理学的文章几乎全部是出自慕维廉的手笔,《地球形势大率论》(1卷1号)讲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地理》(1卷2号)叙述地质层累、海洋水质、气候寒暖;《释名》(1卷3号)介绍了自转、地轴、南极、北极、子午线等地理名词;《水陆分界论》(1卷3号)讲述洲岛陆海的地理、地形;

《洲岛论》(1卷4号)分析了分布各洲的大小群岛,特别介绍了大洋群岛;《山原论》(1卷5号)叙述世界各地高原的地形、地貌;《地震火山论》(1卷6号)简介世界重要的地震和火山及其运动的原因;《平原论》(1卷6号)简述欧美平原的地势;《洋海论》(1卷7号)是各大洲海洋的描述;《潮汐平流波涛论》(1卷8号)分析潮起潮落海流湾流形成的原因;《湖河论》(1卷13号)介绍了各洲的淡湖咸湖,列出了欧、亚、非、美五大洲的河流的名称、长度、广狭和水流的大小;《地气》(1卷13号)分析世界各地气候的变化;《动植二物分界》(2卷2号)介绍世界各地各种环境里的动物和植物。这些文章基本上是慕维廉1853年出版的《地理全志》上篇自然地理部分内容的撮要或节录,也有部分经过修改,如《地理全志》中的“热道”、“温道”、“寒道”的译词,在《六合丛谈》中改译成“热带”、“温带”、“寒带”。

除了慕维廉专论自然地理方面的文章外,其他也有若干文章涉及了地理学的内容。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关于西方地理学家的介绍,如艾约瑟《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一文中提到了西方地理知识的源头荷马史诗:“和马所作诗史(唐杜甫作诗关系国事谓之诗史,西国则真有诗史也),传者二种,一《以利亚》(今译《伊利亚特》),凡二十四卷,记希腊列邦攻破特罗呀(今译特洛伊)事;一《阿陀塞亚》(今译《奥德赛》),亦二十四卷,记阿陀苏自海洋归国事,此二书,皆每句十字,无均(古韵字),以字音短长相间为步,五步成句,犹中国之论平仄也。和马遂为希腊诗人之祖。”^⑩这是在中文第一次出现荷马史诗的名称。以后艾约瑟还专门写了《和马传》,除进一步介绍史诗的内容外,还特别指出:“《以利亚》诗,金戈铁马,笔势粗豪;

《阿陀塞亚》诗,玉帛衣冠,文法修润。泰西武人喜读之,以为兵书。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以和马二诗,置为枕中秘云。”^⑨《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一文还称“今人作古希腊人物表”,其中有“考地理、习海道者十七家”。艾约瑟的《黑陆独都传》是早期有关地理学家希罗多德最详细的一篇传记。指出希罗多德是“希腊作史之祖也”,他是“小亚西亚哈里加拿苏人,生于耶稣前四百八十四年。……幼时喜诵和马所作之诗。……所作之史,凡九卷,皆纪波人与希人战事,至希人自亚西亚海滨凯旋,而此书终矣,事止于耶稣前四百五十六年,后屡加删改始成。”“作史既成,宣诵于阿伦比亚希之文士咸会,辄魁其曹。会众称贺,声情激越,士居提代闻之,悲不自胜,其感人如此。”希罗多德之所以能写出这部巨作,是因为非常重视地理考察:“作此史时居于以大利之土里依,先是出游四方,周知列邦山川险要、风土人情,名城废垒、古庙丛祠,靡不遍览,远至黑海、阿拉尔海。在北方之思古退国(即俄罗斯),又至推罗西顿访彼人事、黑尔古里神之遗迹,又至埃及国,纪埃事颇详。游尼罗河,访埃地上游古道,自埃及而西,至古利奈,纪迦大其人与语之事亦多,疑曾至迦大其地也。又东至巴比伦及波之二名城。足迹所至,手笔甚勤,凡有记载,委曲详尽,实事求是,古来作史者,此为第一。”正因为实地考察,“于其所目睹者,言之详且确也,至今有至埃及、希腊、亚西亚诸国者,考之尤信。”“故人多喜读之。近刻印颇广,亦大有裨于舆地之学云。”^⑩自《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提到“穷理超群者”普利尼之后,艾约瑟为这位古罗马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列了传,并详细地介绍了普利尼闻名遐迩的《自然史》:“伯里尼者,以大利北方人也,生于耶稣降生后二十三年,当中国东汉时。著一书曰《格物志》,列代相

传有名。……希腊罗马格物之学,天文地理、风云水石、飞潜动植,皆在其内。彼亦纪载人事,共三十七卷。第一卷目录,后列引证书目二千部,著书人姓氏五百家。第二卷论天地造化之理。言天地自有生命,无始终,体圆,日为天地之神。天一日一周,以常环转,故地亦球形。地球以他理明之,四边皆有人居,人之灵皆从星精所降。……江河流沙而成平地,火山坟起而成海岛,其言较他说有理。卷三至卷六论地球,皆引他书为证,述印度、师子二国颇确。言地面东西,较南北甚广。里海与北冰洋相通,以今考之,古时本当联络。”《自然史》一书第3至第6卷专门叙述自然地理、历史地理和人种方面的内容,其他各卷,也有不少地理记述。该书在17世纪以前的欧洲堪称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著作之一。这一点也已为艾约瑟所指出:“伯里尼书文笔颇佳,从积学而成,喜作反复推求之语。其书久翻译作泰西各国方言,重其能博学而详说之也。”^⑩

从后来刊刻的王韬《西学辑存六种自序》,我们才得知连载于《六合丛谈》1857年第1卷第5号、第9号至1858年第2卷第2号上的《西国天学源流》一文,是由伟烈亚力口译、王韬著述的。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译出的西方天文学简史,但其中却包含了大量首次引进的早期西方地理学思想史的信息。希腊最古老的学术中心之一是爱琴海东边爱奥尼亚的米利都城,该文首先提到的就是米利都人“他勒”(Thales of Miletus,今译泰勒斯,约BC624—BC548):“相传其童时,夜间观天,误落沟中,保母援其手出之,谓之曰:‘他勒,何为远察天,不近视地耶?’此时希腊人士,多喜吟咏,善议论,讲求经济,习武艺,或好谈性理,无治天文者,独他勒与其徒,好谈天,凡天地之

理,其所创获者,多与今合……始倡言地为球体。”该文随后述及:“自他勒后学者有所心得,时与今理合,有亚那西慢突者,言地自转,又言月光借日而生。”显然是指爱奥尼亚地理学的创建人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 BC610—BC540),他俩被地理学史家看作是地理学中数学传统的始祖。^⑩这一场由亚那萨哥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参与的有关地球形体与运动的讨论后来变得越来越尖锐:“亚那煞各刺(Anaxagoras)者,传他勒之学于雅典,言月面必有山谷平原,与地面同。闭他卧刺(今译毕达哥拉斯)合诸新理考论之,推阐益精,因知地球必绕太阳。”然而“历一千八百余年,无信闭他氏之学者。是时诸游学士,群立一说,言地为心,诸星皆行平圆,以平速绕地球,彗星乃地气中所生,亚利斯多本其说,人以其言与目见合,皆信之。或言亚利氏之师百拉多晚年颇悔其说,谓地球非最大,不当为天心,天心必别有大于地球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国王的远征,把希腊的天文地理知识带到了东方。被称为“地理学之父”的埃拉托色尼也出现在这篇文献中:“欧拉独提尼,古利奈人也,生于周赧王五十七年,多禄某第三王征为掌库,寿至八十,不乐居世,不食而死,欧拉独提尼立测地球大小法。”^⑪埃拉托色尼死后,是希帕库斯在使地理学变得更为精确方面跨进了一大步:“依巴谷,庇推尼之尼西人也,其测天多在地中海罗底岛。……依巴谷星表,共一千零八十星,既定诸星经纬度,乃作天球;依其度刻于上,乃作地球,定各国经纬焉。”希帕库斯的学说被古罗马的托勒密广泛吸收:“多禄某善推步,精测候,亦深于地理……亚历山大库遭兵燹,依巴氏所著书仅存一种,余皆俱烬焉。未毁前,多禄某尽见其书,故所著书多引依巴氏说,因之名遂大显,其书独行一千五百

年,欧罗巴洲皆主之。书中所引历代历事,证以当时所测,以解己立法之理,言地为球体,定居天心,日月五星列宿,每日俱以平速,绕地约一周,轨道俱平圆,准目所见,此理似合。”^⑭罗马时代改变了地理学的方向,“从多禄某氏者,皆士多亚学中人,好臆说,而不知实事求是之学。其人善辩论,格致之功阙焉。”地理学开始走向了衰弱。与地理大发现密切相关的哥白尼在天文学领域中的突破,在清初已被《五纬历指》述及和被《地球图说》所介绍,但传播的范围非常有限,且遭到像阮元这样在当时堪称西学专家的抨击,因此接受者寥寥无几。《西国天学源流》用大量的篇幅再次报道了哥白尼的成就,指出他“独居无事,辄深思天地之理,谓己所心得,后世必有知之者,云天地万物之理,皆简而易明,而世人所论,往往相反,以是知必误也。著书曰《天体环绕》,成于嘉靖九年,皆自论所立法,以地球为行星,绕太阳行,轨道在金火二星之间,又每日自转成昼夜。”^⑮稍后丹麦天文学家“第谷言地球不动,而五星俱绕太阳。太阳率之以绕地球。盖第谷欲合多禄氏歌氏两家说,故列说不能尽合天。后人讥第谷造此法,为不明于理。”^⑯而在关于行星运动规律方面冲破托勒密传统的还有三位重要学者的理论,一是刻白尔(Johannes Kepler,今译刻卜勒)有关行星运行轨道是椭圆形的见解,他的行星运动三定律使“歌白尼之说多有证”。^⑰二是伽离略(Galileo,今译伽利略),“其所测定者,人人能晓,发明歌白尼之说,较刻白尔尤显易。创造远镜见天空之界更远,测天更精,故能得歌氏之确证焉。”^⑱三是奈端(今译牛顿),“至奈端而能究明其所以然”,提出万有引力。对于“吸力”,“奈端之功,不在悟得此理,而能得此理之证。盖前人但空思其理,至奈端始知其确实之数。先论力之法以显

力之用,故奈端较前人功尤大焉。”^⑭这些分析已经认识到了哥白尼到牛顿在近代科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正如现代地理史家所指出的:“从哥白尼、刻卜勒、伽利略到牛顿,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内,播下了科学革命的种子;而跟随这一革命,才开始了科学的专门化,从而结束了无所不包的宇宙学者的工作。”^⑮

《六合丛谈》还极为重视地理新信息的报道,如 1857 年 11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 卷第 11 号上报道了同年 8 月 26 日在爱尔兰首邑都柏林召开的第 27 届英国“格致大公会”,称该会“向例每岁一集,东西南朔,格致之士麇至。”该会讨论的五项议题中,有三项是与地理学有关的,第二项“欲遣舟往海测潮”,第三项“欲造大千里镜置南半球”,第五项“欲遣舟至阿非利加之尼日河,察看新地”。新会会督洛伊特报告了最近科学的新成就,其中有“论地形势及潮汛,近测地球之椭率为二百九十分之一。又测得重率,以水为一,则地球为五又一千分之三百十六。近测阿尔兰海滨潮汛,分别日月二吸力各若干,准此以测大西洋深浅,知其中数约十五里。”另外还有“论地吸铁力与潮水相应”和“论地气”等内容。^⑯1858 年 1 月 15 日第 1 卷第 13 号上报道了 1854 年普鲁士与英国东方贸易局派遣科学家哈曼、阿陶甫、罗白前往印度考察。同年冬天到达孟买、麻打拉萨(今译马德拉斯)接壤地。1855 年哈曼到昆仑东境,及塞哥不丹等山,测量极高山峰。阿陶甫与罗白穿土人服进入西藏,1857 年进入尼泊尔度量马施布腊、雅萨二山之高度。1857 年 6 月哈曼、罗白返国,阿陶甫尚留昆仑山。^⑰

伟烈亚力认为:“地理之学,向为一家言,今笔之于书,与众共明,不必矜为秘籍矣。察地之士,于地壳中物,分其层累

于地面,区其水陆,如大洲丛岛,峻岭高原,地震火山,湖河洋海,皆细加参考,于古昔之变迁,言之凿凿。”上述这些内容在第一卷中“略见一斑”,在第二卷中将通过畅说“大地万有,一致同源,所有泥沙与石,及动植之物,俱有秩序”之理,来赞叹颂美“造物之祖”的上帝。^⑭但不幸的是,伟烈亚力写完小引不过半年,《六合丛谈》就停刊了。戈公振曾记述《六合丛谈》于1858年迁到日本。^⑮加之《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只列出该杂志的13期,^⑯因此许多论著都误认为该刊只有13期。熊月之在牛津大学发现了《六合丛谈》的第2卷第1、第2期,并列出了这两期的目录。^⑰在1858年第2卷第2期上有一份用英文写的停刊通知,《六合丛谈》的管理委员会宣布了停刊的决定,并公布了由掌管财务人(Treasurer)慕维廉签署的收支帐目,其中收入为978656元,支出为978730元,人不敷出可能是停刊的主要原因。由此可以作出判断:《六合丛谈》从咸丰丁巳正月朔日(1857年1月26日)到咸丰戊午五月朔日(1858年6月11日)共出版了2卷15期。

七、傅兰雅与江南制造局 翻译馆的地理学译著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19世纪中国最大的西书翻译出版机构。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统计,在1896年前出版的352种西书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刊的有120种之多,占34.1%。从1867年傅兰雅、徐建寅合译的《运规约指》开始,到1907年舒高第译出《美国宪法纂释》的40年间,笔者统计到的译书共199种,另有已译未印成的共40多种。^⑱在江南

制造局的译书活动中,西方传教士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傅兰雅就是其中最具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出生在英国肯特郡亥司的一个清苦的牧师家庭里。父母深受一些从中国回去的教士与商人的影响,因此年轻的傅兰雅自幼也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有关中国的历史和民间传说。他童年时代就阅读了凡能找到的所有关于中国的书籍,在学校里作文时,他总是以中国为题材,因而同学们给了他一个“中国迷”的雅号。21岁的傅兰雅在伦敦一所专门培养教师的学院毕业后,自愿接受了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的职位,从英格兰来到了中国。1861年他在这所旨在造就华人充当英国教会的教士的书院里主持校务并兼教英语。他在香港认真学习了广东话,1863年他为学好北京官话,转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65年夏,他又南下上海,任英国圣公会开设的英华学堂校长。^⑧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建成江南制造局。1867年经徐寿、华蘅芳等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内筹设翻译馆,同年傅兰雅参与翻译馆的工作,这时他已学了六年的汉语,懂三种方言,掌握了中文的书写规则。^⑨1868年5月正式任翻译馆的译员,先后聘请到馆译书的还有英国的伟烈亚力、秀耀春;美国的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卫理等。

到清末为止,在江南制造局译印的199种译书中,傅兰雅自译和与人合译的达83种之多,占总数的41.7%。1861至1896年他在中国生活了35年,其中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度过了28个春秋。笔者据《西学书目表》统计的352种西书中,傅兰雅译述的竟占了121种,其中算学9种、重学5种、化学9种、声学1种、光学3种、汽学3种、天学1种、地学1种、全

体学 3 种、动植物学 3 种、医学 12 种、图学 4 种、学制 1 种、法律 3 种、农政 5 种、矿政 7 种、工政 27 种、兵政 12 种、船政 4 种、游记 1 种、报章 1 种、格致总 3 种、无可归类之书 3 种。占当时出版总数的 34.4%。1896 年前已译未刊或已佚的有 38 种,外加他 1896 年应聘赴美国加州大学任教后续译的 14 种,毕生译书多达 173 种。由此可见,傅兰雅不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即使在近代中国翻译史上,也是译书最多的西方传教士。

傅兰雅所译西书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军事、航海、采矿、机械制造、冶金、天文地理、农业、动植物、算学、化学、物理、医学、社会科学和工具书等方面,为了做好翻译工作,傅兰雅在 1870 年底的书信中写道:“我不得不加大自己的研究工作量,以便使我能与即将要翻译原著里的知识保持同步。”^⑧他也曾抱怨翻译科技书的枯燥和吃力不讨好,但靠着宗教的热忱以及对这一工作意义的认识,他“方才挺住了这旷日持久、封闭困乏的苦斗。”^⑨

在 173 种译著中,涉及地理学的有 1873 年由该馆出版、傅兰雅口译、赵元益笔述的《行军测绘》(A Practical Course of Military Surveying, Rev. By Col. Robt. Pltey, London, 1869)一书,英国连提(Auguste F. Lendy)著。该书分 10 卷,卷首界说,卷 1 画行军图法、卷 2 地面分三角形、卷 3 测量之法、卷 4 测向罗盘用法、卷 5 平面桌用法、卷 6 纪限仪用法、卷 7 测高下各法、卷 8 相地画图依次总解、卷 9 论行军画草图各法、卷 10 测大地面之略法。书中附图百余幅,后附图一卷共 6 种。1874 年出版的希理哈(Victor E. K. R. von Scheliha)著《防海新论》(A Treatise on Coast Defence)一书,由他与华蘅

芳合译。该书 18 卷,又名《南北花旗战记》。卷 1 总论美国防海之事;卷 2 论近时之城垒不能用古法;卷 3 论泥沙筑城垒更胜于砖石;卷 4 论露置之炮;卷 5 论水路不可无阻船之物;卷 6 论船路若不全阻则虽有炮台不能阻多兵船行过;卷 7 论船路若用良法拦阻又有大炮台守之则无论有若干兵船总不能通过;卷 8 波尔特所论防海事宜;卷 9 论拦阻船路之理;卷 10 论沉物阻船之法;卷 11 论浮物阻船之法;卷 12 论水雷;卷 13、卷 14 论电线发火之法;卷 15 论水雷之力;卷 16 论排列水雷之法及水雷之利弊;卷 17 论攻船之水雷;卷 18 论明灯照路之法。根据当时的报刊专门讨论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水路交战的攻守情形,书中将所得有关军事地理的新理新法一一指出,特别是如何藏伏水雷有详细的论述。华蘅芳在译序中批评南方的失败是因为“既未遑筹之于事前,又不能御之于境外,徒以一怒之威自封门户,虽处处设防,人人言战,而固防之力不足,堪战之器无多。”^⑧这种批评似乎是书生的“马后炮”,但选译此书确实对“海防之事甚有裨益”。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奏折中指出:“查布国《防海新论》有云: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止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等语。所论极为精切。”^⑨十年后(1884)的奏折中他再度提及此书,可见此书对其影响之深。^⑩1874 年李宗羲在条陈中指出:“观西人所著《防海新论》,备言南北花旗交战之事,虽有极善之炮台,极猛极多之大炮,只能击坏一二敌船,并不能禁其来去自如。是火器不足深恃,可为明证。”^⑪同年刘坤一

上奏道：“臣尝见布国希理哈所撰《防海新论》一册，于海口岸上如何筑炮台，水中如何设阻拦之物，言之甚详。并称水中无物拦阻，即岸上之炮台林立，亦不足以抵御兵船。而于水中拦阻之物，除各样水雷外，别法尚多，均经绘图注说。且述南北花旗交兵之时，某处以某物制胜，某处以某物取败，历历有据。今中国于各海口筹防，似可采择是书，或者不无裨益。”^⑧

1876年该馆刊印的《测地绘图》(Method of Conducting a Trigonometrical Survey, London, 1862)一书，由英国富路玛(E. C. Frome)著，傅兰雅口译，徐寿笔述。该书分11卷附1卷。卷1总论，卷2测量底线，卷3分地面为原三角形，卷4图内填补众物，卷5行军揭要，卷6准平线以定高低，卷7证验高低诸器，卷8附“照印法”(英国浙蜜斯著，傅兰雅口译，江衡笔述；即《译书事略》已刊书目中的《锌版印图》)，卷9经画新疆属地，卷10球形相关之事，卷11天文相关之事，附卷天文解题。后附星时变为太阳平时表等共21表。他1879年前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还与江衡合译出意大利裔英籍仪器制造商尼格瑞特(Enrico A. L. Negretti, 1818—1879)和赞博拉(Goseph N. Zambra, 1822—1879)著《测候器图说》(A Treatise on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London, 1864)。1880年该书以《格致释器·测候器》为题，在1880年《格致汇编》的第3年第1至第4卷上连载。全书分七个部分，论述了气象测量所用的各种仪器及其原理、功用。附图74幅。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译出有关地理学著作的西方传教士还有金楷理(Carl T. Kreyer, 生卒年不详)，他是德裔美国浸礼会的传教士，1866年来华，初在杭州传教，在杭州设立传教站。1870年辞教会职，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译员。1877年

辞职,受雇于清政府,任上海道通事,仍从事译书工作。1890年随出使俄国大臣许景澄赴俄,任驻俄使馆参赞。1901年醇亲王载沣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赴德道歉,金楷理为随员。金楷理在江南制造局译书17种,有《光学》、《镀金》、《临阵管见》、《攻守炮法》、《兵船炮法》、《炮准心法》、《克虏伯炮说》、《克虏伯炮掺法》、《克虏伯炮表》、《克虏伯造弹法》、《克虏伯饼药酒》、《行海要术》、《航海简法》等。^⑩由江南制造局1875年出版的英国胡斯(Hughes)《绘地法原》(Mathematical Geography),由金楷理口译、王德均笔述。该书是一部数理地理学的著作。全书分十二章,一论诸曜运行及地球形体;二论本轴旋转及纵横诸线;三论地循黄道分四季五带;四论月绕地球及朔望交食;五测定本处经纬;六考定地体扁圆;七论制造地球法;八论平面圆图式;九论绘平面圆图法;十论绘各洲各国分图法;十一论绘圆柱形全图法;十二画图余论,后附第一行星表等五种,附图多幅。

金楷理还与华蘅芳合作,由他口译、华蘅芳笔述,译出过两部气候和气象学的西书。一是英国白尔特(Paul Bert)著的《御风要术》(Law of Storms),江南制造局1876年出版。该书分3卷176节,论飓风旋转之顺逆、飓风之中枢能移动、风雨表所显之形、飓风移动之轨迹、南北半球风路、飓风欲来时之天气、易起飓风之时、飓风之海浪及横浪、大西洋飓风、印度洋飓风、中国东南洋飓风、印度洋飓风和气浪、飓风之先兆,附论介绍了日耳曼博士笃弗斯有关飓风与气候关系的实地考察。一为《测候丛谈》("Meteorology"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8th ed.),该书译自《大英百科全书》第8版“气象学”的条目,这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最早计划选译《泰西大类编书》的一部

分。^⑧该书 1877 年出版,共分 4 卷。卷 1 分总论、日光为热之源、以化学重学之法论天空气、空气愈高热度愈小、论水陆传热散热之异和论空气中水气变化之理六部分;卷 2 分论风、海风陆风、温带内风改方向之理、论空气之浪、量风之法、论海水流行、论水气凝而降下、露霜雾、论散热之雾及水面之雾、松雾、成云之理、云之形状、成雨之理、冰雹、永雪线、雷电等部分;卷 3 分论推算天气中各事之变数、定函数之各变数及常数、定时中空气压力之变数、一昼夜压力之变数、昼夜热度之变并各处热度之变等部分;卷 4 分论空气含水量、空气中含水之数、空气水气压力热度与风之方向相关、空气中所现之形(虹霓、光环)、极光差、云之颜色、海市、电极光、陨星、旋风等部分。在 19 世纪下半叶译出的气候学西书中,《测候丛谈》被认为是较有价值的一种,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一书中写道:“地文之书,《测候丛谈》最足观。”

《海道图说》(Chinese Sea Directory by Reed)是由美国金约翰据英国兵船部原书初版辑出,由傅兰雅、金楷理和王德均合译,江南制造局 1874 年出版。该书分 15 卷,附长江图说 1 卷,卷 1 论大风与南海东海水性自流并行船要言;卷 2 海南琼州府至珠江香港;卷 3 香港至福建厦门;卷 4 厦门至白犬列岛并澎湖各水道;卷 5 白犬列岛至浙江象山县泊船港;卷 6 象山港至扬子江口附舟山列岛并上海各水道;卷 7 扬子江口至山东直隶水道;卷 8 直隶辽东二海;卷 9 扑勒特司岛并浅滩与台湾水道;卷 10 朝鲜国西南与南面各海岸;卷 11 日本九修屿暨西各屿南岸大日本屿东南岸与东岸以及内海;卷 12 日本屿东岸;卷 13 论日本列岛暨日本与九修各屿西岸又自扬子江口至长崎;卷 14 楚家尔水道与也苏岛南岸并枯里尔列岛;卷 15 日

本海。《东西学书录》称该书“起自琼州迄于辽东、台湾,后附朝鲜、琉球、日本各处沙线、飓风、礁石,诸忌胪列详尽。顾书中所列地名,间与中图不合者。盖书为西船驶行时所记,有本于中图者,有访诸土人者,余皆随意命名,体例未善。王君译成,更为校正。如中国有名者,以中名译之;西人传误者,以中图正之;无义可译者,取西音以写中字。详于沿海,略于内地,为总图一,为分图十,以册不能容,别镬附行,但海中岛沙消长不同,港汊通塞日异,在留心者随时征验增修耳。”1886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曾令地方设立洋务处,汇集条约档案和中外图书,其中就有《海道图说》。1901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陈寿彭据英国海军部1894年第三版译出新的节译本,题为《(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由经世文社出版。

1877年上海举行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会上通过决议,由狄考文、林乐知等发起成立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又称益智书会,该会的英文名称为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建议组织这一委员会的初衷是为当时各教会学校编辑一套初等学校用书。委员有丁韪良、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傅兰雅等,傅兰雅被推举为干事。该会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为编辑出版教科书,一为建立统一的译名。^⑭到1886年为止,益智书会共出版了104种教科书,傅兰雅编写了其中的四分之一,有12种是科学方面的,5种是附有手册的科学知识挂图,8种是科学须知。^⑮其中有关地理学影响较大的有1882年出版的《地志须知》和1883年出版的《地理须知》(参见附录一)。

1897年上海时务报馆出版有傅兰雅口译、华蘅芳笔述的《气学丛谈》(“Barometer”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8th ed.

1853—1860),该书译自《大英百科全书》第8版的“气压表”。该书分上下卷,卷上简述历史上科学家对空气、压力的认识及所做的主要试验。有总论、论古人之意见、论中古博物之士、论今近数百年内格致家之意见、论都离惜里试知空气有压力、巴斯果试验之事、奴韦勒驳巴斯果之说、巴斯果再试验之事、教中人再驳巴斯果之说、革里该初作抽气筒、英吉利初设格致公会、晦正士所试之事、论泡形之风雨表、论双管风雨表之利弊、论胡克所造之双管风雨表、斜管风雨表、短形风雨表、尖管风雨表、连管风雨表、分圆形风雨表等12种风雨表和2种寒暑表的基本原理和寒暑风雨合表的制作、使用及利弊;该书指出在讨论“气”、“火”的问题方面,“阿里斯都笃(即亚里士多德)之论格致,则比普累度(即柏拉图)更切实。故其所考之物理,于几何之外,必逐事逐物而求之。又劝勉其门人云,格致之根基,在乎能细验目前之物理,惜其门人恣守师说,只能从物之外貌求之,而不多考算学之理。所以阿里斯都笃所流传之各说,于天下后世之人,无有大益处。学者株守其说,反致多年无有能创立新法,以考万物之真理者。”在“迦离略初知空气有重”一节中该书指出“以大里耶国之人迦离略(今译伽利略,1564—1642),赋性聪颖,博极群书。幼时即能通希腊国之几何,最精于格致之学,以为考察万物之理,必当以几何为据。斯时古人之书,如静重学、水学,已有亚几默德以几何之法导其先路,惟从迦离略以前,无人能接亚几默德之学,是亚几默德特立于旷古之时,而直至迦离略始能续其绪也。”伽里略注意到了—个奇特的事实:一台普通抽水机的轴中,水上升到超过外部水面32英尺之后就不再上升了。他“因吸水筒之事,自疑其所答之说,不合于理。思欲更考验之,而年已衰老,

身弱多病。天主教中之人,又妒忌其学问,时欲谋害之。故于格致之学,及身不能更有进步。有都离惜里(今译托里拆利, Evangelista Torricelli, 1608—1647)者,迦离略之友也,尝从之学格致之事,故迦离略将其平生未竟之学,尽传与都离惜里,使其再进究之。”托里拆利没有辜负其老师的期望,1643年他做出了“托里拆利真空”实验,发明了气压计的原理。法国流体动力学和概率论的创始人巴斯果(今译巴斯卡, 1623—1662)获悉托里拆利的实验后,用汞和水重复来做。接着于1648年进行了大气压随高度变化的实验;书中还介绍了德国物理学家革里该(今译盖里克, 1602—1686)有关抽气机的发明;荷兰物理学家晦正士(今译惠更斯, 1629—1695)的“双风雨表”和英国物理学家胡克(Robert Hooke, 1635—1703)所造的“双管风雨表”。卷下叙述风雨表的测高之法,介绍了真空盒风雨表、金弧风雨表、自记之风雨表等6种风雨表及其多种测高方法;其中附图11幅。由于温度计、气压计和湿度计的发明,使人类可以对气象、气候进行定量的观察、记录和分析,该书较系统和全面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有关温度计、气压计和湿度计发明的简史。

八、艾约瑟及其西学地理学的启蒙

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字迪谨。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1848年来华,为伦敦会驻沪代理人。他先是协助麦都思工作,编译有《华洋和合通书》、《中西通书》等年鉴和《孝事天父论》、《三德论》、《释教正谬》、《耶稣教略》等宗教读物。1856年麦都思离沪回国后,他成为墨海书馆的主要负责

人之一。1856年郭嵩焘到墨海书馆参观后,曾在日记中称赞他“学问尤粹然,麦都事所请管理书籍者也。”^⑩他在墨海书馆最有影响的译著是与李善兰合译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力学著作。当时李善兰正在与伟烈亚力一起续译《几何原本》后九卷,艾约瑟告诉李善兰:“几何者,度量之学也;重学者,权衡之学也。昔我西国以权衡之学制器,以度量之学考天,今则制器考天皆用重学矣。”^⑪李善兰听后怦然心动,决心将重学介绍给中国人。他们一起合作译出的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胡威立(今译威廉·惠威尔, William Whewell, 1794—1866)的《初等力学》(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的中卷,题名《重学》。中译本分静重学、动重学和流质重学三部分。其中有关牛顿运动三大定律,用动量的概念计算物体的碰撞、功能原理等,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该书1859年刊刻,面世后影响甚大。王韬称赞此书“制器运物,意精理妙,能开无穷之悟。”^⑫梁启超《读西学书法》称此书“甚精”。正因为如此,艾约瑟在中国学者中博得了很高的声誉。清末有学者在为他写的小传中,称其“通习重学,并精算术”,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了他所译的《重学》一书。并引用了钱熙辅的话作为论曰:“西人重学远有师承,近百余年间愈人愈深,且用于步天,而知七政之行,由地球与诸曜之互相摄引,故其迟疾时时不等,遂于小轮不同,心天之外别开门户。艾君谓言天学者必自重学始,因偕李君同译胡氏书而附益之。余谓可以补算术之缺文,导步天之先路,而定质流质为生动之力,以人巧补天工,尤为宇宙有用之学。……盖此书出而明季旧译之《泰西水法》、《奇器图说》等编,举无足道矣。艾氏之功诚伟已哉!”^⑬当时艾约瑟在传教士中已有很高的声望,《六合丛谈》在介绍他的语言学新著时

称其“居中国九年，于音韵之学，穷流溯源，辨之綦精。凡士自各省来者，无不沿接讨论。以英文著一书，曰《官话活法》，俾英人效华言者，知所入门。向时艾君曾撰《上海土白活法》，讲论赅备，观此二书，知艾君于中国声音之理，博考而详，探讨于古书者久，故得自立一说。”^⑧1858年艾约瑟曾一度回国，1859年携新婚夫人返沪。1860年赴烟台，1861年移居天津，在天津设立教会。1863年到北京传教。1872年在北京与丁韪良发起创办《中西闻见录》。1880年被总税务司赫德聘为海关翻译。赫德交给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一套“泰西新出学塾适用诸书”译成华文。经过五年的努力，十五种西方启蒙读物的译述工作宣告完工，1886年由北京总税务司署印行。这十五种启蒙读物依次为《格致总学启蒙》、《地志启蒙》、《地理质学启蒙》、《地学启蒙》、《植物学启蒙》、《身理启蒙》、《动物学启蒙》、《化学启蒙》、《格致质学启蒙》、《天文启蒙》、《富国养民策》、《辨学启蒙》、《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和《欧洲史略》。它们原是美国麻密伦学院的教科书，这套丛书出版后，受到了知识界的高度重视，李鸿章、曾纪泽为它写了序，李鸿章序中称：“同治初同文馆教习丁君韪良《格物入门》一书，五台徐侍郎（即徐继畲）惊为闻所未闻，使及见此，更不知若何叹赏矣。”^⑨我们这里要谈的是其中两种地理学启蒙读物。

《地志启蒙》分4卷，卷1绘地球仪并地图定范，主要论述绘地图的原理，分总论、缘何绘地成图、地图如书贵于熟读、经纬界线、绘地图法、地作球形绘法、默加多耳绘地图法、阅诸地图要规、热界图、温热寒五带、三十二方针盘之用、九十度角等部分；卷2论地，分析陆地地势，分地非正圆、大地水陆不均、东大洲形势、西大洲形势、诸大洲所有异同、欧洲较胜他洲、澳

大利亚、北亚美利加等部分；卷3论海，介绍海洋学的基本知识，分海洋、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南北冰洋、风、水溜、海湾溜、海溜、潮、海洋底处形势、海洋热度、海洋之咸等部分；卷4论地形状，介绍地貌学基本知识，分洲、岛、群岛、土角、山、山名释义、火山、谷、平原、土股、土颈、江河、德勒达地、水名释义、湖、三面阻陆之海、分水界、蓄水池、海滨、海湾、海峡、冰山等部分；后附诸里异同表、各纬度处每一经度所括海面里数多寡表、英国兵部绘图司所用以绘图之各准数表三种。《地理质学启蒙》7卷。卷1总论，用四字一句的标题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如春雨阻游、登桥眺望、河流改观、沟河同理、理寓于常、大地皆书、究明格致等；卷2论地球实形，叙述陆非正平、海由渐下、地圆确证、地非突凸等内容；卷3论昼夜，叙述昼夜相继，地旋故有明暗，日非有出入，时日生于地旋等内容；卷4论风气分6章，第1章详风气为何物，第2章究风气冷暖之由，第3章明风气之热增减皆可成风，第4章考风气得失水气之原，第5章考露雾与云之原，第6章溯雨雪之原；卷5论水行于地之功用分8章，叙述江河湖海沟渠等各种水的功用。第1章究雨抵地归着，第2章明源泉涌地之由，第3章明地下水之功用，第4章详地面物质缘何剥蚀，第5章明石剥成土之原，溯江河沟渠之始，第7章明江河沟渠之用，第8章申论雪与冰川之功用；卷6论海分4章，叙述海陆地势。第1章明海与陆势皆犬牙相错，第2章究海咸之故，第3章洋海之运动，第4章论海之底；卷7论地球体内。《格致汇编》1891年夏季号认为此书“与林乐知所译《格致启蒙地理》似是一稿，惟彼略而此详耳”。

这两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较之以往的地理学译著，却显

得比较全面和准确。地质学的内容是写入了《地学启蒙》一书中,《地志启蒙》是详晰“地上水陆山谷,人目之所及睹者”,因此仅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曰属算学之地志,乃周量地球小大近远,并作何形状,以及绘成地图诸法。一曰属质学之地志,所言概皆地面高下,与有关于人生之动植诸物。一曰属分国之地志,即以明大地之各国土人民,合裂更替诸事。”由于历代地志,艾约瑟拟另编译《历代创知地志启蒙》,因此不加论及;地球质体,即有关地貌学的内容,又由《地理质学启蒙》一书来承担;有关地志之天文者,又写入了《天文启蒙》一书。因此该书论述的问题,就显得比较集中。但又反复指出学科之间的互相联系:“格致家之论人论物,若不旁通地学,则其义皆不能完足,是以地志一学,未容轻视,苟知其法,即一积雨水沟,无难测名江河巨流之理。他若万国史,诸教之宗,以及技艺等学,而往古来今,要皆不能不与此大地之面有所关涉也。”^④该书第1卷第一次列专节较详细地论及了荷兰著名的地理学家默加多耳(Gerardus Mercator,今译麦卡托,1512—1594)的绘图法。《地理质学启蒙》一书中阐述了地球上各种事物都具有不断运动的特性,同时,地球上一切事物都有着广泛的内在联系:“兹我辈所托居之地球,即在在皆为恒自动移变易处,而包罗此全地球外之风气,亦复恒自移动,以透散诸热气、光气、水气,凡江河湖海面上,皆恒有水气,蒸腾于空而为云,既而云中水气,复缩成水,幻面为雨露雪雹,下纷坠于各洲岛之陆地面上,面其水即流剥地面,穿蚀磐石,嗣乃含挟无数之石块泥沙,下合江河,并趋人海。即是可知,水皆周流上下之海陆风气内,如环之无端。若海水亦恒自动移,无时不波,是以大地四周边处,常为所冲塌,而海复藉其各大溜,以通

行地球全面。致海底空陷处,多积有由陆剥下之诸物质,渐次淤凸,高出海面,别自成一新洲,或一新岛。盖地内恒蕴有无量热,面俾此地面,时而震,时而裂,时而高起,时而陷下,其间洲岛,要皆旧者剥尽,新者旋复,嗣是新出之若洲若岛上,势必草木再生,禽兽再育,扰扰人民,在此托处。”^⑩

在西学启蒙十五种完成后,1885年艾约瑟还专门写了《西学略述》一书。该书分10卷,卷1训蒙,从字母、拆习字母、启蒙读物、书法、地理、音乐谈到如何调习幼童肢体,介绍西方的婴塾和义塾;其中“地理”一条颇带感情色彩地写道:“地理一学,如论大海之洋洋,旷野之寂寂,林木森茂而无蹊,雪山矗出于云表,皆足使学者畅悦心目。”同时指出初学者在学习地理时,一定要懂得六点:“一当使明地图所分东西南北之方位;一推测地之远近,须先为酌立一准,如以人每一点钟行十里为准,自无难推而至于千百万里之遥;一凡地理书中所论之江水、河海、土角、土腰等处,皆宜即其所以知者,推而明之,如小湖可作一大海视是也;一当明绘地图例用之号志,如图小圈为城,凸曲线为山,平曲线为河或海岸诸式;一如地理书中分论之平陆原湿,分水界山,以及大河并其旁入之各支流,浸占地面广狭诸理,皆宜明晰;一如地球全图经纬,其间之早暮时差,即原于周天三百六十度,而每十五度为一点钟之候也。”^⑪提示了如何学习地理学的线索。卷2方言,有言语未易考原、辨识土语为考方言之助、字原出于图画、笔墨考、印度及欧洲方言考、西米底族考、土满蒙考、藏缅暹越考等内容。卷3教会,分混沌开朗、主理世界真宰、鬼神、神名为诗人所幻立、较诸教同异、开教诸圣、诸教圣书、各教所论处世之宜、灵魂不死、六道轮回、末日复生、幽冥之神、佛教分有南北、火袄

教原、犹太教、耶稣教分东西、西教复分为二、礼拜等内容。卷4文学,其中内容较为丰富。简述西方诗歌的起源时也提到了荷马史诗,^⑩接着谈及希腊文学的东传罗马、旧约对欧洲诗歌的影响、演讲术、论说、野史、长诗盛行的原因等等。卷5理学,从希腊哲学伯拉多、阿斯多德到新伯拉多理学;述及的欧洲著名哲学家及其学说,有法国代加德(今译笛卡儿)的“物序原于道序”说,德国雷伯尼兹(今译莱布尼茨)和干德(今译康德)的“三能十二思范说”,英国罗革(今译洛克)和休末(今译休谟)的“心学”以及斯本赛(今译斯宾塞)的哲学。卷6史学,在“史学考原”中提到了“希腊创著国史之人”希罗多都,^⑪“海舶周觅新地考原”一节在介绍哥伦布创浮海周觅新地之举之后写道:“嗣复有一意大利国人,驾舟沿行于南亚美利加洲之东北滨诸海处,返至欧洲向人传达,人皆嘉其精详,故即以其名名此新地,曰亚美利加。若今美人所居及英属之北亚洲地,乃由英国人名加波德者之所觅获。”这里介绍了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加(Amerigo Vespucci, 1454—1512)在1497至1504年三次去美洲的探险,确认哥伦布发现的不是“亚洲”而是“新大陆”,后即以其名字命名新大陆的史实;以及迁居英国的威尼斯人加波德(今译约翰·卡博特)所进行的英国第一次海外探险。卷7格致,分天文、质学、地学、动物学、金石学、电学、化学、光学、重学、身体学、植物学、医学、算学、代数学、历学、风俗学等。卷8经济,分富国、租赋、富民、国债、钱制、河防、海防、法国经济始末、意国经济始末、筑路、船制、火车铁路、户口。卷9工艺,讲述了各国的绘画、雕刻、建筑、雕版印刷、铜版制作、乐论、演剧、汽机、棉布、绸缎、熔铁、葡萄酒、玻璃、钟表、煤气灯等内容。卷10游览,分航海遗闻、多禄某书、回人

肇纪来华、波罗来华纪游、欧人西觅新地、游览直北来华水程、古革东游、欧人游览亚非利加全境等目。

卷10的“游览”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旅游，而是西方历史上的地理探险。其中记述了古希腊时代的航海活动，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库克的环球航行等。“多禄某书”一条中记述托勒密“所著地理书内有论及中国地势民风之处，其言则多得自来亚细亚东境贩诸绸缎返逾葱岭贸易者之口。再其时罗马富人皆争出赀招购远方珍奇之物，相与矜夸，是以欧洲商船多由红海或波斯海湾驶往印度东西海口，并南洋之越南等处贩运中华、印度货物，归售规取厚利。似此船商遇至亚利散太城时，多公必过访勤问，俾罄言其所闻所见，爰作《海滨图志》均颇详。”^⑧这里的《海滨图志》很可能是指托勒密的八卷本《地理指南》，因为该书有六卷表格，正是据足迹广远的罗马商人处收集来的资料编成的。在“回人肇纪来华”一条中写道：“当李唐宣宗暨僖宗之世，有二亚拉伯人，一名瓦合白，一名亚不赛得，前后由波斯海湾航海来华，皆著有日记，如《亚公日记》内言来华抵干富城，见其水陆辐辏，贸易流通，四外流寓之人甚多，当该城为敌人攻陷时，其间亚拉伯、犹太、巴西、耶稣教四项人众以死及十二万之多。昔泰西人著记中华风物之书，计自东汉下迨元代，除多禄某书外，惟此《亚公日记》颇称详尽。干富城有言即今之广州者，有言即今杭州之澉浦镇者。”^⑨瓦合白(Ibn Wahab)，今译伊本·华哈伯，他在黄巢起义前从广州到达长安，所谓日记即其与僖宗的长篇谈话。该日记称自康国有陆道可通中国。由中国本部至边界须行两月，途中皆沙漠，无水可得。又记中国朝廷有三大员，曰右大臣、左大臣、中大臣，即唐代的中书令与左右仆射。亚不赛得

(Abu Zaid Hassan)今译阿布赛特哈桑,《亚公日记》显然是指他著的《中国印度纪程》,其中中国部分尤为学者所重视,该书前有佚名的《印度中国事辑》,后半部分的“中国印度纪程”是以哈桑本人所闻的中国事实为主干,记述广州的市肆及官制和行政,而附以伊本·华哈伯的日记。1718年该书被译为法文,传入欧洲,该书颇受外国学者的重视,认为足补中国史乘之缺略。莱诺特、格拉勃洛德、桑原鹭藏、坪井九马三等人都对此书进行过研究。^④艾约瑟讲述的正是这一事实。在“欧人游览亚非利加全境”一条中,艾约瑟简介了欧洲人对非洲全境的发现:“当中前明初葡萄牙君王之诸子有名显理(Henrique o Navegador,今译亨利,1394—1460)者,其所受封居之府第南滨于海,与亚非利加洲相密。迨时显理更无他好,惟以分遣人众驾船游觅亚非利加洲之境地为务,逐年渐次南驶,久而弥勤。计显理创行此举四十余年,迨其歿时所遣人众已南抵仅离赤道八度之处。至成化年间,葡萄牙人始得抵亚非利加尽南土角处。弘治十一年,复由亚非利加南驶至印度,时亚非利加之东偏滨海凡旧为回人立埠通商之处,自赤道南二十三度有奇地方北转抵红海,俱为葡萄牙人所行,遍至该洲内地。”大规模的地理探险首先是由葡萄牙开始的,个人领导就是葡萄牙国王的第三个儿子航海者亨利。1415年,他率军攻占了直布罗陀海峡南边的穆斯林据点,对非洲这一部分的占领,开创欧洲海外殖民的新时代。接着“自中朝乾隆年间始有欧人渐次深入游觅,爰有即此著名数人相继而起,如由该洲西滨海中间当赤道北四度处入海之奈遮河,为英人巴革(George Back,今译巴克,1796—1878)所觅获。迨咸丰末年有名利逢斯敦(David Livingstone,今译李文斯顿,1813—

1873)者,往南亚非利加东西游觅,得知有大湖二,后又有斯毕革(John Hanning Speke,今译斯皮克,1827—1864)并哥兰(James Augustus Grant,今译格兰特,1827—1892),以及贝格(Samuel White Baker,今译贝克,1821—1893)三人分觅获非洲内地之三大湖也。”^⑭地理探险曾是西方物质文明发展的动力,被认为是近现代文化之母,西方近代文明是地理探险的文明。有科学史家甚至认为,发起近代科学革命的不是哥白尼、伽利略,也不是刻卜勒、牛顿,而是航海者亨利王子。^⑮由此可见,艾约瑟在《西学略述》中用相当的篇幅描述全世界的地理探险的活动并不是偶然的。

“西学启蒙十六种”出版后也受到学界的重视,《格致汇编》1891年夏季号曾予以介绍;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中称“西学启蒙十六种”“中有数种为他书所未道及者”,赞扬其中《西学略述》“言希腊昔贤性理词章之学,足以考西学之所自出,而教之流派亦颇详焉”,虽然这套书“译笔甚劣,繁芜佶屈,几不可读。然其书则不可不读也。”^⑯1898年黄庆澄在《中西普通书目表》中也将“西学启蒙十六种”列为“西学门径书”,他似乎不太同意梁启超的观点,认为此套书“译笔晓畅”。^⑰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则详细地评价了其中的地理学译著,称《地志启蒙》“不论各国舆地,不论地球体质,不论有关地理之天文,惟取地球仪与测绘原由及地上之水陆山谷,总言其形势,凡行船测量者,取而观之,可得其要理。”《地理质学启蒙》“论地球实形,论昼夜风气,论水行于地功用,论海,论地球体内,所言皆地面之学,透发公理,颇能详明。”^⑱

九、19世纪中国“地理大发现”的文化意义

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次巨大的思想变革,一次是发生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次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晚清。这两次思想变革都与地理意识的空间拓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商业与交通的发展,使各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居住在中国大地上的先民通过不断的经济交往、人口迁徙、战争掠夺,使自己的地域视界被大大地拓宽了。书成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记述了周穆王姬满自洛阳渡黄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门,抵包头,过贺兰山,穿鄂尔多斯沙漠,经凉州至天山东麓的巴里坤湖,又走天山南路,到新疆和田河、叶尔羌河一带,又北行1000余里,到“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即中亚地区。虽然这还尚未成为战国时代普遍的地域视界,但据《吕氏春秋·有始览》的记载,战国时代的实际地域至少包括了现在的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北、江西、安徽、陕西、甘肃、河北、辽宁等省,比殷和西周时期扩大了一倍多。^⑨他们想象自己居住的天下是一个井字形大地,东南西北的“四极”的空间观念出现在《孟子·万章》、《尚书·禹贡》、《吕氏春秋·为欲》等文献中,“禹别九州”尽管只是一个传说,但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水平。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看来,“地”与“天”是相对应的,天下是一个整齐有序、有固定的中心和有边缘的向外延伸的井字形的结构。战国时代对大地的普遍认识是四方或八方的“回”字形的结构,而这四或八又与向外推衍的与其所象征的

神社、季节、时令、色彩相联系。《管子·幼官图》关于东西南北与中的图式、《山海经》对于地理中、东、西、南、北的想象，都显示了当时学者的地理认识水准。也是后来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秦王朝政府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行政措施，和实行文字统一等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地理基础。

地理视界的拓展，带来了中国人地理认识的突破性思考，《庄子·秋水》中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僦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④与这种世界观念颇为相似的还有齐人邹衍的地理“大九州”说。这一为晚清地理学者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世界地域空间框架的推论，是把《禹贡》九州意识的直接放大，由“九州”推论出八十一州和大瀛海：“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裊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⑤庄子和邹衍的地理学思考是以春秋战国时代地理视野的拓展为基础的。邹衍的这一超越人的实际生活领域的推论，很可能一是来自当时人们对天象地理的观察，因为从《穆天子传》、《山海经》的传说中可以知道，战国时对西北地理知识已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开拓；一是依据了齐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水平。齐国是位于东海之隅的滨海之国，它的海上交通是发达的。根据考古资料证实，辽宁旅顺郭家村下层文化遗存中，有鼎、规等与大汶口文化一致的器物，说明在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间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海上交通。^⑥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据徐广《集解》“‘上’

一作‘中’”，则可解读为于海中败吴，^⑭这条材料或可说明齐国拥有比吴国更强大的海上力量。生活在这个造船业相对比较发达地区的邹衍很可能了解过航海归来者的某些信息；曾经“徐登缙城以望宋都”，喜欢实地观察的这位哲学家也许正是通过上述这些材料，形成了“大九州”和“方今天下在地东南”的观念。^⑮这些在当时对世界地理所进行的综观性思考，组合成秦代学术的“地理台阶”。^⑯齐人徐福正是在这一“地理台阶”上制定出自己大规模的移民计划，而秦始皇会受这种“入海求仙人”、“入海求神药”的蛊惑，同意徐福两次入海的计划，也是出于秦始皇研读邹衍之书、熟悉“大九州”之说的缘故。^⑰

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学的传人，给中国人带来了地圆意识和五大洲的空间概念，但除了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谷等少数接触西学较多的学者外，大部分的士大夫仍不相信九州之外还有大地的存在。许多学者仍然蜗居在传统地理认识制造的“虚幻环境”中，认为利玛窦、艾儒略是模仿邹衍的“大九州”之说而有意制造了五大洲这种荒谬莫考的虚幻空间。明末清初输人的《职方外纪》、《坤舆图说》虽“已为绝完善之地理学教科书”，但很多学者“皆为影附中国古书，若东方朔《神异经》之类而作”，以至到了“道、咸英、法之来，而懵然不识所以对付之策”。^⑱对明末清初引进的西方地理学作出学术层面回应的是19世纪中叶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首先使他们对“虚幻环境”提出疑问的是携带着坚船利炮的“蛮夷”在中国沿海的游弋，1832年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写道：“英吉利恃其船炮，渐横海上，识者每以为忧。”1834年汤彝《英吉利兵船记》有英国“以兵船火器横海上”的记述。^⑲只

要不是想像鸵鸟一样把头插入沙堆视而不见的学者,就不能不穷究这些“蛮夷”的生存空间。这批“蛮夷”不是传统九州大地里的人物,那么他们来自何方?他们有着怎样的一种文明?他们互相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就成为—个严肃的地理学者必然要解答的问题。“筹夷事必知夷情”,^⑩晚清对西方地理学的研究首先正是来自这种对自己民族切身利益的关注。

于是,明末清初的那几本地理学汉文西书再度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19世纪初以来的西方传教士的地理学译著更是他们千方百计寻觅的文献资源。姚莹(1785—1852)在《外夷形势当考地图》中写出当时他是如何寻找这些文献的:海岸诸国和陆上诸国“何者接壤?孰为东西?孰为远近?无从知之。幸有西人艾儒略、南怀仁所刻坤輿图,可以得其形势。盖即利玛窦《万国全图》而为之也。惟方音称名,与中国传说诸书各别,某即某地,殊费钩稽。道光二十二年,奉命即诸夷囚问英夷及俄罗斯远近,当以夷酋颠林等所绘海诸图地名形势,录供为说覆奏,倥偬军旅中未能详加考订也。第就其所绘图取《海国闻见录》与南怀仁二图校之,形势实相符合,当欲以此三图参互考订,于其他同名异者,逐一详辨之,旋为北逮不果。友人邵阳魏默深,得林尚书所译西洋《四洲志》及各家图说,复以历代史传及夷地诸书考证之,编为《海国图志》六十卷,可谓先得我心。”^⑪魏源的《海国图志》除征引明末清初艾儒略《职方外纪》、南怀仁《坤輿图说》、高一志《空际格致》、蒋友仁《地球图说》外,同时代1848年出版裨理哲编译《地球图说》被《海国图志》征引了34处;麦嘉缔培端1852年编的《平安通书》被《海国图志》征引了11段,《海国图志》卷100的《地球天文合论五》全由《平安通书》内容构成,卷76还引录麦

嘉缔培端论证大地为球体的方法及各大洲概况的《地球推方图说》。引录玛吉士《外国地理备考》共 91 处,卷 76 全录《外国地理备考叙》和《地球总论》,卷 96 全录玛吉士的《七政》,置于《地球天文合论》之首。^⑩同时还参考了裨治文译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郭实猎连载于 1833 至 1838 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的《万国地理全集》。《海国图志》几乎全录林则徐主译的《四洲志》,正是据 1834 年英国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一书编译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思想,^⑪是建立在对“蛮夷”的空间分布清楚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就在魏源编译《海国图志》的 1841 年,对“暎夷”和“咪夷”有了初步了解的阮元致函伊里布:“素知在粵通市各国,暎啗喇之外,惟咪喇啞国最为强大,其国地平多米,暎夷仰其接济,不敢触犯,而咪夷在粵向系安静,非若暎夷之顽梗。若优待咪夷,免其货税,又将暎夷之贸易移给咪夷,则咪夷必感荷天恩,力与暎夷相抗。”伊里布对此非常赞同,认为“若假咪夷之力以制暎夷,似觉事半功倍。”^⑫同年裕谦在奏折中称自己“探闻海外各国,因暎逆滋事,贸易平常,无不同深怨恨,如欧罗巴、咪喇啞、佛郎机诸国,其势力亦均与该逆相等,在天朝自不值明降谕旨,令其帮助”;但不妨晓谕各国,“大皇帝君临天下,中外一视同仁;顺者抚之,逆者剿之。”并称如果“暎逆胆敢恃强阻搁致碍尔等生计,准尔等各国在外洋开炮轰击,或另用兵船,持袭其国,亦无不可。”^⑬在这场“以夷制夷”的讨论中,主译过《四洲志》的林则徐的观点当然显得最为内行:英国“在外国最称强悍,诸夷中惟咪喇啞及佛兰西尚足与抗衡,然亦忌且惮之”,“自英夷贸易断后,他国颇皆欣欣向荣。盖逐利者,喜彼绌而此赢,怀忿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控

驭之法,似可以夷制夷,使其相间相揆,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则内向。”^⑥为了彻底弄清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地理与政治,1844年和1845年,梁廷柅先后完成了《合省国说》和《英吉利国记》,前者主要依据裨治文译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后者利用了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以夷制夷”的策略并未成功,但这场讨论却促发了清政府内外上下对域外世界的探索。

发现是人类文化变迁的重要源泉。发现可以是新事物,如新大陆;也可以是新思想,如地理意识。发现是给文化以新的内容,它可以来自本文化系统的内部,也可以来自外部的另一种文化系统。晚清的中国,可以说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文化发现,这种发现先是对域外的文化发现,继而是对本文化内涵的重新发现。在地理学界,也可以说,19世纪是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地理大发现”。从西方地理学家对地势、陆地、洲岛、山岭、峰峦、火山、地震等自然之理论述,到气候的燥湿、潮汐之涨退、波浪之大小、飓风的狂旋猛掠、泉源湖泊和洋海江河的成因的探讨;从亚细亚洲、欧罗巴洲、阿非利加洲、亚墨利加洲、大洋群岛的土著居民及人口、自然景观、物产、农业、工业、商业,到各国的政府、法律、语言、文学、慈善事业、生活方式与国防等等。“四海虽远,在一积块中尔”,而且这一“积块”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正在变得愈来愈小:“地球大矣,今判为东西两半球,其间辽阔数万里,极西之国,自古不通中土。波涛险恶,视为畏途。至今日近一日,广通舟楫,火轮龙尾,驶行迅捷。极远之地,二月可达。陆路则有火轮车,驱驰远道,瞬息百里。”^⑦从荷马、阿那克西曼德、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埃拉托色尼、托勒密到哥白尼、哥伦布、麦哲伦、库克、李文斯敦、洪堡,19世纪西方传教士主译的地理学著作中所引进的

西方地理学知识范围虽然还很有限,1819年至1897年的78年中共出版地理学单行本51种,年平均只有0.65种,但却涉及了地理学通论、地球与地文学、气象与气候学、区域地志、交通地理和军事地理等范围(参见附录一),出现了像世界(World)、经度(Longitude)、纬度(Latitude)、淡水(Fresh water)、地壳(Earth crust)、地形(Land form)、方里(Square mile)、高原(Plateau)、横谷(Cross-valley)、直谷(Longitudinal valley)、空气(Air)、贸易风、恒风(Trade-wind)、珊瑚岛(Coralisland)、咸湖(Salt water lake)、海湾(Bay)、子午线(Meridians)、自转(Rotation)、冰川(Glacier)等对近代中国地理学具有深刻影响的新词,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1889年孙维新在回答“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一文中解说了这一时期的主要地理学译著:“慕维廉之《地理全志》,印行颇久。后于光绪九年,复校正重印,其论大地诸国,详明简要。共分五洲,每洲首论其文质政。每国并详其风土、人情、物产。国名、地名,多采取《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二书,其书不略不详,大合文人之用。此前有玛吉士译之《万[外]国地理备考》,与之相若,今版已毁。再有裨理哲著之《地球说略》一本。初印于咸丰六年,重印于光绪四年。其论各国形势、风土、民性、物产,与《地理全志》大致相同,惟辞意浅简,合于启蒙之用。另有美国甘弟德著之《地理问答》,刊印已久,后于光绪十二年重加修补。其书凡八十三回,有问有答,甚便课蒙之用。光绪八年,美国江德载辑《地理志略》一本,凡九十九章,先述情形,次设条答,亦为课蒙而设。外有慕维廉译之《大英国志》、裨治文译之《联邦志略》、闾斐迪译之《俄史辑译》等书,亦尝略及地理。”文中也已用到了“自

转”、“经度”、“纬度”、“世界”、“层累”等地理学的术语。^⑭

我们从清末著名的思想家郑观应撰写的《救时揭要》(1873年出版)和《易言》(1880年出版)两部著作中,也可见出思想家的思维空间随着地理学新知识的增多,有了很大的拓展。据乐正的统计,《救时揭要》出现国外地名15个,外国地名的使用频率英国9次,美国1次,法国4次,布鲁士2次,欧洲3次,泰西8次,日本4次;《易言》中出现国外地名多达60个,外国地名使用率也大大增加,其中英国30次,美国15次,法国26次,德国25次,欧洲16次,泰西55次,日本13次;《救时揭要》平均每千字含国内地名3.5次,国外地名2.3次;《易言》则含国内地名2.7次,国外地名4.7次。可见《易言》中使用的外国地名竟比国内地名还要多,比七年前出版的《救时揭要》平均使用率恰好多了一倍,其中“泰西”一词的使用量比《救时揭要》多近7倍。这两本书使用的国外地名中,属于欧美和日本的地名分别占78%和73.6%。^⑮上述的统计表明,19世纪初以来西方传教士通过地理学译著绘制的知识线,给中国政论家思考问题和评述时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意识。19世纪70至80年代《格致汇编》中刊载的读者有关地理学的问题是“问地球五大洲之名,各有何国家”、“地球为何只有南北两极而无东西两极”、“西人云,地球之径为二万五千里,不知用何法测得”等等。而1902年10月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招生考题中已有了“问:亚细亚洲有向南入海中之半岛,在南者为阿拉伯、为印度、为后印度即缅甸、暹罗、安南及马来隅等地,在北者为冈札德加,试以欧罗巴洲地势比之,与亚洲各半岛相似者为何地?”“问:英吉利、日本皆称地球雄国,而其国内均无长河大川,其故何也?”“问:昔年俄罗斯据

海参威,英吉利即欲据巨文岛,其后俄人借租旅顺口,英复借租威海卫,试明其地之关系。”“问:俄人常欲修铁路入阿富汗与印度铁路接,又欲得波斯海湾为出海之口,英人均力阻之,试明其关系。”^⑨通过对清末早期出版的科普杂志上读者所提出的地理问题,与20世纪初京师大学堂所出的地理课程考题进行比较,我们不难看出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几十年所做的努力,是有成效的。19世纪末的梁启超对西方地理学的知识线已经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他在《读西学书法》中写道:“风云雷雨相沿以为天文,其实皆地面上之物耳。西人言地学者约分三,宗风云雷雨等谓之地文学,地中矿石物迹谓之地质学,五洲万国形势沿革谓之地志学。地文学之书如《测候丛谈》等是也;地质学之书如《地学浅释》等是也;地志学之书如《地理全志》等是也。”^⑩

中国人经历了落后挨打的苦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才开始正视“蛮夷”所居住的地理空间,西方传教士主持绘制的地理学新知识线,引进了一系列新的西方地理学的概念、新术语和新方法,通过这些线索,中国人了解到了一个西方探险家历经数百年所探寻出的新世界,认识到了一条崭新的全世界地理状况及其分布规律的知识线,同时也意识到了中国只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中国,由此彻底地粉碎了以天朝为中心、惟中国有文明的“虚幻环境”。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两千年前哲人邹衍的“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的假说并非“荒唐之言”,这些地理学译著已让他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远远地超过了清初最杰出的学者顾炎武,懂得了“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驸衍所称,一一实其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⑪薛福成在日记中写道:邹

衍的“大九州”之说，“司马子长谓其语阔大不经，桓宽、王充并讥其迂怪虚妄。余少时颇疑，六合虽大，何至若斯辽阔？邹子乃推之至于无垠，以耸人听闻耳。今则环游地球一周者，不乏其人，其形势方里，皆可核实测算。余始知邹子之说，非尽无稽；或者古人本有此学，邹子从而推算之，未可知也。”^⑧康有为是在1885年开始接触外国史地知识的，始“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渐渐懂得了“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⑨1894年的《桂学答问》中他给学生开列出的参考书中就有军事地理学方面的《行军测绘》、《防海新论》和《御风要术》等，认为这些书“皆有用之书也”。^⑩翌年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在“立科以励智学”中专门介绍了“寻得美洲万里之地”的“科仑布”和“遍绕大地、知地如球”的“墨领”（今译麦哲伦）的事迹，希望清政府以“清秩高第”劝勉百姓的创造发明。^⑪18岁入京会试的梁启超回程时在上海购得取材于西方地理学的《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⑫于是，才“于国学书籍而外，更购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及各星轺日记，与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等书”，^⑬进一步探求西学。知识界开始建立起“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者之旷识”这样的共识，而反对“株守一隅，自画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⑭一位名叫易鼎的学者是这样批判传统天朝自大观念的：“中土之谈风俗者，于同洲各国，率鄙之曰四夷，或曰四裔，或曰异域，侈然以华夏自居。小者以藩属待之，大者以夷狄视之。风俗不善，无礼无义，乃曰夷狄。是故中国而类乎夷狄，则降而夷狄之；夷狄而合乎中国，则进而中国之。斯义既昧，于己国之风俗，美者益夸大而张皇；劣

者乃弥缝而掩盖。虽其极陋甚弊者,亦举国习以为然。沈锢蜷蹙缚于其内,莫能冲破其藩篱。一语及他国之风俗,较胜于己者,嫉之忌之,而不宣诸口。恶者则援之以为谭柄,且过当其实。近者海禁宏开,万方辐辏,无识者仍欲以其夷狄同洲各国之故技,夷狄他洲也。”^⑩只有破除了传统的“虚幻环境”,确立了新的世界空间观念,才可能在新的五大洲的“地理台阶”上确立新的世界文化观念。确信域外文明世界的存在,才能正视其他民族不仅在自然环境方面,而且在技术发明和社会规范方面,有和我们相等甚至高于我们的可能性。“南北亚墨利加袤延数千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⑪与大清天朝有着同样的自然地理空间,为什么不能有同样高、甚至更高的文明呢?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徐继畲在传教士传入的文献中找到了“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的美国民族英雄华盛顿,赞赏他“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帝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意。”认为“米利坚合众以为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⑫在 20 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梁启超、杨度、蒋方震等人的文章中,都频繁地出现“世界主义”的提法,表明明清之际一度在小部分士大夫中建立起的“世界意识”,到了晚清先进中国人中,已渐渐成了一种群体的共识。

地理空间概念的拓展,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与 15 世纪以来西方地理大发现对近代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相似,晚清的“地理大发现”使中国思想界处于极为活跃的状态。中国人从文化独尊的骄狂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经历了痛苦的失落,渐渐又重新在新的世界范围内恢复和建立

起自信。郑观应在《易言·公法》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如果中国不放弃“内外之辨、夷夏之防”的“天下”意识，那就不可能享有国际公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也。”^①只有把自己视为“万国之一”，才可能在变化着的世界里，找到自己准确的位置。确信各种不同空间的存在，也就意味着确信许多不同知识体系的存在，因而也就拓展了求知的领域。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卷四中指出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史的重要性：“昔者大地未通，号史学者只识本国而已，其四裔记载仅为附庸。今则环球通达，天下为家，谈瀛海者，悉当以履门庭数米盐视之。”因此需要从“万国”的角度出发来讨论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否则虽以钱（大昕）、王（鸣盛）之学，亦村学究而已。……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②可以说，晚清的“地理大发现”为中国人向域外寻求新知识建立了“地理台阶”，正是走在这个“地理台阶”之上，中国人一步一步推进了对“西学”的理解，从兵船制造的技术科学，到声光化电的自然科学理论；从交涉公法的社会规范，到哲学文学的心理认知的层面，19世纪先进的中国人正是这样逐渐理解了西方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中国人开始抛弃传统的“天下”观念而建立起一种全球意识，承认世界有多元文化的存在。这就是19世纪中国“地理大发现”的文化意义。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254—255。

② 有关马戛尔尼使华的研究，可参看[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

- 实》，1797年伦敦英文版，该书有叶笃义译本，上海书店1997年版；
[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三联书店1993年；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8世纪外交与中国
命运》，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6、卷4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
刊》第六十辑，文海出版社，页3677—3678、3731。
- ④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169。
- ⑤ [英]洛弗特(Richard Lovett)《伦敦会史1795—1895》(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第2卷，牛津大学出版社
1899年，页425；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年，页161。
- ⑥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嘉庆丙子(1816)年全卷卷首。
- ⑦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卷六，嘉庆庚辰(1820)年第71帙；卷七。
- ⑧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页256—257。
- ⑨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86年，页66。
- ⑩ 伦敦会档案，来自巴达维亚，1823年5月30日、1823年8月23日、
1824年9月1日；转引自[美]巴纳特(Suzanne Wilson Barnett)、费正
清(John King Fairbank)编《基督教在中国》(Christianity in China)，哈
佛大学1985年，页57。
- ⑪ 《咬嚼吧总论》，第一回；载《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3年第一期。
- ⑫ [美]利奥诺德(Jane Kate Leonard)著《麦都思：基督教信息的改写》；
载巴内特、费正清编《基督教在中国》，哈佛大学1985年，页57—58。
- ⑬ [英]伟烈亚力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上海1867年版，
页28。
- ⑭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页 261—262。

- ⑮ [英]伟烈亚力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上海 1867 年版,页 5。
- ⑯ 转引自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页 115—116;该书称《地理便童略传》全书为 8 回 60 问,但引文中又出现 68 问、69 问,待考。
- ⑰ [英]伟烈亚力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上海 1867 年版,页 18。
- ⑱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页 50—56。
- ⑲ 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载《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 1997 年,页 9—10。
- ⑳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33 年,第 2 卷,第 8 期,页 187。
- ㉑ 载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 1997 年,页 286。
- ㉒ 同上,页 346。
- ㉓ 同上,页 126。
- ㉔ 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载世界地理述论》,纪念谭其骧先生八十五周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 ㉕ 《俄罗斯国志略》,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 1997 年,页 273—274。
- ㉖ 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 1997 年,页 195。
- ㉗ 同上,页 204。
- ㉘ 同上,页 234。
- ㉙ 同上,页 394—395。
- ㉚ 转引自[苏]约·彼·马吉多维奇《世界探险史》,屈瑞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页 702—703。
- ㉛ 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 1997 年,页 29。
- ㉜ 参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英]伟烈亚力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上海 1867 年版,页 60。
- ㉝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1834 年,第 3 卷,第 7 期,页

- 378—381。
- ⑳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页 20—28。
- ㉑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1837 年，第 8 卷，第 11 期，页 510—512。
- ㉒ 王家俭《十九世纪西方史地知识的介绍及其影响》，载《大陆杂志》第 38 卷第 6 期，1969 年 3 月。
- ㉓ [英]伟烈亚力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上海 1867 年版，页 70。
- ㉔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页 32。
- ㉕ 王家俭《十九世纪西方史地知识的介绍及其影响》，载《大陆杂志》第 38 卷第 6 期，1969 年 3 月。
- ㉖ 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页 10。
- ㉗ 该书初版 125 页，分 27 卷，一觅新土；二分野度数；三创国原由；四百姓自脱啖咭喇国之制；五开国以后史略；六原居苗人；七户口册；八山川(天时附)；九土产(禽兽附)；十田农；十一工作；十二贸易；十三至十七为国政一、二、三、四、五；十八济贫；十九辨教邪正；二十土畜本原；二十一学馆；二十二书籍(刊刷各器附)；二十三各艺；二十四仁会；二十五五伦；二十六礼仪规模；二十七推度将来。
- ㉘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把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收入的内容视为原本的全文，并通过该文与《海国图志》百卷本的对照，指出后者全部辑入了原本的《美理哥国志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页 314、331—332。)这一考证恐怕失之于武断，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在收入舆地书籍时大多进行过删节，与哈佛燕京学社所藏版本有着明显的区别，《美理哥国志略》的原序也未见收入。因为王锡祺书收入的绝大部分舆地著作都是不收序跋的。笔者认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入的《美理哥国志略》就如同该书中的《四洲志》一样，很可能是转抄于《海国图志》，因此两者所录的书名相同，而却不同于真正原本《美理哥合众国志略》的

书名。《海国图志》收录的个别内容未见于王锡祺书,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王锡祺的漏抄。

- ④③ 裨治文《原序》,收入《大美联邦志略》,墨海书馆 1861 年。
- ④④ 裨治文《重刻联邦志略叙》,载《大美联邦志略》,墨海书馆 1861 年。
- ④⑤ 《发凡》,载《大美联邦志略》,墨海书馆 1861 年。
- ④⑥ 高理文《美理哥国志略》,第 28、29 段,载王锡祺编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 12 帙。
- ④⑦ 宋小宋叙,载《大美联邦志略》,墨海书馆 1861 年。
- ④⑧ 梁植跋,载《大美联邦志略》,墨海书馆 1861 年。
- ④⑨ 王韬《瀛壖杂志·瓮牖余谈》,岳麓书社 1988 年,页 24。
- ⑤① 《王韬日记》,中华书局 1987 年,页 92;参见拙著《江苏翻译出版史略》,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页 127—133。
- ⑤② 《王韬日记》,中华书局 1987 年,页 107。
- ⑤③ 宋小宋叙,载《大美联邦志略》,墨海书馆 1861 年。
- ⑤④ 王韬《瀛壖杂志·瓮牖余谈》,岳麓书社 1988 年,页 120。
- ⑤⑤ 《与法国儒莲学士书》,王韬《弢园尺牍》卷 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文海出版社,页 308。
- ⑤⑥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辑,文海出版社,页 833—834。
- ⑤⑦ 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 年石印本。
- ⑤⑧ [英]麦金托什(Gilbert McIntosh)著《在华伦敦会印书馆》(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美华书馆 1895 年,页 7。
- ⑤⑨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页 169—170。
- ⑥① [英]麦金托什著《在华伦敦会印书馆》,美华书馆 1895 年,页 17—18。
- ⑥② [英]伟烈亚力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上海 1867 年版,页 140。
- ⑥③ 裨理哲《地球说略引》,载《地球说略》,宁波华花书房 1856 年。

- ⑥② 《地球说略》，庚申(1860年)春东都江左老皂馆出版的箕作阮甫的训点本，页40、49、57、67、94、8。
- ⑥③ 《六合丛谈》咸丰丁巳(1857)六月第7号。
- ⑥④ 详见胡道静《印刷术“反馈”与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载《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1988年第1期。
- ⑥⑤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9年，第18卷，第10期，页518。
- ⑥⑥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88；据笔者所知，这一统计仍有讨论的余地，如熊氏所录的《几何原本》后九卷，是松江韩氏私刻本而非墨海书馆版；墨海书馆版的《问答良言》(合信著)却未见著录。
- ⑥⑦ 王韬《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年，页59。
- ⑥⑧ [英]季理斐译、温和光述《慕牧师木铎记》(The Life of the Rev. William Muirhead, D. D., for 53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22—1900 by his widow)，广学会1909年版，页1—6。
- ⑥⑨ 《出版史料》1988年第3、4期合刊。
- ⑦⑩ 参见沈毓桂《〈天道实义〉跋》，载《万国公报》第108期，1890年1月；艾约瑟《慕维廉先生轶事》，载《万国公报》第143册，1900年12月。
- ⑦⑪ 参见拙文《慕维廉与〈新工具〉》，载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⑦⑫ 详见刘强《1949年前上海地理学的发展与贡献》，《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0卷第114期，1998年第2期。
- ⑦⑬ [俄]伊·冈察洛夫《巴拉达号三桅战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464。
- ⑦⑭ [英]伟烈亚力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上海1867年版，页168。
- ⑦⑮ 王子贤、王恒礼编著《简明地质学史》，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页 202、204。

- ⑦⑧ 见郭双林《晚清西方地理学东渐述论》，载《学人》第7辑，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 年。
- ⑦⑨ 参见[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页 72；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页 503—506。
- ⑦⑩ [葡]玛吉士《外国地理备考》卷 1，“海山仙馆丛书”版。
- ⑦⑪ [英]慕维廉《地理全志》首篇“地理总志”，墨海书馆 1853 年。
- ⑦⑫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著《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增订本，页 244—245。萨默维尔的这本书最初的三版是两卷，分别出版于 1848、1849 和 1851 年，以后她不断增补新资料，曾合成一卷再版于 1858、1862、1870 和 1877 年。《地理学思想史》称该书在英国“甚少影响”。
- ⑦⑬ 慕维廉《地理全志》下篇卷 10“地史论”上，墨海书馆 1854 年版，页 1—5。
- ⑦⑭ 同上，页 7。
- ⑦⑮ 同上，页 7—8。
- ⑦⑯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著《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增订本，页 51。
- ⑦⑰ 慕维廉《地理全志》下篇卷 10“地史论”上，墨海书馆 1854 年版，页 8。
- ⑦⑱ 同上，页 12。
- ⑦⑲ 李长林《中国马可·波罗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世界历史》1996 年第 5 期。
- ⑦⑳ 慕维廉《地理全志》下篇卷 10“地史论”上，墨海书馆 1854 年版，页 13。
- ㉑ 《地理撮要》，载《退迹贯珍》1855 年 6 月第 6 号。
- ㉒ 王韬《瀛壖杂志·瓮牖余谈》，岳麓书社 1988 年，页 119。
- ㉓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9；文海出版社，页 4728—4729。

- ② 慕维廉《地理全志》识语,美华书馆 1899 年版。
- ③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页 339。
- ④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1896 年时务报馆版。
- ⑤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页 293。
- ⑥ 《遐迩贯珍》创刊号上列出时间为“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八月朔旦”,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 1 卷(页 294)把这一时间换算成 1853 年 9 月 3 日。其实这里“朔”是《礼记·礼运》“皆从其朔”的“初始”之意;且是“日”,某天的意思。《遐迩贯珍》“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正月朔旦”第 1 号的英文对照是“1st January, 1855.”。
- ⑦ 《遐迩贯珍》1854 年 12 月第 12 号。
- ⑧ 《新年叩贺》,载《遐迩贯珍》1855 年 3 月第 3 号。
- ⑨ 《地理撮要》一文附言称“慕维廉先生著有《地理全志》,分为文、质、政三统,斯诚无微不至,无义不穷者矣。有志地理者,于是书而考究焉,则庶乎其无遗义矣。兹《遐迩贯珍》所载,与将来后号所续,不过特其撮要耳。”(《遐迩贯珍》1855 年 6 月 6 号)文中提及的“地理博士”和“博士”可能指慕维廉。
- ⑩ 《续地理撮要》,载《遐迩贯珍》1855 年 7 月 7 号;这些地理学术语未见于其后出版的《六合丛谈》中慕维廉有关地理学的文章,也未见于 1883 年重订本的《地理全志》,因此笔者认为《地理撮要》一文作者不是慕维廉,《地理撮要》也非《地理全志》一书简单的摘编。
- ⑪ 《遐迩贯珍》1853 年 10 月 1 日第 3 号。
- ⑫ 《遐迩贯珍》1855 年 2 月第 2 号。
- ⑬ 《遐迩贯珍》英文停刊小启,转引自潘贤模《鸦片战争后的香港报刊》,载《新闻研究资料》第 11 辑,展望出版社 1982 年。
- ⑭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页 146。
- ⑮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页 33。

- ⑨ [英]托马斯(Rev James Thomas)《伟烈亚力传略》，载[英]伟烈亚力著《中国研究录》(Chinese Researches)，上海 1897 年，页 1—4。
- ⑩ 《六合丛谈》1857 年 1 卷 1 号。
- ⑪ 同上。
- ⑫ 艾约瑟《伯里尼传》，载《六合丛谈》1857 年 1 卷 12 号。
- ⑬ 《六合丛谈》1858 年 2 卷 2 号。
- ⑭ 《六合丛谈》1857 年 2 卷 2 号。
- ⑮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著《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增订本，页 27。
- ⑯ 《六合丛谈》1857 年 1 卷 9 号。
- ⑰ 《六合丛谈》1857 年 1 卷 10 号。
- ⑱ 《六合丛谈》1857 年 1 卷 11 号。
- ⑲ 《六合丛谈》1857 年 1 卷 12 号。
- ⑳ 《六合丛谈》1858 年 1 卷 13 号。
- ㉑ 《六合丛谈》1858 年 2 卷 1 号。
- ㉒ 《六合丛谈》1858 年 2 卷 2 号。
- ㉓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著《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增订本，页 116。
- ㉔ 《论英格致大公会会议》，载《六合丛谈》1857 年 1 卷 11 号。
- ㉕ 《察地略记》，载《六合丛谈》1858 年 1 卷 13 号。
- ㉖ 伟烈亚力《六合丛谈二卷小引》，载《六合丛谈》1858 年 2 卷 1 号。
- ㉗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 1955 年，页 68—69。
- ㉘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页 1—3。
- ㉙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页 205。
- ㉚ 参见拙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科技的引进》，载《出版史料》1986 年第 6 期；有关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书目至今统计不一。最新的

- 统计见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载《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16卷第2期),该文写道:“翻译馆译书183种,地图2种,译名表4种,连续出版物4种,共193种;他处所刊行翻译馆译书8种;已译未刊译书40种。总计已刊未刊各种译著共241种。”
- ⑩ [美]贝内特(Adrian Arehar Bennett)《傅兰雅译著考略》(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67年版,页4—8。
- ⑪ 傅兰雅致苏西(Cousin Susy),1867年5月;转引自[美]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著《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企鹅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英文版,页144。
- ⑫ 傅兰雅致玛利亚(Anut Maria),1870年11月8日;转引自[美]史景迁著《改变中国》,页152。
- ⑬ 傅兰雅《科学在中国》(Science in China),转引自[美]史景迁著《改变中国》,页156—157。
- ⑭ 《海防新论·华蘅芳序》。
- ⑮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0辑,文海出版社,页9129—9130。
- ⑯ 《清季外交史料》卷45,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页112。
- ⑰ 《李尚书政书》,卷6,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二辑,第二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页714。
- ⑱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辑,文海出版社,页9262—9263。
- ⑲ 另外,金楷理还与赵元益译出过《海战指要》,刊载与《格致汇编》第4年(1881)第6至第10卷上;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统计的已译未成或未刊的西书中还有金楷理译述的《地说》、《热学》、《公法千章》、《布

- 国兵船操练》、《美国兵船枪法》、《兵船炮法》、《喇叭法》等译著。
- ⑬ 参见拙文《近代最早百科全书的编译与清末文献中的狄德罗》，载《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
- ⑭ 王树槐《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载林治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页199—202。
- ⑮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43。
- ⑯ 《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33。
- ⑰ 李善兰《重学序》，1859年钱氏活字版。
- ⑱ 王韬《瀛壖杂志·瓮牖余谈》岳麓书社1988年，页120。
- ⑲ 张兆蓉《泰西各国名人言行录》，明达圣教会1903年，卷11，页3—4。
- ⑳ 《新出书籍》，《六合丛谈》咸丰丁巳年（1857）九月第10号。
- ㉑ 《敬录李爵相西学略述序》，载《万国公报》1889年6月第5册。
- ㉒ 艾约瑟译编《地志启蒙》卷4，上海著易堂书局1898年版，页114。
- ㉓ 艾约瑟译编《地理质学启蒙》卷7，总税务司署1886年印本，统论。
- ㉔ 艾约瑟著《西学略述》，总税务司署1886年印本，页4。
- ㉕ 该卷指出“至中国周初时，希腊有一瞽者，名曰和美耳，最长于诗。其生平著作惟时已脍炙人口，后人为之校定成集，计其大者，分有上下两部，每部二十四卷，中皆详咏希腊国人时与邻境构兵，而希腊人多好勇，以独身挑战为能等事。虽其言多奇诡而义皆终归于正固，未足称史，实开作史之先。即后人之著作篇什，下而至于农歌、戏剧等文，皆祖之。”参见《西学略述》，总税务司署1886年印本，页31。
- ㉖ 文中称希罗多德“缘其曾周游多国问政访俗，并皆征诸故老之所流传典籍之所采录，返至希腊，兼证以昔所见闻，而作史九卷。”参见《西学略述》，总税务司署1886年印本，页55。
- ㉗ 艾约瑟著《西学略述》，总税务司署1886年印本，页122。
- ㉘ 艾约瑟著《西学略述》，总税务司署1886年印本，页122—123。
- ㉙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岳麓书社1987年，页351—352。
- ㉚ 艾约瑟著《西学略述》，总税务司署1886年印本，页127。

- ⑮ 参见王晓伦《地理探险、地理学与西方文化》，载《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
- ⑯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时务报馆1896年本。
- ⑰ 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卷3，算学报馆1898年版。
- ⑱ 徐维则、顾燮光编《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石印本。
- ⑲ 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页5。
- ⑳ 《庄子集释》，载《诸子集成》(三)，上海书店1986年，页101。
- ㉑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页2344。
- ㉒ 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载《考古》1979年第5期。
- ㉓ 《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1977年，页1473。
- ㉔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246。
- ㉕ 有关“地理台阶”请参看第一章注(84)。
- ㉖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页237—238、246、263。
- ㉗ 范祎《中等地理教本序》，[英]汉勃森著《中等地理教本》，广智书局1907年。
- ㉘ 参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二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页68、793。
- ㉙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议战》卷2。
- ㉚ 姚莹《康輶纪行》卷5，页1。
- ㉛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60—265。
- ㉜ 魏源《海国图志》叙。
- ㉝ 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辑，文海出版社，页1622—1623。
- ㉞ 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4，同上，页1876—1877。

- ⑮ 林则徐《覆奏曾望颜条陈对关禁海事宜折》，载《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分册，页164。
- ⑯ 《六合丛谈二卷小引》，载《六合丛谈》1858年2卷1号。
- ⑰ 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己丑年，上海书局1897年石印本。
- ⑱ 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79—180。
- ⑲ 朱有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940。
- ⑳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时务报馆1896年版。
- ㉑ 冯桂芬《采西学议》，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82。
- ㉒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页77。
- ㉓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载《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页112—116。
- ㉔ 参见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62。
- ㉕ 参见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169—170。
- ㉖ 梁启超《三十自述》，载《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页49。
- ㉗ 《曼殊室戊辰笔记》，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8。
- ㉘ 魏源《西洋人玛吉土地理备考叙》，载《海国图志》卷76。
- ㉙ 易鼎《五洲风俗异同考》，载《湘学新报》1898年5月1日，第35册。
- ㉚、㉛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9。
- ㉜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67、175—177。
- ㉝ 姜义华编《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702。

第三章 戊戌到辛亥近代西方地理学 思想与知识体系的输入

1898年至1911年是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一个关键的时期。1894年甲午一战的惨败和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以巨大的震惊。曾经是“蕞尔小国”的日本,通过全面地学习西方,竟一举击败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帝国。如果以往列强侵略所带来的危机感还局限在少数先进知识人范围里的话,那么,甲午一战则是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群体。笔者之所以把1898年作为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前后阶段的分期界标,是因为1898年的戊戌维新虽然没有达到它的政治目标,但戊戌变法所引起的思想变革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和全国规模的冲击。1898年的政变并没有导致西学传播的萎缩,而是预示着新一轮大规模西方新思想引进高潮的到来。正如美国学者张灏所指出的:“维新时代产生了新的社会类型的人,这些人和旧式士大夫截然不同。他们的出现,与新颖的思想风气、新的变革的组织工具以及正在成长的社会舆论一起,构成了维新时代的主要遗产。”^①从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致力于西方地理学的传播,至1898年已历经了80年的岁月了,但由于译出的地理学译著毕竟非常有限,传播的范围也只在一部分知识者的

群体中,直至1890年美国传教士谢卫楼在《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现状及其需求的关系》中指出:尽管“近代天文学、地理学早在三百年前已经在中国传授了。数百年来这些学科的书籍,很容易搞到手。可是在今天中国的首都宣布地球是圆的这样一个真理,会引起一批孔门学者的惊讶和怀疑。”^②地理学的启蒙工作仍需在新的层面上进一步强化。

19世纪中叶以来,以经济的近代化作为清末城市发展的基础,上海等一些通商口岸迅速成长为具有相当规模贸易网络和交通发达的工商业城市。戊戌维新造成的晚清思想界的激荡,1898年以后的学会、学堂和各种传播媒介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的公共领域。它们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西方新式铅字和动力印刷技术的传入,书籍装订技术的变革和清末实行的书籍免税政策,大幅度地降低了书籍的价格;技术变革导致了藏书容积的减少也促进了20世纪初图书馆事业的发达。19世纪初以来西方传教士从事的教会教育,也为近代图书市场的发育培植了一个具有新知识和近代趣味的读者群体。加之西方版权观念的输入和版税方法的采用,催发了20世纪初以留日学生为主体、以上海为中心的地理学出版高潮的掀起。

一、留日学生运动的掀起与 日文地理学西书的翻译

甲午战后,中国人从惨痛的失败中开始寻找与思考日本之所以迅速强大的原因。有识之士在众多的因素中注意到了日本对西方书籍的翻译。康有为在1898年5月的《戊戌奏

稿》中大声疾呼：“日本者亦闭关也，而早变法，早派游学，以学诸欧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早译其书，以善其治，是以今日之强而胜我也。”他自信“大译其书以善其治，则以吾国之大，人民之多，其易致治强可倍速于日本也”。^③盛宣怀也指出日本维新以后，“以翻译西书为汲汲，今其国人于泰西各种学问皆贯串有得，颇得力于译出和文之书”，因此要“广购日本及西国新出之书，延订东西博通之士，择要翻译”。^④梁启超进一步分析道：“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⑤对赴日留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是 1898 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一书，该书中《游学第二》写道：“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理由一是路近费省可多遣，二是去华近，易考察，三是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是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当然还包括“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⑥这几条后来几乎原封不动地被光绪皇帝写进了 1898 年 8 月给军机大臣的上谕。^⑦尽管当时各派人士在主张留学、译书问题上，各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有着不尽相同的利益，但在留学日本与译书方面却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也是为什么 1898 年 9 月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在派遣赴日留学生的计划方面各省仍能继续有效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日本学者阿部洋认为，清政府制定的派赴留日学生的计划，由于政变而被取消，只是在义和团运动后慈禧太后进行变法时期，清政府才真正开始实施派遣学生留日的计划。^⑧实际

上,就在戊戌政变后的第二年,留日学生的派遣工作已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899年10月嘉纳治五郎主持的私塾改名亦乐书院,收容了11名张之洞派遣的学生入学,这一年总数为117人。^⑨1900年目前尚未找到明确的统计,从姚锡光《东瀛学校举概》一书1899年在北京出版后,1900年又出皖城版,可见销路看好,继而又摘要编成《日本学校述略》,由浙江书局出版。1901年章宗祥撰写的《日本游学指南》相继出版,反映出这一时期留日学生和预备留日学生的人数不在少数。1901年留日人数为280余名,^⑩1902年增至608人,1903年为1073人,1904年高达2823人。^⑪1905年11月,留日学生达8621人,1906年秋达13000人,1907年仅东京一地就有15000—17000人。^⑫上述这一数字仍然是不完整的。吴玉章估计1905年的留日学生人数在万人以上。^⑬张元济1906年在《议改留学日本办法》一文中描述当时留日的盛况:“查近日留学日本学生人数已达八千。沪上邮船开派日本者,每次总有学生数十人,转瞬即将过万。”^⑭日人青柳笃恒描述:“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中国留日学生东渡心情既急,至于东京各校学期或学年进度实况,则不暇计也,即被拒以中途入学之理由,亦不暇顾也。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中留学之实情也。”1906年11月他估计“现在都下清国留学生数将达二万”。^⑮1906年至1907年是清末留日学生运动的高峰期,以后就逐年减退,1908年为5217,1909年为5266,1910年为3979,1911年为3328。^⑯这一统计虽不一定精确,但下降的趋势却是符合实际的。

日本开始对近代西学的接受也是借助中国这一中介的,即使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仍然是通过阅读汉译西书来了解

西方文化的。在地理学的领域中同样如此。日本幕府末期的著名洋学家柳河春三在 1861 年出版的汉文本《横滨繁昌记》中,有“舶来书籍”一节,其中介绍的近刊汉文西书有《谈天》、《数学启蒙》、《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博物新编》、《重学浅说》、《智环启蒙》、《全体新论》、《内科新说》、《西医略论》、《妇婴新说》,西方地理学方面的有《瀛环志略》、《地理全志》、《地球说略》、《联邦志略》,以及《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上海新闻》等杂志。^①《地理全志》、《地球说略》、《联邦志略》在传入日本后不久,就有了日本刻本。1858 年盐谷岩阴在序中写道:“近代译西舆地书,以《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为核实。然《图志》失于杂,《志略》主于事迹,皆未能悉于方輿。此书西洋士所撰,其记国朝,虽多疏谬,而至旧所通诸邦,盖简而括。浏览三日,略足以了五洲之大势,则讲地理者,安得不以此为捷径焉哉。”^②裨理哲的《地球说略》1856 年问世后传到日本,1860 年由箕作阮甫训点刊行,为上中下三卷。作为简明的世界地理入门书很受欢迎,明治初年还一度成为学校的世界地理教科书。1864 年重印了薄页本。1874 年东京甘泉堂出版了赤直常道的日译本,名为《地球说略和解》。第二年又由宝集堂刊印了福田敬业译解的《地球说略译解》。裨治文的《联邦志略》1861 年版传入日本后也有箕作阮甫训点,箕作死后翌年 1864 年正式刊行。^③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向西欧派遣留学生,有到英国学商业、地质金石学、畜牧业的;有到法国学动植物学、国势学的;有到德国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有到美国学邮政、工艺学、农业、畜牧学、商业、矿山学等。^④当时西欧的大学还没有地理学系,但大多已设立了专门的地理学课程。^⑤日本留学生在上述这些系科中

多少接触到了欧美的地理学最新的研究成果。19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的地理学研究兴趣日益高涨,1875年日本设立东京气象台,1879年在东京成立了地理学会。地理作为一门大学的专业课程,在日本首先是由地质学者、历史学者和农业专家创始的,领路的地质学者是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奠基人小藤文次郎。他原是东京大学的学生,后派赴德国的慕尼黑和莱比锡研究地质。1890年他回国后就在东京大学地质系教地理课。日本的第一批地理学教授都是小藤的学生,他们都在东京大学读了地质再去德国学地理的。清末小藤文次郎还数次来中国和朝鲜进行地质调查,他的第一篇著述是《支那并其四近地质撮要》,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日本许多地质学家来中国考察,出版了有关中国地质的大量图籍。^②在一片向日本学习的呼声中,日本地理学者引进的西方地理学以及日本学者的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学者和赴日留学生的高度重视。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卷4的“图史门”列出了日本学者译编的“地理总记”18种,其中有后来译成中文的志贺重昂的《(订正四版)地理学讲义》;“万国地理”21种,其中有小藤文次郎编纂的《地理学教科书》和中村五六的《中等地理》;“各国地理”13种,其中有矢津昌永的《亚细亚地理》;“地理小学校用”教科书52种;“横文地理及地文”7种;“地文学”18种;另外还有小学校用地图78种、日本地图45种、东京图19种、府县及分国图22种、北海道图7种、亚细亚地图15种、万国地图16种。^③1898年黄庆澄在《中西普通书目表》中指出:“治地学当求实用,仅以考证自鸣抑末也。罗君叔蕴近得日本《万国地志》,条例精善,中国地志,无其伦比。”

1898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东传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

段,在这短短的13年中,笔者统计到的西方地理学译著多达157种,每年平均12.1种。这一时期地理学译著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部分地理学译著的原本来自日本,在这157种译著中,日文原本或由日人用中文撰写的多达99种,占总数的63%。有关地理学通论与教科书共34种,其中23种来自日文;气象与气候学的6种译著,有5种来自日文;人文地理学的12种,有10种来自日文;商业地理学的11种,有8种来自日文。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留日学生编译的,如译出《新撰大地志》的叶瀚、译出《日本地理志》的王国维、译出《改正世界地理学》的吴启孙、主译《普通百科全书》的范迪吉、译出《地理教授法》的陈独秀、译出《政治地理》的刘鸿钧、译出《外国地理讲义》的曹典球等;译出《地球之过去未来》的秦毓娉和译出《富之满洲》的马为珑是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译出《世界物产志》的童世亨是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留学生,译出《地文学问答》的邵羲是法政大学的留学生。有些地理学译著直接是由一些留日机构出版的,如《(中学)万国地志》由出洋学生编辑所译出,汪郁年译补的《中学地文教科书》1903年由东京教科书译辑社出版,陈树藩译编的《最近中学地理教科书地文之部》1906年由中国留学生会馆出版,谷钟秀译编《(最近)统合外国地理》1907年由清国留学生会馆推出(参见附录一)。小藤文次郎的学生山崎直方(1870—1929)189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地质系,在仙台大学教了三年书后被派赴德国和奥国留学,1898至1901年在波恩师从彭克父子。1902年回国,在东京高等师范执教,不仅培养了许多合格的中学师资,还在大学里发展了地理学研究。1908年他担任东京大学法律系的经济地理教授后,还继续在高等师范任教。1911年他被任命为东

京大学的第一个地理学教授。1925年地理学会成立,出任会长,并创办《地理学评论》。他的地理学思想受德国拉采尔的影响较深,既是日本地理学发展的推动者,又是日本地理教育的先驱。著有《大日本地志》、《西洋与南洋》等书。他所编的教科书,先后通过1904年昌明公司出版的沈仪熔译编的《(最近中等)地文学教科书》和1910年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出版的曾彦编译《(普通教育)地文学教科书》传入了中国。

甲午战后中国朝野人士都开始认识到日本在摄取西方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他们鼓吹留学日本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期望通过翻译经过日本消化删定的西方书籍,来进一步认识西方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日本教育的成功。梁启超在1897年的《变法通议》就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日本变法就以学校为最先,他主张以日本为师,兴师范、办女学、倡幼学。^④即使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认识到日本教育改革所具有的示范效应。1902年春,张之洞致函张百熙讨论学务政策,指出“师范生宜赴东学习。师范生者,不惟能通晓普通学,必能晓为师范之法,训课方有进益。非派人赴日本考究观看学习不可。”^⑤由下面这些材料可以解释为什么从戊戌到辛亥通过日文译出的地理学著作中大部分是日本各种不同层次的教科书。1903年4月至10月,留日学生中的毕业生(不包括进入其他学校深造者,下同)共175人,读师范者71人,占40.6%,其中宏文学院速成师范毕业生46人,宏文师范毕业生25人。1903年10月至1904年4月,留日学生中的毕业生共124人,读师范者86人,占69.3%,其中宏文学院速成师范毕业生41人,其他速成师范毕业生45人。1904年5月至11月,留日学生

中的毕业生 165 人,读师范者 37 人,占 22.4%,其中宏文学院师范毕业生 24 人,其他 13 人。^⑥大批师范毕业生的回国,迅速推动了国内地理学教育的发展。他们编译了一批日本各种不同层次的地理学教科书,如樊炳清译《万国地志》是日本在 1896 年出版的中学课本,出洋学生编辑所译《(中学)万国地志》、徐大煜编译《(最新)世界地理学》也是日本中学地理教科书,吴启孙编译《改正世界地理学》是译者据东京初译的《世界地理学》重编,后经京师大学堂审定,列为教科书颁行各省为学堂课本。朱杞编辑《地理学》编入速成师范讲义丛录,江苏师范生编辑的日本牧口常三郎讲授的《地理》,列入了江苏师范讲义第 7 编。日本一些质量较高的小学教科书被中国多家出版社推出,如日本地理学家横山又次郎的《地球之过去及未来》,1902 年有广智书局版冯需译本和文明编译印书局秦毓璠、杨我江译本;日本富山房编纂的《地文学问答》一书,1903 年就有邵羲译述的商务印书馆版、范迪吉等译的会文学社《普通百科全书》本、陈大棱译述的上海作新社三种版本。日人山上万次郎所著《统合地文学》一书,先后有邓毓怡译的《地文学教科书》(东京合资会社三田印刷所 1906 年版)、无锡译书公会译的《最新地文学教科书》(上海科学书局 1907 年版)、曾彦编译的《(普通教育)地文学教科书》(上海科学会编译部 1910 年版),后者还参考石川成章、山崎直方、神谷市郎所著的各种教科书和参考书进行编译。东京湖北法政编辑社 1905 年版刘鸿钧编译《政治地理》是译编者据日本学者野村浩一等编著讲授稿,同时参考了山本信博的《政治地理学》、辻武雄的《五大洲志》、佐藤传藏的《万国新地理》、辰巳的《万国宪法比较》诸书编译的。该书共分 9 章,第 1 至第 3 章,泛论

国家、国家之分类及政体；第4至第8章分述各国政略，如亚洲各国志、欧洲各国志、美洲各国志、亚美利加洲志、大洋洲和属地；第9章论列强之属地，是据山本信博《政治地理学》译辑而成。日本池边义象著的《世界读本》是日本各中学练习语法用的教材，1902年初版后至1906年已印有20版。1907年日语讲习会译释该书成《(和文汉译解释)世界读本》，由贵州启智学社出版，该书译本据新版译出，采用日汉对照，原文在前，译文次之，解释附后，以供中国留学生学习日文之用。全书分3编。第1编由西洋各国之衣食住、土耳其之风俗、巴里之凯旋门、露西亚之王宫四节组成；第2编由西洋人之公共道德、俄罗斯之风俗、伦敦之繁华、欧米之市街交通四节组成；第3编由伦敦之日曜日、柏林市、波达漠、巴里之花战、西洋之画端书五节组成。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毓修编译本。

1905年废止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成立新式学堂。在新式学堂师资奇缺的年代里，清政府曾大量向日本招聘教员，1905年大批日本教习来华，担任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种师资，1906年估计有500—600名之多。分布在京师、直隶直至云南、贵州、蒙古等22个地区。有一些学校的地理课程就由日本人承担，如关荣太郎就充任过北洋师范学堂的地理历史教员。1906、1907年开始有大批的留日毕业生回国，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师范生陆陆续续执教代替了由日本教习担任的课程，当然也包括各类学堂中的地理学课程。到了1910年已找不到日本教习任教的统计数字了。^②正像在国内到处掀起的收回利权的运动一样，留日学生运动的兴起也为在教育上收回由日本教习掌握的教育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留日学生的翻译日文西书的活动，为20世纪的中国地理学界培养了一个具

有新思想、新知识结构的翻译群体,一度活跃在地理学翻译的舞台上的叶瀚、王国维、吴启孙、范迪吉、陈独秀、刘鸿钧、曹典球、秦毓璠、童世亨、陈树藩、谷钟秀等,后来有的成了许多科学、社会、文化等报刊的主要编辑,如陈独秀、谷钟秀等;有的在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如王国维、童世亨等;有的成了著名的教育家,如叶瀚、曹典球等。大批留日毕业生归国后成了一些新型出版机构,如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作新社、金粟斋、会文学社等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出现,使中国翻译史上的主译者的地位发生了转换,取代了戊戌前西方传教士作为近代文化传播中的桥梁地位,最终结束了那种口译笔述的译经方式。在地理学译著方面从戊戌到辛亥中国人译编的已居主导地位,在 157 种里占有 131 种,是总数的 83.4%,在 13 年中出版的 40 种区域地志中,有 36 种是中国人译出的;有关文化与政治地理学的 12 种,全部都由中国人译出(参见附录一)。

二、广智书局的地理学译著

戊戌变法以前,西学出版的中心是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美华书馆等官方和教会主办的出版机构。1898 年后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民营出版机构的大量涌现。广智书局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出版西方地理学译著较多的出版机构。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启超游澳洲的时候,与该地维新会同志谈及在国内创办文化事业的计划,得到了多数同志的赞同,以后进一步与康有为商量,决定征股创办译书局和图书公司,于是有 1901 年上海广智书局和 1902 年横滨大同译

书局的诞生。广智书局原定名文明书局,于光绪二十七年四五月间开始筹备。十一月间正式营业,改名广智,取广为传播知识之意。^②该局设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同乐里(以后迁棋盘街,再迁江西路),一切筹划均由带罪之身的梁启超幕后主持,名义上是由华侨冯镜如全权负责,担任发行人。主要股东黄慧之任总经理,驻横滨主管财务。梁荫南驻上海负责实际经营。梁启超1902年在信中称冯镜如不仅是“未受一文薪水”的志愿者,而且“为吾党公事赔垫不少”。梁荫南“每月仅支四十元,实亦不足用,且彼为此事亦极尽瘁。”^③开创不久,形势颇好,于是又在北京和广州设立分局。广智书局的经营方式第一为译书,从事西学的介绍,第二是出版应试指南,以从中牟利。以此来发展译书事业。张朋园估计该局所出翻译图书不下二百余种。以日文为蓝本之著作,所占比例最大,近二百种之多。以类别言之,政治、经济、哲学、地理、历史等份量最重,文学、自然科学次之,应用科学又次之。翻译者大多为留日学生,较知名的有麦孟华、麦仲华、麦鼎华、梁启超、梁启勋、章太炎、冯自由、赵必振、罗伯雅等。^④

广智书局出版的译著中,地理学占有相当的比例。其中较有份量的普通地理学译著有卢藉刚编译《外国地理问答》(1902年);有周起凤译述日人中村五六编纂、顿野广太郎修订的《万国地理志》,该书为《万国通志》第六编,1902年出版。全书分七编,一编地理学分3章,第1章数理地理学,论地球之形状及大小、方位、地球的自转与公转、五带、经度与纬度;第2章自然地理学,论水陆、陆之区别、地面之变动、水之区别、海水之运动、大气、风、雨、气候、植物、动物、人类及人种、矿物;第3章政治地理学,论国民之生业、文明之等级、宗教、

政体；二编亚细亚洲，分 12 章，论中国、日本、朝鲜、亚细亚部俄罗斯、印度支那、印度、阿富汗、俾路芝、波斯、阿刺伯、亚细亚土耳其；三编欧罗巴洲，分 19 章，论英吉利、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奥地利、匈牙利、瑞西、日耳曼、普鲁士王国、巴威里王国、乌尔丁堡王国、撒逊王国、诸小邦及自由都府、帝领、比利时、荷兰、丹麦、瑞西那威、俄罗斯；四编亚非利加洲，分 11 章，论埃及、亚培息尼、北海岸诸国、萨哈拉等地；五编北亚美利加洲，分 7 章，论绿岛、英领加奈多、合众国、墨西哥、中央共和诸国、西印度诸岛；六编南亚美利加洲，分 15 章，论哥伦比亚、维尼助拉、英领扼亚奈、法领扼亚奈、勃来如尔共和国、伊扣独亚共和国、秘露等地；七编澳西尼亚洲，论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纽裁伦岛、濮来尼亚。1904 年该局出版有沈诵清译日人秋鹿见二著《世界诸国名义考》，该书是一部简明地理学的人门书。全书分五节，第一亚细亚洲，第二欧罗巴洲，第三亚非利加洲，第四亚米利加洲，第五大洋洲。每节都分为约说与名义两部分，追溯名义的起源，犹如一部地名语源学词典，秋鹿骏东在《叙》中称：“以其地名过去之历史，及现在之影响，敷陈引用，用为资料，随示其名，并释其义。”^④

1907 年该局推出了任廷旭、范祎译述的英人汉勃森 (Herbertson) 著《中等地理教本》，该书以汉勃森原著为主，同时参以美国弗尔来 (Frsge) 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绪论，分述发端、地球之远近与方向、地面之周围与其变动、地球之形状与大小、地球自转以分昼夜、地球公转以成四时、地球上之五带、地球之经纬度、地理学之分类。中卷地理概略，分形势地理、生物地理、人类地理三章，形势地理即今日的地貌学，讲

述水陆洲洋区分、地球之凹凸与江河山岭之成因,火山、山、磐石的种类,气候之变化,热气所分之带、各带四季之气候、空气中之水、空气之成风雨、海洋之气候与其咸质等;生物地理讲述各种动物与植物的区别,赤道界内之森林、沙漠、大草地、冰地、动物之区别、海中之动物、陆地之动物、冰地之动物、草地之动物、东方之动物、非洲之动物、南美洲之动物、澳洲之动物、海岛之动物;人类地理讲述全世界民族及其所居之地,人民之职业,通商之大要,人类的种族,各族的方言,各国的政体,人类的宗教。下卷世界通志,分为亚细亚洲、欧罗巴洲、阿斐利加洲、北亚美利加洲、南亚美利加洲、大洋洲六章。后附中西名目表。译者范祎在序中指出西方地理学思想传入时间并不晚,早在明末已有了像《职方外纪》那样“绝完善之地理学教科书”,但为什么到了近代“道、咸英、法之来,而懵然不识所以对付之策乎!”原因在于“三千年来,深闭固拒之习俗未除,又以非利禄之途,则肄习者甚少,即有一二名山著述,亦不过校班志之遗闻,补桑经之佚说。以为地理学者,固在故纸堆中,于本国当前之现象,尚无待深知,更何暇驰鹜于域外乎。呜呼!历溯最近数十年中外交失败,以画界而割地于暗中,动辄数千里。内讧蜂起,仇此国而波及他国之人,赔款至不可胜计。而社会盲瞽之害,其足为隐忧者,犹不止此。然则地理学之关系于民智,诚一国兴衰强弱之本也。”译者称编译地理学教科书就是为了培养民众的“世界观念”和“国家思想”,“激励其精神”。^②

地文学和地球知识方面的有 1902 年该局推出冯霏译日人横山又次郎撰《地球之过去及未来》,该书旨在阐明“地本圆球,为天空中一小游星之至理”。分总说、星辰世界、太阳、游

星、水星、金星、火星、众小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月球、地球的去及未来。书中述及康德的《天然史及天之说》和拉普拉斯的《世界解说》。

交通地理方面有 1902 年广智书局译日本参谋本部编辑《东亚各港口岸志》，该书分 8 篇，首篇 23 章记中国的上海、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宜昌、重庆、天津、芝罘、牛庄、宁波、温州、汕头、福州、广州、厦门、北海、琼州、台湾、鸡笼、淡水、香港、澳门这 23 个通商港口；二篇 2 章记俄领沿海洲的乌拉地俄斯德和哥萨港；三篇 3 章记朝鲜的釜山、元山和仁川；四篇 1 章记法属的西贡；五篇记安南的海防；六篇 1 章记英属地新加坡；七篇 1 章记暹罗的盘谷；八篇 1 章记小吕宋群岛马尼拉。对于各港口位置、分界、沿革、行政、人口、兵备、风俗、气候、物产、贸易、街市、碇泊均有所叙述。同年还有克斋译日人小越平隆著《满洲旅行记》；1903 年有汪国屏译日人林繁著《扬子江流域现势论》。

商业地理方面的有 1902 年广智书局译英人嘉植德著《万国商业地理志》；1907 年该局出版了李鸣谦译日人矢津昌永著《最新韩国商业地理》和霍颖西译日人胜部国臣著《中国商业地理》，后者分 2 编 13 章，前编包括中国总说，中国通商总说、列国之经营、中国之矿山、交通、金融机构、货币、度量衡、关税和商品等 11 章；后编专述开港场和商业地。

重要的教科书有该局 1905 年和 1906 年分别编述了《(中学用)世界地理教科参考书》(第 1 编)和《(中学用)世界地理教科书》(第 1 编)，该书编纂取法于德国教科书的精义，接受了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地理学家李特尔的见解，认为地理学研究的是人类的家乡，其目的在于弄清自然的一切现象和形

态与人类的关系。该书的弁言指出：“盖必使学者于地球上，明人种生存与大地有何种关系。吾所立之部分，与他部分有何干涉，有何比较，因而取自然界内之所有，如形势、气候、物产、生业，及人类发达迟速之现象，都邑盛衰迁变之原理，以发其思想智识，使毕业后立于世界上，凡彼我之自然的地理、经济的地理、政治的地理，知其长短优劣。渐而至一种不可言语之精神的地理，亦自领悟得。此地理学，所为位于学科最要之点也。”^③该书有“惟举纲目、汇列而条析”的纪事本末体；“激发吾人乡土家国之爱情”的开化史的结合法；“必具参考书以济教科之用”的博参类集法；以及以价值叙述为特点的中心统合法四大特色。该书系采集群书而成。欧罗巴部分引用的资料有腓立氏《近世地理》、利克留氏《新万国地理》、希尔《近刊万国地理》、斯丹福《地理撮要》、各国最近政治年鉴、各种地名辞书、《世界完备地图集》、《世界现状地图集》、《时代地图集》、矢津昌永等《高等地理》、山上万次郎《新撰大地志》、野口保兴《世界大地志》和《世界经济地理》、历史地理讲习会《地理讲义》、伊东《最近世界年鉴》、历史研究会《世界大年表》。第1编为高等地理学的欧洲部分，专备中学、师范学校教学之用。全书不分卷而采用列目，有名称、比较、境界、幅员、地形、岛屿、海峡、地峡、海湾、岬角、内海、黑海、里海、波罗的海、地势、山岳、河川、湖沼、气候、雨量、物产、植物、动物、人种、人口、语派、宗教、教育、文明、商业、交通机关之发达、天然区划之利用、政治、政统之区别、国力之比较三十多目。参考书目录与教科书同，内容略有增加，如1903年的海军统计表和陆军统计表，教科书中颇略，而本书中不仅对所列表中的数字详加解释，还追本溯源，介绍战时法国和俄国的兵额，最后还将中国

陆军兵制和海军兵制与其对照。

另外还有世界地图和地区图,如1901年有日人岸田吟香的《中外方輿地图》、《坤輿全图》;英国约翰逊的《世界大地图》;1907年有邝其照的《地球五大洲全图》等。

广智书局出版的译著,皆有相当的特色。但广智书局经营不善,尤其财务管理不得其人,因此,除第一年稍有盈余外,^④以后均呈亏损状态。该局经营不善,有时任上海广智书局经理梁荫南的“不在行之处”,尽管他在工作中也颇为尽心,但“亦诚有刚愎之处”,^⑤其失误可能是因为该局1902年编印了大批应试指南,价值三万余元,不幸两年之后科举制废除,大批应试指南成了废纸,此一损失转而变成广智书局的债务,广智书局的一些畅销书又纷纷被一些不法书商盗版。加之驻东京掌财务的黄慧之品行不端,竟乘梁启超游美期间挪用巨款。后来虽经催促交还了部分,但仍欠下了三万元,终于化为乌有。梁启超痛悔不能识人,然已使广智书局陷入周转不灵的困境。再加上梁启超本人也挪用股款二万元支持《新民丛报》,更使广智书局雪上加霜。1903年改由何擎一负责上海工作,^⑥1904年又改组增资,剔除黄慧之等不良分子,改由梁荫南任总经理,然情况仍未见好转,负债达两千元之巨。不仅股息不能发放,还需康有为每年予以汇款接济。1906年汇墨银圆约四万元,以后每年平均支持千元,但仍营业不振,所汇款项,不过维持而已。由于广智书局不能发放股息,引起股东的不满,以至影响到了维新会内部的团结。康有为的接济,加上熊希龄的暗中扶助,广智书局勉强拖到了1915年,再也维持不下去了。^⑦

三、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译著及其影响

在晚清翻译出版界独占鳌头的商务印书馆是光绪二十六年(1897)正月初十(2月11日)在上海成立的。发起人为夏瑞芳、鲍咸恩、咸昌兄弟和高凤池,共筹集了四千元资本。这四位创办人都与西方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四人幼小时都就读于基督教长老会清心堂分设在南市的清心小学。夏瑞芳后来以优异成绩升入清心书院,在这所培植教徒的学校里,他学圣经、英文等科目,并在附设的工场里学习技艺。毕业后他在同仁医院里当助手,一年后他转入英商文汇报馆学习英文排字。数年后入字林西报馆,娶同馆同事鲍咸恩之妹为妻,后又入当时颇有名气的一家英文报纸——捷报馆(China Gazette),与鲍咸恩、咸昌兄弟同在该报馆当英文排字、制版,夏瑞芳很快成了该报馆的“排字领袖”。^⑧在创设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中,在美华书馆当司务的高凤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美华书馆是继墨海书馆之后影响较大的教会出版机构,其前身是宁波的花华圣经书房。1858年美国传教士姜别利(William Gamble, ?—1886)继裨理哲出任该馆主任,他不仅发明了电镀中文字模,而且很快认识到上海对于发展教会出版的巨大意义,于1860年12月把该馆迁往上海。^⑨19世纪60到90年代的许多重要的西学书籍都是由该馆出版的。因为四人是同学,又有共同的基督教信仰,星期日常常一起到教堂里做礼拜,高凤池后来在《本馆创办史》中说:“捷报总经理兼编辑是英人 Mr. O'shea,脾气极坏,对于工友非常看轻;怠慢之事,又是常有。三四十年前,西人那种不可一世,轻视华

人的心理,是很显著的。夏鲍二先生在捷报馆里,极为痛苦。我与夏鲍二先生是幼小时候的同学,又以宗教信仰相同,星期日做礼拜,常常在教堂里会面;午后又常常在城隍庙湖心亭吃茶,有时上小饭馆吃饭,真是少年知己,无话不谈。”^⑩他们的创设计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商务印书馆在江西路德昌里开办后,高凤池仍留在美华书馆,想来是让高充当一种了解技术信息、商业情报的中介。起名“商务印书馆”,英译“Commercial Press”,标明其业务是与美华书馆相似,主要承印商业用品,如名片、广告、簿记、帐册、信纸、信封等,随着设备和技术都超过美华书馆,最终把这家教会出版机构挤垮。

早期商务印书馆是靠谢洪赉译注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二书改变自己形象的。这两本书在教育界打响,风行一时。梁漱溟称自己在中西小学堂开始学习 ABC,用的就是这两本书。^⑪两书经过几次改译,流行了十几年,这是商务印书馆经营出版事业的开端。^⑫以夏瑞芳为代表的这批创办人,尽管文化程度并不高,但由于他们长期在教会办的报馆和出版机构中工作,眼界比较开阔。他们除了承印《格致新报》、《外交报》外,也开始从事编译出版。甲午战后,随着留日学生运动的勃兴,大量通过日文转译的西书传入中国。当时日文译本“充塞于上海书肆中,译者大概是日本留学生,印刷发行大概是各书坊都有,又有日本留学生和日本人合办的作新社在上海福州路,是专门译日本书给中国人读的。”^⑬由于质量不高,无人购买,亏本将近万元,夏以为内容有问题,于是请当时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任总办的张元济物色人进行修改。张元济因译书院印书业务经常与夏瑞芳交往;两人一见如故。^⑭

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印刷小作坊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出版

机构的转机是在 1903 年。这一年出现的两件大事,一是张元济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一是该馆与日本金港堂的大股东原亮三郎为中心的日本人的合资。这两件事也代表了商务印书馆今后发展的两大杠杆,即人才与资金。早在 1901 年,夏瑞芳就意识到:经营出版事业非自设编译所不可。由张元济推荐的第一任所长蔡元培主持了新式教科书的编译。有一种说法称,蔡元培离任后,夏瑞芳为表示诚意,提出愿意用月俸 350 元的报酬请张元济出任编译所所长。^④1903 年的另一件大事是日本方面投资了 10 万元,于同年 11 月 19 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的合资,使商务印书馆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00 年至 1901 年间,商务印书馆因购买留日学生一些劣译曾经业绩不佳。组织编译所后情况略有改善,但合资前商务只能拼凑 10 万元说明情况并不怎么好。1903 年与日本合资后经营情况可说突飞猛进。1903 年一年的营业额是 30 余万元,1903 年 11 月改组之后,“因有日本人的参加印刷和编写教科书,商务的营业状况可说一日千里,不到一年资本额升至五十万元,一年后又增至一百万元。”^⑤人才与资金的结合,导致了商务印书馆的迅速起飞。

教科书的编印在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编译国外教科书。1902 年至 1910 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图书 865 种,^⑥而据笔者粗略统计,译作多达 330 种。^⑦早期商务主要是承印,其中重要的地理学译著有 1902 年推出日本著名地理学家矢津昌永的两种著作,一是陶容译出的《日本政治地理》;一是出洋学生编辑所译出的《(中学)万国地志》。矢津昌永(1863—1923),曾在福井县师范学校和中学当教员,1889 年任第五高等中学助教

授,同年发表有《日本地文学》,获得好评。1893年在东京丸善社出版了《日本帝国政治地理》。两书的成功,使矢津昌永受到了日本地理学界的瞩目,1897年任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地理讲师。此年进入高等师范研究科。1900年起先后任高等师范学校地理科讲师、东京专门学校讲师。1904年任陆军教授、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02年矢津昌永出版了《世界地理学》,同年来华时,曾把此书赠给吴汝纶。^⑧该书是日本中学地理教科书,由丸善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当时在日留学生的重视,就在该书出版的当年冬天就有了出洋学生编辑所译本。该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分地球及天体、地球之运动、水陆、社会、人种、宗教、国家、国体、亚洲总论及各国地理分论;中卷分欧洲总论及各国地理分论;下卷分非洲总论及各国地理分论、美洲总论及各国地理分论、大洋洲总论及各国地理分论。每卷均有若干插图,书前有沧桑主人序,称赞此书译本“措辞清浅,叙事简明。至于地名中西并立,可由中而知西,亦可由西而知中。且于地理有探奥究微之妙。凡已读小学地理者,如能蝉联读之于地理一门,可以升堂而入室矣。”^⑨1903年该书另有樊炳清译《万国地志》(成都志古堂版)和吴启孙译《改正世界地理学》(文明书局版),该书当时销路很好,1906年美华书馆还重印出洋学生编辑所的译本。1903年文明书局版吴启孙译《改正世界地理学》是译者据原在东京的初版本改定的,译者称该书初版后,“一时同学之士颇垂谬赞”,被赞为“奇构”,“此书奥博足配史公,而日本事中论山脉一段,则又史公未辟之境界也。”但其中问题不少,因此趁文明书局重版时译者重加改正。该书当时已被“管学大臣采入教科书目,颁之各行省,定为学堂课本。”^⑩矢津昌永是20世纪最受中国学者重

视的日本地理学家之一,《南洋七日报》从1901年9月22日第2册到1902年4月13日的第27册,连载了上海广方言馆译出的《日本政治地理》;《直说》1903年2月13日刊登了他的《十九世纪亚洲地理之变迁》;《湖南学报》1903年4月的第1帙到第6帙刊出了颜可铸述概的矢津昌永的《地理学》。1907年文明书局出版的侯鸿鉴《中等地理学教科书》也是根据他在东京所得矢津昌永的地理讲义编写的。同年昌明公司推出的《世界物产地志》,也是矢津昌永等日本学者的作品。

1903年商务印书馆代印过东京闽学会主编的“闽学会丛书”,其中有地理学两种,一是杨允昌译日人守屋荒美雄编《国际地理学》,一是林楷青译日人鸟居龙藏编辑《人种志》。《国际地理学》一卷,原载《游学译编》第5至7册,1903年4至5月;1903年出版单行本,《译书经眼录》称“此书特阐明地理与国际之关系,举近今国运大势、领地殖民沿革,言之綦详,诚地理学之善本。”早在17世纪下半期和18世纪初,法国F·柏尼埃(Francois Bernier, 1625—1688)和瑞典C·V·林奈(Car Von Linne, 1707—1778)就对世界人类进行了分类。1775年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J·F·布鲁门巴哈(1752—1840)依据人的肤色、发型、身高等体质特征和原始居住区域将人类划分为白种(高加索人种)、黄种(蒙古利亚人种)、黑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红种(亚美利加人种)和棕种(马来亚人种)这五种类型。《人种学》一书正是吸收了J·F·布鲁门巴哈的研究成果,以其分类将书列分为五部分。一亚细亚系统人民,记支那和西比利亚种族;二欧罗巴及亚非利加系统人民,记北地中海和南地中海种族;三南方亚非利加系统人民,记尼孤利洛部及尼孤洛伊特部;四海洋诸岛屿人民,记类似“黑奴”种族、马来种族和

澳大利亚种族；五亚米利加系统人民，记亚米利加种族、南亚米利加部和北亚米利加部。此书对上述种族的人类学性质、分布区域等作了概括性介绍。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然地理学方面的译著有 1903 年出版的邵羲译述《地文学问答》，该书是商务印书馆较早组织编印的普及性丛书“普通学问答全书”之第 6 种。全书采用问答式，共分 11 章，依次为天体、地球之形状及经纬度、昼夜及四季、空气及其运动、空中之水分、海洋、陆地及地势、陆界之组成、地热之作用、大气水及生物之作用、生物之分布。《译书经眼录》称：研究地质学“不可不先求诸地文。若空中之水分，陆界之组成，生物之分布，皆地文学之显而易见者。”1905 年印有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编发的日人横山又次郎著、日人西师意译《地文学教科书》；1906 年出版有王建极、奚若译订的美国忻孟 (Hinmon) 著《最新中学教科书地文学》(Hinmon's Physical Geography)，书前为序言和译例。正文首为发端，卷 1 论地球为行星之一，包括日系和地动 2 章；卷 2 论空气，包括成分、重、热、水汽、空气之流动、空中光线之现象 4 章；卷 3 论海，包括海水之深、成分、热度、潮浪、流淤积 3 章；卷 4 论陆地，包括陆地之区分、地面、地之构造、泉、流、流之功用、冰川、湖、山之构造、地之凹凸、地震、火山 10 章；卷 5 论气候；卷 6 论生物，包括各类生物、生物之分布和人 3 章。后附地文学中西名目表。书中附插图 148 幅，另附整页彩图 13 幅。

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多种旅游地理学方面的译著，1902 年有日人林安繁著《扬子江》；1904 年有该馆译出的日本参谋本部著《满洲地志》；最引人注目的是 1908 年孙毓修译述的美国人谦本图原著《(谦本图旅行记)地理读本》(Carpenter's

Geographical Reader)和1909年孙毓修编译的日人池边义象著《世界读本》(The World's Readers)。前者分甲乙编,论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亚洲和非洲。译者一边译述,一边据《钱伯斯简明世界地名词典》、《威廉斯地名词典》和《世界地图册》改正错漏和补译缺略。其中不仅仅是地理,还有数学、自然、政治、历史、宗教、宪法、考古等内容,如北美洲分四十五节,述及北美之统观(附美国与欧洲诸国大小之比较)、纽约与外国之商业、大湖与大湖的矿产、落机山之奇观与其宝藏、黄石公园、印第安人之生活等。《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1910年)认为此书有四大特色:一是体例新颖。“地理书每嫌枯燥,此则引人入胜,不啻卧游。”二是考证确实。“谦氏本系亲历其境,采用他种亦非凿空之谈。”三是收罗宏富。“虽据谦氏一书,而参考之书,则不下数十种。”四是词笔渊雅。“不仅可作地志读,且可藉习国文研修辞之用。”张元济正是读了孙毓修写的十页《地理读本叙言》,“至为钦佩”而邀请译者加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⑤后者原是日本各中学练习语法用的世界读本,1902年初版后至1906年已印有20版。贵州启智学社1907年出版过日语讲习会译释《(和文汉译解释)世界读本》,该译本是据新版译出的,采用日汉对照,原文在前,译文次之,解释附后,以供中国留学生学习日文之用。孙毓修译述的《世界读本》分上中下三卷,卷上分十一章,一航海、二热国之港埠、三苏彝士运河、四古罗马及新罗马、五瑞士之山水、六巴黎之所见、七巴黎之掷彩节、八伦敦之繁华、九伦敦人之休息日、十柏林市、十一柏林之宫殿与其民风;卷中分十三章,一奥地利及匈牙利、二俄国都门之风俗、三俄皇宫殿、四俄国之旅行、五俄国之农民、六黑海、七土耳其之情势、八纽约及

其他邑之工商、九美国之政体、十美国民风杂记、十一加拿大铁路、十二日本之名城、十三日本之风俗；卷下分十章，一欧美人衣食居室之道、二都会中之交通、三旅馆、四博物院、五题画明信片、六店肆、七游戏、八公园、九戏院、十公德，书中附有插图多幅。《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1910年)称此书“译者于原书之特色，既靡有所遗，复旁稽他籍，补其阙遗，正其谬误，于欧美诸国风俗习惯、民气国情、山川名胜、港埠景况，言之甚详，文笔雅饬，模范山水，益饶其趣。插画之后复加题辞，学者读其书、观其画、玩其题，而知译本之价值又在原本之上也。”

商务印书馆还配合东西洋历史教科书的编译，1904年出版过《东洋历史地图》、《西洋历史地图》，两书均由日人小川银次郎著，张元济校订，前者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等教科书之一，后者共20幅38图，自古代迄近世世界止，凡对欧洲历史的变迁沿革有重大关系的，皆有图加以说明。

四、作新社、金粟斋、新学会社 及其地理学译著

1901年上海出现了一家名叫作新社的出版社，该社是留日学生戴元丞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合作开办的。下田歌子(1854—1936)，原名平尾，出身于武士家庭，与贵族下田猛雄结婚后改名，丈夫去世后从事妇女教育长达20年之久。期间曾赴欧美各国考察妇女活动，一度晋谒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返日后竭力普及中等以下阶层的妇女教育，成立帝国妇女协会，主张结合“东洋女德之美与西欧科学之智”。1899年她开设实践女学校与女子工艺学校，办校的宗旨是

“希望传授适应现今社会之实学,养成实践躬行的良妻贤母”。^②女校于1901年开始吸收了几名中国学生,出于范源濂的个人要求,于1904年接纳了20名湖南女生。奉天省遣派熊希龄到日本视察教育后,便与下田歌于约定,每年派15名女生到实践女学校肄业,1907年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出21名学生到实践女学校读师范科。^③因而实践女学校于1908年开设了独立的“支那部”,并有自己单独的校舍。下田歌于以促进中国现代女性奉行“东洋女德”为己任,她亲自讲授修身必修课,并演讲、著文宣传自己的宗旨。^④1902年吴汝纶参观该校后称“观各室,体操甚整齐,作字皆悬腕。”听到女学生演奏古筝,不禁深表惊讶,认为这种古乐器,现在连中国也很少有人会弹,不料“日本乃习之于女学校”,“吾甚愧赧!”而且这些筝曲的歌词都是下田歌子自己创作的,更是“尤难之难者也”!^⑤就在这所女学校里诞生了反清女英雄秋瑾。

作新社的创办人之一是戢元丞(?—1908),他是湖北房县人,名翼翠。1896年官费选派赴日留学。后任职于励志学会,创办《译书汇编》,又加入兴中会。曾被誉为“留日学生最初第一人,发刊革命杂志最初第一人,亦为中山先生密派人长江运动革命之第一人。”^⑥下田歌于与戢元丞相识是由于她邀请后者教她和一位姓逸见的人学习中国文。她希望为中国人多出一些好书。实践女学校的一笃志家了解了此事后,捐助了10万元。因此,她与戢元丞和逸见商量,在上海办起了作新社。担任该社的编辑和印刷职务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是日本人。该社设在上海四马路惠福里53号。陆续出版的有一些日本书的中译本和学习日语的读本。^⑦而戢元丞的想法显然与下田歌子有别,刘禹生写道:“元丞利用日本女子贵族

学校校长下田歌子资本,欲宣传改革文化于长江。孙先生亦壮其行,乃设作新社于上海。首刊其《东语正规》、《日本文字解》诸书,导中国人士能读日本书籍,沟通欧化,广译世界学术政治诸书,中国开明有大功焉。元丞遂为沪上革命党之交通重镇矣。”^⑧较重要的译著有日本原田潜译、杨廷栋重译的《路索民约论》,作新社据日人涩江保日译本重译的明恩溥的《支那人之气质》,杨廷栋、周祖同译日人成濑仁藏著《女子教育论》;杨荫杭译日人加藤弘之的《物竞论》,以及日人岛田三郎著《社会主义概评》、日人中岛生《朝鲜政界活历史》、小越平陆《白山黑水录》、松平康国《世界近代史》、《万国演义》、《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朝鲜史略》等。有不少书销路颇好,如该社1902年10月14日初版的《可萨克东方侵略史》,12月6日即改名《哥萨克东方侵略史》再版,颇受学界重视。

作新社出版的重要的地理学译著有1902年该社在东京编刊的《世界地理》。该书是据西人所著地理教科书纂译的。共分三编31章,首编第1章世界总论,论天文地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上编本国之部分2章,一为亚细亚总论,二为中国,分总论、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地方志四节;下编外国之部,分日本、朝鲜、西伯利亚、中部亚细亚、高加索、西部亚细亚、南部亚细亚、大洋洲、欧罗巴总论、俄罗斯、瑞典、挪威、丹麦、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法兰西、比利时、荷兰、英吉利诸岛、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巴尔堪半岛、阿非利加、亚美利加总论、南亚美利加、北亚美利加、合众国、英领北亚美利加28章,每章各分总论与地方志二节。附有东西半球的彩图。至1905年已发行了9版。

作新社出版的地理学译著涉及的范围较广,有自然地理、

商业地理和游记等。如 1903 年版的《(普通教育)地文学问答》是广东陈大棧据日本富山房编纂的原本译述的,该书包括天体、关于地球之形状古人怀如何之谬见,昼夜及四季、空气及其运动、空中之水分、海洋、陆地及地势、陆界之组成、地热之作用、大气水及生物作用和生物之分布 11 章共 305 问,附插图 5 幅。同年译刊的日人永井惟直编辑《商工地理学》分 2 编 8 章,第 1 编总论,包括商工地理学之概念和商工业盛衰之原因 2 章;第 2 编各国商业之形势,包括亚细亚洲、阿非利加洲、欧罗巴洲、北亚美利加洲、南亚美利加洲和澳大利亚洲 6 章。1906 年作新社刊行了顾雪梅编译的日人甲斐山留吉著《最新世界商业地理教本》,该书分 5 章,分论欧、亚、美、澳、非各国和地区的面积、人口、农业、牲畜业、矿产业、制造业、商业、交通和港口。书后附译者编“万国面积人口比较表”和“万国输出入比较表”。20 世纪初商业地理受到了中国译者的高度重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出现,各国的工商业、农业的区位、水陆运输、劳动力分布等都进入了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学者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于商业分布的影响。王景沂写道:“近代学者引德黑革之言曰: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此商业地理之权舆哉!迁史咏叹,秦以来货殖所聚,必在都会。黄河、尼罗河,蔚然为东西文化之母,不其然乎!我自五口互市,门户洞开,名都大城,江介海曲,悉为他族之利。曾未有只轮单艘,抱布贸丝于波罗的、苏彝士间者,茫茫六州河山如绣,不禁废书投袂面起也。”^⑨作新社 1903 年还译出美国白雷特著《澳洲风土记》,该书是作者的澳洲游记。共分十九记。一记游西德亚及钮客斯特尔、二记树、三记游牧、四记澳洲人民原始、五记禽兽、六记游密伯昂

城、七记金矿、八记埃乃城、九记达斯马尼亚岛、十记新西兰、十一记亚克兰岛、十二记新西兰矿源水源并火山、十三记南岛、十四记费几岛、十五记新卡特尼亚岛、十六记檀香山岛、十七记克乐火山、十八记疯人岛、十九记太平洋群岛。

清末有许多民营出版社的具体情况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资料了,偶尔有些记载也充满了错误。如作为反映上海出版社历史资料最翔实的《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中就把广智书局创办的时间定在1898年,在作新社这一条中却只谈到了戢元丞等创办的《大陆》月刊,其他均语焉不详。^⑥金粟斋的资料在该书中没有得到任何反映。金粟斋至少在1901年就在上海创办了,社址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小菜场对面的寿康里。创办人是安徽合肥人蒯光典(1857—1911),字理卿,亦作礼卿,一字季述,号金粟道人,室名金粟斋,以室名作为出版社的名称。他是李鸿章的侄婿,光绪八年(1882)的举人,光绪九年(1883)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1888年典贵州乡试。1889年充顺天同考官、会典馆图绘总纂。1896年,刘坤一聘其主尊经书院讲席。“为学笃实,主经世致用,对西学很有研究”,次年应张之洞之邀赴两湖书院任教,该院设东西监督,梁鼎芬为东监督,讲中学;蒯光典为西监督,讲西学。结果与梁鼎芬发生冲突,1898年蒯氏离开两湖书院。1898年以道员发江南,筹办江南高等学堂,以大学士刚毅反对,事未成。后出任安徽候补道,督饘淮南,整顿银金,卓有成效。1906年授淮扬海兵备道,加按察使衔,治水赈灾甚力。1908年任赴欧洲留学生监督官,1909年辞归,充京师督学局长。1910年任南洋劝业会提调,卒于江宁。著有《金粟斋遗集》、《宪法演说录存》、《读书札记》、《欧洲宪法精义》等。^⑦金粟斋译书处是

请他的南京高等学堂的学生包天笑负责编辑、印刷和校对。该社究竟译刊了多少书,目前仍是一个谜。包天笑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称该社主要出版严复和叶浩吾两位的译作,如严译《穆勒名学》、《原富》、《社会通论》、《群学肄言》以及叶浩吾译出的《日本宪法》中的《皇室典范》等。^⑤现在看来这显然是误记。据笔者查对,《原富》系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出版物;《社会通论》严复译序写在光绪癸卯(1903年)十一月,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群学肄言》是在“壬寅(1902年)中,此书凡三易稿,岁暮成书,”^⑥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就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因此,也都不可能是金粟斋出版的。金粟斋版《日本宪法义解》(附皇室典范义解)的译者是沈紘。惟有严译《穆勒名学》确是金粟斋当时出版物中最有影响的一本书。1900年,严复“开名学会,讲演名学,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⑦1900年至1902年间,他译出《穆勒名学》的上半部,由于严复在官场上郁郁不得志,且吸上了鸦片烟,向蒯光典借的3000元无法偿还,就把这部未译全的上半部《穆勒名学》抵了债。1905年该书付诸印刷,由包天笑担任校务,排印是在商务印书馆,他便风雨无阻地天天跑商务,严译的稿子非常整洁,他的改笔也“新鲜可喜”。包天笑校对时极为认真,“不敢有一点武断”,一般都校对四次,头校、二校、三校之后,还有一次清样。^⑧正是靠着包天笑认真负责的精神,才使金粟斋版的《穆勒名学》被后人认为“不但印刷精美,校勘也是最精审”的,而商务印书馆以后据此版排印的铅字本则“颇有错字”。^⑨《穆勒名学》出版后,大大提高了清末中国人学习逻辑学的热情,有人来金粟斋译书处商量建议趁严复到上海办洋务交涉时开办一个“名学讲演会”。当时一些社会名流,如张元济、郑孝

胥、章太炎等都来参加听讲。除了《穆勒名学》外,金粟斋出版物中较有影响的还有叶潮译日本小川银次郎的《西洋教育史》、王国维译日本矶谷悻次郎的《法学通论》、沈紘译日本伊藤博文《日本宪法义解》等。

金粟斋出版的三部地理学译著颇受人瞩目。一是1901年出版的王国维译日人中村五六编纂、日人顿野广太郎修补的《日本地理志》,该书分十一篇,一总论、二畿内、三东海道、四东山道、五北陆道、六山阴道、七山阳道、八南海道、九西海道、十北海道、十一台湾(时为日本所窃据),前有汪德渊序,这是一篇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来分析日本地理的序文,汪德渊指出:“日本以四岛立国,其形势为两山脉之交系。……故日本为国,兼有山海之胜,其民亦具山海情俗。山居之民,质实而果敢;海居之民,便给而轻疾。两者相调,遂成天赋。故日本之民,有敏捷不羈之性质。又自开国至今,戴一皇统,无外族以陵夷之。元之强,亚土无幸免者,日本离于大陆,得保全其天赋。其民自昔营航业,外通任那、白济、高丽、脂那,于他国之文物,多所取摄,国既环海,无大陆险阻之沈锢。故其民之心思,绝少怙滞,进文明跃如也。”^⑥一是1901年出版的萨端译日人志贺重昂述《地理学讲义》,志贺重昂毕业于札幌农业学校,长期从事地理学研究,主持创办过政教社和《日本人》杂志,被誉为是向日本青年“提供海外知识的第一人”。1917年被推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名誉会员。^⑦该书深受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的影响,强调地球的自然形态对于人类身心发展的多样性关系。在“论地理学之必要”中首先强调地理学对于医学、商业、军事、航海的重要性,认为即使“研究历史,固不可无地理学之知识,若社会学者、文学者、经济学者、政治

学者,皆不可不藉资于地理学。”在“论地理学之区分”中把地理学分成数理地理、自然地理、政治地理三类;政治地理实际上就是今天的人文地理。解释了五种人种的划分:阐明了人类衣、食、居与地理的关系;注意到了人类开化的程度、政治、宗教、人民之职业、物产、贸易以及城市将来的发展趋势。该书还探讨了地理环境对于人情风俗的影响:“人情风俗,邦国异宜。然山国之民,大率敏捷黠慧,用度奢侈。此其大略。又因职业而别析之,则农业国之民,讷钝劳苦;工业国之民,心思致密;商业国之民,便给轻捷。”在“研究地理学必要之关系”一节中提出地理学者实地考察的重要性:“研究地理学最要者,就实地山岳、原野、溪谷、川海、村落、都邑、市场之所在;植物、动物、矿物之分布;气候、物产、农业、制造、商业之情状,与夫人民之职业、性情、风俗、宗教、教育、政治等,当一一观察。”并分别讲述了研究亚洲地理之法,研究欧洲地理之法,研究非洲、大洋洲、美洲地理之法,最后附有表说六种。汪德渊在序中强调地理学通过对“地球之层构、种类之祧禅”,揭示了“新旧演迤、迭为消长,新者递昌,旧者递灭”的自然规律,这就是“无常居之形,可恃之势。此造物之所以悠长,百昌之所以日进无疆,而非区区一国之成势常形所得掩也。”⁶⁹金粟斋 1902 年出版有日人樋田保熙译、中村五六编纂、顿野广太郎修补的《世界地理志》,该书部首分地理学总论、数理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四部分,论地球的形状、方位、自转与公转、经度与纬度、水陆与大气、动物与植物、人类与人种等;然后分甲、乙、丙、丁、戊、己诸部,分别讨论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阿塞亚尼亚洲各国的政区、宗教与文明等状况。该书被当时教育界认为是“明晰精详,为他书所未有。编次各国

地理,亦得纲要。所有岛名人及名词,附以洋文,尤见精善。译笔亦雅驯,可作为中等外国地理教科书。”^⑩金粟斋出版的地理学译著当时颇受好评,1903年出版的王景沂《科学书目提要初编》一书对金粟斋版的《世界地理志》和《地理学讲义》给予高度评价:“中村氏书,首括名义,博稽六洲,朗若列螺;志贺讲义,指画重要,挈领振纲,盖取径于自然学,而注意于政治学者,二籍相辅,可云并美。”

金粟斋后由于经费的匮乏而关闭,该社虽出书不多,但在20世纪初期大量质量低劣的日文译本充塞书肆的环境里,金粟斋可谓特立独行,出版了一批具有相当质量的译本。特别是地理学译著,这与金粟斋的实际负责人包天笑有密切的关系。1901年包天笑就与后来译编过日人神谷市郎《中学地文教科书》的江苏吴县人汪郁年一起创办了励学会,又称“励学社”或“励学译社”,该会所办《励学译编》刊载过周先振译美国福来氏的《普通地理学》。励学译社1902年推出过马汝贤、顾培基辑译日人若原撰《万国地理统纪》,该书是世界自然地理的统计资料的汇编。体例仿《列国岁计政要》,分为太阳系统、地球之广袤、水陆之分划、大洋之面积深度、大洋之支派、大陆之位置、大陆之境界、列国位置、列国境界、列国之面积人口、著名岛屿、著名半岛、著名地角、著名地峡、著名高山、著名大河、著名大湖、著名都府之人口、各国大都离伦敦之程度、人种、宗教、政体、温度、军备、交通运输、物产等。杨学斌在序中称此书于“宗教之派别、政体之宽猛、军备之多寡、物产之丰歉,收罗既广,调查最新”。^⑪

据朱联保的记述,新学会社可能1903年前创办于宁波,清末由宁波迁往上海,设在山东中路与河南中路之间的交通

路口(今昭通路)上。创办人为庄景仲。并称据裘柱常说,是奉化庄崧甫创办的。^⑦其实庄景仲(1860,一作1859—1939)的字是崧甫,别号求我山人,浙江奉化人。早年从事农学研究,编印农业书籍,著有《农业新书》、《螟虫防治法》。又设林业公司于余杭,经营山林事业。1908年加入同盟会,在浙江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杭州光复后,任军政府财政部长,后改任浙江盐政局长。新学会社在上海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孤岛时期仍在出书。晚清出版过不少有影响的书,如1903年的《世界十二杰》、1909年出版有黄郛译日人樱井忠温著的《旅顺实战记》以及《泰西人物韵编》、《测绘学教程》、《博物学教科书》等。另外还有不少有影响的教科书,如1906年有周世棠编《(初等小学)简明地理教科书》,该书分三编,上编中国本部总论,中编十八省本部地方志,下编东三省、新疆、蒙古、青海、西藏、三藩;全书注重地势、气候、物产、人民、国政、宗教、铁路、矿产、商埠等,附有五彩地图一本,经学部审定作为高等小学地理课本。1908年出版的胡朝阳编《(第一简明)地理启蒙》,该书先释水陆、疆域名词,次叙各省形势大略,最后论物产、人名、国政、宗教、商务、交通诸事,每课附有插图,颇便教授,至清末已印有八次之多。^⑧出版的地理学译著有1908年出版的余宗农编译,庄景仲校阅《(中等农学校用)气象学》等。

笔者感兴趣的是该社1909年推出的一本人文地理学的译著:凌廷辉译编的《人生地理学》,该书共36章,前27章主要论述与人文地理有关的各种自然地理现象,后9章主要介绍各种人文地理知识。在该书“总论”中,作者全面论述了人生地理学的原理及其研究方法,指出:“人生地理学者,研究地理与人生之关系者也。”地理与人生的关系是什么呢?“盖人

既存立于地球上,则人种之生存竞争,于大地究有何关系?我所占之一部分,既不能划然自守,则与它部分必有种种之关系。有关系即有比较,若气候、若物产、若地势、若宗教、若交通,以及国家兴亡变迁之原则,人类发达迟速之现象,非一一详细比较,必不能得其最要之点。故地理学之一门,自表面观之,仅为普通各科学之一科,而范围广博,包含富有,与种种科学,尽有密切之关系。近人分类法,有所谓天文地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者。又有人文地理中,而分为政治地理、经济地理者。盖地理虽属一门,而非深知各科学之原则,演绎而归纳之,必不能真知地理学。然则人欲扩充其思想知识,则研究地人相关之理,其可缓哉!”^④中国自古以来,对人地关系有过种种论点,但没有过系统的人文地理学的著作,在西方,地理学一向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乡来研究。19世纪后期,地理科学开始形成地文、人文和区域三大分支,^⑤这也可以视为是近代地理学知识体系的确立。分别为地文和人文地理的研究开创了早期理论的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洪堡和李特尔,恰恰也是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中国,在人文地理作为一门学科通过日本引进的过程中,新学会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五、会文学社与《普通百科全书》中的地理学

甲午战后,中国人开始密切注意日本翻译出版界的动向,日本学者借助汇聚各种知识的“百科全书”的编纂,对日本民族进行系统西学启蒙的活动也受到了中国学者的注意。1897年,康有为发表了《日本书目志》,在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字语言、美术等门类中,列

出了日本文部省藏版的《百科全书》80多种单行本的篇目。^⑥康有为列出的“百科全书”中译名,是否系首见于中文文献的整词,还有待考证。但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百科全书”是一个19世纪末就出现的日语外来词。^⑦1902年由袁清舫、晏海澜编纂的《西学三通》的《西史通志》之《图籍志》中,也著录了28种日本文部省出版的百科全书的书名。汤寿潜在1903年写道:“日本之重科学也,有《日用百科》、有《通俗百科》、有《小百科》,亦浸浸与欧美并隆矣!”^⑧同年,汤寿潜与沈霖(玉林)在上海创办了会文学社,开始就以出版教科书为主,如范震亚编译的《化学探原》、《中学生理学》、《代数备旨》、《法史揽要》、《日本帝国近世史》、《日清海陆战争史》等,以后还非常重视地理学教科书的编著,如1905年有何琪编《(最新)初等小学本国地理教科书》,1906年有杜芝庭编《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1907年有沈祖绵编《(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1908年有杨文询编述的《(普通教育)新地理》和《普通教育新地理外国之部》。也许是受当时日本编译百科全书的启发,该社也注意大型图书丛刊的编纂。据沈霖给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的禀呈中称,由于20世纪初各项章程都在不断更新,但人们“苦乏专书”,因此该社计划推出“编辑丛书”一种,“凡新旧和约、各处矿务章程、开垦章程、铁路章程、官私学堂章程,其余各种政治、商务等章程,一一择要选刻,以备汇集成书。”同时,由于中国上下贫困,急于理财求图治之道,因此计划再编“财政丛书”一种,“凡税则钱币等事及一切有关财政各书,广搜博采,敬谨选择汇集成书。”^⑨还有一套就是为振兴新学而推出的《普通百科全书》。

《普通百科全书》的编译工作是由“志大而才富者”、江苏

昭文(今常熟)的留日学生范迪吉(字枕石)主持的。他“诸会文社之请译百科全书”,^⑩可能是出于编译这部规模浩大的百科全书所需,他在日本成立了东华译社,总译述是范迪吉,编辑有黄朝鉴、李思慎、张振声、顾福嘉。校阅有顾厚璠和郑绍谦。该社翻译和编校诸人,都以“负发明学理、增进文化责任”为己任,决心“务各尽微力于学界之事业,一冀完全对社会上之天职”。他们编译这套百科全书的宗旨是“以开通民智、养成世界人民的新知识为公责”,是想把“凡关于学理与政术与种种科学有影响于诸科学之发达进步者,皆在是书范围内涵容无遗。”且收录的均为“日本最有力学者之名著,且系最新最近出之书,有学皆臻,无科不备,拾级以进,足供一般学者之取吸,足为专门科学之立足点。”尽管这一百科全书并非是以一家之言为中心,按词典的形式分条编译的,而是节译各种不同程度的教科书汇聚而成。但这种将各类不同的西学新知识合成积聚,在中国仍有其独创之处。何况“在吾中国流通各书,可供参考者鲜”,许多新名词还是第一次出现,因此他们常常一起共同商定合适的译名。^⑪为了编好这套书,范迪吉“以一人一手,更数寒暑,废寝忘食之劳,译录百科之巨册”,^⑫可见这位学日文出身的总译述在定稿过程中着实化了一番大力气。

《普通百科全书》共计 100 种,1903 年由会文学社出版。全书的原本分别是日本富山房的初级读物、中学教科书和大专程度的教学参考书,按政治、法律、哲学、历史、地理、数学、理学、工学、农学、经济学、山林学、教育学等分类,以三个系列由浅入深地编排。每本书独立成篇,各自为目。第一系列“首编”为初级学类,共 17 种,全部采用富山房编纂的问答式初级

读物,按编译宗旨“全书可为小学校完善之课本,不独便于学童之记忆,且由是以进则于诸学科门径,皆已了然于胸,得以渐次养成完善之教育。”其中地理类 2 种,地文类 1 种。《世界地理问答》分旧世界、新世界两篇,共 6 章。上篇 3 章,亚洲 199 问,欧洲 193 问,非洲 38 问;下篇 3 章,北美洲 28 问,南美洲 17 问,阿西尼亚洲 27 问。内容涉及山川、物产、贸易、宗教等。《日本地理问答》共 418 问,是日本小学生的地理课本。分总国、东海、畿内、东山、北陆、山阴、山阳、南海、西海、北海等篇,共 10 章。《地文学问答》分 11 章。一为天体、二地球之形状及经纬度、三昼夜及四季、四空气及其运动、五空气及水分、六海洋、七陆地及地势、八陆界之组成、九地热之作用、十大气水及生物之作用、十一生物之分布。

第二系列“中编”普通学类 21 种,按编译宗旨“皆为研究普通学之必要部分,如教育学、生理学、物理学、动植矿物学、历史、地理、算数等学,靡不大备,务期科目毕具,条理井然,不敢稍涉紊乱。”实际上普通学属于中学教科书。其中有关地理学的共 5 种,有田边新之助著《万国地理学新书》,该书总论介绍了数理地学(星学地学)、自然地学(地文学)和政治地学(人文地学)三部分。并以五洲分章,以列国分节,介绍各国的土地、人口、风俗、宗教与政体的异同。《地文学新书》是日本富山房编纂的,该书共分九章 18 节,分绪论、地球之形状、昼夜之别、四季五带、空气、水之循环、海洋、地球之内部,介绍了土壤之形、山川之根、河川之源、空气寒暖等地球表层的万种气象和无限变化。两种旅游地理的作者都是山上万次郎。《万国旅行地理》分两章,一为亚洲和欧洲,一为南北美洲。后有地理总论,分天文地理、人文地理、地理学三部分。全书旨在

介绍诸国海陆交通、政府兴废、气候温暖、工商盛衰,其中对中国介绍尤详。《日本旅行地理》分两篇,前篇地理特说 15 章,介绍东京、大阪、马关、京都等城市以及北海道海岸与九州海岸。后篇地理总说 49 章,分地文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子目,叙述山川都邑、人物草木、幅员区划、政治兴革,附录地名总汇。《气中现象学》为小林义直著,该书分九章 36 节。介绍氛围气的成分、构造;氛围气的运动;氛围气的蒸发,如露、雾、云、雨、雪;地面与大气的关系,如平均温度、贸易风、海风、陆风、降雨;天气之规则,风之性质,飓风、雨、暴雨;气候,如同温线、异种植物带、岛屿气候、陆地气候等;大气之电气,如雷电、北光;光辉现象,如虹、日月晕;烧性现象,如流星、火球等。

第三系列“末编”专门学类 62 种。按编译宗旨“原书每册有十余万言,皆为研究专门学之资料,分级以进,有完全无缺之科目,得渐次养成专门学者之资格。”这显然属于有相当深度的大学教科书或参考书。这一系列的编译方法大部分均是节译,有的只译出了原书的一小部分。编译者强调其编译方法是“以务合中国人民教育界之程度为注意,所译各书不独为东西大学者最新最要之大著述,且为中国向来译书界中所未曾见。”^⑧也许初有模仿《大英百科全书》按条目编写的打算,也许因为全书字数容量的限制,也许也因为编译者缺乏各领域的专门知识,总之,专门学类中的大部分译著是有头无尾的。编译者在不少书目提要中标明了译至某章某节,并表示“当译《续百科全书》,以冀组织成种种最完全之好结果。”专门学类中地理学译著共 4 种,有佐佐木佑太郎著《气候及土壤论》,该书原本二编,译本仅节译了第一编气候学的前 4 章,第 1 章序论,简述气候、太阳、地球、大气以及空气的性质与成

分；第2章光，论述地球上光之分配、日照时、植物生育上光之影响；第3章温度，分析地球上温热之分配，造成温热分配不规则有海洋、陆地大小和形状、风、植物的各种影响，同温线，日本之气温，植物生育上气温之影响；第4章气压与风尚未译出。地理学通论和区域地理有佐藤传藏著的《万国新地理》和《日本新地理》，前者分6编，分论亚细亚、欧罗巴、北亚米利加、南亚米利加、亚弗利加、濠太刺西垭六洲。每编又各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多邦土地三部分详加论述。后者属于省郡志体例。人文似种族志，族制似户口志，外交、政治似大事志，军备似武备志，教育似学校志，社寺似坛庙志，工商农鱼诸业似杂志，铁道道路似地域志，地文类之位置、地势、海流、潮汐、五大岛及属岛似山川志，矿物、矿泉、植物、动物似物产志；气温及风雨雪似天文志；地方志之分道似省志之分郡。其中有不少文化地理的内容，如新闻纸及杂志的统计等。永井惟直著《商工地理学》特别令人瞩目。1903年作新社也有过同书的异译本。该书原本二编，译本是第一编。全书分两章论述商工地理学之概念与商工业盛衰的原因。指出盛衰的原因有地文的状态（地势及位置、自然力、地味及矿产之有无、人种及人口）和政治的状态（习惯、租税制度、政府之组织及方针、运输交通、货币制度、度量衡制度）两部分。该书作者认为，随着文明的日益进步，“社会人类间之问题日起，乃极形复杂，因是学理之研究别为各派分类，至限定其范围于一小部分，共讨究其蕴奥，乃结果为《新商工地理学》一书，实由文明之学问，成一独立之研究。”商业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该书作者认为它“可谓人类经济的科学。若详言之，则于各国各地农工商产出之物，即食料品、饮料品、贗泽品（非单纯生活需要

之物品——引者注),或诸般之粗制品、制造品等之产地,关于买卖输出输入等,可云推理研究事实之学问。于是研究斯学之目的,从地球上关商工艺一般隆颓盛衰之本末,进图将来是等事业之发达进步,可得概言也。”由此可见,商业地理学是与数理地理学之于地球之自然的状态、政治地理学之于人类与地理事项之关系一样,“其主眼之处,在论各国间之需要供给,生产之消费程度,及为运般[搬]之方法如何,又以比较研究各国工商业之形势。”^④

《普通百科全书》的编译者还声明此书不是纯粹的日文译本,其中除了参考日本《政治全书》、《教育学全书》、《理科全书》、《栽培全书》、《商业全书》、《工业丛书》、《蚕业丛书》、《医学新书》外,还参考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东华录》、《大清一统志》、《瀛环志略》等中文书。尽管这套百科全书还不是按现代意义上西方百科全书的形式编写的,某种程度上说还只能算是用传统的类书编纂方式,以日本各科教科书的内容来编排西方近代新知识,但编译者从以往翻译界仅注意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点和知识线的引进,而着力于对西方各科知识体系的输入。这种既注重知识系统、又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接受能力的尝试,受到了当时中国学者的高度评价,汤寿潜就指出:“中国学子沌窍初凿,譬之病者初复,骤而饜以粱肉,胃力不能纳,亦不能化转,足以招疴;不如进以嘉谷新蔬之为益也。译科学以溥通先盾意。于问答各书,浅显易了,亦庶几嘉谷新蔬之有益病者矣。”^⑤郑绍谦在序中认为,自中兴以来,同文方言诸馆三四十年来所译之书,大多只是“一鳞一角,窥豹未全。夫学界之有进步,必有学皆臻,无科不备,宏篇巨帙,履饫士林,俾博考广证,旁通触引,普通

之既备,科学之渐精,始文明富强,国势隆盛焉。且前鉴东西,亦莫不贱步武而贵研精,轻一得而重互证;中国若犹是。从前是学者虽知涉猎普通,普通不备,况欲专精科学,科学何来。穷其影响之功,不过能步武有一得而已,何以研精,何以互证。”^⑥《普通百科全书》的译出,为中国莘莘学子从初级到中级的西学知识的学习,为了解西学各科的知识体系,为将来进入专门阶段的“研精”和“互证”,作了重要的知识准备。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给此书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中国留日学生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业”,“这套书可以作为本年度(1903年)汉译日本书的最高成绩的代表。”^⑦

六、学部编译图书局的世界区域地志译著

戊戌变法以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废除科举制,1905年设立了学部,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在学部学务处原设的编书局的基础上奏设编译图书局,局长为学部奏派,局员由学部委派与局长聘用。同年六月初六,奏派学部行走——翰林院编修袁嘉谷(1876—1937)为局长,地址在学部之西偏院。编译图书局设局长一人,副局长二人,下设总务课,有总务、总校、校定、文牍四股,局员八人(另有局外特派、特聘的知名人士若干人);编书课设八股:经学修身、国文、史地、法制理财、图画、音体、算术、博物理化,共42人,是图书局的骨干力量;译书课有日文、英文、俄文三股;庶务课设会计、印刷、校对、书籍、管理书记、管理杂务六股,办事官员16人。四课共有大小官员80余名,其中有修撰、编撰、御史、提学史、检讨、知州、知县、进士、举人、中书、郎中、员外郎、参事、主事、通判多人,还

有千总、云骑等武官。王国维当时就以附生的身份受聘于编译图书局,在译书课英文股任职。校对股负责人汪盘是知县,几名校对也都是小京官、从九品之类。只有饮食股7名印刷员是留学生(日本印刷学校毕业)。年龄最大者48岁,最小者20多岁。派员月薪百两以上,聘员月薪也在纹银百两左右。^⑧

从编译图书局的章程来看,该局主要工作是编译各种教科书。遵循的原则是初等小学最先,高等小学次之,中学与初级师范又次之;凡编一种教科书,兼编教授用书;译书选择的原本以英、日二国为先;为了提高教科书的质量,编译图书局专设研究所,任务是随时研究磨砺,以增长编译书籍的能力,聘请讲解员讲解、研究教科书的编写问题。^⑨该局究竟出版了多少书目前尚未有确切的统计,有材料统计1908年该局年印书66种,出书品种除各种课本外,还有《内则衍义》、《近思录补注》、《家庭谈话》等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书,同年编译成书的55种;售书124种,计102720部。^⑩其中包括了一部分世界区域地志的译著。据笔者统计,有关世界区域地志共14种,1907年编译出版的有9种,1908年译刊的4种,1909年译刊的1种。

(1)《土耳其志》(附新志) 1907年

该书由《土耳其国志》、《土耳其地志》、《土耳其新志》三部分组成。国志从倭斯曼诸朝的系统叙述土耳其的历史;地志讲述土耳其的地理、人口、动植物、商务进出口、农务、财政、陆军、水师、教育、交通;新志补充了人种、宗教、教育、水陆军、物产与工艺方面的不少新资料。

(2)《印度志》 1907年

该书封里题为“印度国志”,不分章节,由论略、释名、位

置、境界、形势、喜马拉雅山、流域、河系、五谷、风景、高南原、文得亚山、物产、矿产、教育、报章、税收、民俗、历史沿革等组成。

(3)《印度新志》 1907年

该书叙述了1891年以来印度的形势、户口、男女、宗教、城镇、农业、织业、别种制造、煤、金、石油、盐、财帛、沿海岸商务、边境商务、进款与出款、国债、储蓄银行、陆军、巡警与监狱、1900年邮政与电报的统计、1896至1897年学校的统计、1880年以来的历史。

(4)《小亚细亚志》(附新志) 1907年

该书卷首题为“小亚西亚志”，由名称简介、位置、山脉、河流、湖、气候及出产、地质、古代之部分及民种、历史组成。新志介绍了山脉、河流、湖沼、行政与交通。

(5)《俾路芝志 马留土股志 纽吉尼亚岛志 西里伯岛志》
1907年

该书分别介绍了上述四地的位置、人种、气候、植物、动物、宗教、交易和历史。《西里伯岛志》还附有新志，叙述该岛的地理、河流、人口和政府。

(6)《缅甸国志 英领缅甸志 缅甸新志 暹罗国志 布哈尔志》 1907年

《缅甸国志》叙述了位置、物产、林木、矿产、兽类、鸟类、居民、政治、职官、赋税、制造、商业、货币、权量、历法、言语文字、宗教文学、历史。《英领缅甸志》介绍了物产、商业、财赋、气候、政体。《缅甸新志》用1895年的资料叙述了气候、官制、兵备、林木、商业、制造等。《暹罗国志》叙述了该国的位置、河流、气候、矿产、植物、动物、商业、赋税、水陆兵额、法律、城镇、

教育、宗教、美术、节日、历史。《布哈尔志》介绍了该地的居民、植物、动物、历史。

(7) 《爪哇志 苏门答拉志》(附新志) 1907年

该书分别介绍了两国的位置、形势、气候、疆域、户口、宗教、教育、矿产、种植及物产、牲畜；新志分别介绍了爪哇的船只商务、道路、铁道及苏门答拉的地质、地形、河流、居民、出口、道路和铁道，以及1883年至1894年的历史。

(8) 《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志》 1907年

该书由《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志》、《阿富汗斯坦志》、《阿富汗新志》、《土耳其斯坦志》、《东土耳其斯坦志》五部分组成。《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志》分地理、行省及知名之地、居民、物产制造、历史、古迹；《阿富汗斯坦志》分地理界域、天然地理之分段、河流、湖、城邑、气候、天然物产、植物、动物、哺乳动物、猫类动物、狗类动物、鸟类、两栖类动物、家畜、商业、居民、政治、政府、税饷、兵力、语言文字、历史；《阿富汗新志》分诸河流域、山、地质、气候、行省、名城、自主各族、民种、历史；《土耳其斯坦志》分土耳其司丹志、大亚西亚高原、西土耳其司丹、东土耳其司丹、高原部、山部、天山湖底、低原、西土耳其司丹地势地形之改变、气候、动物、植物出产、农艺、工艺、民种、城镇、俄罗斯势力等；《东土耳其斯坦志》分界域、行使、塔里木河、气候、植物、生业及矿业、水泉、居民、历史。

(9) 《亚拉伯志》(附新志) 1907年

该书是据 Niebuhr、Bure-Khaidt、Wallin、Welsted、Palgrave 诸君旅行亚拉伯的日记编译的。全书分幅员、西海滨、东南海滨、波斯湾海滨、形势、部分、西奈山土股、地质、黑夹斯部形势、麦加圣域、植物、猫、鸟、农业、牧场、矿业、渔业等部分。19

世纪后 50 年,一些西方旅行家进入亚拉伯地区进行测量与调查,新志即据这些新材料编译。

(10)《阿达曼群岛志(附新志) 婆罗岛志》 1908 年

该书分三部分,《阿达曼群岛志》论述了阿达曼群岛的地理位置、居民、气候、地质、植物、动物、历史等;新志论述了阿达曼的测候学、林木、动物、土著与军犯羁留所;《婆罗岛志》论述了山脉、湖、气候、矿产、动物、植物、居民、大野克人、中国居民、居民总数、界域、荷兰界域、历史。

(11)《亚细亚洲志》(附新志) 1908 年

该书叙述了亚洲的位置、定名、面积、界址、岛屿、形势、山岭与地之关系、气候、居民等,并简介了中国、印度支那、英辖印度、锡兰、波斯高原、帕米尔等地的地理、气候、人种与历史。新志有 1870 年以来有关亚洲舆地的调查、亚洲普遍形势的分析、河流情形的描绘、地质与火山、古代通商的孔道及近代之铁路、工艺和灌溉的进步等等。

(12)《开埔殖民地志》(附新志) 1908 年

该书由英国所属的非洲最南端的开埔殖民地志和新志组成。地志研究了该地的土性、河流、海滨及港湾、气候、植物、动物、历史、分省及要埠、户口、政府、宗教、教育、公家建设、新闻纸;新志补充了 1880 年至 1900 年的内容,以及矿产及矿业、农业、内地交通、邮政与电线等内容。

(13)《西伯利亚志》(附新志) 1908 年

该书对西伯利亚全地大略情形、山脉、大高原、纵行谷地、多山部、高平原、冰河、火山、矿产、河流、海滨线及海岛、植物、动物、居民、土著、西伯利亚之俄人、畜牧、猎业、渔业、制造、商务、交通、殖民、军犯、教育、行政分区、城镇、历史。新志补充

了1897年有关居民的统计,1901年的租法和1900年的农务、制造与矿业。

(14)《亚斐利加洲志》(附新志) 1909年

该书一卷,前述从黑鲁忒斯到李文斯敦的非洲发现史,继而论述非洲的位置、大草原、高山、地质之大略、矿产、林木、河流、大陆流域、风、热带中之雨水、岛、民族与宗教;新志利用了西方人有关非洲大陆结构、高原、流域、气候、物产、民族的最新调查,后附1890年非洲被瓜分的情状表。

学部编译图书局所编教科书当时就受到当时教育界的批评,《教育杂志》第1年(1909)第7期上载:学部所编教科书之稿“必经管部大臣审定,往往一稿既定,忽以为不可,则提笔涂之,或搁置不论,故书成无期。万一限期迫促,即东抄西袭,杂凑成册,聊以塞责云”。著名学者汤寿潜曾为新编的国民课本致函学部,对其中的错谬“逐条指责”。^①当时有人对这一官办教科书编译机构作过猛烈的抨击,指出:“吾国官场办事,毫无心肝,毫无条理。学部编书局非无人材,然在外间可编出适用之书,在部则绝无其事,一则应酬甚繁,安能全力办公。堂官又不知甘苦,平日任起稽延,一旦期迫,尽力催促,但求不误宪政之筹备。何为教育?何为教科书?皆非彼所注意也。二则局员分编辑、校勘二种,编辑者尚有明教育之人,校勘者大概词林中人,不知教育为何物,持笔乱改;每有原稿尚佳,一经校勘,反不适用者矣。校勘之后,尚须呈堂官,较校勘者辈分愈老,顽固愈甚,一经动笔,更不知与教育原理如何背谬。然以堂官之威严,何人敢于对抗。彼所改者,无论如何,皆必颁行。科学为彼辈所不解,不敢轻于下笔,故笑柄尚鲜。修身、国文、历史、地理,彼辈自命高明,最喜改窜,故笑柄最多。”^②

从这 14 种世界区域地志来看,情况虽不像江梦梅一文中描述的那么糟糕,但各种区域地志的确远不如当年传教士的地志译著,基本上是各区域或国别的地志资料的汇编,没有体系,也都不标明资料的出处和来源,各志详略不一,有的很厚,如《印度志》,有的好几种合在一本仍显得很薄。有的地理内容较多,有的地理内容几乎没有,如《波斯志》,实际上成了一部历史沿革。故本文不把此书作为区域地志收录后附的译著知见录,因为它实际上是一部区域国别史。

凭心而论,这批区域地志虽然有诸多的缺点,但是毕竟为清末的读者提供了不少以往西方传教士区域地志中不曾包含的新资料,如 1907 年译刊的《印度新志》中包括了 1891 年以来印度的形势、户口、男女、宗教、城镇、农业、织业、别种制造、煤、金、石油、盐、财帛、沿海岸商务、边境商务、进款与出款、国债、储蓄银行、陆军、巡警与监狱的资料,特别是 1900 年邮政与电报的统计。1908 年译刊的《开埔殖民地志》新志中补充了 1880 年至 1900 年的开埔殖民地的矿产及矿业、农业、内地交通、邮政与电线等内容;《西比利亚志》新志补充了 1897 年有关居民的统计,1901 年的租法和 1900 年的农务、制造与矿业,这些都是以往的其他区域地志中不曾见过的资料。1910 年王先谦著的《五洲地理志略》卷首的中外参考书中就开列了学部编译图书局译刊 10 余种区域地志。这些都表明这批区域地志介绍了不少新的世界区域人文地理的内容,多少满足了人们希望更多地了解世界各种地区国别地理状况的愿望。

学部编译图书局在教科书的名词术语的统一方面所做的努力,对于世界地理的翻译也有着积极的作用。众所周知,19 世纪初以来,传教士在地理学的译名方面就一直存在着困扰,

傅兰雅等西方传教士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编订过不少中外译名对照表,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行政手段,译名表即使编制得再合理,其他译书机构也未必会采用。由于学部编译图书局属于国家教育图书的翻译出版机构,1909年该局在局内设置了编订名词馆。1910年该局在奏折中提到:“编订名词馆,自上年奏设以来,于算学一门,已编笔算及几何、代数三项;博物一门,已编生物及草木等项;理化、史学、地学、教育、法政各门,已编物理、化学、历史、舆地及心理、宪法等项。凡以编者,预计本年四月可成;未编者,仍当挨次续办。”^⑧1908至1911年出版的不少世界地理教科书都声明在译名方面遵奉学部编译图书局的出版物,可见编订译名的工作对于后来地理学翻译著作中的名词统一,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七、近代西方地理学思想与知识 体系的输入及其影响

与1898年前的西方传教士引进的地理学相比较,戊戌到辛亥的13年间输入的西方地理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出现了明显的飞跃,形成了地理学知识输入的加速度现象。“加速度”原是用来描述速度变化的快慢和方向的物理量,这里笔者用于表述在1898至1911年较短时间内输入的地理学知识量的迅速递增。19世纪西方传教士主译的地理学著作中所引进的西方地理学知识量还很有限,递增率也较平稳。1819年至1897年的78年中共出版地理学单行本51种,年平均只有0.65种;19世纪20至40年代每10年出版2种,50年代略有增加,有8种,70年代7种,80年代16种,90年代19种

(参见附录三表一)。而 1898 年至 1911 年这短短的 13 年中,笔者统计到的西方地理学译著多达 157 种中,每年平均 12.1 种,后 13 年的年平均量是前 78 年平均量的近 20 倍(参见附录一)。在 1902 年至 1904 年间形成地理学译著出版的高峰值,6 年中出版的总数为 114 种,每年平均 19 种,最高值的 1903 年有 34 种(参见附录三表一)。这种“加速度现象”不仅仅表现在数量上,还表现在输入的知识范围和知识规模上,后 13 年与前一阶段相比较,从知识线的引进走向了知识体系的输入。

早期 15 种地理学通论与教科书中,除了慕维廉的《地理全志》、裨理哲的《地球说略》、戴德生的《地理志略》和傅兰雅的《地志须知》等少数几本外,大多是零碎的地理学知识的介绍;而 1898 年后出版的 35 种地理学通论的译著,在地理学的概念上已明确地与地质学区别开来,“地理学者,考察地球表面之现象也。其过去之历史,与内部之构造,则详诸地质学;旋转于空间之理,及夫关系万物之由,则详诸天文学,故地理学与天文、地质二学不同。”^④这一时期译介的地理学译著一般均用天文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这三方面来涵盖地理学的范围,如萨端译出的日本志贺重昂的《地理学讲义》一书,在“论地理学之区分”一节中把地理学分成数理、自然、政治地理学三类;作新译书局译纂的《(新编)世界地理》,首编一章世界总论,论天文、地文、人文地理三部分;周起凤译述《万国地理志》的第一编地理学也分三章,分别论述数理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政治地理学;范迪吉等译出的日人田边新之助著《万国地理学新书》,该书总论介绍数理地学(星学地学)、自然地学(地文学)和政治地学(人文地学)三部分,西方近代科学地理

学的概念通过这些日文中译本渐渐成了知识界的普遍认识。笔者找到的清末的许多地理学教科书都是按这三分法编写的。

中国有着悠久的地理研究的传统,《周易·系辞》中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表明早在先秦时代已经有了专指地表形态的“地理”一词。自东汉班固《汉书》有《地理志》始,正史中就有了以疆域政区的建置沿革为主要内容的“地理志”专篇,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地理学从一开始就侧重于地理沿革的考订和社会历史的记述,而比较忽视对于地理环境本身的形态及其变化规律的探索。尽管中国古代地理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与天文、数学、农学和水利工程等学科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传统地理学基本上是历史学的一个辅助学科,地理类的图书在中国传统目录分类学上是属于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史部。戊戌到辛亥引进西方地理学的一个突出的方面是注重自然地理学的介绍,如有关地球与地文学的 31 部译著中,有 21 部出版在后 13 年,横山又次郎撰《地球之过去及未来》1902 年有冯霏和秦毓璠等两种译本,该书旨在阐明“地本圆球,为天空中一小游星之至理”。分总说、星辰世界、太阳、游星、水星、金星、火星、众小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月球、地球的过去及未来;书中述及康德的《天然史及天之说》和拉普拉斯的《世界解说》。富山房编纂的《地文学问答》,1903 年有陈大棱、邵羲、范迪吉三种译本,该书包括天体、关于地球之形状古人怀如何之谬见,昼夜及四季、空气及其运动、空中之水分、海洋、陆地及地势、陆界之组成、地热之作用、大气水及生物作用和生物之分布 11 章共 305 问,《译书经眼录》称:研究地质学“不可

不先求诸地文。若空中之水分,陆界之组成,生物之分布,皆地文学之显而易见者。”梁致祥编译的广东高等学堂地文课本《地文学》也是以日本富山房编《地文问答》为主,参考英国文教治口译、李庆轩笔述的《地学指略》及东西洋教科书分类编译的。这一年还有教科书译辑社出版的汪郁年译补、日本神谷市郎著《中学地文教科书》、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的樊炳清译《地文学简易教科书》。昌明公司 1904 年出版的沈仪熔译编《(最近中等)地文学教科书》,该书分 6 章,“凡例”称“依佐藤传藏与横山又次郎和文原著译出,又参考今村明恒、石川成章、神谷市郎、矢津昌永、永山万次郎、山崎直方、岩崎直三各理学家中等地文教科书”,书前有论地文学的意义,正文分述天然、陆圈、水圈、气圈、生物和人类,书中附插图 77 幅,另附插页图 11 幅,至 1907 年已发行了 4 版。王建极、奚若译订的美国学者忻孟(Hinmon)著《最新中学教科书地文学》1906 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卷 1 论地球为行星之一,包括日系和地动 2 章;卷 2 论空气,包括成分、重、热、水汽、空气之流动、空中光线之现象 4 章;卷 3 论海,包括海水之深、成分、热度、潮浪、流淤积 3 章;卷 4 论陆地,包括陆地之区分、地面、地之构造、泉、流、流之功用、冰川、湖、山之构造、地之凹凸、地震、火山 10 章;卷 5 论气候;卷 6 论生物,包括各类生物、生物之分布和人 3 章。这一地文学表述的结构,在 20 世纪初的各种地文学译著中反复出现,如日本山上万次郎著的《地文学》所采用的也是相似的六分法:一为地球星学,包括太阳学、地球之外形及内部、地球之运动、地表之测定 4 章;二陆界学,包括陆界之分配、陆界之变化 2 章;三气界,包括气界之性质、气温、气压及风、气界之水分、天气及气候 5 章;四水界,包括海水之性

质、海水之温度、海底和海水之运动 4 章;五地壳;六生物地理学;该书 1906 年有东京合资会社三田印刷所的邓毓怡译《地文学教科书》、点石斋版《最新普通地文学》和中国留学生会馆版陈树藩译编的《最近中学地理教科书地文之部》三种不同的译本;1907 年还有上海科学书局版的无锡译书公会译出的《最新地文学教科书》异译本;上海科学会编译部 1910 年出版的曾彦编译《(普通教育)地文学教科书》一书,也是以山上万次郎所著《地文学》为范本,参考石川成章、山崎直方、神谷市郎所著的各种教科书和参考书编译的。

人文地理学,又称人生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中国自古以来,对人地关系有过种种论点,但没有过系统的人文地理学的著作,在西方,地理学一向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乡来研究。近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内容,如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商业地理学、交通与旅游地理学都是在晚清,特别是在后 13 年传入中国的。在笔者统计到的 14 种文化与政治地理的译著中,1898 年后出版的占 12 种;交通与旅游地理学的 19 种译著中,1898 年后出版的有 14 种;而 11 种商业地理学的译著则全部都是 1898 年后出版的。晚清比较有影响的通论性人文地理学著作一共有三种,一是 1906 年南京宁属学务处、苏属学务处出版的《人生地理学》,该书由日人牧口常三郎著、江苏师范生编译;该书是《江苏师范讲义》第 7 编,全书 5 编,分论地球、气界、陆界、水界、人类和产业地理。艾素珍认为这是中国最早以“人生地理学”命名的著作。^⑤二是 1907 年上海群益书局再版的由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译的《最新人生地理学》,共 3 编 34

章,绪言着力讨论人地关系;第一编人类生活处之地共 13 章讨论日月星辰、地球、岛屿、地峡、山岳、平原、河川、海洋等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作者以希腊、意大利、阿拉伯、印度与中国的山东半岛为例,论证了岛屿在贸易和国防上都有重要地位,指出半岛为文明生发的一大原因。第二编地人相关自然之媒介共 6 章论无生物、大气、气候、植物、动物及人类的相互关系;谈及温度变动与人生的关系,太阳作为生灵之本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特别列举了日本人的太阳崇拜。^⑤第三编人类以地球为舞台之生活现象共 9 章论社会、社会之分业、生活地论、产业地论、国家地论、都会及村落地论、生存竞争地论、文明地论;在都会和村落地论中首先使用了“聚落”的概念,指出都会原起于六种情况构成的聚落,一防卫外敌、二宗教原因、三政治目的、四艺术娱乐、五学术研究、六经济活动。^⑥在文明地论一章中,作者专门讨论了现今文明的中心点、文明中心点的移动、将来文明中心点,该书得出的结论是“一文明中心沿纬度线而移动,二文明中心点移动于东西,三文明中心由水路而移动,四文明由地势而移动。”^⑦第三种即凌廷辉的《人生地理学》,该书共 36 章,前 27 章主要论述与人文地理有关的各种自然地理现象,后 9 章主要介绍各种人文地理知识。在该书“总论”中,作者全面论述了人生地理学的原理及其研究方法,指出:“人生地理学者,研究地理与人生之关系者也。”地理与人生的关系是什么呢?“盖人既存立于地球上,则人种之生存竞争,于大地究有何关系?我所占之一部分,既不能划然自守,则与它部分必有种种之关系。有关系即有比较,若气候、若物产、若地势、若宗教、若交通,以及国家兴亡变迁之原则,人类发达迟速之现象,非一一详细比较,必不

能得其最要之点。故地理学之一门,自表面观之,仅为普通各科学之一科,而范围广博,包含富有,与种种科学,尽有密切之关系。近人分类法,有所谓天文地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者。又有人文地理中,而分为政治地理、经济地理者。盖地理虽属一门,面非深知各科学之原则,演绎而归纳之,必不能真知地理学。然则人欲扩充其思想知识,则研究地人相关之理,其可缓哉!”^⑧专门讨论地理与文明关系的译著有 1906 年金陵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的《地理人文关系论》,该书强调殖产、政治、美术文学、宗教等都离不开地理学,因为“人无地理之学识,则经济论必流于狭隘”;“不究地理学而言政治者,空谈之政治也”;“地理之关系于美术文学,犹慈母之于子”;“宗教历史与地理学有互相倚伏之势”。^⑨

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是研究国家与地区等各种类型的领土间的政治活动现象的地理分布或空间布局的一门学科。各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国家间的集团组合或矛盾冲突,国家的不同社会制度与政治态度,国家与政府的决策,以及各国内部行政区划的划分,各行政区域的功能等,都是政治地理学讨论的范围。在 20 世纪初影响较大的政治地理学译著有陶镛译日人矢津昌永编《日本政治地理》,该书 1902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国土、人民、邦制、经济、交通、生业物业、外交等七编;《南洋七日报》从 1901 年 9 月 22 日第 2 册到 1902 年 4 月 13 日的第 27 册,连载了上海广方言馆同书异译本。当时该书被认为“别具组织,新义独标。虽专限于日本,然可以为斯学之指南也。”^⑩东京湖北法政编辑社 1905 年出版有刘鸿钧编译日人野村浩一等编著的《政治地理》,该书为“法政丛编”第 16 种,主要依据野村浩一

的讲授稿,同时参考了山本信博的《政治地理学》、辻武雄的《五大洲志》、佐藤传藏的《万国新地理》、辰巳的《万国宪法比较》诸书;该书共分9章,第1至第3章,泛论国家、国家之分类及政体;第4至第8章分述各国政略,如亚洲各国志、欧洲各国志、美洲各国志、亚美利加洲志、大洋洲和属地,该书第9章论列强之属地,是据山本信博《政治地理学》译辑而成。20世纪初的中国人致力于西方和日本政治地理学译述的着眼点仍然是中国,如1903年《直说》上刊出的矢津昌永的《十九世纪亚洲地理之变迁》一文,介绍了亚洲各国屡遭列强侵略的现状,指出中国“处于万矢齐集之地,起将何以御之”?编者加评论曰:“哀哉!吾亚洲大陆之销沉也,其土地三分之二已归于欧人之掌中。”疾呼:“分割中国之说屡起,……吾不知我四万万同胞闻之其将何以处此!”^⑧

商业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前驱,以叙述和解释人类商业活动的地域分布、人类生活资源的消费和交换为主要任务。16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以后,由于海上新航路的开辟,商品交易和运输不断加大,有关世界各地商品的生产、销售以及运输路线、贸易市场的了解,对于欧洲各国的经济繁荣和对外扩张,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为此,以记述各国、各地区的物产分布,以及贸易关系、城市港口和运输路线等情况为主要内容的商业地理学著作纷纷问世。20世纪在中国流行的商业地理学译著,以永井惟直著《商工地理学》特别令人瞩目。1903年该书有作新社和《普通百科全书》本两种不同的译本。该书原本二编,译本是第一编。全书分两章论述商工地理学之概念与商工业盛衰的原因。指出盛衰的原因有地文的状态(地势及位置、自然力、地味及矿产之有无、人种及人口)和政治的

状态(习惯、租税制度、政府之组织及方针、运输交通、货币制度、度量衡制度)两部分。该书作者认为,随着文明的日益进步,“社会人类间之问题日起,乃极形复杂,因是学理之研究别为各派分类,至限定其范围于一小部分,共讨究其蕴奥,乃结果为《新商工地理学》一书,实由文明之学问,成一独立之研究。”商业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该书作者认为它“可谓人类经济的科学。若详言之,则于各国各地农工商产出之物,即食料品、饮料品、赘泽品,或诸般之粗制品、制造品等的产地,关于买卖输出输入人等,可云推理研究事实之学问。于是研究斯学之目的,从地球上关商工艺隆颓盛衰之本末,进图将来是等事业之发达进步,可得概言也。”由此可见,商业地理学是与数理地理学之于地球之自然的状态、政治地理学之于人类与地理事项之关系一样,“其主眼之处,在论各国间之需要供给,生产之消费程度,及为运般之方法如何,又以比较研究各国工商业之形势。”^④同一时期译出的 11 种商业地理学译著中,译自欧美的有 1902 年广智书局版英人嘉楂德氏著《万国商业地理志》、1905 年南京南洋官书局出版的张梦香译英人贾萨德立著《最新商业地理教科书》,以及湖北商务报馆光绪年间据日人瓜生寅译英人尼用椅子著《商业博物志》的翻刻本;译自日文原本的除上述两种外,还有作新社 1906 年《最新世界商业地理教本》、广智书局 1907 年版的《最新韩国商业地理》和《中国商业地理》、上海昌明公司 1907 年版的童世亨、俞镇合译的《世界物产地志》,另外还有“五洲舛编译时务丛书”1911 年版刘世珩译日人永野耕造著的《亚洲商业地理志》、日人青柳笃恒著《北满洲商业地理论》(载王锡祺辑《中外游记汇编》)等。1900 年 3 月到 7 月的《江南商务报》还连载

有日人田冈佐代治译的《商工地理学》。对世界商工地理学的关注,是起于中国学者对本国资源不断被掠夺的痛惜,1905年刊载于《直隶白话报》上连载的由多人署名的长文《中国商业地理》介绍了中国的地理资源、物产矿藏的分布情况后指出:“中国的出产极富,可惜自己不能细细考察”,真叫“开粮食房的摸不着饭吃”,“中国的矿产是非常多的了。若能都开采出来,那一定要成全地球第一富国。偏偏我们中国人不知尽这地利,不但自己不开,而且还要送给别人。”^④

与商业地理学有密切关系的还有交通旅游地理学,20世纪出版的交通地理学的译著有广智书局1902年译刊的日本参谋本部编《东亚各港口岸志》,该书分8篇,首篇23章记中国的上海、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宜昌、重庆、天津、芝罘、牛庄、宁波、温州、汕头、福州、广州、厦门、北海、琼州、台湾、鸡笼、淡水、香港、澳门这23个通商港口;二篇2章记俄领沿海洲的乌拉地俄斯德和哥萨港;三篇3章记朝鲜的釜山、元山和仁川;四篇1章记法属的西贡;五篇记安南的海防;六篇1章记英属地新加坡;七篇1章记暹罗的盘谷;八篇1章记小吕宋群岛马尼拉。对于各港口位置、分界、沿革、行政、人口、兵备、风俗、气候、物产、贸易、街市、碇泊均有所叙述。由于中国与日本在交通运输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甲午战后日本觊觎中国丰富的资源,而中国又对新崛起的日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就有了克斋译小越平隆著《满洲旅行记》(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版);日人林安繁著的《扬子江》(原名《扬子江溪谷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02年版);汪国屏译日人林繁著《扬子江流域现势论》(广智书局1903年版);马为珑译日人松本敬之著《富之满洲》(普及书局1907年版),中国人译出这

些书当然不是为自己旅行提供方便,而是将它们作为亡国警钟来敲响的。马为琬在《富之满洲》的例言中特别指出该书固然为中国人了解东北提供了材料,但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此书足以见出“日本人口增殖,欲攘之为殖民地”的宗旨。当时商务印书馆图书广告在介绍上述《扬子江》一书时指出:“长江大河为国之宝。我国扬子江襟连五湖,贯连六省,为我国财富之源,各国覬觐尤切。是书于沿江商业物产记载最详,大抵为彼族搜讨所得,而读之其亦稍得因应之策乎!”^⑨范迪吉等译《普通百科全书》中收入了日人山上万次郎著的《万国旅行地理》和《日本旅行地理》,这是当时颇受读者重视的旅游地理学读本,前者分两章,一为亚洲和欧洲,一为南北美洲。后有地理总论,分天文地理、人文地理、地理学三部分。全书旨在介绍诸国海陆交通、政府兴废、气候温暖、工商盛衰,其中对中国介绍尤详。后者分两篇,前篇地理特说 15 章,介绍东京、大阪、马关、京都等城市以及北海道海岸与九州海岸。后篇地理总说 49 章,分地文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子目,叙述山川都邑、人物草木、幅员区划、政治兴革,附录地名总汇,颇便中国人查阅。范迪吉等还译出日人坪谷善四郎著《最新日本全国漫游记》,东京东亚公司 1907 年出版有日人大桥新太郎编《汉文日本游历必携》,该书是据坪谷善四郎的《日本漫游》摘编的,宗旨在资清国人游东之便。全书分东京游历指南和各地游历指南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自清国到日本东京行程及旅费,上岸地方驰名的客店,东京的沿革、地理、舟车之利便、市内客店、购物指南、市内各学堂、银行报馆、使馆、酒楼、青楼及不夜城、驰名医院,以及市内和市外的游历指南。第二部分分五区叙述了横滨、本牧、四国、山阴道、九州、北海道、房总内海岸游

历的路线指南。末附日本各铁路火车及轮船的价目单。该书前有驻日使署马永宽的叙,末有邝继野跋,均希望中国人能从各种角度充分利用日本的旅游资源,东亚公司在上海、汉口、天津、奉天、济南、扬州均有分号和该书的销售批发处。

19世纪后期,西方地理学开始形成地文、人文和区域三大分支,^⑨这也可以视为近代地理学知识体系的确立。分别为地文和人文地理的研究开创了早期理论的是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洪堡和李特尔,以后又经李希霍芬、拉采尔等人的发展,为地理学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知识系统。清末地理学知识输入的加速度现象,不仅仅表现在西方地理学译著数量的急剧增加,同时表现在这些地理学家为代表的地理学思想恰恰也是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中国,洪堡、李希霍芬、拉采尔等被介绍给中国时,他们甚至还都在世。

本文第三章已经论及1853年出版的《地理全志》一书中最早提及了洪堡,约19世纪70年代归安人吴钟史在《地球说略》中谈及洪堡及其著述:“本朝乾隆五十三年,英人创立公会,访查亚非利加内地。嘉庆二十三年,英人又令人探访南北极。自是地学日合于格致。时详论地性及山川险阻,与夫天然之疆界、人力所经营者,为布国人洪巴耳特著《考司麻司》、《由乃乞耳》两书,流传各国。”^⑩《考司麻司》显然是指洪堡总结自然地理学研究原理和区域地理研究法则的名著《宇宙,物质世界概要》,德文 Kosmos, 英译为 Cosmos, A Sketch of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e, 全书共五卷,第一卷出版于1845年,第五卷出版于1862年。第一卷是关于宇宙全貌的概述;第二卷是历代对自然风光的论说和人类致力于发现及描述地球的历史过程;第三卷论述天体空间的法则;第四卷讲地球;第五卷

是笔记。《由乃乞耳》可能是《自然的观念》英译本 Views of Nature 的译音。^⑩1903年徐心镜增订的《泰西名人传》中出现了洪堡的小传：“宏博德，德人，生于乾隆三十年，卒于道光十五年，世称博物君子，初至法京，与法人该路撒克出外游历。嘉庆四年，游历美国，乘小船冒江险以察美洲形势，又睹保沙拉火山，高六法里，约合中国十里，又至古巴、墨西哥，五年以后返法国。著书名《墨赤道》（今译《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一纸风行，不胫而走。道光八年，俄皇以重金聘之，令游历亚中。俄人属意东方，欲知其究竟也。宏就聘往亚，跋涉山川五六载之久，方旋著《游历亚中记》。道光十七年归德，虽老态龙钟而笔墨不辍，撰《世界形势记》（今译《宇宙，物质世界概要》）。法英人皆收为翰林，赠以宝星，极一时之荣云。”^⑪

近代地理学创建人之一的李特尔(Carl Ritter, 1779—1859)，最早阐述了人地关系和地理学的综合性、统一性，并奠定了人文地理学的基础。和洪堡不同，李特尔一生担任过好几个教师的职位。1819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历史学教授，1820年任柏林大学首任地理学教授，成为德国第一个地理学讲座教授和柏林地理学会的创建人。1903年留日学生创办的《汉声》杂志第6期登载的《史学之根本条件》一文就提到过“利铁尔”。1906年出版的《地理人文关系论》较早地提及了李特尔及其著述：“彼普鲁士之言普通教育，多注重地理一门。故世界尝以之为模范。由是理铁尔伯息尔特著世界唯一之地理教科书问世，几乎纸贵一时，而英国政府有鉴于此，亦屡诏其国之地理学协会，就其地理教育之法，而推行之。嗣是以后，地理学之发达，殆不可限量矣。”^⑫这里“世界唯一之地理教科书”当指他的学术巨著《地学通论》，它同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关

系；或普通比较地理学，自然和历史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坚实基础》。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即1907年初经家龄在《高等小学地理教授用书》中引证了李特尔的理论：“近世教授地理之泰斗、德人李殿尔有言，凡一土地之全体事项，如自然及人工之生产物、人群及天然之印象联为一体，告语于青年，因相互之比较，使受教者了解于自然及人生之要，果此，余之志也。盖地球及人群互有关系，以自然地理为地理学之基础，通厥关联，欧罗巴教科书之著乘此而已云云。”接着著者又详细地介绍了李特尔的地理教育思想：“德人李氏之教授地理，所主张之方法有三：一直观法，以实际万物存在之地，就令观察，庶儿童直接感觉。二描图法，儿童之地理观念，既渐发达，不有以外著其形，则终属心灵之倘恍。使之描图，则印象深而记忆与兴味并起。且李氏不特重描图也，并重用图，其教授法中，为比较最重点。三比较研究法，以已知者为基础，如数量之三十为六之若干倍也。终上三者，李氏而后以至今日，教授地理方法三大端，殆外不是矣。”^⑩

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于1860年获博士学位后一直在欧洲从事区域地质调查,1860年前往东亚考察,历经斯里兰卡、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缅甸等国。1868年至1872年间在加利福尼亚银行和上海西商会资助下多次到中国考察旅行,调查了大多数省区的地质、矿藏、黄土、海岸性质与构造线分布等。据郭双林称,《万国公报》等报刊多次报道他在中国的活动,对其创立的有关理论则很少介绍。直到1903年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中才提到了他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充当德国瓜分山东谋士的角色:“千八百七十一年,德人利忒何芬 Richthofen 者,受

上海商业会议所之嘱托,由香港入广东、湖南、湖北,遂达四川;入陕西,山西而之直隶。复下湖北,往来山西间,经河南之怀庆,以至上海,入杭州,登宁波之舟山岛,遍勘全浙。复溯江至芜湖,捡江西北部,折而之江苏,遂入山东。碧眼炯炯,击节大诧若所悟。……历时三年,其旅行线强于二万里,作报告书三册,于是世界第一石炭国之名,乃大噪于世界。其意曰:支那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⑩其实,他于1877—1912年撰写出版的《中国》(5卷,附地图集2卷)一书,在清末也已有过较为详细的介绍。1900年7月在日本出版的孙中山手绘《支那现势地图》跋中,就提到了李希霍芬在中国的地图测绘工作,认为:“德国烈支多芬所绘之北省地文、地质图各十二幅,甚为精细。”1911年《地学杂志》的“介绍图书”栏刊有张星烺所撰精彩的书评:“《支那》,此书德文原名 China,为德国已故男爵李希德和芬所著,凡四巨册,每册约八百页。幅长一尺(英尺),宽八寸,所附图画,不可胜计。每册价三十六马克,共一百四十四马克(约合中国七十五元)。《支那地质图》,此亦李氏所著,附于前书者也。第一册为北支那之地质图,分绘各色,以为标识,其篇次为山东、盛京、直隶、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四川八省,共二册。第一册价八十马克,第二册尚未出版。”“吾国中凡稍治西文者,莫不闻知李氏之名。而‘山西煤矿足供全球千年之用’一语,亦自李氏发之。然其著书之原委,或有未能详知者,今请略言之。千八百六十三年间,新德意志联邦尚未告成也,而普相毕斯马克,素怀雄略,驰域外之观,深嫉英法诸国属地遍寰宇,而日耳曼独无之。于是盱衡全局,而以中国之政治腐败,国民愚

陋,尚有隙可乘也。遂于是年遣李希德和芬,率众十余,漫游中国,历时几及二十年。而于山河险要、地质矿产、海港形势,皆悉心考察,一一笔之于书。且播告其国人,谓支那有三良港:一为浙江之三门港;二为江苏海州之青口;三为山东之胶州湾,皆可占据,而胶州湾逼近矿产,尤为最胜。由是而知千八百九十八年,德人之占胶州,蓄谋已久,而倡其议者,实漫游之李氏也。”但作者并不因为李希霍芬曾为德国侵略胶州湾出谋划策而否定其学术贡献:“李氏之归也,惨淡经营,几耗三十年之心力,而又有生徒助之,乃成此书,真所谓体大思精、绝世之作也。盖德国名儒著述往往而然,其气魄宏远,殆远驾乎宋人纂注及明儒顾炎武诸君之上,吾国今人著书之才,虽不逮古人,但就他人已成之书而移译之,固亦非难事也,苟得同志五六人,分门译之,则二三年内,中土之研究地志矿产者,亦得最良之参考书,其有造于中国前途,岂浅鲜哉!”^⑩指出他在德国侵略中国领土时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但并不否认这种地理学考察的科学价值,这正是中国地理学界走向成熟的一个例证。

拉采尔(Frederich Ratzel, 1844—1904)是德国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1886年接替李希霍芬任莱比锡大学地理系教授。据笔者所知,最早提及拉采尔的可能是清末地理学家丁谦,光绪壬寅(1902年)他在《汉书传考证》卷上所附《北方三大人种考》一文中指出:“泰西自科学盛行,凡百事物,皆别为专门以资研究。人种学其一也。有白勒门拔克者,实为此学鼻祖,其说订人类为五种:一高加索种,二蒙古种,三奥洲种,四美利加种,五马来种,后法人葛得雷法徐踵其说而小变之,分人种为三,而以美利加及大洋洲土著为杂色种。近世人种学家,则欲割除人类成见,而以文明程度定其高下,如弗雷得

力辣彩耳辈是已。”^{①9}文中的“白勒门拔克”及其理论,显然是指1775年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J.F. 布鲁门巴哈(1752—1840)依据人的肤色、发型、身高等体质特征和原始居住区域将人类划分为白种(高加索人种)、黄种(蒙古利亚人种)、黑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红种(亚美利加人种)和棕种(马来亚人种)这五种类型。而“弗雷得力辣彩耳”就是拉采尔,可惜他没有详细介绍拉采尔的观点。1903年留日学生所办的《汉声》杂志第6期登载的《史学之根本条件》一文中也提到过拉采尔及其《人类地理学》一书,指出:“物理条件,颇为古来学者所注意。至于近世,孟德思鸠、黑狄儿、孔德、巴克尔、达殷(即达尔文)、利铁亚出,工夫渐密。近拉且尔设《人类地理学》之名(即《人种地理学》),从事于此方面之研究。然则我辈由此方针渐次进步,物理条件信可全通。兹取拉且尔所类别之物理条件,为之部次:

A、及于人间状态之影响:甲、生理的作用。譬诸热带气候,弛缓皮肤,妨害蒸发,足以弱人身体。乙、心理的作用。譬诸雄大伟丽之山水,足以动人间之感情。在于个人之间,势力虽钝,然渐次及于多数,浸假而感染至于全国民,是为发著于史学事项之始。

B、及于人间意志之影响:甲、起事之作用。1 运动之作用。譬诸沿海地方之人民,始于渔业运输业,进而渐营商业之类。2 抑制之作用。譬诸沙漠山林山脉之大者,遮断人间,俾难飞跃,既所以抑制其运动笼络之于个所也。乙、起状态之作用。1 土俗的作用。譬诸时节气候,直接影响于衣食住之情景;因求适应与抵抗之方法,遂起人间之工夫。寒则御寒,暑则防暑。又因地面肥瘠,注意土壤,若人口鲜乏,则更测量

水力风力,以利用其天然力。此即工艺发达之渊源也。2 社会的影响。譬由时候土地之构造,凝聚居住之国民,制为种种生存之工夫。实业之发达,重被此作用之刺激而成。自然力弱,则人间之抵抗力遂占优势;若自然力强,则人间反被抑制,而社会终不发达矣。”^⑭

这一段概述了《人类地理学》第1卷中有关各种自然特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拉采尔认为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但同时又认为由于有人类因素,环境控制是有限的,并把位置、空间和界限作为支配人类分布和迁徙的三组地理因素。

1898年前有关西方地理学思想的介绍大多是零碎片断而不成系统的,1898年后的13年间已有了比较完整的西方地理学说的介绍,其中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学说,地理环境决定论创自孟德斯鸠,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充分强调了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与土壤对于人类生理、心理及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以后经过黑格尔、巴克尔、拉采尔和森普尔等人的系统发挥,成为影响全世界的理论学说。在清末译出的主要是孟德斯鸠和巴克尔的学说。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人是通过1899年12月31日《清议报》上所刊梁启超的《蒙的斯鸠之学说》一文才知晓孟德斯鸠的,^⑮其实早此30多年的1864年崇实馆刊行的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卷1中,已经提到:“孟德斯咎著书,名曰《律例精义》,云各国自有公法也。”1879年日人冈本监辅所著《万国史记》和高桥二郎译述《法兰西志》都提到了孟德斯鸠及其《万法精汇》,1882年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的《万国通鉴》以及1890年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都先后提及了孟德斯鸠及其《论法的精神》。^⑯清末《论法的精神》先后有刊载于《译书汇

编》(1900年12月至1901年4月和5月)第1至第3期的《万法精理》、1903年文明书局出版的张相文等译的《万法精理》和1904年至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的严复译述的《法意》三种译本。虽三种译本都译出了原书中有关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叙述,但当时中国人注意的仍主要是译本中的三权分立的学说,张相文对于原书未加任何注释,严复也不同意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陈伯龙的《孟德斯鸠学说论》^⑩和雷曜辑的长篇孟德斯鸠传^⑪,都详述其三权分立说,而基本上没有注意到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巴克尔(Hennu Thomads Buckle, 1812—1862)是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他的思想深受孟德斯鸠的影响,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不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他认为地理环境(地形、土壤、气候和食物的供应等等)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的程度愈低,其所依赖自然界的程度愈大。他的代表作是仅出了两卷的《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这实际上只是全书的一个导论。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的《泰西政治学者列传》已经简要地介绍了巴克尔的生平和著述,称其《英国文明史》“立论尖新,着着出人意表,且又行之以雄浑活泼之文,抑扬顿挫,妙尽鼓舞”,“以豪迈之气,兼卓绝之识,谠言直论,肆无忌惮,鞭挞一世,矫千古之必败”,认为该书“总论二卷,已倍于基率特(今译基佐)文明史全书,使天假以年,则全卷落成,不几如涑水《通鉴》之大著。”^⑫《英国文明史》先后有四种中译本,一是1903年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刊的《英国文明史》;二是通过日文译本转译的《文明史论》,新书出版广告见之1903年4月27日《政艺通报》第15号;三是王建祖译

《英国文明史》，1904年作新社出版的《美国留学报告》的“留学生著述”中有过报道；四是陆续连载于1906年至1907年清末学部主办的《学部官报》第3至第28期上魏易译出的《文明史》。^⑭南洋公学版分甲乙丙丁戊五篇，这是原书第一卷“概论”的前五章。篇一总论史学考证之原、人事齐次之理；指出凡人事每受制于心理、物理，故史学与格致有密切的关系；篇二论天然物理于人群组织个人品质上所施之感格力；篇三论心理学家考察心理之法；篇四论心德心慧，拆心理为二，曰德、曰慧，指出此篇发明二者之关系于治化而较其轻重；篇五论宗教、文学、政府三者范移治化之力。该译本前有《亨利·多马斯·勃克鲁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巴克尔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著书过程，并把《英国文明史》的理论与方法概括为十条大意。在巴克尔看来，一般的自然景观（天然物理）可直接感染人的精神状态，如阴森使人恐怖，雄伟使人想象力开阔。地理环境与民族性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联。^⑮当时该书在中国学术界有着相当的影响，在京师大学堂任史学教习的陈黻宸读了此书后，在《中国史学通论续编》的《读史总论》中写道：“善哉《英伦文明史》曰：天下精微之理，极数千年，通人学士，竭虑研思，万方未得其解者，求之日用见闻之间，而其理悉备。而我中国之学者，往往识足以洞天地无尽之奥，而不足以知氏族之原；辨足以凿浑沌七窍之灵，而不足证闾里之事。”该文曾先后发表在1904年第17号《政艺通报》和1905年四川的《广益丛报》上，流传很广。^⑯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于1878年就有了日本文明史家田口卯吉的日文译本。日本史学界深受该书的影响。清末对中国史学界有过很大影响的日本浮田和民著的《史学原论》的第5章专门讨论“历史与地理”，而该章的

主要依据是巴克尔的观点。《史学原论》在 1903 年先后有过侯士绾译《新史学》、李浩生译《史学通论》、罗大维译《史学通论》、刘崇杰译《史学原论》、杨毓麟译《史学原论》、东新译社同人编译《史学原论》6 种译本。据有关专家的查对,梁启超的《新史学》、《中国史叙论》、《新地理》等论著,均有大段抄自浮田和民著的《史学原论》。^⑨

注释:

- ① [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页 382。
- ② 《在华新教传教士 1890 年上海大会记录》,转引自朱有琳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页 114。
- ③ 康有为《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载《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页 223—225。
- ④ 盛宣怀《奏请设立译书院片》,载《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 1953 年,页 50。
- ⑤ 梁启超《论学日本之益》,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页 176。
- ⑥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页 14 533。
- ⑦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422,转引自朱有琳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页 17。
- ⑧ [日]阿部洋《向日本借鉴》,载许美德等主编《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页 110。
- ⑨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 1983 年,页 29;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称 1899 年“我留东学生全数不满百人”。中华书局 1981 年,页 72。

- ⑩ 黄愷《东游日记》，转引自《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页 32。
- ⑪ 这三年的统计数字来自《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及其续五册，这还只是留日学生会馆中有案可查的，至于未到留日学生会馆登记的当尚有人在。参见倪墨炎《鲁迅革命活动考述》，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年，页 16—19。
- ⑫ 哈里·E·金《新近建立的中国教育制度》，载 1911 年《美国教育司公报》，转引自《中外比较教育史》，前揭书，页 119。
- ⑬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页 22、24。
- ⑭ 《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 1987 年，页 136。
- ⑮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 1983 年，页 37—38。
- ⑯ 参见汪向荣《日本教习》，三联书店 1988 年，页 117。
- ⑰ [日]增田涉著、由其民等译《西学东渐与中日文化交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年，页 17—18。
- ⑱ 盐谷岩阴《地理全志序》，《地理全志》，爽快楼 1859 年版。
- ⑲ 王晓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 1992 年，页 49—50。
- ⑳ 武安隆著《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年，页 299—300。
- ㉑ 1820 年德国李特尔在柏林大学开设了第一个地理学讲座。1874 年普鲁士政府决定在各大学设置地理教授席，接着英法相继任命了大学地理教授。英国于 1899 年在牛津大学设立地理系，美国于 1903 年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地理系。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国家的大学地理系才有了很大的增长。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页 54。
- ㉒ 参见章鸿钊《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页 9；[美]普雷斯頓·詹姆斯、杰弗雷·马丁著《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增订本，页 326—327；书中“古藤文次郎”是“小藤文次郎”的误译。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 1909 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时，也曾受教于小藤文次郎。参见章鸿钊《六六自述》，转引自李学通著《书

- 生从政——翁文灏》，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年，20—21。
- ② 参见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页 670—697。
-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9 年。
- ④ 《张文襄公全集》卷 17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页 12 781—12 782。
- ⑤ 转引自丁钢主编《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年，页 199—200。
- ⑥ 参见汪向荣《日本教习》，三联书店 1988 年，页 117—123；朱有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页 376。
- ⑦ 《广智书局历史》，载《国民日报》1903 年 8 月 17 日。
- ⑧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页 273。
- ⑨ 张朋园《广智书局（1901—1915）——维新派文化事业机构之一》，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 期。
- ⑩ 秋鹿骏东在《叙》，[日]秋鹿见二著《世界诸国名义考》，沈诵清译，广智书局 1904 年。
- ⑪ 《中等地理教本序》，载《中等地理教本》，广智书局 1907 年，页 1—5。
- ⑫ 《（中学用）世界地理教科书》第 1 编，《弁言》，广智书局 1906 年初版。
- ⑬、⑭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页 313—314。
- ⑮ 同上，页 325。
- ⑯ 张朋园《广智书局（1901—1915）——维新派文化事业机构之一》。
- ⑰ 参见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蒋维乔《夏君瑞芳事略》，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 1987 年，页 1—5。
- ⑱ 有关初期美华书馆的情况可参见[英]麦金托什（Gilbert McIntosh）著《在华伦敦会印书馆》（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美华书馆 1895

年,页19—23。

- ④① 参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页2。
- ④②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页198。
- ④③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
- ④④ 参见《上海学艺概要》(二),载《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年,页529。
- ④⑤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页132。
- ④⑥ 林熙《从〈张元济日记〉说商务印书馆》,载《出版史料》第5辑。
- ④⑦ 《商务印书馆历年出版物分类统计》,载《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
- ④⑧ 这一统计是据《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宣统二年二月)的出版广告,其中不录作者、译者的还很多,因此这一数字是不完整的,译本可能比目前的估计还要多。
- ④⑨ 参见[日]荒川清秀著《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中心》,白帝社1997年,页138—140、151—152。
- ④⑩ 沧桑主人《中学万国地志序》,载《(中学)万国地志》,商务印书馆1902年。
- ④⑪ 吴启孙《改正世界地理学缘起》、贺松坡评语,载《改正世界地理学》,文明书局1903年版。
- ④⑫ 张元济致沈绶云,载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683。
- ④⑬ 参见孙石月著《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页99—100。
- ④⑭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页55。
- ④⑮ [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64。
- ④⑯ 吴汝纶《东游丛录》卷2,日本三省堂书店1902年,页24。

- ⑤⑥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 1960 年，页 150。
- ⑤⑦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 1983 年，页 259—260。
- ⑤⑧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 1960 年，页 155。
- ⑤⑨ 王景沂《科学书目提要初编》，北洋官报局版，页 24。
- ⑥⑩ 朱联保编《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 1993 年，页 59—60、250。
- ⑥⑪ 参见蒯光典小传，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四辑，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88 年，页 275；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页 406—408。
- ⑥⑫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 1971 年，页 223—224。
- ⑥⑬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上），中华书局 1986 年，页 127。
- ⑥⑭ 王遽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 1936 年，页 55—56。
- ⑥⑮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 1971 年，页 219—222。
- ⑥⑯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四册（上），中华书局 1986 年，页 1027。
- ⑥⑰ 汪德渊序，[日]中村五六编纂、[日]顿野广太郎修补、王国维译《日本地理志》，金粟斋 1901 年。
- ⑥⑱ 中村之等著《近代日本哲学思想家辞典》，1982 年，日文版。
- ⑥⑲ [日]志贺重昂著、萨端译《地理学讲义》，一卷本，金粟斋 1901 年版。
- ⑦⑩ 《学部审定中学教科书提要》，载《教育杂志》1909 年，第 1 年第 1 期。
- ⑦⑪ 杨学斌序，载[日]若原著、马汝贤等译《万国地理统纪》，励学译社 1903 年。
- ⑦⑫ 朱联保编《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 1993 年，页 403—404。
- ⑦⑬ 《新学会社书目提要》，清末刊本，页 12、10。
- ⑦⑭ 凌廷辉《人生地理学·总论》，上海新学会社 1909 年；转引自郭双林《晚清西方地理学东渐述论》，载《学人》第 7 辑。

- ⑦⑤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页 2。
- ⑦⑥ 参见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 3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 ⑦⑦ “Encyclopedia”19 世纪 60 年代曾被西方传教士译为“大类编书”，《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最早的中译名“泰西大类编书”，是出现在 1880 年 6 月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文，载《格致汇编》第 3 年第 5 卷。参见拙文《近代最早百科全书的编译与清末文献中的狄德罗》，载《复旦学报》1998 年第 3 期。
- ⑦⑧ 汤寿潜《新译日本普通百科全书叙》，载《普通百科全书》，上海会文学社 1903 年版。
- ⑦⑨ 《钦命二品顶戴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袁为给示谕禁书》，载《普通百科全书》，会文学社 1903 年版。
- ⑧⑩ 《普通百科全书》郑绍谦序，美国学者任达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将范迪吉视为会文学社的领导人显然是错误的，详见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页 133。
- ⑧⑪ 《普通百科全书》东华译社“编译本书之原因”。
- ⑧⑫ 《普通百科全书》李思慎序，按“更数寒暑”一语，表明编译工作开始于几年前。
- ⑧⑬ 《普通百科全书》“本书之内容”。
- ⑧⑭ 《普通百科全书》第 1 章《商工地理学之概念》。
- ⑧⑮ 汤寿潜《新译日本普通百科全书叙》，载《普通百科全书》，上海会文学社 1903 年版。
- ⑧⑯ 《普通百科全书》郑绍谦序。
- ⑧⑰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 1983 年，页 226—229。
- ⑧⑱ 杨维新《清末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略考》，载《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0 年。
- ⑧⑲ 参见《学部编译图书局备览》，载《学部官报》1908 年第 68 期、69 期。

- ⑨ 杨维新《清末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略考》，载《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0 年。
- ⑩ 参见王建军著《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页 158。
- ⑪ 江梦梅《前清学部编书状况》，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 1953 年，页 211。
- ⑫ 转引自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页 760。
- ⑬ 《地理人文关系论》，第一章，金陵江楚编译官书局 1906 年。
- ⑭ 艾素珍《清末人文地理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载《中国科技史料》第 17 卷(1996 年)第 1 期。
- ⑮ 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译《最新人生地理学》，(上海)群益书局 1907 年再版本，页 5—6。
- ⑯ 同上，页 138—140。
- ⑰ 同上，页 174。
- ⑱ 凌廷辉《人生地理学·总论》，上海新学会社 1909 年；转引自郭双林《晚清西方地理学东渐述论》，载《学人》第 7 辑。
- ⑲ 《地理人文关系论》，第一章，金陵江楚编译官书局 1906 年。
- ⑳ 《东方杂志》1904 年第 1 期图书广告。
- ㉑ 《直说》，1903 年 3 月 13 日第 2 期。
- ㉒ 《商工地理学》，载范迪吉主译《普通百科全书》，会文学社 1903 年。
- ㉓ 《中国商业地理》，先后署名洁忱、显彰、南村等，载《直隶白话报》1905 年第 1、4、6、10、13 期。
- ㉔ 《东方杂志》1904 年第 1 期图书广告。
- ㉕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页 2。
- ㉖ 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 1 帙，上海著易堂本。
- ㉗ 英译本由 E.C. 奥特与 H.G. 博恩译，1847 年在伦敦出版；参见[英]

- 罗伯特·迪金森著、葛以德等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商务印书馆 1980 年，页 41。
- ⑩ 上海徐汇报馆原本、徐心境增订《泰西名人传》，鸿宝斋 1903 年，页 5。
- ⑪ 《地理人文关系论》，第一章，金陵江楚编译官书局 1906 年。
- ⑫ 经家龄著《高等小学地理教授用书》，《弁言》，上海普及书局 1907 年。
- ⑬ 《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页 4—5；参见郭双林《晚清西方地理学东渐述论》，载《学人》第七辑。
- ⑭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 1981 年，页 187—188；《地学杂志》第二年（1911）第 16 号。
- ⑮ 丁谦《汉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载“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浙江图书馆 1915 年，页 25。
- ⑯ 《汉声》1903 年第 6 期，台湾国际印刷厂 1968 年影印本，页 781—784。
- ⑰ 许明龙《孟德斯鸠与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页 106—107。
- ⑱ 参见拙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 年，页 141。
- ⑲ 陈伯龙的《孟德斯鸠学说论》，载《地球英雄论》，新民书局 1904 年。
- ⑳ 雷曜辑《各国名人事略》，砚耕山庄 1905 年再版。
- ㉑ 《邇克尔传》，载[日]杉山藤次郎著、中国广东青年译《泰西政治学者列传》，广智书局 1902 年；该文几全部收入雷曜辑《各国名人事略》，砚耕山庄 1905 年再版。
- ㉒ 参见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页 58—59。
- ㉓ 参见[英]勃克鲁原本、南洋公学译《英国文明史》，南洋公学 1903 年。
- ㉔ 参见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页 60—61、97。
- ㉕ 梁启超著《新地理》，一元学舍 1903 年出版，该书分四章，第 1 章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第 2 章亚洲地理大势论；第 3 章中国地理大势论；第 4 章欧洲地理大势论。

第四章 晚清地理学文献中西方 自然地理学新词

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和概念的重要工具,词汇是语言的基本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地理学的知识和思想主要是通过词汇来表达和传递的,地理学教育一项重要功能也在于传授由词汇组成的地理学专门术语。晚清的地理学专门术语中包含了大量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新词。根据周振鹤先生的意见,西方外来语新词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五类:一音译词,即把外语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如“摩托”Motor、“沙龙”Salon;二音意词,是指音译词和本族语言成分混合构成的一种新词,如“酒吧”Bar、“芭蕾舞”Ballet;三意译词,指根据外语单词的意义或构词结构产生的新词,如“电话”Telephone、“灵感”Inspiration;四移译词,利用古代汉语原有的词语而给以新的涵义,如“经济”Economic、“革命”Revolution;五生造词,指受外来事物影响而产生的新词,如“火轮船”Steamship、“长颈鹿”Giraffe。考察晚清自然地理学新词的演变,可以对西方地理学在近代中国影响的范围的广狭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根据抽样统计的138个在晚清文献中流行的自然地理学新词的演变,对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一、晚清开始广泛受到重视的 明末清初的地理学新词

在地理学知识最初传入的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汉文西书中留下了一批地理学的新词。最早从事地理学译述的利玛窦曾感叹专门术语翻译的困难:“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嗣是以来,屡逢志士,左提右挈,而每患作辍,三进三止。”^①这里虽然在说《几何原本》翻译的种种艰难,其实,地理学译著何尝不是如此!明末清初传入的地理学知识点还很有限,地理学方面的新词基本上是意译词,也有少量移译词(如“赤道”、“南极”、“北极”)和音译词(如“台风”)。此参据日本学者荒川清秀的研究列表如下:^②

地理学 今译名	坤輿万国 全图 1602	职方外纪 1623	坤輿图说 1674	浑天仪说 1636	地球图说 1761
地球	○	○	○		○
半球	○		○		○
东半球					○
西半球					○
赤道	○	○	○	○	○
南极	○	○	○		○
南极圈	○	南极规	○		
北极	○	○	○		○

续表

地理学 今译名	坤輿万国 全图 1602	职方外纪 1623	坤輿图说 1674	浑天仪说 1636	地球图说 1761
北极圈	○	北极规	○		
北回归线	北道	北道、夏至 线、夏至规	北道		
南回归线	南道	南道、冬至 线、冬至规	南道		
地平线	○		○		○
子午线	○、子午环	子午规			○
五带	○	○	○		
温带	正带	○	正带		
热带		○			
寒带		冷带			
经线	○	○	○		○
纬线	○	○	○		○
经纬线	○		○		
纬度	○、直度	○	○		○
经度	横度	○	○		○
时差			○		○
五大洲	○	○	○		四大洲
海滨	○		○		
海峡		○	○		
冰山		○	○		
大洋		○	○		
暗礁		○			

续表

地理学 今译名	坤輿万国 全图 1602	职方外纪 1623	坤輿图说 1674	浑天仪说 1636	地球图说 1761
航海			○	○	○
太平洋		太平海、 太平大海	太平海、 太平大海		
地中海	○	○	○		
大西洋	○	○	○		○
气候		○	○		○
天气		○	○		○
地震		○	○		
火山		○	○		
喷火		○	○		
潮汐			○		
海底			○		
海面			○		

以上列出的 41 个新词中,有 37 个至今仍为地理学界所采用。表明当时中外译者在翻译这些地理学新词时,颇费过一番功夫。明末清初的这些新词在晚清受到了中外地理学学者和地理学译著者的高度重视,成了这批学者从事新的西方地理学著作翻译的重要语词资源。如“南极”、“北极”原分别是指“南极老人星”或“天球的南极”和“北极星”或“北天极”,经利玛窦用于 South pole 和 North pole 的译词后,晚清魏源的《海国图志》就使用了这两个译词。其他被使用的新词还有“地球”、“赤道”、“经线”、“纬线”。我们通过“热带”、“温带”和

“寒带”这三个词在晚清文献中的流行,也可见晚清地理学译词与明末清初地理学文献的紧密联系。^③

笔者抽样统计晚清使用频率较高并在今译名中能找到对应词的 138 个地理学新词中,明末清初的新词在初译名中有 25 个,占总数的 18.1%,可见明末清初的借词和译词在晚清地理学界仍有着相当高的使用率(参见本章附表)。同时,明末清初西方耶稣会士所采用的地理学译词方法,也受到晚清中外地理学译者的重视。如“气候”,《文选》中南朝宋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诗有:“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是指时令的变化。^④耶稣会士将此语用于译出英文中 Climate 的意义,用于指某一地区长年天气特征的综合。《热河志》卷七“天章七”有乾隆名曰“气候”一诗,讲述木兰牧场在其一生经历中的气候变化,^⑤乾隆使用这一赋以古有词语新涵义的移译词,很可能是受耶稣会士汉文西书的影响,这种移译词的创造方法也为 19 世纪西方传教士的译者和中日译者所借鉴。

值得注意的还有“台风”一词,虽未出现在明末清初的汉文西书中,但却是一个在明末清初出现、并在晚清普遍使用的新词。据查,“台风”一词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福建通志》卷 56 的《土风志》里出现过。^⑥有认为这可能与明万历年间颜思齐时始称“台湾”有关,因为很多台风经过台湾进入大陆。大陆居民认为这种风暴来自台湾,故称台风。还有一种可能是:根据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希西奥德(Hesiod)的史诗《神权史(Theogony)》,“泰丰”(Typhon)是被称为“海上风暴之父”的怪物,所吹之风带有湿气。台湾在颜思齐死后为荷兰人所占,荷兰人经常在此遇到热带风暴,因此就用“泰丰”之名称之。后来“Typhon”一词演变为“Typhoon”,而“泰丰”也就在

汉语中转为“台风”了。^⑦此说若属实,可算是明末清初出现音译词的一个例证。

二、19 世纪汉译地理学文献中的地理学新词

晚清中国人在创立新词的过程中,的确大量地借用了日本的译词。但以往的外来词研究者过高的估计了 20 世纪初日本译词的影响。笔者抽样统计的 138 个新词中,有 40 个初译名是首先出现在 19 世纪西洋传教士主译的文献中,占总数的 29%(参见本章附表)。有些译词,如“地下水”,一般都认为这是 20 世纪初来自日语的词汇,^⑧但实际上该词 1886 年艾约瑟的《地理质学启蒙》一书中已出现了,该书卷 5 有“明地下水之功用”一语。过去我们都把“世界”一词的出现与日本联系在一起,如 1854 年 11 月的《遐迩贯珍》中所收罗森的《日本日记》,其中有日本学者平山谦二郎给罗森的信,信中有“全世界中各国布棋”,“方今世界形势一变”等语。^⑨这里的“世界”一词,当指“地球上所有的地方”。1879 年王韬的《扶桑游记》和 1890 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都使用过这个已赋予了新意的译词。其实早在嘉庆庚辰年(1820 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第七十一帙所载《论亚默利加列国》一文中已将哥伦布发现的美洲称之为“新世界”。1855 年 7 月号《遐迩贯珍》中刊出的《续地理撮要论》一文,在叙述“哥林”(今译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事迹时,也用了“新世界”和“旧世界”的概念。因此,最早将 World 译成“世界”的恐怕还是新教传教士。

再如一般都认为由后缀“学”字构成的词,是来自日语的

原语借词,但墨海书馆和江南制造局出版的一系列科学书籍,如1853年出版的伟烈亚力主译的《数学启蒙》、1859年出版的艾约瑟主译的《重学》;傅兰雅主译1874年出版的《声学》、1876年出版的《光学》和1879年出版的《电学》,都表明这种结论很成问题。有的学者又认为“在汉语中由后缀‘学’所构成的词,几乎总是双音节词;而三音节词大部分是从日本传入的。”^⑩这个结论仍可商榷,因为墨海书馆1859年就出版了伟烈亚力主译的《代数学》和韦廉臣主译的《植物学》,两者都曾传入日本。而日本学者宇田川榕庵1822年把botany音译为“菩多尼珂”,有《菩多尼珂经》;1834年又意译成“植学”,有《植学启原》。^⑪1867年韦廉臣的《植物学》在日本重刻。1875年日本学者据中译本转译为日文出版,有阿部弘国的《植物学和解》和田原陶猗的《植物学抄译》两种版本。^⑫因此,笔者认为使用后缀“学”的三音节构词方法,倒很有可能是19世纪西方传教士主译的中译本传入日本后给日本学者的启发,成了日本后来重要的译词方法之一。因此,有的学者认为1879年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中的“地理学”一词是来自日语原语借词,这仍是值得重新研究的问题。周振鹤先生指出过,在日本开国以前,中日欧语言的接触方向或曰外来词的走向是欧→中→日,而在20世纪初主要走向变成欧→日→中,在早、晚两期中间两种走向都有。^⑬16世纪末以来中日学者之间交流的密切程度,远比我们今天估计的要大得多,中日学者在译词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着如何程度的交互影响,目前很难完全陈述清楚,还需要对晚明以来的汉文文献和日本的“兰学”资料作出全面的清理。

如何做好专门术语的翻译工作,19世纪来华的西方传教士

已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19世纪60至90年代长期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的傅兰雅极为重视“名目”(即专门术语)的翻译,认为当时西方科学的输入门类、名目甚多,有许多为传统中国所没有的新事物,因此就有设立新译词的必要。“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若所用名目必为华字典内之字义,不可另有解释,则译书事永不能成。然中国语言文字与他国略同,俱为随时逐渐生新,非一旦而忽然俱有。故前时能生新者,则后日也可生新者,以至无穷。近来中西交涉事年多一年,则新名目亦必每年增广。”他据自己十几年译科学书的经验,总结出三项译专门术语(即名目)的方法:(一)在传统的中国格致和工艺等书和明末清初的译著里找出中文中相应的名目。(二)设立新词的方法,除在普通字加偏旁构成新词外,可用几个字采用意译来生成新词。(三)用官话(北京官话)音译。^⑩这几项学术用语的译名方法给予20世纪以来的科技翻译家以深刻的影响,以后的地理学翻译中也普遍采用这些译述方法。

19世纪汉译地理学文献中的地理学新词,对中国现代地理学专门术语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如1847年的《外国地理备考》就已有“海湾”(Gulf);1854年出版的《地理全志》不仅大量使用了明末清初地理学图书中的译词,如“地球”、“热道”、“温道”、“寒道”、“经度”、“地平”、“地平线”、“海面”、“火山”、“子午线”等,还创造了许多重要的译词,如淡水(Fresh water)、地壳(Earth crust)、地形(Land form)、方里(Squar mile)、高原(Plateau)、横谷(Cross-valley)、直谷(Longitudinal valley)、空气(Air)、贸易风、恒风(Trade-wind)、珊瑚岛(Coral island)、咸湖(Salt water lake)方位(Azimuth)等。1857年第3号《六合丛谈》刊载的《地理》一文中又出现了“南极圈”(Antarctic circle)、

“自转”(Rotation)等,有的因较明末清初的译词为妥而取代了旧译,如“经度”(Longitude)替代了“横度”;“纬度”(Latitude)替代了“直度”。有的译词,如第一午线(Prime meridian,今译本初子午线)、枕地(Peninsular,今译半岛)、土腰(Isthmus,今译地峡)、时风、薰风(Monsoon,今译季候风),陆续被淘汰。但也有的译词,如1866—1869年罗存德编在《英华字典》中的“半岛”(Peninsular)后经日本译述返传中国,在20世纪的地理学著作中普遍流行,至今已成了定型词。1886年艾约瑟编译的《地理质学启蒙》中使用的冰川(Glacier)一词,较之后出的1903年问世的《新尔雅》的“冰河”,似乎更有生命力。19世纪西方传教士译出的有些过渡词较之后来从日本传人的新词似乎有着更高的精确度,如Gulf,《遐迩贯珍》的编者译为“海股”,用于表示“深流陆中”的封闭性海湾;Bay则用于译述开放性的海湾,20世纪20年代以后两者均被译为“海湾”。从地理学术语的角度来看,后来的定型词反不如19世纪的传教士创造的过渡译词来得精确了。^⑮

三、20世纪初地理学新词中 来自日本的译语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吸收近代西洋学术时,也是借助明末清初的汉文西书和近代的汉文译著,大量吸收中国词汇。即使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仍然是通过阅读汉译西书来了解西方文化的。鮎泽信太郎就藏有文化(1804—1817)、文政(1818—1829)、天保(1830—1843)等年代的《职方外纪》抄本有8种之多。可见该书当时通过抄本广为流传。日本幕府末期的著名

洋学家柳河春三在 1861 年出版的汉文本《横滨繁昌记》中,有“舶来书籍”一节,其中介绍的近刊汉文西书有《谈天》、《数学启蒙》、《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博物新编》、《重学浅说》、《智环启蒙》、《全体新论》、《内科新说》、《西医略论》、《妇婴新说》,西方地理学方面的有《瀛环志略》、《地理全志》、《地球说略》、《联邦志略》,以及《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上海新闻》等杂志。^⑮可以说,19 世纪初在译词方面,中国仍然是日本的老师。钱基博《徐寿传》中称其在江南制造局“翻译汽机、化学等书,成数百卷。日本闻之,派柳原前光等赴局考访,购载寿译本以归。今日本所译化学名词,大率仍袭寿本者为多,人以此服其精审。”^⑯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学生赶上了老师,据汪向荣称,1887 年日本翻刻王韬《普法战纪》之后就不再有汉译西洋书的出版活动了。^⑰它标志了中日文化地位发生了逆转,不久中国从老师转变为日本的学生。

20 世纪初,随着留日高潮的掀起和通过日文转译西书活动的广泛展开,大量的日书中译本涌入中国,从钱存训所作的统计来看,1900 年前的中译日文书共 86 种,而 1902 年至 1904 年的中译日文书高达 321 种,占这一时期翻译总数的 60%。^⑱日文译语通过译书滔滔然流遍全国。虽有学者对生吞活剥地接受日文译词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如中国译词“德意志”,日本译为“独逸”;中国译词“美国”、“俄罗斯”,日本则分别译为“米国”、“露西亚”,这些日本译词不加修改的一并照抄,自然造成了很多的混乱。但地域的接近和文化交流的频繁,使日语译词在中国广泛流行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江庸《趋庭随笔》叙述光绪末年,日本名词盛行于世,张之洞由鄂人湘,兼管学部,“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

曰：“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成“日本土话。”当时学部拟颁一检定小学教员章程，张之洞以“检定”二字为嫌，想换一换，迄不可得，遂搁置不行。^②这里活生生地写出了张之洞既对日本新词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的窘境。而梁启超则对日本新词表示了由衷的热情：“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字。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据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擗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据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③

在1898年至1911年的13年间，大部分地理学译著的原本也是来自日本，在笔者统计的这一时期出版的157种译著中，日文原本或由日人用中文撰写的多达99种，占总数的63%。有关地理学通论与教科书共34种，其中23种来自日文；气象与气候学的6种译著，有5种来自日文；人文地理学的12种，有10种来自日文；商业地理学的12种，有8种来自日文（参见附录一）。日本译词自然大批出现在清末的地理学翻译文献中。笔者抽样统计的138个晚清地理学的新词，其中来自日本的初译名约有66个，占总数47.8%（参见本章附表）。从以下几个译词在晚清文献中的流传来看，地理学新词主要集中在1900年以后出版的与日本译书有着密切关联的文献中。^④

译 词	外国地理备考	地理全志	六合丛谈	大美联邦志略	英华字典	地志启蒙	地理初桃	地理学讲义	新地理	新尔雅	舆地学讲义	新撰地文学	普通百科新大词典
北回归线								○		○	○	○	○
背斜											○		○
冰川						○	○			○			
大陆								○	○	○	○	○	○
地壳		○	○			○	○	○		○		○	○
地峡								○	○	○	○		○
断层										○		○	○
高原		○	○			○	○	○	○		○	○	○
海岸线								○	○	○	○	○	○
海湾	○	○		○	○	○	○	○	○				○
空气			○				○	○			○		○
流域								○	○	○			
贸易风		○	○			○	○	○	○	○	○	○	○
山脉								○	○	○	○	○	○
咸湖		○											○
子午线			○					○		○	○		○
自转		○				○			○	○		○	○

20 世纪的前 10 年间所产生的异译名也最多,有些比 19 世纪西方传教士的译词贴切因而取代了前者,如“层理”之于“叠层”、“珊瑚礁”之于“珊瑚磧”、“地峡”之于“土腰”、“雪线”之于“雪界”、“纵谷”之于“直谷”、“熔岩”之于“温石”、“盐湖”之于“卤湖”、“近日点”之于“星辰近日之势”、“本初子午线”之于“第一

午线”等。而也有不少却是后出的译词反不如先出者合适,而首先被淘汰,如“冰河”、“汀线”、“常风”、“旋风”等。20世纪初从日本传来的自然地理学新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是音译词。如将 Oasis 音译为“奥昔司”,意即绿洲、沃洲。Pampas,清末给出的解释是“雨量少,不适树木之成长,惟有若干雨期,杂草茂生,至干期悉枯,仅余若干矮树,而变为一望荒凉之原野。此种地方,谓之‘本波斯’。”^④该词原出印第安语,指没有树木的原野。

第二是移译词。如“暖流”,在古代汉语中是指“温泉”,《唐诗纪事》卷三越王贞《和过温汤诗》:“坎德疏温液,山隈派暖流。”^⑤日人用来译 Warm current,清末词典的解释是:“赤道海面之水,为日所炙,流至纬度高处,而热度更高。由是上传其热于空气中,下传其热于水底。流至洋东,复回赤道。受赤道空气及水所传之热,而复西流,故水有均匀热度之性,从热处流至冷处,则使冷处增热,而变其气候。”^⑥“气象”,《梁书·徐勉传·答客喻》:“仆问古往今来,理运之常数;春荣秋落,气象之定期。”这里泛指自然界的景象。^⑦日人用此词译述 Meteor,成了大气中冷热干湿、风云霜雪等各种物理现象和物理过程的统称。“大陆”,《尚书·禹贡》:“恒卫既从,大陆既作。”^⑧系指大片陆地。日人用于译述 Continent,其义扩大为地球上面积广大而完整的陆地。这一译词的影响后来大大地超出了地理学的范围,如1902年戢元丞创办的鼓吹革命的刊物就用了一个《大陆》的刊名,在发刊词中写道:“‘大陆’云者,盖深有痛于大陆之事,而特为大声疾呼,以觉我大陆者也。凡我土著,食大陆之毛,践大陆之土,聚族而聚于大陆者,数千年于兹矣,忍弃我大陆,作犹太人之漂泊乎?忍让我大陆,为他种人之安宅乎?吾愿居于大陆

者,以欧洲大陆为师,以非洲大陆为戒,则他日支那之大陆,庶有豸乎。”^②荒川清秀指出“山脉”一词在传统汉语中是风水的用语,1836年小关三英在《新释舆地图说》中使用了“山脉”一词,1846年箕做省吾的《坤舆图识补》、1851年杉田成卿的《地学正宗》都使用了这一新词,1868年宇田川榕庵《万国地学和解》还对“山脉”作了解释。^③20世纪初“山脉”一词通过矢津昌永等的地理学译本传入中国。

第三是意译词,即利用两个以上的汉字按照汉语的原义来译述新概念,构成新词。这部分的词占有最大的数量。两个字构成的双音节新词有背斜、赤潮、地滑、地垒、地热、叠层、冻野、浮冰、干潮、公转、海蚀、海啸、河系、环礁、黄土、积云、卷云、卤湖、满潮、软风、熔岩、山崩、水圈、水蚀、台地、地峡、小潮、褶曲、雪界;三个字构成的三音节新词有背斜谷、标准时、潮候时、赤道流、大气圈、大洋岛、等高线、等深线、等温线、等压线、分水界、火山岛、季候风、近日点、陆半球、贸易风、气象学、热带林、熔岩丘、三角江、水半球、水平线、造山力等;三个字以上构成的多音节新词有北回归线、本初子午线、海底形势、火山口堆、南回归线、风化作用、沿岸成层、洋海平流、森林植物带、自然地理学等等,笔者统计的138个自然地理学新词的初译名和异译名两部分中,来自日本的68个新词至今仍在中国地理学界通用,占总数的49.3%。

中国传统地理学侧重于地理沿革的考订和社会历史的记述,而比较忽视对于自然地理环境本身的形态及其变化规律的探索,因此汉语中有关自然地理学的词汇比较少,在译述西方自然地理学知识时,所能利用的词汇库存非常有限。晚清自然地理学新词的大量增加,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地理学的词汇库。

现代中国地理学界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些地理术语,如大陆(Continent)、断层(Fault)、河床(River bed)、流域(Drainage basin)、气温(Air temperature)、气压(Atmospheric pressure)、区域(Regional)、山脉(Mountain range)、山系(Mountain system)、半岛(Peninsular)、雨量(Rainfall amount)、海岸线(Coast-line)、降水量(Amount of precipitation)、三角洲(Delta)、水平面(Horizontal plane)、大陆性气候(Continental climate)等等,都在20世纪初的前十年已出现在中文地理学文献里(参见本章附表)。大量新词的产生,使知识点空前的汇聚,这既是晚清地理学范式变革的需要,也是中国地理学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的结果。这些赋予了近代意义的新词使许多传统地理学中不曾有过的新概念得到了表述,一些复杂而深刻的近代地理学思想也能通过汉语直接得以表达。每一个新词都有意义比较严密的定义,而且这种定义又有了国际上的共同界定。地理学语汇的国际化,又大大加快了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传播的速度,清末地理学发展加速度的形成和地理学体系的构建,都与大量地理学新词的涌现有着密切的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理学术语还又越出了地理学的领域,一度成为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影响的用语,如“层累”(Stratigraphic sequence)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意为重叠,明代王铨《春芜记·献赋》中有“见巫山互折,步巉岩层累,下临沧漭”。清代龚自珍《最录禅波罗密门》有“层累盘旋,如鸟道而渐上”。^①1854年《遐迩贯珍》所载《地质略论》一文,首次将“层累”作为地理学术语译出,该文写道:“凡地面平野及山麓、海滨、壑谷内之磐石泥沙,排有层累。此层或横或纵,甚有次序。”^②这里“层累”有了“逐层积累的”层序之意。1857年第2期《六合丛谈》上刊出的慕维廉的《地理》中也使用了这一移译

词。1889年孙维新在回答“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一文中提到：“地学考地壳之层累，可藉以推占古今之变迁。”^③1886年出版的《地志启蒙》、1899年出版的《地理初栲》和《地学指略》（文教治口译、李庆轩笔述）中都反复出现过“层累”和“层累石”的译词。“层累”这一地理学译词，在清末民初开始越出地理学的领域，在知识界流行。严复的《救亡决论》中写道：“今夫生人之计虑智识，其开也，必由粗以入精，由显以至奥，层累阶级，脚踏实地，而后能机虑通达，审辨是非。”^④1922年顾颉刚开始酝酿“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1923年他将这一观点的论文发表在《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第9期上，引起了学界的不小震动，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与讥笑，也得到了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支持。1938年杨宽改定《中国上古史导论》，专门讨论了“论层累造成说”，指出“层累造成之古史观，最为近人所称道。”^⑤奇怪的是，“层累”一词在50年代以后却渐渐地消失了。再如“世界”一词，原来自佛经，《楞严经》：“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可见“世”指时间，“界”指空间。世界本来是包括时间、空间来说的，相当于汉语中的“宇宙”。在佛经里，世和界的分别很严格。“三世”指过去、未来和现在；“三界”指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后来“世”的意义渐渐被“界”所吞并，《智度论》和《俱舍论》的“大千世界”就是只指空间而言。^⑥早期传教士的译著也采用“全地”、“四海”、“红尘”、“万国”、“普天下”、“通天下”来译 World，20世纪初留日学生等译出的《世界地理》、《世界地理志》等地理学著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后“世界”这一新词渐渐取代“万国”等其他过渡译名，成

为整个社会使用最频繁的新词之一。20世纪初以“世界”命名的杂志仅在上海就有1901年的《教育世界》；1902年的《新世界学报》、《翻译世界》和世界繁华报馆；1903年的《童子世界》和《科学世界》；1904年的《女子世界》；1906年的《新世界小说社报》，1906年李石曾还在巴黎创办了“世界社”。从地理学的新词变迁和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西方地理学知识在晚清的传播和扩散，也许能有效地将西方地理学在中国影响的研究切入更深的层面。

注释：

- ① [意]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载《几何原本》，同治四年（1865）金陵书局版，页6—7。
- ② [日]荒川清秀《地理学用语的系谱（1）——以中国洋学书为中心》，载《文学论丛》（爱知大学）1996年。
- ③ 本表参据荒川清秀著《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中心》，白帝社1997年，页53—58绘制；略作变通。
- ④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合订本，页922。
- ⑤ 参见《钦定热河志》，乾隆四十六年（1781）；此一线索为邹逸麟先生提供。
- ⑥ 罗常培著《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89年，页33。
- ⑦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页111；“台风”在德文里作“Taifun”、法文里作“Typhon”，后者似乎就是《神权史》中的“泰丰”。但也有认为“台风”不是外来词，“台”字与广东口音“大”字相近，广东人“大风”的发音，别处人听作“台风”。李荣认为“颱风”是从“风颱”转变过来的，“风颱”、“风台”始见于1566年的《荔镜记》（参见李荣著《颱风的本字》上中下，载《方言》1990年第4期、1991年第1、2期）。

- ⑧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 1983 年，页 329。
- ⑨ 罗森《日本日记》，载《遐迩贯珍》1854 年 11 月。
- ⑩ [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年，页 110。
- ⑪ 同上，页 268。
- ⑫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页 199。
- ⑬ 周振鹤著《逸言殊语》，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8 年，页 219。
- ⑭ [英]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 1954 年，页 14—16。
- ⑮ 参见周振鹤著《逸言殊语》，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8 年，页 92—93。
- ⑯ [日]增田涉著、由其民等译《西学东渐与中日文化交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年，页 17—19。
- ⑰ 柳原前光(1850—1894)，日本外交官。1869、1871、1872 年曾三次来华，1874 年任驻华公使；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 43，载《清碑传合集》(四)，上海书店 1988 年，页 3 631。
- ⑱ 汪向荣著《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页 23—24。
- ⑲ 钱存训著、戴文伯译《近世译书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文献》1986 年，第 2 期。
- ⑳ 参见王晓平著《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年，页 267。
- ㉑ 梁启超《论译书》，载《翻译研究论文集 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年，页 19—20。
- ㉒ 本表绘制过程中参考了[日]荒川清秀著《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中心》，白帝社 1997 年，页 269—271 的《地理学书与辞书的用语》一表。
- ㉓ 黄人编《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上海国学扶轮社 1911 年，丑集，页 81。
- ㉔ 《全唐诗》第 6 卷，中华书局 1990 年，第 1 册，页 66。

- ②⑤ 黄人编《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上海国学扶轮社 1911 年，酉集，页 45—46。
- ②⑥ 《二十五史》第 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合订本，页 2061。
- ②⑦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08 年，页 147。
- ②⑧ 《大陆发刊词》，载《大陆》1902 年 12 月，第 1 期。
- ②⑨ 此据荒川清秀《日中学术用语的创制和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主》，“晚清西学译介”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影印本，德国哥廷根 1999 年 12 月。
- ③⑩ 转引自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 4 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9 年，页 61。
- ③⑪ 《地质略论》，载《遐迩贯珍》1854 年 4 月 3、4 号合刊。
- ③⑫ 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己丑年，上海书局 1897 年石印本。1906 年出版的《最新地文图志》论述空气折光时写道：“特空气之层累不同，疏密亦异，物之光线，时或被折，时或倒映，所成之象，故有倒正之别。”
- ③⑬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页 40。
- ③⑭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 7 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页 97。
- ③⑮ 参见王力《汉语史稿》，载《王力文集》，第 9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8 年，页 674—675。

附表：《晚清西方自然地理学新词表》

- (1) 本表按初译名汉语拼音的次序排列先后。
- (2) “首见文献”栏的著译者可参见附录一、附录二；凡同名译著两本以上者注明出版社。
- (3) “今译名”主要参据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年版《地理学词典》的有关条目。
- (4) 表中“新词典”是“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的缩略词。

英文名	初译名	首见文献 (成书年代)	异译名,文献例 证(成书年代)	今译名
Underwater reef stone	暗礁	职方外纪 1623		暗礁
Oasis	奥昔司	新词典 1911		绿洲、沃洲
Peninsular	半岛	英华字典 1866—69	杭地,外国地理备考 1847;土 股,地质略论(遐迩贯珍)1854	半岛
North pole	北极	坤舆万国全图 1602		北极
Arctic circle	北极圈	坤舆万国全图 1602		北极圈
Anticlinal valley	背斜谷	新词典 1911		背斜谷
Anticline	背斜	新尔雅 1903	背斜褶曲,新词典 1911	背斜
Pampas	本泼斯	新词典 1911		潘帕斯
Standard time	标准时	新词典 1911		标准时
Transportation	剥挟土 石诸质	西学三通·西艺通考· 地学考 1902	运搬营力,新词典 1911	搬运作用
Tidal establishment	潮候时	新词典 1911		潮候时

续表

英文名	初译名	首见文献 (成书年代)	异译名,文献例 证(成书年代)	今译名
Red tide	赤潮	新词典 1911		赤潮、红潮
Equator	赤道	坤輿万国全图 1602		赤道
Equatorial currents	赤道流	新词典 1911		赤道海流
Continental climate	大陆气候	地理学讲义 1901	大陆性气候,世界地理(作新社 版)1902	大陆性气候
Ocean island	大洋岛	新词典 1911		大洋岛、海洋岛
Continent	大洲	续地理撮要论(遐迩贯 珍)1855	大陆,世界地理(作新社版)1902	大陆
Fresh water	淡水	地理全志 1954		淡水
Contour line	等高线	新词典 1911		等高线
Depth curve	等深线	新词典 1911		等深线
Isotherm	等温线	新尔雅 1903	同寒暑线,源寰全志 1903;同候 线,最新地文图志 1906	等温线
Isobar	等压线	新尔雅 1903	同压线,最新地文图志 1906	等压线

续 表

英文名	初译名	首见文献 (成书年代)	异译名;文献例 证(成书年代)	今译名
Prime meridian	第一午线	外国地理备考 1847	本初子午线,世界地理(作新社 版) 1902;万国子午线,新尔雅 1903	本初子午线
Rock slide	地滑	新词典 1911		滑坡、塌方
Geography	地理学	日本杂事诗(黄遵宪) 1879		地理学
Horst	地垒	新词典 1911		地垒
Surface	地面	坤舆图说 1674		地面
Level surface	地平垂线	格物入门 1868	水平线、铅直线,新词典 1911	水平线
Horizon	地平线	坤舆万国全图 1602	地平面,英华萃林韵府 1872	地平线
Earth crust	地壳	地理全志 1954		地壳
Earth	地球	坤舆万国全图 1602		地球
Atmosphere	地球周围 之气	英华字典 1866—69	气层,新撰地文学 1908;大气 圈,新词典 1911	大气圈
Geotherm	地热	新词典 1911		地热

续表

英文名	初译名	首见文献 (成书年代)	异译名,文献例 证(成书年代)	今译名
Physiography	地文学	地文学问答 1903		地文学
Ground water	地下水	地理质学启蒙 1886		地下水
Land form	地形	地理全志 1854		地形
Geomorphology	地形学	新词典 1911		地貌学
Earthquake	地震	职方外纪 1623	地动,英华萃林韵府 1872	地震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坤輿万国全图 1602		地中海
Bedding	叠层	西学三通·西艺通考· 地学考 1902	层理,新词典 1911	层理
Eastern hemisphere	东半球	地球图说 1761		东半球
Tundra	冻野	新词典 1911		冻原、苔原、冰沼
Fault	断层	西学三通·西艺通考· 地学考 1902		断层
Member	段丘	新词典 1911		段

续表

英文名	初译名	首见文献 (成书年代)	异译名,文献例 证(成书年代)	今译名
Cumulus	堆垒之云	英华字典 1866—69	积云,最新地文图志 1906	积云
Squar mile	方里	地理全志 1854		平方英里
Azimuth	方位	地志启蒙 1886		方位
Divide line	分水界	新撰地文学 1908		分水线
Drift ice	浮冰	西学三通·西艺通考· 地学考 1902		流冰、淌凌
Low water	干潮	新撰地文学 1908		低潮、干潮、枯潮
Plateau	高原	地理全志 1854		高原
Revolution	公转	万国地理志 1902		公转
Valley wall	谷侧	新词典 1911		谷侧、谷坡、谷壁
Beach	海边、海滨	英华字典 1866—69	滩边,英华萃林韵府 1872;海 滩,地理初枕 1899	海滩
Coast-line	海岸线	地理学讲义 1901	汀线,新撰地文学 1908	海岸线

续表

英文名	初译名	首见文献 (成书年代)	异译名, 文献例 证(成书年代)	今译名
Submarine geomorphy	海底形势	西学三通·西艺通考· 地学考 1902	海底地形, 新词典 1911	海底地貌
Trench	海谷	地志启蒙 1886		海沟
Marine erosion	海蚀	新词典 1911		海蚀
Strait	海峡	职方外纪 1623	海腰, 续地理撮要论(遐迩贯珍) 1855	海峡
Tsunami	海啸	新撰地文学 1908		海啸、地震 波浪、津浪
Gulf	海湾	外国地理备考 1947	海股, 地质略论(遐迩贯珍) 1854	海湾
Frigid zone	寒带	乾坤体义 1605	冷带, 职方外纪 1623; 寒道, 地 理全志 1854	寒带
Thermometer	寒暑针	英华字典 1866—69	寒暑表, 格物入门 1868	寒暑表、温度表
River bed	河床	西学三通·西艺通考· 地学考 1902		河床、河槽
Stream system	河系	西学三通·西艺通考· 地学考 1902		水系

续表

英文名	初译名	首见文献 (成书年代)	异译名,文献例 证(成书年代)	今译名
Longitude	横度	坤輿万国全图 1602	经度,地理全志 1854	经度
Cross-valley	横谷	地理全志 1854		横谷
Atoll	环礁	新撰地文学 1908		环礁
Loess	黄土	新词典 1911		黄土
Volcano	火山	职方外纪 1623		火山
Volcanic island	火山岛	新词典 1911		火山岛
Mud volcano	火山口堆	西学三通·西艺通考· 地学考 1902	泥火山,新词典 1911	泥火山、假火山
Amount of precipitation	降水量	新词典 1911		降水量
Perihelion	近日之处	英华字典 1866—69	星辰近日之势,英华萃林韵府 1872;近日点,新词典 1911	近日点
Meridian	经线	坤輿万国全图 1602	午线,英华萃林韵府 1872	经线
Cirrus	卷云	最新地文图志 1906		卷云
Air	空气	地理全志 1954		空气

续表

英文名	初译名	首见文献 (成书年代)	异译名,文献例 证(成书年代)	今译名
Neap tide	两弦潮汐	英华字典 1866—69	小潮,新词典 1911	小潮、方照潮
Drainage basin	流域	地理学讲义 1901	灌域,世界地理(作新社)1902	流域
Land hemisphere	陆半球	地理初栲 1899		陆半球
Saline lake	卤湖	地理初栲 1899	盐湖;地理学讲义 1901	盐湖
High tide	满潮	新尔雅 1903		高潮
Trade-wind	贸易风、 恒风	地理全志 1854	恒信风,博物新编 1854;通商 风,格物入门 1868;常风,新尔雅 1903	信风、贸易风
South pole	南极	坤舆万国全图 1602		南极
Antarctic circle	南极圈	地理(六合丛谈)1857	南圆线,英华萃林韵府 1872	南极圈
Landslide	泥石冲落	英华字典 1866—69	山崩,新撰地文学 1908	山崩
Warm current	暖流	新词典 1911		暖流
Exrusive rock	喷火	职方外纪 1623		喷火岩、熔岩

续表

英文名	初译名	首见文献 (成书年代)	异译名,文献例 证(成书年代)	今译名
Caldera	破裂	新词典 1911		破火山口、 巨火山口
Climate	气候	职方外纪 1623	风土、地气,英华萃林韵府 1872	气候
Sea breeze and land breeze	气候卓越风	日本地理志 1901	软风,新撰地文学 1908	海陆风
Meteorology	气奇象论	英华字典 1866—69	气象学,气象学略史(科学世界) 1903	气象学
Air temperature	气温	气温浅说(科学世界) 1903		气温
Meteor	气象	气象学略史(科学世 界)1903		气象
Atmospheric pressure	气压	新尔雅 1903		气压
Regional	区域	地理学讲义 1901		区域
Torrid zone	热带	乾坤体义 1605		热带
Tropic of cancer	热带北线	英华字典 1866—69	北回归线,新尔雅 1903	北回归线

续表

英文名	初译名	首见文献 (成书年代)	异译名, 文献例 证(成书年代)	今译名
Tropical rain forest	热带林	新词典 1911		热带雨林
Tropic of capricorn	热带南线	英华字典 1866—69	南回归线, 新尔雅 1903	南回归线
Lava dome	熔岩丘	新词典 1911		熔岩穹丘、穹状火山、钟状火山
Triangulation bay	三角江	新词典 1911		三角湾
Delta	三丫江口	英华字典 1866—69	三角洲, 新尔雅 1903	三角洲
Vegetation zone	森林植物带	新词典 1911		植被带
Glacier	山谷冰	英华萃林韵府 1872	冰川, 地理质学启蒙 1886; 冰河, 新尔雅 1903	冰川
Mountain range	山脉	新尔雅 1903		山脉
Mountain system	山系	西学三通·西艺通考·地学考 1902		山系
Coral island	珊瑚岛	地理全志 1854		珊瑚岛

续表

英文名	初译名	首见文献 (成书年代)	异译名,文献例 证(成书年代)	今译名
Coral reef	珊瑚礁	地质学启蒙 1886	珊瑚堤,最新地文图志 1906;珊瑚礁,新撰地文学 1908	珊瑚礁
Equation of time	时差	坤舆图说 1674		时差
World	世界	日本游记(遐迹贯珍) 1854	四海、普天下,英华萃林韵府 1872	世界
Sea level	水半球	新撰地文学 1908		水半球
Horizontal plane	水平面	新词典 1911		水平面
Hydrosphere	水圈	新词典 1911		水圈
Water erosion	水蚀	新词典 1911		水蚀
Platform	台地	新撰地文学 1908		台地、高原
Typhoon	台风	《福建通志》56 卷 1684	旋风、大旋风,格物入门 1868	台风
Cape	土角	续地理撮要论(遐迹贯珍)1855		岬角、地角

续表

英文名	初译名	首见文献 (成书年代)	异译名,文献例 证(成书年代)	今译名
Isthmus	微地	地球全图之总论(东西 洋考每月统纪传)1834	土腰,续地理撮要论(遐迹贯珍) 1855;地峡,新尔雅 1903	地峡
Lava	温石	英华字典 1866—69	熔岩,新尔雅 1903	熔岩
Five zone	五带	坤舆万国全图 1602		五带
Western hemisphere	西半球	地球图说 1761		西半球
Salt water lake	咸湖	地理全志 1854	咸水湖,地志启蒙 1886	咸湖
Erosion	消磨作用	新词典 1911	风化作用,地力说(地学杂志) 1911	侵蚀作用
Fold	斜直弯 曲之层	西学三通·西艺通考· 地学考 1902	褶曲、新撰地文学 1908	褶皱
Snow-line	雪界	地理初阶 1899	雪线,新词典 1911	雪线
Monsoon	时风	英华字典 1866—69	薰风,英华萃林韵府 1872;季候 风,世界地理(作新社)1902;节候 风,新词典 1911	季风

续表

英文名	初译名	首见文献 (成书年代)	异译名,文献例 证(成书年代)	今译名
Littoral mound	沿岸成层	新词典 1911		沿岸堤
Coasting marine	沿海	英华字典 1866—69		沿海
Ocean current	洋海平流	西学三通·西艺通考· 地学考 1902	洋流,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屠寄) 1905;海流,新词典 1911	海流、洋流
Rainfall amount	雨量	世界地理 1902		雨量
Orogeny	造山力	新词典 1911		造山运动
Meridians	子午线	坤舆万国全图 1602	午线,外国地理备考 1847	子午线
Physical geography	自然地理学	地理学讲义 1901		自然地理学
Rotation	自转	地理(六合丛谈)1857		自转
Temperate zone	正带	坤舆万国全图 1602	温带,职方外纪 1623;温道、地 理全志 1854	温带
Latitude	直度	坤舆万国全图 1602	纬度,地理全志 1854	纬度
Longitudinal valley	直谷	地理全志 1854	纵谷,新词典 1911	纵谷

第五章 清末的地理学教育与近代 地理学教科书的编纂

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在清末社会转型时期,新知识和新观念的传播,新式学堂是一条直接而具体的通道。清末的地理学教育是将西方传入的地理学新知识加以有目的有意识地传递与保存,将一种新的地理学的知识图式通过有序的方式进行文化普及。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地理学教育,还远远落后于欧美和日本,以往学者在考察西学输入的影响时,较多分析的是晚清知识阶层中的接触西学的那一部分精英的思想观念,而于一般社会阶层的知识状况很少注意。而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准往往却是为后者所左右的。19世纪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引进,一般社会阶层的地理学知识的水平并不是与那一部分知识精英同步发展的。由于获得传播信息的机会和速率的差别,精英阶层和一般社会阶层的地理学知识水平的差距可能变得愈来愈大。19世纪末一些思想家,如薛福成、康有为等都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本章试图通过对地理学教育观念、地理学教育内容和方法、地理学教科书编纂之变革的分析,探讨这一地理学新式教育的产生、发展与近代中国人思想观念变化的互动关系。

一、教会学校中的地理学教育

1818年马礼逊在南洋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其宗旨“一则造就欧人学习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字;二则举凡恒河外方各族,即中国、印支及中国东岸诸藩属之琉球、高丽、日本等民族,其就读于中文科者皆能以英语接受西欧文学及科学之造就。”并要用英国语文授以地理、历史、数学等课程。原计划是招收中学或中学以上程度之学生,故称之为书院(College)。1843年迁港,1856年停办。^①后来参与过林则徐主持的《四洲志》等书翻译活动的重要译员袁德辉,1825年起曾在英华书院读了两年书。^②1840—1844年曾在该校任院长的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在该校执教时曾编写过《智环启蒙塾课》(Graduated Reading)一书,1856年出版。该书共分24类200课,内容分为人类、国政、贸易、居住、饮食等,其中第13类包括地面分形论、土之分形论、水汇论、地之质体论、天气诸天论、宇宙论、地极论、地之运动论、地球分域论、天气论、四方论、赤道论、热带论、二寒带论、二温带论、诸带土人论、寒暑道论、诸寒暑道土产论等。该书中英文对照。后删削英文,1859年有广州版,1864年香港再版,1867年有日本江户开物社训点翻印本,题为《翻刻智环启蒙》;1870年有沼津学校版,题为《智环启蒙》;1872年有瓜生寅版,题为《启蒙智慧乃环》;1873年有石川县学校版,题为《智环启蒙和解》。1883年香港中华印务局有英汉对照本。早期教授地理学的还有马礼逊学校。1835年郭实猎夫人在女校附设了马礼逊纪念学校,1839年在澳门正式开课,主持校务者为美国人勃朗。根据马礼逊教育

会第三届年会报告,1839年有学生6人,1841年为17人。后来成为中国风云人物的容闳是1841年入该校,他在自传中写道:“先我一年而入者已有五人,黄君胜、李君刚、周君文、唐君杰与黄君宽也。校中教科,为初等之算术、地文及英文。”勃朗采用的课本有柏利(Perley)的地理学。1842年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设有4个班,学生共32人,英文科包括了天文、历史、地理、数学、作文等课程。^③

教会学校最初发展的速度并不很快,据1852年的报告,在江南地方的耶稣会派办有七、八所学校,学生总数达1260人。^④至1866年,全国还只有各种基督教义学19所,学堂44所,学生总数还不到千人。^⑤

地 区	义学数	学生数	学堂数	学生数
广东	3	36	10	268
香港	4	60	4	60
汕头	1	15	1	22
厦门			7	70
福州	4	46	3	63
宁波	2	40	7	84
上海	2	32	5	42
烟台			1	6
登州	1	5	1	6
天津	1	6	4	55
北京	1	8	1	20
合计	19	248	44	696
备注	全给衣食	全给衣食	只给师俸	

据 1877 年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报告,从 1842 年至 1877 年全国基督教办的学校有 350 所,学生 5975 人。^⑥人数虽然仍有限,但对于传统的教育来说,这是一股异己的力量。与这种教育相适应,1877 年 5 月上海举行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会上通过由狄考文、林乐知等发起成立的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又称益智书会,该会的英文名称为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建议组织这一委员会的初衷是为当时各教会学校编辑教科书,委员有丁韪良、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傅兰雅等,傅兰雅被推举为干事。该会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为编辑出版教科书,一为建立统一的译名。经过委员会数次商讨,初步决定编初级和高级的两套教材。包括数学、天文、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科目。^⑦益智书会要求教科书应通俗易懂,不仅能教育读者,还可被教师用来进行教学;不是译作而是原作,要对本学科中某些外国最好的著作进行比较,选择一本最适宜的作为基础,然后把自己对逐个文化的了解与手头的工作结合起来,“以便编写出将对中华民族产生强大影响的书籍”。最重要的还有“应在使这些书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的同时,抓住一切机会引导读者注意上帝,罪孽和灵魂拯救的全部事实”。科目中就包括有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宗教地理以及自然史。^⑧据 1890 年傅兰雅报告该会历年来的成就,14 年中自行编辑出版的书籍共 50 种、74 册及图表 40 幅。另外,还审定合乎学校使用之书 48 种、115 册。两项合计共 98 种、189 册。其中以自然科学为最多。算学类 8 种,科学类 45 种,历史类 4 种,地理类 9 种,道学类(包括哲学与宗教)19 种,读本类 1 种,其他 12 种。以上各类书籍,至 1890 年共计出版了三万余册,售出者

约占其半,约一万多册。^⑨1889年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数增加到16836人^⑩,可见该会教科书的编写是与教会教育的发展同步的。

当时有不少教会学校中设有地理课程,如1881年中西书院课程的第三年就有“各国地理”;1900年有人调查过华南华东中华北五个美国教会女塾的课程,全部设有地理课程;有一所还开设“人文地理”。^⑪上海中西女塾章程规定第三年的格致课是学地理志,第四年是地理志和地势学,这些课本或用英文,或用中文。^⑫与此相配合由益智书会经费出版的35种教科书中,傅兰雅所编写供初级中学或高等小学使用的图说(Wall Charts with Hand Books)有13种,占37%,傅兰雅自费出版的供初级中学或高等小学使用的大纲性图书有28种。也有统计称其中有12种是科学方面的,5种是附有手册的科学知识挂图,有8种科学须知。^⑬其中有关地理学的有1882年出版的《地志须知》,该书分6章,第1章略释地势名义;第2章论亚细亚洲各国;第3章论欧罗巴洲各国;第4章论阿非利加洲各国;第5章论亚美利加洲各国;第6章论太平洋列岛。傅兰雅在“总说”中强调了人类对于世界地理知识由点到面,由片面到全面的逐渐拓展的过程:“窃以不登山者,不知泰岱之高;不赴海者,不知沧溟之深。况人各处一方,何能遍知地球之大也。如数十年前,东方数处,未知有泰西诸国,数百年前,西人未知有西半球之地。是因水远洋宽,帆船所难通也。今则轮船既造,行海如衢,游览人等,无往不到。每到一处,即阅其地上之形势,访其人民之风俗,查其物产之多寡,一一记于书中,是谓之地志。”^⑭在1883年出版的《地理须知》一书中,傅兰雅指出,从广义上看,“地理一学,所该甚广。如地

质、地势、矿石、水泽、空气以及光热雷电、吸力、草木、禽兽、人类等,莫不属乎地理,盖地所以载物也。凡此诸事皆不能离乎地也。”这里傅兰雅对地理学概念的理解,与慕维廉颇为相似。但他又认为如以这样一个概念去写一本小册子,“不惟篇幅难容,而且不易细论”,因此《地理须知》中仅选择“地理之紧切者”来讨论。该书分列6章,第1章略论地势,叙述陆地之形势、洲岛之来源以及山岭峰峦天生之形状、火山地震自然之事理;第2章略论空气,叙述天时之所以冷热、气候之所以燥湿、风之所以动荡吹嘘、颶之所以狂旋猛掠的原因;第3章略论雨雪,叙述露、霜、雾、云、雨、雪、雹各理;第4章略论水源,剖释泉源、湖泊、洋海、江河的成因;第5章略论潮浪,叙述潮汐之涨退、波浪之大小以及半流之情形等;第6章为地理总论,叙述地球各事,恒相运用动作,各尽其职,以备生长植物,繁衍动物,养育人民而显大造之奇功。地理“各事形性细微”,傅兰雅计划用“专书”“依类分陈”,最关键的是,中国读者可以通过此书所绘制的地理学知识线,了解“西国地理大略”,能使中国人把真正意义上的地理学与“中土堪舆家专以地脉、风水、阴阳、宅寓愚惑庸众者”区分开来。^⑮

19世纪70年代以后,教会学校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到了90年代很多学校还提高了层次。当然有的学校自命为大学,实际上并没有学生在攻读大学课程,更多的学校是小学、中学、初级学院混同一校。圣玛利亚女书院就是初级、备级、正级课程齐备的12年制学校。据《圣玛利亚女书院章程》,其备级课程第一、第二年有“训蒙地理志”上下;第三、第四年有“地理志略”的课程;正级第一、第二年有“地理初栢”课程。^⑯镇江女塾也是一所12年制的学校,其功课表列出第一年有“地理

口传”,第二年有“地球风俗”,第三年有“地理初阶”,第四年有“蒙学地理”,第七年有“地理志”,第八年有“地势略解”,第九年有“地学指略”,^⑩这里的课程名称与当时一些流行的教科书读本完全一样,如美国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编译、赵如光笔述的《地理志略》(美华书院 1882 年版)、美国李安德(Leander W. Pilcher)著《地势略解》(1893 年汇文书院排印本)、美国孟梯德著、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编译的《地理初阶》(上海美华书馆 1899 年版),这些学堂很有可能采用了这些译著作为本校的教科书。《圣约翰书院章程》则明确地列出了该校使用的教材,如第一、第二年地理志采用孟梯德的著作;第三年地理志采用富莱的著作。^⑪

20 世纪 20 年代,程湘帆在《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成立之经过》一文中指出:“这委员会颇能供给当时的需要,所编译的教科书为数也不少,中间大半属自然科学、算学、西洋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就现在的眼光考量起来,这些书籍的价值似乎有限,但在五十年前,实为创作。我国新学的机括,实在起端在这里。讲到委员会事业的目的不过满足当时教会学校的需求罢了,但是对我国教育和新文化的间接贡献却是极大的。”^⑫特别是西方传教士编写的教科书,正像美国学者卢茨所指出的,一改中国人历来轻视分级启蒙读物的传统,而力求能使教科书适合学生的智力水平。他们不仅仅翻译,而且要用“中国的例子和图解来加以改编。虽然这种理想在 19 世纪并不完全能够实现,但传教士教师出版了许多种类的书籍,从而为引进西方知识作出了贡献。”^⑬王建军也认为,这些教科书的编辑与出版,不仅顺应了教会学校发展的需要,而且正式揭开了近代教科书发展的帷幕;它开始注意到中小学教学

的需要,不仅在形式上有了图说一类的课本,而且在内容上开始着手将科学名词规范化和科学知识条理化,为近代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最早的范本。^②

二、清末近代学制的变迁和 地理学教育体系的确立

清末在中国学校中开设地理课程可追溯到 19 世纪 60 年代的京师同文馆,从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年就有了“讲各国地图”的课程,第六年有“航海测量”,第八年有“地理”。^③以后一些学堂也有舆地课程,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等。1870 年上海广方言馆的课程中有“译舆图以参实测”一条,认为“今之讲求实学者,咸知究心舆图。大而规画形势,小而详志都邑;远而测度经纬,近而准量丈尺。以至演炮取准,皆凭测算,而莫要于按图行船。……今西人用经纬仪测量,所置酒准佛逆最为得法。立表重测,出自《海岛算经》。行船则用纪限仪,取其便于手测,不必择地安置。近从外洋购得中国沿海各图,自盛京以至广东,长江则自扬子江以至岳州,图之外又详以说,西人行船,奉为指南。”^④1882 年,黎兆棠致张树声的信中就提及了福建船政学堂的“地舆图说”和“航海全书”的课程,^⑤显然,对于这些培养外语和航海技术人才的学堂来说,设置地理课程主要是为了学习驾驶技术或便于译出西方舆图,作为实际航船的指南。

19 世纪 60 年代到甲午战前,中国近代的学堂发展极其缓慢,到 90 年代中期,约只有 20 多所,而且大部分学堂中西学课程实在只有中小学的水准。19 世纪 80 年代郑观应就提

出“仿照泰西程式”，广设大小学堂，建议“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并设立“艺学科”，培养天文、地理、测算、制造的人才。^⑤甲午战后兴学堂、废科举成了中国知识群体的普遍要求，1895年公车上书后的一年半左右时间里，主张兴学的奏折至少有20多份。报刊杂志也以鼓吹兴学为重要内容。《时务报》发表这类文章53件，《湘学新报》35件，《利济学堂报》49件，《集成报》127件，《知新报》139件。1895至1899年，全国共兴办学堂越150所，其中1895年3所，1896年14所，1897年17所，1898年5月以前14所，戊戌变法期间达106所，估计全盛时期学生总数达到万人。^⑥与新式教育相配套，一些学堂也开设了新式地理课程，如求是书院、沅水校经书院、两湖书院、广雅书院等。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除了学习传统课程外，还要学习“各国语言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⑦1897年张元济创办的通艺学堂的文学门课程中有“舆地志”。^⑧戊戌维新时期，清政府曾一度明令废八股、诗赋、小楷取士制度，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1901年第二次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和废除武试。1903年，张之洞和张百熙、荣庆《奏请递减科举折》，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1905年，许多封疆大吏，如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人，联名奏请立停科举。他们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在各方的压力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⑨于是新式学堂数量猛增，据《教育世界》所载学部的统计：从1903年至1909年的七年间，学校由719所增加到52348所；从1902年至1909年的八

年间,学生由 6 943 人增加到 1 560 270 人。^①此据当时另一份可参照的教育统计图表列表如下:^②

年份/类别	学堂及教育处所	职员数	教员数	学生数
1907	37 672	59 359	63 556	1 013 571
1908	47 532	77 432	73 703	1 284 965
1909	58 896	95 820	89 362	1 626 720

还有统计表明,到 1912 年,全国共有学堂 87 272 所,在校学生 2 933 387 人。另据中华教育改革社在 1924 年公布的《中国教育统计概览》所载,清末学生总数(教会学校学生未计在内),1906 年为 486 220 人,1907 年为 883 218 人,1908 年为 1 144 799 人,1909 年为 1 536 909 人。^③

中国近代地理学教育的发展与清末学制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很早就有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私塾和社学等教育机构组成的传统教育体系。明清以来,除社学稍作一些普及教育外,其余均是以科举为中心展开的。其教学的中心内容是为培养封建官吏做准备的四书五经。这种以科举的知识为学问的教育,被日本学者依田熹家概括为一种“选拔、达到目的型的教育”。^④这种教育的最大弱点就是把教育的目的变得非常狭隘,使学问变成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程式化的考试又使应考者陷入一种痛苦的境地。而且造成了一旦目的达到,教育就似乎完成的错觉。既然地理不作为科举的内容,因此没有学者愿意在地理学上化大力气,“地理至难详明,夙昔治科举之士,什九不措意于此,一二博学者则又沾沾考古,而于现在之略不讲求。”^⑤鸦片战争后,这种“选拔、达到目

的型的教育”的弱点日益明显。改革科举制度,加试实用科学的呼声此起彼伏。地理学的实用价值也日益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1898年编译《坤輿撮要问答》的孙文楨认为:“欧墨二洲之人,性多聪慧。其童子束发就傅书算之后,研核地图,若者邦,若者部,若者名山大川,目极寰宇,如数家珍。较之辘轳使者,握槩怀铅,遍历万方,采其风俗形势以备掌故,尤加详焉。是以西人之行商也,未出家而遐方巨埠,如在目前,长行无阻,宜其贸迁有无,易获什一之利。西人之应制也,文词国史之外,精考地理,故凡为文人,必通图籍。而行船管舰之俦,尤当精参是学。其所以涉重洋,制强敌,称雄异地,虎瞰邻封,要以地学是赖。其他农夫、工匠、村姬、灶妾,亦知輿地崖略。每谈外国时事,口若悬河,……我华人专重词章,罕及杂艺;诗书帖括之余,不究四维八极。惟自道、咸间中外通商,西人纷至,始知中国之外,尚有俄、英、意、德、法、荷、美、奥、班、葡诸国。其人之学问制作,多有精于我者。然问英何在?法何在?而士林中人茫然不知所答,甚有名列贤书,谓英、法在我国南者,昏昧至此,令人绝倒!”^⑤康有为指出:由于中国学校里不传授“地球剖辟、五洲大通、万国旁薄”的学问,“故俄之割精奇里江、哈滚江、混同江、乌苏里之地六千里,中人皆若未知之。近者俄界黑顶子巴未尔之案出,举国茫然。割澳与葡,大臣有以为在星架坡之东者。日本之人我疆边也,探报地名,吾大臣皆不之识,至待问之洋教习,为彼所訕。若夫割野人山地于英也,吾使者不知,待询于英之外部;割滇界土司于法也,大臣不知中边,至割腹里土司于法人。至夫词馆之英不知中国省会郡邑之东西,疆土之吏不知全地外国之名号,其他更不足责已。譬由旧家遗产甚多,子弟甚愚,至不能按其图契,其为人

盗卖欺占也固宜。推原其由,皆学校仅课举业不讲地理之故。童子不习,士人不讲,则公卿大臣皆由此出,宜其闻名罔然,窥图索然也。……(泰西)童崽之子摹印地图,有文书可诵,远近南北,指画如流。日人效之,皆有小学、中等地理之书,以遍智其国民,有教科,有问题,故非博雅士考据之谓教,凡农工商人皆通之谓教也。”^⑤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会奏变法自强第一折》中就建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光绪二十八年(1902,即壬寅年)张百熙拟出《钦定学堂章程》(后称壬寅学制),此项学制曾经颁布,但因学制本身的不够完备和清政府对学制制定人存有戒心等原因而未能实行。^⑥光绪二十九年(1903,即癸卯年)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通常称“癸卯学制”,该章程实际颁行的时间是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即1904年1月13日。“癸卯学制”共分三段七级,长达29年到30年,如果蒙养院四年不算在内,也有25到26年。

正因为“地理学之关系于民智,诚一国兴衰强弱之本”,因此,要改变“社会盲瞽之害”,“一当以世界观念,养成其知识,一当以国家思想,激励其精神。则地理一科,不可不视为学堂中重要之科目。”^⑦晚清设立的各级新式学堂,大部分都设置了新式地理学的普通课程,如1901年袁世凯奏办的山东大学堂的备斋,设有地舆学和地势学的课程。1905年国立南洋中学堂也规定第一学年本国地理,第二学年本国地理、世界地理,第三学年世界地理,第四学年地文学,第五学年地质学。1902年京师大学堂预备科的政科三年中都开设有“中外舆地”,学科阶段第一年有舆地课,讲述全球大势和本国地理,第

二年讲述外国地理,第三年讲述地文地质学,第四年“中外舆地”课“授以教地理之次序方法”。^⑧两湖书院的文高等学堂,1903年就设置了“中外地理学(测绘学附)”的学科。各级新式学堂的地理学教育有不同的要求,如1901年上海澄衷蒙学堂章程规定“舆地先授初级,取南洋公学所编初二等地理教科书,及学堂所纂字课图说,各种地理简明图,举五洲国名、省名、部名及名山大川要隘处所,指画口讲,但详今地,不涉沿革。授毕诸童复讲,如前法。”^⑨该学堂1906年出版有姚名辉编《本国地理教科书》三卷。澄衷学堂后来新添办了中学部,后来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的竺可桢1905年就在该校读过书,他的同学胡洪驛,即大名鼎鼎的胡适。^⑩

“癸卯学制”包含了一系列学堂章程,对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等各个层次的教育都提出了具体的地理学教育要求。如《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五年都有地理课程,第一、第二年“讲乡土之道里建置,附近之山水以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第三年“讲本县本府本省之地理山水,中国地理之大概”。第四年“讲中国地理幅员大势及名山大川之梗概”。第五年“讲中国幅员与外国毗连之大概,名山大川都会之位置”。《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小学四年都有地理课程,“学科程度及编制章第二”第六条“地理”规定:“其要义在使知地球表面及人类生计之情状,并知晓中国疆域之大概,养成其爱国奋发之心;更宜发明地文地质之名类功用,大洋五洲五带之区别,人种竞争与国家形势利害之要端。”《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等教育一级五年都有地理课程,“学科程度章第二”第六条“地理”规定:“先讲地理总论,次及中国地理,使知地球外面形状、气候、人种及人民生计等事之大概,及

中国地理之大要,兼使描地图。次讲外国地理,使知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指澳大利亚及太平洋各岛)诸国地势。次讲地文学,使知地球与天体之关系,并地球结构及水陆气象之要略(外国谓风云霜雪雷电等物为气象)。”章程还对地理教师提出了要求:“凡教地理者,在使知大地与人类之关系,其讲外国地理尤须详于与中国有重要关系之地理,且务须发明中国与列国相较之分际,养成其爱国心性志气。其讲地文,须就中国之事实教之。”^⑩《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年到四年,通儒院五年,共三级 11 到 12 年。“各分科大学科目章第二”规定了经学科(理学附)须开设“中外地理学”,章程同时也要求“中国文学门”注意“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商科大学的所有专业都得开设“商业地理”的课程。文学科列有“中外地理学门”,也就是今天的“地理学专业”,具体科目如下:

主 课	第一学年每 星期钟点	第二学年每 星期钟点	第三学年每 星期钟点
地理学研究法	2	2	4
中国今地理	5	4	3
外国今地理	5	4	3
政治地理	0	0	1
商业地理	0	0	1
交涉地理	0	1	1
历史地理	2	1	0
海陆交通学	1	1	0
殖民学及殖民史	0	1	0

续表

主 课	第一学年每 星期钟点	第二学年每 星期钟点	第三学年每 星期钟点
人种及人类学	1	0	0
补助课			
地质学	0	1	0
地文学	0	1	0
地图学	0	1	1
气象学	0	0	1
博物学	0	1	0
海洋学	0	0	1
外国语(英法俄德日选习其一)	6	6	6
中国方言(满蒙藏回选习其一)	2	1	1
合 计	24	24	24

《章程》还简介了各门课程的讲习法：“地理学研究法：中国与外国之关系，气候与地理之关系，财政与地理之关系，海陆交通与地理之关系，历史与地理之关系，动植物与地理之关系，文化与地理之关系，军政与地理之关系，风俗与地理之关系，工业与地理之关系。交涉地理：日本名国际地理，可斟酌采用，仍应自行编纂。”这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人对地理学专业研究者须具备的知识结构的认识。^④

另外，在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中也规定了相应的地理课程，如《奏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学科程度章第二”规定商业科应开设“商事地理”，水产科应开设“地文”。《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提出的“地理”的教学要求基本上与中学堂相

同,只是规定要讲述“为师范者教地理之次序法则。凡教地理者在使知大地与人类之关系;其讲外国地理,须尤详于与中国有重要关系之地理,且务须发明中国与列国相交之分际,养成其爱国心性志气。其讲地文须就中国之事实教之。”^④

传统中国文化重礼教大防,提倡三从四德,所以女学在中国一直没有合法的地位。最早设立女学的是基督教传教士。1869年新教女学生有576人,1876年为2100人,1895年已达6798人。1878至1879年天主教有女校213所,学生2791人。估计女生占教会学校总数的1/3。^⑤1907年随着女子教育的广泛开展,清政府才勉强颁行《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前者“教科要旨”第五条“地理”规定:“在使知地球表面及人类生存之情状,并本国国势之大要,兼养成其爱国心。其教课程度,先授以本国地势、气候、区划、都府、产物、交通等,并地球形状运动等,更进使知各大洲地势、气候、区划、交通之概略;并使知各与本国有重要关系诸外国之都会、交通、产物等,且可援本国政治、财用、生计之大势,比较于外国所处之地位。授地理者务本诸实地之观察,并示以地球仪、地图、标本、写真等类,使得确实之知识,尤须与历史及格致所教授事项互相联络。”后者的要旨“在使知地球形状运动,并地球表面及人类生存之情状,且使理会本国及外国之国势。其教课程度,授地理总论、中国地理及与中国有重要关系之外国地理;兼授地文学大意,并授以教授地理之次序法则。”^⑥

“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它将近代地理教育列为学校教育的内容之一,并首次规定了明确的教育宗旨和目的要求,初步奠定了地理教育作为基础课的地位。“癸卯学

制”的诞生标志着近代地理学教育体系在中国的确立。传统的中国教育缺乏明确的层次性,因此就不可能有比较合理的普通地理学教育的体系,也不可能保证地理学新知识和新思想的流传。晚清中国近代地理教育是在教会教育的启发下兴起的,特别是20世纪初大批留日学生的回归,引入了比较完整的日本地理学教育课程,这些对于清末地理学教育体系的建立具有积极的作用。20世纪初,各个层次有关地理学教学的规定陆续在一些学校贯彻执行。如果上面罗列的统计不误的话,那么,到清末时,已有二百多万人在接受着不同层次的地理学教育,这些为民国年间地理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清末民营出版社地理学教科书的编纂

戊戌变法前,教科书的编纂权基本上操持在西方传教士的手中。1898年前的在中国编译的西方地理学教科书绝大部分是由西方传教士充当主译者,在笔者统计到的49种地理学通论与教科书中,1898年前出版的15种,全部由西方传教士主译(参见附录一)。而这些由西方传教士主译的“华文教科书”,作为学校教育的课本,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当时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些译著“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因此呼吁“速自译编”各种教科书,或“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⑦罗汝楠指出:“近世地理诸书,大抵译自外国,凡外人之所述者,则复冗无节;外人所未述者,则漏略弗详。”^⑧屠寄说得更为精辟:“国民教育,以本国之伦理、语言、文字、地理、历史、宗教及法制经济为精神。此类教科书,必由本国学术家苦

心斟酌编定,方为适用。近来坊间所出本国部地理教科书,大半由东西文世界地理教科书中抽译中国之一部而成。以外国人说我国之地理,其不能适当者什六七也。间有教会中所编之本,则意偏宗教,不适国民教育之用。”^④

如何掌握编写教科书的主动权,日本摄取西方文化的成功经验给中国人提供了榜样。日本对西学决非盲目的接受,而是以西方教育为蓝本而进行独立地再创造。当年张之洞和刘坤一在一份奏折中指出:“日本诸事虽仿西法,然多有参酌本国情形斟酌改易者,亦有熟察近日利病删减一通者,于中国采用,尤为相宜。”^⑤张之洞还指出:“日本教学全仿西法,惟宗教科则改为修身伦理,自编课本,其余如舆地、图算、理化各科多本西籍,近犹时时参用之,而人才日出不穷,此用他国书而得大利者也。”但他也担心像“俄罗斯学堂用法兰西民主国之教科书,而学生屡次滋事,此用他国书而得大害者也。关系至巨,乌可不慎。即如舆地、植物、理化各科,虽译用外国书,亦须详加酌改。”^⑥1903年,以江浙地区留日学生为主体成立的国学社,已不满足于照本翻译日本教科书,主张借鉴日本教科书自行编著。他们在《国学社编辑教科书启》中声明:“自顷海内明智之士亦尝有意于教科书矣。然率勇于译述而怯于编著,工于谈外情而拙于言国故。甚或三千年之历史,十八省之地志亦复求书于异域,奋笔抄胥。呜呼,抑可谓穷矣。”^⑦他们计划编撰的教科书中就有《中学本国地理志》和《外国地理志》。甲午战后,留日学生运动蓬勃展开,大批留日学生取代西方传教士在翻译舞台上扮演了主角,使主译者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898至1911年出版的157种译著中,中国人主译的有131种,占总数的83%,在13年中出版的34种地理学

通论与教科书中,中国人编译的有 28 种,占 82%;在 40 种区域地志中,有 36 种是中国人译出的,占 90%;有关文化与政治地理学的 12 种,全部都由中国人译出(参见附录一)。

近代最早由中国人自编的地理学教科书据说是美华书馆 1893 年出版王亨统编的《地理问答》,^⑤但笔者未能见到初版本实物。戊戌前后出版的一批地理学读本均属传统型的启蒙读本,只是将一些新知识溶入传统的童蒙记诵的读本。如 1897 年叶瀚、叶澜著《天文地学歌略》,该书是四字一句便于学童吟唱的地理启蒙读物,关于天文者 290 句,地理及地方志者 1018 句。作者认为如果大人能辅以《天文图说》、《平圆地球图》、百兽百鸟等图,按歌指点,学童“由是悟得其理以期精益求精”。1899 年张士瀛编《地球韵言》,该书是小学堂的地理读本,共分 4 卷,卷 1 亚洲;卷 2 南洋岛、欧洲;卷 3 欧洲、非洲、非岛;卷 4 澳洲、太平洋岛、美洲、美岛。正文为四字一句,间有大段的注释。还有贾恩绂辑《五洲歌略》,该书虽是供学童边唱边学的启蒙读物,但已注意在解释中反映地理学方面较新的研究成果。如开篇为“地非方体,橘柚其形,两极稍卑,高其当中,地学之家,因以球名,地面文质,剖析最精,欲知地面,图象先呈”,注有:“讲地舆者分三家,曰地面、曰地文、曰地质。”^⑥

第一批真正带有近代意义的自编地理学教科书是 1901 年南洋公学出版、张相文辑的《初等地理教科书》和同年上海兰陵社出版的张相文编《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这里的近代意义的地理学教科书应当包含有三层要求,第一其编排应当体现出由浅入深、逐级递升的原则;第二其应当符合教学的规则,有时间单元的限度;第三其应当不是枯燥难记而应当是启

发式的,特别应有配套地图和教授法,以便于学生接受。两书基本符合上述三项要求。张相文称自己所编的地理学教科书,既区别于传统的考据家所讲之地理,也区别于当时流行的“苦难记忆”的“问答之书”和“歌括之篇”。他认为自己所编的“地理科之书,每附有闲情画片,博儿童之兴味,即以引起其脑力之纪念。”所附精良的图本,“与书辅行”,“凡山水市港,形势区域,朗若列眉”。并各附有地图多幅及教授法一卷。^⑤1903年9月文明书局出版过张相文《初等地理教科书》的增订版,改名《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该版列为学部审定的初等小学堂学生用书,全书分17章,第1章世界大势、第2章中国大势、第3章大山、第4章大水、第5章区域、第6章天气、第7章地势、第8章人口、第9章民族、第10章宗教、第11章交通、第12章产业、第13章商埠、第14章本部各省、第15章东三省、第16章新疆、第17章藩属,全书附图多幅,至1910年8月已发行了26版。从附录三的两份统计表中可以看出,1904年起,中国人自编地理学教科书开始逐渐进入出版的高峰时期,西方地理学译著出版的峰值34种出现在1903年,而中国人自编地理学教科书的出版峰值34种出现在1906年;1908年地理学译著的出版开始进入低谷,而中国人自编的地理学教科书在1908至1910年的三年间仍保持了平均每年13种的数量(参见附录三表一、表二)。

清末地理学教科书编纂者主要是民营出版社,如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开明书局、彪蒙书局、会文学社、昌明公司、时中书局、普及书局、乐群书局、鸿文书局,等等。1906年清学部颁布第一次审定初小教科书暂用书目102种,其中民营出版团体的出版物有86种,占五分之四强。1910

年,清学部颁布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 84 种,其中民营出版团体占全部数量的 90% 以上。^⑤其中以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最为突出。

文明书局创办于 1902 年,创办人是俞复、丁宝书、廉南湖等无锡三等公学堂的教员。初称文明编译印书局,社址在上海棋盘路。文明书局可以说一开始就是靠出版教科书起家的。最初就是靠出版无锡三等公学堂的课本《蒙学课本》一炮打响。三年中重印十余次。紧接着推出一套蒙学丛书,其中有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文、地质等。1902 年底,文明书局在广告中昭示其出版书目,49 种全部是教科书,其中小学教科书 32 种,高等小学教科书 17 种。如 1902 年陶懋立编的《世界读本》。1903 年推出较有影响的地理学教科书有钱承驹著《蒙学地文教科书》,该书为初等小学教科书,共 4 章,第 1 章星体分太阳系、经纬度、四季、五带 4 课;第 2 章气分空气、空气之诸力、风气、水气、水气成云、水气成雨、水气成露、水气成雪、水气成雹、水气成虹、电气等 13 课;第 3 章水陆分水陆之比较、洋海、海潮、江河、湖泊、泉水、大陆、高原、低原、山岳、火山、地震等 12 课;第 4 章人物分矿物、植物、动物、人种等 7 课。1905 年该书已发行了 6 版,1906 年达 9 版。1903 年除出版张相文著《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外,还推出他的《蒙学外国地理教科书》。同年出版的张国维著《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出版后当年就印了五版。另外,还有钮永建编《高等地理小学教科书》。1907 年出版有侯鸿鉴著《中等地理教科书》,该书分天文地理学、地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三部分。天文地理学分地球为太空诸行星之一、太阳系、日月地、地球形状、地球之大、地球之动静、昼夜之分、四季之更代、经纬线;地

文地理学分空气界、陆地界、海洋界、生物界四部分；人文地理学分国家之组织、国体、政体、国防军制、国家经济、租税、财政、交通、生业及产物、贸易、人民之种族、国风、风俗、习惯、教育、宗教、卫生等部分。1910年出版有国民教育社等编《(新体)高等小学中外地理》，该书4卷，卷1、卷2由国民教育社编辑，卷3、卷4由曹同文编辑。首篇“编纂趣意”，分编纂之目的、体例、材料、分量、文字、图画6章；卷1分总论、北部六省、中部六省3章；卷2分南部四省、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租界割让地7章；卷3分地球概论、亚细亚洲、海洋洲、欧罗巴洲、阿非利加洲、北亚美利加洲6章；卷4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2章。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推1908年出版的张相文著、胡尔霖校的《新撰地文学》，该书是编者为中学堂、师范学堂及程度相等各学堂所编的教科书。《新撰地文学》的内容分星界(地球之成因、地球之形状、地球之运动、地表之测定、地磁力)；陆界(陆地之构成)、水界(海水、河湖、泉水)、气界(大气、气候、气流、气中之水分、气中之映象)、生物界(生物之分布、生物之变迁、人类之进化、人种之分布)五编。后附中西术语对照表和各国权度对照表。迄今所编的普通自然地理学的基本内容仍不出这五个方面。在《新撰地文学》之前，中国虽已有了几种外国自然地理的译本，但其内容仅限于无机自然界。张相文别具一格，新增生物界一章，把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联系起来，这在世界地学史上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创举。^⑤文明书局的教科书在当时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相当高的质量。1906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小学教科书102种，其中文明书局出版的有30种，占总数的29.4%，1906年清学部设立图书局，其所颁布的编辑大意，大半是仿效文明书局及商务印

书馆的教科书体例。^⑤

讨论清末教科书的编译,我们就不能不再度提到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 1902 年起编译各级中外地理学教科书,最早的有 1902 年出版的陈乾生(即陈独秀)编辑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1901 年 10 月陈独秀留学日本东京专科学校,正式入学前,还在亦乐书院补习普通课程,《小学万国地理新编》是他据当时的课本编写的。该书分全球总论、亚洲、欧洲、非洲、澳洲、美洲等六编,总论内容有象数地理,讲述宇宙空间;形质地理,讲述全球地形的分布;政事地理,讲述人种分布、政治制度、宗教、风俗、物产等。当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广告上称该书“凡疆域、气候、政教、风俗、民情、物产,纪载明晰,纲举目张,文词雅饬,浅显易解。选用地名皆沿旧称,绝无近日日译本新奇骇怪之敝,以供小学教授最为合宜。”^⑥

1905 年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的《最新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该书全四册,附图多幅,至 1906 年 8 月已发行有 8 版。商务印书馆地理教科书的编者注意利用地理内容的广泛性和生动性来加强教材的趣味性,如 1905 年出版的徐仁镜、张元济校订、由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日人长尾慎太郎编《(再版)最新地理教科书》,该书指出:“近时蒙学地理课本,编刊者日见其繁,惟依次臚举,板滞无情,童年习之,既鲜兴趣,且难记忆。”该书分四卷,每卷 40 课,第一至第三卷论中国地理,第四卷论外国地理。全书采用游记体裁,所叙路程,循长江入藏,经京师、新疆、蒙古满洲。该书取材古今游记地志多达数十种,附有插图多幅。^⑦1905 年,曾为商务印书馆注译过《华英初阶》的谢洪赉编纂了《最新地理教科书》、《最新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和《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每书均四册。《最

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一、二册为中国地理；三、四册为外国地理，适合高等小学所用。学部审定的评语是“取材谨严，行文雅洁，洵小学地理教科之善本”。^①

商务印书馆出版较出色的小学地理教科书还有 1906 年童振藻编辑的《初版简易地理课本》，该书是为无法受正式学校教育的寒素子弟所编的小学地理读本。全书共 40 课，前 30 课是有关本国的，后 10 课是有关五洲的，第 39 至 40 课为地球总论。1908 年出版有为学部审定的初等小学堂课本《简明小学地理教科书》，该书由谢观编纂，全书分中国幅员之大略、名山大川之梗概、山川都邑之位置、中外毗连之关系四章，“教材排列参用旅行汇类，区画之体轻重剪裁，斟酌悉当。”^②清末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理学教科书还注意合理的配套，同时利用该馆出版的杂志广为宣传，赢得了较好的声誉。如 1909 年有谭廉编纂、沈颐校订的《（高等小学用）最新地理教科书详解》，该书分四册，第一、二册中国地理共 80 课，第 1 至 11 课分述疆域、地势、山脉、区画、土脉、江湖、湖泊、海岸、气候；第 12 至 40 课及下册第 1 至 23 课为各省介绍；下册第 24 至 40 课分述人民、政治、军政、财政外交、教育、宗教、物产、工艺、商业、道路、铁路、航路、邮政电报。第三、四册外国地理共 80 课，上册第 1 至第 6 课为自然地理，第 7 至第 11 课为人文地理，第 12 至 30 课为亚细亚洲总论及各国分论，第 31 至 40 课为阿非利加洲总论及各国分论；下册第 1 至 21 课为欧罗巴洲总论及分论，第 22 至 36 课为亚美利加洲总论及各国分论，第 37 至 40 课为海洋洲总论及分论。该书被誉为“征引详备，考核精确，实为用是商务地理教科书者之完全参考书也”。^③

在商务印书馆编写的中学教科书中注重以人地空间关系

为主线,如1903年版谢洪赉编、赵玉森重订的《瀛寰全志》是早期发行量较大的中学地理教科书。该书是编者据东西及本国地志数十种编辑而成的。全书分七编,一为总论,论地球(地形、地广、地动、天象)、地面诸线(地轴、经线、五带、地图)、地之分界(陆之分界、水之分界、世界大势)、天气(同寒暑线、四季、风、雨)、物产(矿产、植物、动物)、人民(人数、种族、性情、言语、社会)、国家(界说、国体、政体)、宗教;第二至第七编依次为亚细亚洲、欧罗巴洲、阿非利加洲、北亚美利加洲、南亚美利加洲、海洋洲。该书1907年已发行了9版。与此书“相辅而行”的还有彩色套印的《新撰瀛寰全图》,该图册收录东西两半球及山川比较、世界现势图及各国面积比较、小型地文图和大陆剖面图等共15幅。1905年出版的屠寄著《中国地理教科书》也注意到人地的空间关系,全书分三卷,卷一总论,分亚细亚总论和中国总论两部分,中国总论的地文地理分地势与山脉、沿海岸线、潮汐、洋流、水道、气候六部分;卷二为(中国)人文地理分人民、政教、物产、交通等部分;卷三地方志分七部分,分述黄河流域、中带扬子江流域、南带珠江流域、关东三省、西域与新疆、北藩(内、外蒙古)、西藩(青海与西藏)。附有照片与图表。该书作为中学堂教科书,至1909年已发行了7版。1908年出版的臧励和编纂的《新体中国地理》,吸收了最新的国外学者有关地理学概念的界定,明确指出:“地理学者,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现象与人生种种现象之科学也。”该书分4编。在第1编地理学总论中,把地理学分为天文地理学、地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三大类;第2编亚细亚总论,分地文、人文两部分述山川形势之大略;第3编中国总论,分地文、人文两部分述中国之山川形势;第4编地方志,分黄河流域、珠

江流域、关东及新疆、蒙古、青海、西藏,附录土司、外国属地、外国租界。全书附图多幅,简明扼要。⁶⁴后经谢观校订、赵玉森重订,至1913年已发行了11版之多。这些教科书既注意克服传统的中国地理描述中区域地理与自然地理分离的倾向,又注重贯彻人地关系的原理。

商务印书馆还注意到高级地理教科书的编撰,如1906年出版过徐念慈编纂的《初级师范学校教科书·中国地理》,该书分五洲略说、亚洲略说、中国位置境界、天气及地势、区画、山脉、河流、湖泽、海岸、航路、商埠、铁路、电线、矿产、农工商业、种族、语言文字、风俗、宗教、政体等20章。书中有“通商口岸表”和“中国铁路表”,注意中外地理事物和现象的联系与横向的比较,在众多的地理学教科书中别具一格。商务印书馆1904年前还出版过邹代钧撰的大学堂讲义《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讲义》,该书分两编。初编由卷首和第一章地理学总论组成,论数理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卷一第一章为亚细亚洲总论,分14节,讨论释名、位置、境界、面积及人口、地势、海岸线、半岛及岛、海及海湾、高地、平原、沙漠、分水界江河、浸、气候;二编共35课,论中国地理。第1课疆域、第2课至第5课地势、第6课至第35课为海岸。1910年该馆还出版有奚若据20多种中日英法德五国图籍精绘译校的《世界新輿图》,全图册分天文、地文、人文图8幅,六洲总图和各国分图38幅,城市图百余幅,附记铁路、航道、运河等,末附各国政体、教育、财政、国防、交通、商务等统计表,集中体现了清末地图绘制和印刷的水平。同时商务印书馆一直关注在整个社会普及地理学常识,曾推出国民游戏24种,其中有《世界地理牌》和《环游世界图》,“于游戏之中寓教诲之意”。⁶⁵

当年亲身参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纂的庄俞在《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写道：“我国自甲午战后，上下奋兴图存。光绪二十八年七月颁布学堂章程，是为中国规定学制之始。有志教育之士，亟亟兴学；无如学校骤盛，教材殊感缺乏，遂有蒙学课本之试编；但不按学制，不详教法，于具体工具犹多遗憾。本馆编译所首先按照学期制度编辑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诸种，每种每学期一册，复按课另编教授法，定名为最新教科书，此实开中国学校用书之新记录。当时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杜亚泉诸君围坐一桌，构思属笔，每一课成，互相研究，互相删改，必至多数以为可用而后止。最新国文第一册初版发行，三日而罄，其需要情形可以想见。自此扩大编纂，小学而外，凡中学，师范，女子各教科书，络绎出版，教学之风，为之一变。”^⑥这种认真的编纂作风，使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教科书在学界让人刮目相看。最可贵的还在于商务印书馆对于本馆出版的教科书有自身的批评系统，如商务主办的《教育杂志》有“介绍批评”一栏，不仅批评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也批评自己出版的教科书。如指出屠寄著《中国地理教科书》虽“详简得宜，条理甚晰，为近今地理教科善本。惟其中讹误之处，亦复不少”。这些讹误包括不加分析地引用日本地理教科书中的错误；在“气候”一章中，将西藏的干燥，误认为是由于喜马拉雅山南北雪线的高位导致的无雨，等等；指出该书中“文词不明、地理不合之处尚多”，“人文地理篇政教章所述，已与今制不合”。^⑦

正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编纂方面有一套自我完善的机制，从而使其出版的地理学教科书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名列前茅。1906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颁行的初等

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 102 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就有 54 种,占 52.9%。1910 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共 84 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 30 种,占 35.7%。^⑧学部审定认为谢洪赉编、徐仁镜、张元济校订的《最新中外地理教科书》“取材谨严,行文雅洁,洵小学地理教科书之善本”。又称赞道:“地理之学,图画尤要,该书馆《万国舆图》一册,可与是编相印证。”指出谭廉编纂的《最新地理教科书详解》“凡山川郡邑、品物名称,均就原文解释详明,教员得此自能因应无穷”。^⑨李泽彰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一文中,曾对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编纂方面所作的贡献有过中肯的评价:“民营的出版业在革新运动的后期,不仅是在出版界居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新教育的推行上也有极大的帮助。因为在光绪三十二年学部虽然颁布了学堂章程,但藉以推行新教育的教科书并未编印。在科举初废时,教科书的编制实为创举,真是极困难的一件事。当时的出版业不避艰难,毅然负此重任,实属难能。其最早编印教科书以备采用者,当推商务印书馆。我们现在谈到科举的废除,学校的创设,不能不归功于革新运动。而革新运动有此成绩,我们却又不能不归功于当时的出版业,尤其是商务印书馆。”^⑩在商务印书馆的带动下,不少民营出版机构都纷纷加入地理学教科书出版的行列,笔者统计到清末的地理学教科书共有 159 种,其中 1901 至 1911 年的 10 年间,各种出版社编写的初等和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多达 97 种,中学与师范地理教材 44 种,每年平均出版 14.1 种;随着地理教育的普及,师范专科和大学的地理学教科书的编纂也受到了充分的重视,10 年间出版的师范专科的地理学教科书有 19 种,大学教材也有 7 种之多

(参见附录二)。

西方地理学知识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只有通过学校教育这一有序的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它的影响力。而任何新型的学校教育,如果没有合适的教科书配合,那么它也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清末新旧教育学制转换的过程中,以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广智书局、会文学社等为代表的民营出版机构,开创了新式地理学教科书编纂的新纪元。在1910至1911年的10年间出版的中小学地理学教科书共141种,其中官书局和官报局出版10种、教会方面的2种,仅占总数的8.5%(参见附录二)。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人们不再需要用一种统一的模式来规范地理课本,于是各家为争夺教科书的市場,往往在地理教科书的编写上各显神通,造成了晚清地理学教科书编纂上的空前繁荣。当时有的学者已注意到民营教科书出版事业对于我国教科书编纂得以健康发展的巨大意义:“以冀完全私家著述,以自由贸易之故,竞争弥激进步弥速。若国定则编者之利害关系既浅,而又凭藉官力以疏通各地,竞争既绝,改进之机亦寡。凡天下之所谓真善美者,必经多人之自由研究,此攻彼击,而真理乃出。集思所以广益,古人不我欺也。若以少数人之意见,欲施之于二十二省而悉当,其能免于专己独断之弊乎。”^①虽然民营出版社出版的各类地理学教科书中也有不少带有新旧杂糅、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毛病,但在清末社会里,正是通过这些粗糙和不完善的教科书,使西方地理学知识在普通的社会阶层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四、清末乡土地理教科书的编纂与 民族自尊自信意识的重铸

清末中国人天朝自大的“虚幻环境”随着日益增强的“世界意识”而逐渐走向解体,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世界”并非如西方传教士一味鼓吹的圣经故事中的伊甸园,而是一幅充满了血腥味的民族搏杀图。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猛烈地轰击着中国的大门,“数千年来沉寂无聊之太平洋”,已成了“列国竞争之中心点”,而中国又首当其冲。^②鸦片战后,西方列强接踵而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特别是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的签定,日本割去台湾、澎湖,俄国以干涉还辽强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德占胶州湾,真是“一虎已啖其肉,群狼磨牙以随”,“瓜分豆剖,祸在燃眉”。^③康有为在1898年的《京师保国会演说》中形象地描述了迫在眉睫的亡国之祸:“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小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④

政治上的失败,文化上“虚幻环境”的破除,也使晚清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和失落感,一部分中国人如同日本“鹿鸣馆时代”的全盘西化论者,也出现了从死守国粹的一种极端走向了沉迷西洋的另一种极端,“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曰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⑤清末崇洋心理颇

盛行,1903年4月17日《大公报》就有当时青年人崇洋心理的描述:“他们看着外国事,不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的,所以学外国人惟恐不像。”有竹枝词这样嘲笑道:“洋帽洋衣洋式鞋,短胡两撇口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⑥20世纪初一批“醉心欧化”的学者甚至倡言废弃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吴稚晖攻击汉字是祖宗遗留的“糟粕”,是代表“旧种姓”障碍国民进化和“制造野蛮”的渊藪。^⑦乡土地理教育的兴起,正是为了回应清末社会文化界出现的这种面对西方冲击,因民族自尊与自信的双重失落而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

身处异国异乡的学子最易唤起深深的民族自尊之心和爱国之情,“爱国必自爱乡始”首先是写在1903年湖北留日学生的《湖北同乡会缘起》中。^⑧同年江苏留日学生在《江苏同乡会创始纪事》中写道:“吾言爱国,必自爱乡始。无他,事之有小以成大,自迩以及远,亦必至之势。”“今同人以爱江苏者爱中国,各省亦竟以爱其本省者爱中国,驯至齐心一致,以集注于爱国之一点,则中国之兴也,吾欲与江苏及他省同乡会卜之。”^⑨笔者见到的晚清最早的乡土地理教科书是1898年宁波汲绶斋出版处出版的蔡和铨编辑、李文铨校正的《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该书是浙江本省初等小学第二学年本乡风土教科书。分上下两编共90课。上编为中国及本省总述,共38课;下编为各府分叙,共52课。各府分叙粗举古迹人物,间插以图画,“以引起儿童爱恋乡土,景仰前贤之心”。1904年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初小、高小和中学共14个学年中,年年开设地理课。《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第一第二年着重“讲乡土之道里建置,附近之山水以及本地先

贤之祠庙遗迹等类”。第三年“讲本县本府本省之地理山水，中国地理之大概”。然后再从内而外，第四年“讲中国地理幅员大势及名山大川之梗概”。第五年“讲中国幅员与外国毗连之大概，名山大川都会之位置”。目的就如《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给小学地理教育所下的界定：“其要义在使知地球表面及人类生计之情状，并知晓中国疆域之大概，养成其爱国奋发之心；更宜发明地文地质之名类功用，大洋五洲五带之区别，人种竞争与国家形势利害之要端。”^⑧在此之后，乡土地理教科书纷纷涌现，笔者统计到的1906至1909年4年中的乡土地理教科书共有21种，此列表如下：

书 名	编纂者	出版者	年代
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	刘师培	国学保存会	1906
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	刘师培	乡土教科书发行所	1906
(初等小学)浙江地理教科书	启文社编	启文社	1906
(初等小学)乡土地理模范教科书	储丙鹗	震东学社	1906
湖北乡土地理教科书	陈庆林	国学保存会	1907
江西乡土地理教科书	陈庆林	国学保存会	1907
直隶乡土地理教科书	陈庆林	国学保存会	1907
江宁乡土地理教科书	刘师培	国学保存会	1907
(初等小学)江苏省地理教科书	启文社编	启文社	1907
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	黄海闻	乡土教科书发行所	1907
乐山地理教科书			1907

续表

书 名	编纂者	出版者	年代
松江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沈宗祉	时中书局	1908
(最新初等)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	蔡和铿	千顷堂	1908
湖南乡土地理	辜天佑	长沙集益群智书社	1908
泸州乡土地理教科书	李正华等		1908
(初等小学)会城地理教科书	陈受恩	福州新闻报馆	1908
(初等小学)本省地理教科书	陈受恩	福州新闻报馆	1908
新宁乡土地理	雷泽普		1909
松江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沈宗祉著 王毅存、陈庭兰重订	上海时中书局	1909
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	辜天佑	群益图书社	1909
天台小学地理教科书	张廷琛		1909

在编撰乡土地理教科书方面,国学保存会的工作颇值得重视。国学保存会创办于1905年1、2月间,由邓实、黄节、刘师培、陈去病等发起在上海成立,旋创刊《国粹学报》,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这一口号的提出,受到了日本地理学家志贺重昂发起成立政教社、倡言“国粹保存”的启发。国学保存会是一个拥有包括报社、图书馆、出版所在内的具有实力的文化实体。^④出版所在上海爱而近路国学保存会,发行所在四马路东惠福里国粹学报馆。1906年起,该会致力于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的编纂,如陈庆林的《湖北乡土地理教科书》、《江西乡土地理教科书》和《直隶乡土地理教科书》;黄海闻的

《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刘师培的《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和《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等。这些乡土地理教科书注意介绍当地自然资源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开发的潜力、城乡的生态环境等等。该会在“编辑国学教科书出版广告”中写道：“本会所编教科书皆就国学之一面着手，盖以吾国学术历五千年，浩瀚渊博，典籍浩如烟海，学人苦无门径，每兴望洋之叹。非萃荟群籍，提要钩元，折衷至当，重行编辑，不足以发挥国学之精粹，面合学堂教科之用。其事之难，非就外国科学之一面，有东西洋编成之本，可以按文直译者可比。故吾国至今尚无一精良之国学教科善本。本会有鉴于此，特任其难，集合邃于国学之士，参互考订，务求完善。”^④国学保存会的学者注意将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传统学术的研究领域。1906年第20期《国粹学报》刊载了该会的《国学保存会报告》第1号《征各省府县志书启》，该文中明确提出：“德儒萨尔曼氏谓，教授历史之初，必先授以乡土史谈，俾其抚前代遗迹，以得直观之方便。不惟历史而已，即地理亦然。希尔列尔之乡土志，其分目至细，且与府县志不相混合。如是乃能唤起爱乡心，即由此而生爱国心。斯小学教师不可不知者也。”^⑤不难看出这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复兴旧学，而是在吸收外来新知识基础上对传统的重新认识与估价。1906至1907年间，国学保存会所编的历史地理教科书，注重乡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可读性的统一，获得了社会的良好评价，1907年国学保存会第7号“已编成湖北江西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出版”报道：“本会所编乡土教科书出版后，颇受海内教育家之称许，以为书之图画文字引证，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长儿童爱乡爱国之心，为效至巨。故公私学校，采用至夥”。^⑥

该会出版的较有影响的乡土地理教科书有 1906 年刘师培编著《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该书专备安徽省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之用。该书第一册共 18 课，第 1、2 课沿革，第 3 课总论，第 4 课区画，第 5、6、7 课山脉，第 8、9、10 课河流，第 11、12 课人文地理，第 13 至 18 课分别论述安庆等各府州。这位当时年仅 23 岁的编者深受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着力从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制约入手，作了非常精彩的论述：“平原之民与山国之民不同，若皖省之地，则皖北多属平原，皖南多属山国（淮北之地，地鲜大山；淮南之地，则西境多山，东境山脉渐平；若江南之地，则所在皆山；惟滨江一带，地势稍卑，然山脉亦相连不断）。皖北虽多大山，然睢、汴诸水，均成细流；芍陂、艾塘，遗迹久淹。平原旷莽，沙土漂轻，多与徐、豫相同，故民生其间，鲜营实业，习为强悍之风，近于古代之游侠。皖南多山，溪涧滢洄，水流漂急，沟浍之间，盈涸不时，农民终岁勤劬而限于地利，不克自给，其身家由是舍农而商，逐什一之利，散居东南各省。故至于今日皖北之民宜于服兵，皖南之民宜于经商，而实业教育以皖南为宜，军国民教育，以皖北为宜，推其原因，则于皖南地势殊于皖北，地势既殊，则民风习尚亦随之而殊。试观六安诸地，与宁省之淮扬同居于江北，何以小民生计有贫富之殊，则以淮扬处水道交通之地，而六安则处群山之中也。徽、歙之地，与苏、常、杭、绍同居于江南，何以先儒学术有尚虚尚实之殊，则以苏、常、杭、绍为泽国，而徽、歙则为山国也（如近人江戴之学，均以征实为主，与吴越之学派不同）。略举二端，余可类求。嗟夫，皖省之民，其特质有三，一曰尚朴，二曰好义，三曰贵勤，此皆所处之地使然。”^⑥1909 年初版的雷泽普编《新宁乡土地理》，虽为新宁县

的初等乡土地理教科书,但其也立足于面向整个世界,该书“自叙”称其目标是为“刺激学生之心志,先养成其爱乡国心,使之先入为主,他日虽身在异邦面心怀祖国,不为他国之同化力所吸收,而为吾国爱结力所囚缚也。”全书分上下两卷 23 章 74 课。注意天然地理与政治地理的区分,依次为新宁县之起源、新宁县之成立、新宁县城之建置、广海卫之建置、赤溪庭之析置、经纬度及分野、气候、疆域、都界、山岳、河流、洋海、户口、田亩、水利、咸围、险隘、铁路、水陆交通及大市场、古迹、风俗、物产(附森林、渔业、盐法)、兵防(附警察)。同年群益图书社出版的辜天佑编辑的《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也是用新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分类法,来容纳有关湖南的乡土地理资料。

不难看出,这批新的地理学知识群体与传统旧式士大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大多受过包括西方地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训练,已初步形成了与前者迥然不同的知识结构,因而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地理教科书。正是这批有着新的知识结构、视野开阔而富有激情的年轻的地理学者,用一种世界的眼光重新认识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张相文为《新撰地文学》一书所写的结论颇具代表性:“人类社会之成立远矣。始由个人而家族,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国家。究其因天乘地之原,可分为四期:即山陆、内河、外海、大陆是也。第一期山陆时代,狃狃榛榛,世界同为野蛮,我国黄帝以前当之。文明发育,其在第二期之河流时代乎。世界开化最先之国,若埃及、若巴比伦、若印度,皆以河流著称。我国河流之富,尤冠绝全球。埃及之尼罗河,逼近赤道,又经行撒哈拉沙漠。巴比伦之提古利河,源委不长,又迫近阿拉伯沙漠。印

度之恒河,北迫喜马拉雅山,南入热带。我国黄河、扬子江、珠江三大流域,输纳群流,概居温带,迥非埃及、巴比伦、印度所及。气候调和,物产丰富,故五千年来蔚然成东方大国。至第三期之外海时代,只以海岸线较短,而富于大陆,海通以来,经商殖民,稍落欧人之后,亦地势使然也。继至今水陆既通,要以内蕴之丰啬为优劣,国权之伸张,又不在海而在陆矣。统观环球,内陆广莫、地力雄厚者,西则北美,东惟我国而已。我国领土,奄有东亚大平原及中央高原之地,其广轮殆过于北美。而河川湖泽之富饶,亦复相埒,及是时广筑铁道,大发矿藏,利用三十万种之物产,一以铁道输送之黄河流域,以郑州为枢纽,北出蒙古,西逾伊犁,以达中亚。扬子江流域,以汉口为中心,西通川藏,绾毂南北。珠江流域,以广州为总汇,南挹澳洲,西达印度,握全亚之大动脉,以与世界争衡。则南洋群岛,东邻日本,皆我中途之输血管也。第四期东半球唯一之雄邦,舍我中国固莫与属矣。”^⑥读了这一段充满自信的肺腑之言,哪一个充满血性的中国人会不感到激动与振奋呢?地球是一个整体,地球上的人类也是一个整体,只有把中国放到全世界这一大背景中,才能重铸起不是坐井观天式的、而是具有世界意识的自尊和自信。

注释:

- ①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 年,页 204、211、213。
- ② [意] 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年,页 21。
-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 1985 年,页 46;参见高时良主编《中国

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页 49—50。

- ④ 参见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页 58。
- ⑤ 《教会新报》1868 年第 1 期。
- ⑥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页 58。
- ⑦ 王树槐《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载林治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81 年，页 199—202。不少著作误认为益智书会与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是两个机构，边春光主编的《出版词典》就为这一机构写了两个词条（参见《出版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 年，页 525）。
- ⑧ 韦廉臣《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报告》，载《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 1890 年》附录 E，转引自朱有琳、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页 33—37。
- ⑨ 王树槐《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载林治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81 年，页 199—202。
- ⑩ 《全国基督教会学生历年增进表》，载《新教育》第 5 卷（1922）第 4 期。
- ⑪ 朱有琳、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页 286、266。
- ⑫ 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第十集第十九章，页 43—47。
- ⑬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页 243。
- ⑭ 傅兰雅《地志须知·总说》，1882 年刊本。
- ⑮ 《地理须知·识语》，1883 年刊本。
- ⑯ 朱有琳、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页 310—311。
- ⑰ 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第十集第十九章，页 42—43。
- ⑱ 朱有琳、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页 438。
- ⑲ 朱有琳、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页 52—53。

- ⑳ [美] 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页 59。
- ㉑ 王建军著《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页 58—59。
- ㉒ 朱有琳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年，页 71—72。
- ㉓ 《广方言馆全案》，“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页 127—128。
- ㉔ 《洋务运动》(二)，页 131。
- ㉕ 《盛世危言·考试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页 299—300。
- ㉖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 1995 年，页 39—40。
- ㉗ 《戊戌变法》(二)，页 292。
- ㉘ 《通艺学堂章程》，载《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 1986 年，页 103。
- ㉙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页 167—168。
- ㉚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页 122。
- ㉛ 朱有琳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页 838—840。
- ㉜ 转引自郭双林《晚清西方地理学东渐述论》，载《学人》第 7 辑。
- ㉝ [日] 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卞立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页 213—215。
- ㉞ 屠寄《中国地理学教科书·自叙》，《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 1905 年。
- ㉟ 孙文楨《坤輿撮要问答叙》，《坤輿撮要问答》，上海土山湾印书馆 1898 年。
- ㊱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载姜义华编《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页 682。

- ⑳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页 169—170。
- ㉑ 范祎《中等地理教本序》，[英] 汉勃森著《中等地理教本序》，任廷旭、范祎译述，广智书局 1907 年。
- ㉒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页 759—762。
- ㉓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页 400、608、807、848。
- ㉔ 参见《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 1990 年，页 8。
- ㉕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页 180—182、193、386。
- ㉖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页 783—784、786、811—814。
- ㉗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页 41—42、228。
- ㉘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 1995 年，页 43。
- ㉙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页 660、670。
- ㉚ 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载《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 1986 年，页 172。
- ㉛ 罗汝楠《中国近世舆地图说·例言》，罗汝楠编《中国近世舆地图说》，广东教忠学堂 1909 年。
- ㉜ 屠寄《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凡例》，屠寄纂《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 1905 年。
- ㉝ 《谕折汇存》（光绪朝）卷 21，转引自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 年影印本，页 50。
- ㉞ 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1902 年），转引自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90 年，页 51—52。

- ⑳ 《教育世界》卷 25,转引自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页 68—69。
- ㉑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 1953 年。
- ㉒ 贾恩绂辑《五洲歌略》,五求实学社 1902 年重刊本。
- ㉓ 张相文著《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编辑大意》,文明书局 1903 年版,该书是 1901 年南洋公学出版的《初等地理教科书》的第 17 版。
- ㉔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页 128。
- ㉕ 参见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1 卷,第 5 期。
- ㉖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页 130。
- ㉗ 《东方杂志》1904 年第 1 期图书广告;沈寂的《陈独秀与商务印书馆》一文认为《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可能据日本斋藤鹿三郎的《地理教授法》一书加工编译的(载《编辑学刊》1996 年第二期),但据笔者的调查,这是由两家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书(参见附录一 042—42、附录二 006)。
- ㉘ 《(再版)最新地理教科书》,[日]长尾慎太郎编、徐仁镜、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 1905 年。
- ㉙ 谢洪赉(1872—1916),浙江绍兴人,受父亲谢元芳影响,早年信奉基督教。曾帮助传教士潘慎文译出《八线备旨》等科学教科书,后从事宗教著译,青年协会出版的谢著有 48 种,译作有 41 种,在商务印书馆除编有地理学教科书外,还编有《最新理科教科书》以及《最新中学教科书》的几何学、代数学、三角术、生理学、化学、物理学、微积分等多种。详见《谢洪赉先生纪念册》,1926 年印本。有关谢洪赉的生平可参看汪家熔著《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年,页 20、188—190。

- ⑤② 《东方杂志》1909年第4期图书广告。
- ⑤③ 《教育杂志》1910年第13期“介绍批评”。
- ⑤④ 参见臧励稣编纂《新体中国地理》，商务印书馆1908年。
- ⑤⑤ 《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6号出版广告。
- ⑤⑥ 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页724—725。
- ⑤⑦ 《学部审定中学教科书提要》，载《教育杂志》1909年第1期。
- ⑤⑧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113。
- ⑤⑨ 《教育杂志》1910年第1期图书广告。
- ⑤⑩ 载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中华书局1959年，页385。
- ⑤⑪ 张世杓《论教科书与教育进化之关系》，载《教育杂志》1910年第5期。
- ⑤⑫ 慧僧《二十世纪之太平洋》，载《浙江潮》1903年第2期。
- ⑤⑬ 修真《阅报之有益》，载《觉民》1904年第1至第5期合本。
- ⑤⑭ 《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载《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页166。
- ⑤⑮ 陈作霖《柄烛里谈》，转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下)，世界书局1935年，页300。
- ⑤⑯ 参见胡绳武等《民国初年的社会风尚变化》，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62。
- ⑤⑰ 参见倪海曙著《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1908年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 ⑤⑱ 《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留学记录”。
- ⑤⑲ 《江苏》1903年第4期，“传记”：《江苏同乡会创始纪事》。
- ⑤⑳ 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180—182。
- ㉑ 参见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1997 年,页 13。

- ② 陈庆林编著《湖北乡土地理教科书》，国学保存会 1907 年版后附广告。
- ③ 俞旦初考证文中的“萨尔曼”，是指德国教育家 Christian Gotthilf Salzmann(1744—1811)，他的著作先在日本翻译出版，接着中国又通过日本译本转译成中文，书名《儿童教育鉴》，其思想对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教育界都有影响。参见《爱国主义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页 127、147。
- ④ 《国粹学报》1907 年第 27 期。
- ⑤ 刘师培《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叙》，《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国学保存会 1906 年。
- ⑥ 张相文著《新撰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 1908 年，页 195—197。

第六章 清末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与 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学术转型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文化变迁,中国学术产生了新的规范和新的方向,学界一般称之为“现代学术”。由于“modern”一词的翻译,使中文里的“近代”与“现代”两个概念常常混淆不清,为了与 1840 至 1949 年的近代史划分法和地理学史的一般叙述相对应,笔者采用了“近代”一词。有关学术转型的讨论,多以剖析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个案作为立论的基点,^①笔者认为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转型来阐述中国近代学术传统的变革,可能会找到一种新的、独特的视角。

一、中国近代地理学确立的时间和标志

中国传统地理学向近代意义上的新地理学的过渡究竟在何时,目前学术界未能取得共识。谭其骧指出:“清代的地理学研究只能是旧的总结,而不可能成为新的开端。”^②曹婉如、孙关龙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的“中国地理学史”词条中,把 19 世纪中至 20 世纪初定为“近代地理学的萌芽”,指出“中国的近代地理学是在引进欧美的近代地理学基础上逐步

形成的。清末和中华民国初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地理杂志》的创刊,以及地理学课程的教授、地理学教科书的出版和各大学地理系的设置等,都在中国地理学向新阶段发展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但似乎又婉转地表示同意有人主张将 19 世纪中 20 世纪初中国地理学划入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发展阶段。^③杨吾扬也认为中国民族的新地理学从本世纪初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已经开始萌芽,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创立是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创始人是竺可桢。^④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一方面称:“整个清代,地理学仍然是历史学的附庸,地理只是一种工具,研究它的目的是便于读史,而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说:“咸道之后至‘五四’运动之间,中国传统地理学逐步过渡到西方的先进地理学阶段,无论在地理学理论、研究方法、研究的范围上都有鲜明的特色。”认为 20 世纪初近代地理学在中国已经确立。但该书并未讲清楚近代地理学的标志究竟是什么。^⑤郭双林在《迈出传统的门槛》一文中把中国近代科学的民族地理学开始产生的时间定在光、宣之际,并确立了它的标志主要有大学地理课程的设置和新式地理教科书的编纂、地理学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专业刊物的创办、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这三个方面。^⑥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的学术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大致发生在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的清末。从传播与影响的意义上来看,对知识体系的研究,包含着对共同进行知识探索和共享研究成果的学者所组成的交流网络和学术团体的分析与研究。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新地理学区别于传统地理学的重要标志是地理学的学术独立、职业地理

学者群体的出现、近代地理学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的建立,而这三点又与清末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托马斯·库恩指出:“科学尽管是由个人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却是集团产物,如不考虑创造这种知识的集团特殊性,那就既无法理解科学知识的特有效能,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方式。”^⑦笔者使用的“地理学共同体”,是借用了库恩“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⑧指晚清一批地理学专业工作者形成的社会集团。笔者在文中把地理学共同体分为非体制化共同体和体制化共同体两种。19世纪中期的一批以世界地理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者所构成的社会集团可以视为非体制化共同体,而稍后出现的地理学学会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化共同体。清末的地理学共同体的成员往往都有探索研究的共同目标,很大程度上注意和吸收同样的文献,内部的交流比较充分,专业看法比较一致。这种共同体的效应,是新兴学科生长点的有力的社会抗体,它不仅能抵御传统研究方法的压力,而且能激活研究系统中的创造力。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产生了冲击,使中国学者复兴了自己的天算和地理的研究传统,他们主张把异域的学术和汉代的学术传统结合起来,恢复实证性的考据学方法。钱大昕在《赠谈阶平序》中指出:“夫东海之与西海,语言不通,文字各别,而布算既成,较之,无垒黍之失,无他,此心同,此理同,此数同也。欧罗巴之巧,非能胜乎中土,特以父子师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转精。而中土之善于数者,儒家辄訾为小技。……中法之绌于欧罗巴也,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也。”^⑨他认为耶稣会的西学开拓了儒学研究的视域,是对几个世纪以来重视道德、哲学玄谈偏向的纠正。考据学家的

知识范围和内容的变化体现为研究方法、研究途径的变化,讲习、问答式的研究为专题式的研究所取代。^⑩清初以来的考据学、清中叶兴起的西北边疆地理研究和晚清东传的西方地理学,是晚清地理学共同体的研究规范的主要来源。

二、晚清非体制化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

19世纪初,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一些西方地理学的汉文小册子开始出现在南洋、广州、福州、宁波与上海,这些以研究全地球的地理状况及其分布规律为特点的记述,受到了以文献考据为基本方法的中国地理学学者的重视。1838年春林则徐到广州禁烟,他深感不谙西方地理之苦,因此组织译员,据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勃朗赠送的1836年伦敦版的英国慕瑞(Hugh Murray)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一书,编译为《四洲志》。这是1836年伦敦出版的当时最新版本的世界地理百科全书,中文编译本《四洲志》译介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这四大洲主要国家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译文约8700多字。^⑪《四洲志》主要是通过魏源《海国图志》的流传而产生学术影响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发行于1842年,《四洲志》的材料全部分别辑入第3、5、7、13、14、16、20至22、25至33、36至43各卷,魏源把《四洲志》的材料放在各篇之首,然后再辑入其他材料。以后魏源不断修订,1847年扩大为60卷,1852年增补为100卷。魏源称该书的特点是“以西洋人谭西洋也”。^⑫强调了材料的可靠性,除美国志外,其他均把《四洲志》列在所有材料的第一条,并注明“原本”。试图建立起不抹杀前人成果的近代研究方法。在介

绍美国时,则把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辑在最前面,称《弥利坚即美理哥国总记上》,而将《四洲志》原本列为《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总记下》,并特别声明:“志例当先原本,次重辑。惟《美理哥志》出其本国,实较原志尤提纲挈领,故先之。”^⑩他不仅重新组合了明末清初艾儒略《职方外纪》、南怀仁《坤舆图说》、蒋友仁《地球全图》等书中引入的知识点,而且广泛地吸收了同时代西方传教士汉文著译中的新信息,如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裨理哲的《地球图说》、玛吉士的《地理备考》和《地球天文合论》、培端的《平安通书》、郭实猎的《万国地理全图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⑪初步绘制出一条全世界地理的崭新知识线。第一个为研究这条新知识线规定了学术“范式”的是晚清著名地理学家徐继畲的《瀛环志略》。

徐继畲极为重视明末清初以来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撰的地理学汉文西书,留心古今中外人士的著译,如酈道元的《水经注》、王恽的《泛海小录》、邵星岩的《薄海番域录》、黄毅轩的《吕宋纪略》、顾亭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谢清高的《海录》以及郭实猎的《万国地理全集》、玛吉士的《地理备考》等。在参与办理“夷务”的实践中,他深感文献记载“其说恢谲,其文瑰异,考之事实,或不尽然”,无法应付现实的需要,于是他计划依据自己所接触到的西方地理学新知识点,尝试建立一套全世界地理的研究模式。1844年他在厦门与西洋人商讨具体事项时,结识了担任译员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向这位“西国多闻之士”请教自己在学习世界地理中碰到的难点。徐继畲还利用职务之便,求教于美国传教士甘威廉(W. H. Cumming)、英国首任驻福州领

事李太郭(G. T. Lay)及其后任阿礼国(R. Alcock)和夫人,“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⑮《中国丛报》的报道称他是中国官员中对西方地理极其感兴趣的人,会一个下午连续与传教士谈论着世界各国的情况。^⑯由于徐继畲注意和善于利用世界地理的新知识,使其所著的《瀛环志略》成了“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著作”。^⑰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在自然地理、区域地理、地名学、地志学方面为晚清世界地理研究建立了一整套规范。传统汉文文献中大多以“东南洋”、“西南洋”、“小西洋”、“大西洋”来看待世界。即使魏源《海国图志》的基本框架仍是分洋,而不是分洲。这种先把全球分为东南洋、西南洋、小西洋、大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六大块,并把各洲附于各洋底下的模式,实际上仍是以中国为中心来确定方位,将世界各国地理围绕着中国来叙述。以分洋为基础,就不得不与分洲的安排相桉凿。洋有六,而洲仅四,结果就无法得以对应。^⑱而《瀛环志略》卷一“地球”则以四大洲(亚、欧、非、美)和五大海(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南冰洋)来划分全世界,注意了自然地理上大陆与海洋的区别。在介绍各国时,也往往是首叙一洲概貌,然后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将一洲划分为若干区域,各洲之下再分国叙述,这是近代区域地理方法对徐继畲产生的影响。徐继畲曾计划把《皇清一统舆地全图》置于亚洲全图之后,因为好友张穆的忠告,才不得不违心地在正式出版时将其置于亚洲全图之前。《瀛环志略》全书分十卷,卷一至卷三分述地球的基本知识和亚洲各国地理,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以及大洋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卷四至卷七分述英、法、意、俄、

奥、普、希、比、荷、西、葡、丹、瑞典、瑞士等欧洲各国地理；卷八叙述非洲各国；卷九、卷十介绍南北美洲，内容涉及了这些国家的方位、疆域、地形、山脉、河流、气候、物产、人种、风俗、政区与历史沿革等等。在地名译述的选择上，徐继畲继承了先秦以来的“约定俗成”的原则，指出“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原因是由于“外国同音者无两字，而中国则同音者或数十字；外国有两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国无此种字。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加上外国人居粤东，又带上了粤东土语，于是波斯被译成“白西”、“包社”、“巴社”，甚至变成了“高奢”。因此，他主张译专有名词一定要依据“因俗定契”的原则。不少地名的译述虽然不是《瀛环志略》的首创，但徐继畲在地名译述的取舍方面，如“日耳曼”、“维也纳”、“伯尔尼”、“摩纳哥”、“荷兰”、“瑞典”等等，显然比同时代或后代的一些译著要更接近于今人“约定俗成”的译名。还有一些专有名词，如《四洲志》把美国国会的“议员”（Representative）音译为“里勃里先特底甫”，《瀛环志略》译为“贤士”；《海国图志》把“议会”音译为“巴厘满”（Parliament），《瀛环志略》则译为“公会”；并以“爵房”译上议院，“乡绅房”译下议院；蒋敦复的《英志》把总统音译为“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瀛环志略》译为“总统领”。不难看出，《瀛环志略》采用的译名方法，较之同代人的著作更准确、更适宜于中国读者的理解和接受。^⑩《瀛环志略》规范的基本框架、内容编次和译名方法，都对后来的世界地理学著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道、咸年间，吸收和研究西方地理学的成果来撰写世界地理的著作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如汪文泰（1796—1844）有《红毛番英吉利考略》（1841）、陈逢衡《英吉

利纪略》(1841)、何秋涛(1824—1862)《朔方备乘》(1843)、梁廷枬(1796—1861)的《海国四说》(1846)、姚莹《康輶纪行》(1848)等等。这是一个对于某一组问题的特定研究路线有共同的信奉而聚集在一起的学术圈子,笔者把它称为“非体制化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准确边缘比较难确定,其成员是以兴趣为基础聚集在一起的,并不以地理上的接近和所属的地位为基础,在地理上是分散的,有的成员甚至于从来没有发生过面对面的接触,也没有正式的领导人,其交流一般是靠地理学文献的影响和间接的互动来实现的。

三、以《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 为中心的交流网络

晚清这一非体制化的地理学共同体有着自己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学术交流网络。道光二十年(1840),魏源在浙江前线参加抗击英国侵略军,为了解敌情,他参与审讯英俘,从英俘口中得知了许多英国的情况,他将审讯记录整理成《英吉利小记》。他的研究取向深得林则徐的赞赏。1841年在浙江军营效力的林则徐再度遭贬斥,被道光皇帝命令遣戍新疆伊犁。林则徐在扬州奉命折回东河,效力“赎罪”,于京口(镇江)与魏源进行了长谈,嘱其将自己译编的《四洲志》增编扩充。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开始,魏源以《四洲志》为蓝本,加以整理、扩充,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编成了《海国图志》50卷。^①并在序言中首先声明:“《海国图志》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并近日夷图、夷语。”^②从道光二十六年(1846)到二十七

年(1847)扩充为60卷。1844年秋,徐继畲已完成了《瀛环志略》的初稿《瀛环考略》的稿本。也许是看到了《海国图志》的面世,他对自己的著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以后五年的时间里,他不断地修改、补充,“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②据已发现的两种全稿、四种残稿的粗略统计,前五种稿本正文680页,143845字,窜改增补达1907处。^③1848年徐氏《瀛环志略》出版,马上引起共同体成员的重视,咸丰二年(1852)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100卷,吸收了《瀛环志略》戊申版(1848)的研究成果,从此书中引用的资料多达30余处。^④咸丰年间版的《海国四说》在按语中也不断比较《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两书有关地理名词的考释。

地理学文献是地理学共同体各个成员研究工作之间的正式联系的途径。《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是晚清地理学共同体成员之间产生联系、发生影响最大的两本书。19世纪40—50年代主要在地理学共同体中流传,并首先在日本引起反响。1853年《海国图志》60卷本和《瀛环志略》相继传入日本,有识之士如广濑旭庄、桥本佐田等对《海国图志》不断进行搜求和朱批;自1853年幕臣川路左卫门尉圣谟首命学者盐谷世弘训点翻刻开始,以后各种翻刻、训解、和解、校正本,几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1854年后的一二年间,《海国图志》的“训点翻刻本”与“邦刻本”等便有20余种。^⑤《瀛环志略》在日本也大受欢迎,1861年出版有德岛小西等同刊的对唱阁本,由井上春洋等训点,该版在印刷和装帧的质量上远远超过了同

期的中国版本,地球图用红、黄、绿三色套印,人名地名有英、日两种文字注音,年代日期则用日本纪年标示。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两书也发生了“出口转内销”的现象,影响开始越出共同体而波及整个社会。在清末的半个世纪中,《海国图志》有14种刊刻本。^⑥《瀛环志略》则多达18种刊刻本。^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指出:“此两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⑧实在说得非常中肯。

围绕这两本书,清末的学者曾进行过特点的比较分析。王韬这样评论道:“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环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已……此二书者,各有所长,中丞以简胜,司马以博胜。”^⑨康有为也是“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础。”^⑩他还对两书进行了比较,指出:“《瀛环志略》其译音及地名最正,今制造局书皆本焉。《海国图志》多谬误,不可从。”^⑪李慈铭则从儒学正统论的角度发表了评论,认为《瀛环志略》“用心可谓勤,文笔亦简净。但其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海国图志》“体大思精,真奇书也。”因为其书采纳杨光先《不得已》中的见解,“以挾天主教之妄”。^⑫《皇朝经世文四编》卷10中有《问魏氏〈海国图志〉与徐氏〈瀛环志略〉考证孰优》一文,就两书的具体记载进行比较批评。该文作者还专门讨论了征引材料的规范问题,指出《海国图志》引用了《瀛环志略》的内容,却未在叙中加以说明;《俄罗斯国总记》的五千余言均引用《四洲志》之文,却未著书名。^⑬其实《海国图志》百卷本在辑录《瀛环志略》材料时,是冠以书名的。《俄罗斯国总记》卷首也注明了林则徐译、魏源重辑,不

能说是“攘美”之举。

《海国图志》出版不久,就在共同体中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曾在台湾抗击英国侵略的地理学家姚莹写道:“近岁邵阳魏源字默深,得林尚书所译欧罗巴人《四洲志》,更以旧闻异域之书十余种,遍加考证,作《海国图志》六十卷。通中外之异言,订地名之沿革。诸国崇奉佛教、回教、天主教之异同源流,大山巨泽之原委分合,五天竺、俄罗斯、英吉利、佛兰西、弥利坚、利未亚各域内区分之部落,贸易攻战之所长,金银货贝之所出,无不详载言之,如指诸掌。皆有根据,非凭臆说。余四十年之所欲言所欲究者,得默深此书,可以释然无憾矣。”^④《海国图志》说出了他数十年所欲言、欲究的事情。陈澧在批评《海国图志》“以夷款夷”论点的同时,指出:“其书罗列荒远之国,指掌形势,可谓奇书!”以后魏源来粤,陈澧还当面就《海国图志》中的观点同其商榷,“魏君大悦,遂定交焉,并屡改《海国图志》之书,其虚心受言殊不可及也。”^⑤郭嵩焘在《书〈海国图志〉后》中赞扬该书对明清以来的汉文西书“征引浩繁”,尽管“有参差失实”,然“其大旨在考览形势,通知洋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其论开始“无不笑且骇者,历十余年而其言皆验。”郭嵩焘认为这是因为魏源“读书多而见事明”,“其议论乃以卓绝天下,亦岂非学问之效然欤!”^⑥从地理学角度对《海国图志》提出批评的有冯桂芬的《跋〈海国图志〉》(《显志堂文稿》卷2)、田梓材的《读魏默深先生〈海国图志〉》、舒润的《读魏默深先生〈海国图志〉》、姚炳奎的《魏氏〈海国图志〉近日应改应增举例》,田梓材和姚炳奎都认为《海国图志》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繁征博引,收罗宏富”,他发奋著述“欲使天下豪杰之徒,闻其言而深有感奋,以孜孜讲求于当世之务”,以改变“嘉庆、道光

以来海内学者多讲求时文试帖、声音训诂之学，浸成风气”。^②有关《海国图志》的讨论，还有吴承志的《读〈海国图志·元代北方疆域考〉》、^③何秋涛的《朔方备乘·考订海国图志》、林传甲的《国志通义》、孙灏的《海国图志证实》等。^④

在共同体的成员中，在学术上对《瀛环志略》有过比较充分的讨论和积极的回应。梁启超是1890年赴京会试途中，在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⑤由于《瀛环志略》15万字，篇幅较小，以简取胜，颇受那些出洋考察或充当使节的中国人的欢迎，他们大多随身携带此书，并随时查阅。如1867年出使欧洲的斌椿，1875年出使欧洲的黎庶昌，1876年出使欧洲的郭嵩涛和刘锡鸿，同年游历欧美的李圭，1890年出使欧洲的薛福成，1894年出使日本的黄庆澄，沿途都对《瀛环志略》的记述进行了校对。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盛赞道：“所经过山川城市，风土人情，《瀛环志略》所载，十得七八，乃叹徐氏立言之非谬”。^⑥斌椿写道：“自古未通中国，载籍不能考证，惟据各国所译地图，参酌考订，而宗以《瀛环志略》耳。”^⑦丁谦也利用新近出版的《印度史指要》、《印度志》及《马哥博罗游记》等，指出了《瀛环志略》“以非洲北境之阿比西尼亚为马八儿，努比亚为俱兰”，是“臆度无据”。邹代钧则根据自己实地考察，指出印度马德拉斯邦有地名马拉巴尔，与锡兰只隔一道海峡，《元史》中的“马八尔”应为此地，“俱兰”亦应相去不远，可能即《宋史》的注辇，《明史》的小葛兰，这几个地名都是“一声之转”。^⑧一些成员也开始了续补、增订的工作。如咸丰年间何秋涛的《〈瀛环志略〉辨正》1卷，附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新化三味书室校刊本之后，对该书有关俄罗斯的记述错漏进行订正；光绪十四年（1888）有周官锦撰的《瀛环志

略节录》，并附杂碎语；光绪年间有刊载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中的署名“毅”的《瀛环志略订误》；光绪二十四年（1898）有游五大洲人的《瀛环志略续编》；光绪二十六年（1900）张煜南的《海国公余辑录》收有《辨正〈瀛环志略〉》、《推广〈瀛环志略〉》各一卷，考订补充了有关资料；光绪二十八年（1902）李慎儒刊有《瀛环新志》10卷，退思斋石印本。在续补、增订《瀛环志略》诸家中成就最著的要推薛福成。薛氏的《续瀛环志略》是由其主译的亚洲部分的《续瀛环志略初编》（1902）、欧洲部分的《英法义比国志译略》（1899）、《土耳其国志译略》、《罗马尼亚国志》、《塞尔维亚国志》、《布加利亚国志》、《门得内各罗国志》（以上均为1901）、《希腊国志》（1902）以及非洲部分的《阿非利加洲》（1901）这三个单元组成。原计划是依徐继畲《瀛环志略》的体例，首亚洲、次欧洲、次非洲、次美洲、次澳洲，待全稿修订完成后，再“统一编次”，可惜由于薛福成的逝世，我们未能看到《续瀛环志略》全编本的出版。^④

当时的一些西方人也关注着晚清的地理学共同体，1847年的《中国丛报》中记载了《海国图志》的出版，认为该书的发起人是林则徐，编辑《海国图志》的目的在于讨论蛮夷的战术能力与长处，以推进中国的适应力。传教士郭实猎还摘译给英国当局，英人威妥玛还将《海国图志》内有关日本岛的部分译成英文，刊载于《中国丛报》。1851年4月的《中国丛报》又就《瀛环志略》作了报道，认为该书成为中国地理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它比中国出版的任何一部提供给高级官员和文人的有关地球上其他国家的资源、计划、位置的读物，都要高明得多。^⑤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在1883年据其1853—1854年由墨海书馆初版的《地理全志》，另出删改本时写道：“兹所讲之地

理,只论地土形势及水,分派洋海湖河;暨万国人民、风俗、土产等,向中土文人略识之。”他称删改本是仿《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之意,“专以外国地志为本,希中土儒林,披而获益。”^⑥1897年新会学堂还刊有他与陈侠君辑订的《瀛环志略续集》。1902年文贤阁有《海国图志续集》石印本,卷首有高丽洋海关税务司邓铿写的小序,卷1至卷12有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与瞿昂来译的英国麦高尔辑著的有关英、俄、土、印度等国际关系的内容;卷13是傅兰雅口译、徐建寅笔述的英国贾密伦和裴路撰写的轮船布阵等内容。据说同文馆曾刊有林乐知的《续海国图志》,共20卷,内容大多介绍海战知识,与《海国图志》并无直接关系,后附于魏源《海国图志》,作120卷本。^⑦

在清末的短短的几十年间,由如此之多的学者参与的、就两本地理学著作进行范围如此广泛的讨论,甚至引起了国际汉学学者的注意。智力的互相碰撞和互相激发,大大调动了地理学学者群体的智慧与热情。这种交流网络在中国传统地理学学术界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交流体系的建立,只能通过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四、邹代钧与清末体制化 地理学共同体的初建

清末最早的地理学学会是邹代钧创办的地图公会。邹代钧(1854—1908),字甄伯,又字沅帆,湖南新化人。他出生于一个舆地世家,祖父邹汉勋是清代著名的舆地学者,同魏源有交往,为魏源的《海国图志》编绘过列国地图,撰有论述中国传

统测量理论和地图绘制方法的《极高偏度说》和《宝庆疆里图说》。父亲邹世繇,曾助邹汉勋修《贵阳府志》。邹代钧从小耳濡目染,致力于地理学,通晓历代疆域沿革,精于测绘之学。光绪十一年(1885),经两江总督曾国荃推荐,邹代钧得为刘瑞芬出使英俄的随员。^⑧他的《西征纪程》,记录了赴欧沿途经过的国家和地区的地势、疆域、山川、海洋、政教、历史、风俗、物产、时事等。在国外期间,他还特别留心研究西方测绘地图新法。光绪十五年(1889),邹代钧返国,带回了各种欧美诸国的地理书籍与图册。光绪十七年(1891),湖北舆图局成立,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邹代钧出任该局总纂,主修《湖北全省地图》。在邹代钧的主持下,历时四年,于1894年完成测绘任务,所成的湖北地图为当时各省舆图中最佳本子之一。^⑨此后,邹代钧在武昌译书局任海国地图编辑。

早在光绪三年(1877)四月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就注意到英国地理学会,并参加过该会的活动。他把地理学会意译为“地理学馆”,或直接据“Geographical Society”音译为“奇约喀刺非尔苏赛意地”。光绪四年(1878)正月初六,他还派精通地理学的随员李丹崖去地理学会听取了美国探险家、记者斯丹雷(今译斯坦利)有关李文斯顿非洲探险的报告。^⑩对于这种外国地理学同行的交流活动表示出浓厚的兴趣。19世纪80年代曾编译过日本陆军省《日本地理兵要》的姚文栋就指出日本已有“士民私立”的“东京地学协会”;^⑪在给葛子源的信中认为葛氏有续《海国图志》的宏愿固然可贵,但毕竟所成的仍是“一家言”,他认为应该利用学会的集体力量来获取更大的学术成果:“方今五洲广通,翻译辈出,鄙意欲仿外洋通例,设立地学会,联合四方同志为一局,互相考求。又与各国地学会

中通信往来,广征书籍,此即西人所云交换知识之法。移通商局面运之于学问一途,集五洲才人之心思,为吾一国之利益,行之数十年,欧美情形必洞若观火矣。岂不胜于钻研汉文故纸,一手一足为烈者耶?”以为即使魏源“生于今日,吾知其亦必出于此策也”。^④

1894年甲午一战的惨败,使中国人日益感到民族危机的严重。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从各种角度寻找国家强弱的原因。郑观应认为学会是推动学术发展的最佳手段:“公会学者,设会以资考究辩论也,如天文会、地理会、丹青会、花木会、医学会、算学会、救生会、格物会、化学会等,通伦敦城凡一百三十九所。每会皆有公社,崇旗广厦,宏敞壮观,入会者尝数千人,按年分捐公款,各会主皆以世爵富绅充之。每天文有新星,地球有新地,格物、化学有新理,花木有新种,或思新法,或拟新章,或创新工,则约期入会,互相辩难,盖欲精益求精,以期登峰造极。”^⑤1895年6月30日,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指出西方国家强盛的一大原因就是西方有各种学会的设立:“外国凡讲一学,必集众力以成之,固为集思广益,观善相摩,亦以购书、购器,动费巨万,非众擎则不举。……考地理则有地理之会,凡言地理者皆聚焉。英国阿侯为亚洲地理会首,醴金派人游历我亚洲,自东土耳其、波斯……及我国蒙古、西藏,测量绘图,穷幽极险。”^⑥邹代钧也指出:“英国兵部海部之舆图学(会),开办至今二百余年,未尝或辍。是知彼之雄长五洲,于地理故研求有素焉。”^⑦而当时能见到的汉文世界地图有《瀛环志略》本,《海国图志》本,江南制造局的《地球图》译本,“皆照西人原图译出,然展转绘刊,不无差移;且分率过小,山川形势仅得仿佛。近日所印《万国舆图》及《中外地舆图

说》,尤为疏陋,盖书贾射利之作,不足责也。”他在随使赴英法期间,购得德人所作地图集,“方尺之幅百纸,精绝冠泰西,于天下各国皆备,惟欧洲各国则甚详,余尚嫌略。”同时还收求到许多单幅地图,如俄人的中亚西亚、西比利亚二图;英人的印度、缅甸、暹罗及北亚美利加、南阿非利加等图;法人的越南图;德人的南洋群岛图、啊非利加洲图,邹代钧认为这些地图“均称精详,足补图本之缺。”计划用统一的比例,以上述这些图本为底稿,“其略者则增人,各单幅尽行译绘,付之石印。”他认为这一译图工作“有益于国、有裨于学者,西人为之无不众志成城,一倡百和,故无难举之事,无不兴之业”,中国地理学界的当务之急也是尽快创立同人译印地图的共同体。他的想法得到了好友吴德潇、陈三立、汪康年“极力怂恿”,不仅设法为“地图公会”招股以期事业必成,而且又引王秉恩、志钧等作为邹代钧的助手。^④1895年译印西文地图公会在武昌成立。^⑤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清政府下令禁止学会,邹代钧就将“地图公会”改为“舆地学社”,^⑥后又改称“舆地学会”。

“地图公会”的主要工作是译印西文地图。计划译印的共409幅。^⑦其中:大地平方总图1幅,亚洲图共209幅。计亚细亚洲总图1幅,东三省、蒙古、新疆兼俄罗斯亚洲地图100幅,西藏兼印度图32幅,暹罗图4幅,越南图6幅,缅甸图2幅,高丽图2幅,日本图4幅,南洋群岛图50幅,土耳其亚洲地图4幅,阿刺伯图4幅。欧洲图共54幅。计欧罗巴洲总图1幅,德意志图4幅,瑞士图1幅,奥斯马加图4幅,意大利图2幅,法兰西图4幅,西班牙、葡萄牙图4幅,荷兰、比利时图1幅,丹麦图1幅,英吉利图3幅,俄罗斯、瑞典、挪瓦图24幅,

土耳其图 4 幅,希腊图 1 幅。美洲图共 91 幅。计北亚美利加洲总图 1 幅,加拿他图 4 幅,加拿他分图 3 幅,米利坚图 24 幅,墨西哥图 16 幅,中美洲五国、西印度群岛图 18 幅,南美洲总图 1 幅,南美洲分图 24 幅。阿非利加洲图共 31 幅。计阿非利加洲总图 1 幅,阿非利加洲分图 30 幅。澳洲图 8 幅。计澳斯大利亚岛总图 1 幅,澳斯大利亚岛分图 7 幅。另外还有印度洋岛图 2 幅,太平洋岛图 3 幅,大西洋岛图 3 幅,地中海岛图 2 幅,北极下地图 1 幅,南极下地图 1 幅。计划编印的中国各省图共 260 幅。地图采用统一规格,“每图一幅,东西一尺四寸,南北一尺,积一百四十方寸。全图六百幅,计八万四千方寸。现拟以十人开绘,……约需时五年,方成全图。”如果印千份则需实本洋 31 100 元。^⑩

为了加快地图的译印工作,邹代钧还接受了在学会里承担雕刻地图铜板工作的侄子邹焕廷的建议,赞同他建立一个专业地图出版社,除从地图学会拨给部分地图资料、仪器和地图铜版外,还给邹焕廷五千大洋作资金,并派他去日本东京、上海、南京等地考察地图的编绘与印制技术,又从日本购进了制图仪器与机器,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建了亚新地学社。^⑪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地图公会的子机构。邹代钧主持的这一体制化地理学共同体究竟译印了多少西文地图,目前还缺乏精确的统计。1902 年的《增版东西学书录》列有“《舆地社舆地全图》六百七十幅,舆地公会日本铜印本”,并指出“《西北地图》九十幅已出”。^⑫1904 年的《译书经眼录》列有“《五大洲总图》六幅”和“《清朝一统舆图》一幅”,都是舆地学会的译印本。^⑬这样算来,正式出版的似乎有 760 多幅。也有的学者认为:“后因经费十分困难,并未出齐。”1897 年首出西伯利

亚、中亚细亚地图共 94 幅,1903 年在管学大臣张百熙的赞助下,方将已完成的图稿集陆续出版。如 1903 年有《中外輿地全图》、《皇朝直省图》、《五洲列国图》;1906 年有为配合高等小学课本《中外地理志略》的教学用图《中国地理图》和《外国地理图》;1907 年有在京师大学堂使用的《本国地理讲授图》、《东洋历史图》、《支那疆域沿革图》和《湖南全省分图》;1908 年有《湖北全省分图》和《西藏全图》。^④

地图公会有着一个良好的交流网络,不仅在国内联络同人,号召“天下有志輿地学者,均可如社共相切磋”。1896 年还由上海时务报馆兼办。在文献信息方面,“凡中外新出輿地图书必购存之;应译刊者即译刊。”同时还与各国地理学会保持经常的联络,“如各国疆界建置有改变,山川有新测者,即购新图重译,更正底本,并与泰西地理公会订约,互相考究”。^⑤图尚未印出,读者已开始征订,当时在总理衙门任章京的张元济向在沪的汪康年“乞惠邹译地图样张一纸”,并称:“都门购者不少。”张元济对邹代钧译绘之图是满意的,他建议汪康年主持的《时务报》采用邹图所译地名,“该图亦可畅销于今,不朽于后矣。”^⑥作为一个专门译绘西文地图的共同体,该会还为译绘工作制定了一系列规范。邹代钧一方面批评《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所绘地图的不够准确,一方面又继承了两书强调的“以西洋人谭西洋”的方法,即最大限度地使用西人第一手资料和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在译绘中外輿图方面,“内地各图以胡(林翼)图为底本而参以近今所出新图,如各省通志,本地州府州县地图。光绪十六年本三省黄河图,德意志人所作盛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六省地学图,英吉利海部所作长江、白河、西江及中国沿海图,日本人所作朝

鲜、盛京、山东作战图,黑龙会前后所作最新满洲图,英吉利人游历西藏地图,俄罗斯人所作东三省、蒙古、新疆地图,洪文卿侍郎(钧)中俄交界图,许竹筠侍郎(景澄)西北中俄界图,邓铁香京卿(承修)中俄定界图,薛叔耘星使(福成)中缅定界图,均辜榘其形势,消息其详细,兼收并采,一一收入……。”外国地图则以德国地图集为底本,不详者以他图的单幅补充,“往往一图而六七易稿”。^⑥邹代钧在制图时还根据经纬网和方里网之间的相互推算方法,将图上计里画方绘法转化为地图投影法。他不仅将外国地图上的外文译成中文,而且将经纬度改成以中国北京子午线为起始子午线,并将各种地图上不同的比例尺改用自制的中国舆地尺,每尺长度 = $40,000,000 \div 129,600,000 = 0.308642$ 米。^⑦梁启超评价清代地理学进步一节中曾就此特别指出:“邹沅帆(代钧)自制中国舆地尺(一华尺等于百万分米特之三十万又八千六百四十二),以绘世界全图。凡外图用英法俄尺者,悉改归一律,无论何国何地,按图可得中国里数分率之准焉。”^⑧对这一“中国舆地尺,当时各国之深于测算者,都佩服其精审。”^⑨钱基博称赞邹代钧“译绘西人地图,原本比例,有用英法俄尺者,悉据中国舆地尺改归一律,无论何国何地,按图可得中国里数分率之,五千年来未有也。”^⑩邹代钧还引进了不少先进的绘图方法,如在《中外舆地全图》中出现的“外国之城镇村大致以人数多少为分别,人数不及三千者作○,三千以上者作⊙,满万人作◎……”这是中国人编制的地图上最早出现的人口划分等级图例,^⑪至今仍为地图绘制者所采用。

地图学会推出的各种地图中,以1903年舆地学会出版的邹代钧译编的《中外舆地全图》影响最大。该书共68幅,合订

一册,计总图 1 幅,全国图 1 幅,中国分省图 24 幅,世界各洲各国图 38 幅,群岛图 2 幅。经清政府学部审定作为全国的“中学课本”。这是中国近代民间编制并公开出版小比例尺地图的开端,也是学校教学用地图出版的首创。^③后世编绘中外地图集多以此书为主要参考资料,如 1906 年周世堂、孙海环译编的《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就是以此图册为基础编绘的。1909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奚若编纂的《世界新輿图》也参考了輿地学会出版的《中外輿地全图》,并在例言中指出该图“译音悉本学部审定之邹氏《中外輿地全图》,以期画一”。^④罗汝楠编《中国近世輿地图说》所绘各图也有不少以“邹图为底本”。^⑤清末不少地理学教科书也是以地图学会所出的地图译名为准。如 1910 年国民教育社出版的《(新体)高等小学中外地理》称:“本书中国地名皆以官书,外国地名大概依邹氏輿地学会地图。”^⑥地图学会主要是由邹代钧创办并维持的近代中国第一个体制化的地理学共同体,他“为翻印地图,倾家荡产,炊烟几绝”。^⑦他因病不能主事,学会也趋于衰落。由其侄子邹焕廷创建的亚新地学社事实上成了地图学会的继承者,该社在中国维持了半个多世纪,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成立最早、历史最长、出版地图最多、在社会上流传最广、贡献最大的一家私营专业地图出版社。^⑧20 世纪初的一位学者曾把以邹代钧为代表的这一派称为近代地理学史上的“新化家”：“我国言山脉,固有山经专家,然多限于内部,且界限不甚明显。是派崛起,一洗旧习。界以江河,分内部山脉为三大干,深得《禹贡》之意,其创始伟人,即新化邹代钧,故学者以新化家称之。邹氏又长于輿图,组织輿地公会,著述中小学教科,得以沾溉士林。有大地图七百五十幅,内地各图,以胡图为底本,而参

以近今所出新图。国外以德人所作为底本,而参以英法所出各图。……言山脉、言外国地理者多宗之。”^⑨虽短短数语,这一体制化共同体的特点及其贡献基本得到了界定。继邹代钧再起,创办体制化地理学共同体的是张相文。

五、张相文与中国地学会

中国地学会是近代体制化地理学共同体的代表。研究中国地学会不能不首先论及张相文。张相文(1867—1933),字蔚西,号沌谷,生于江苏桃源县南园。早年刻苦攻读,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举。甲午战争期间,正在淮滨书院执教的张相文从《万国公报》中获得了中日战争的零星消息,把购到的一张中国地图挂在墙上,凡与战争有关的要地,均在图上——标出,并向学生讲解。他对地理学的兴趣就萌发在那个年代。他开始注意江南制造局的地学译书,购买了不少上海土山湾天主堂出版的地理图说。1899年他到上海入南洋公学充师范生,并在留学预备班讲授国文、地理。暇时阅读卢梭的《民约论》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并结识了章太炎、张謇、吴稚晖、蔡元培等,经吴稚晖、章太炎介绍,参加了同盟会。他是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为了让国人倍增爱国之心,激发爱国热情,他将在公学授课的地理讲稿编成《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前者共二册,由南洋公学1901年初版,后者共四册,由上海兰陵社初版。它们各自是中国第一部初等和中等地理教科书。“两书流行,达二百余万部,出于意料之外,由是海内谈地理者无不知之”。^⑩另外,1902至1904年间他还编有《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和《蒙

学外国地理教科书》(均为文明书局版)、《中国初等地理教科书》上中下三卷附教授法一卷(南洋公学版)。^⑧

在南洋公学任教期间,他从日籍教师栗林孝太郎、藤田丰八学习日语;经二三年的学习,日文已通,1901年他编译了日人后闲菊野和佐方镇子合著的《家事教科书》(文明书局版),又与傅运森、白作霖合译出日本《太阳报》特刊《列国岁计政要》(海上译社版)。1902年从日文转译了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比较完整地介绍了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观点。1906年他任淮阴江北师范学堂教务长,1907年任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教务长,旋任该校校长,并兼授地理课程。1908年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普通自然地理学师范教材——《新撰地文学》。1909年创立中国地学会,1910年创办《地学杂志》。民国年间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兼职图史编纂处,著有《中国地理沿革史》、《江苏省志》、《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南园丛稿》等。^⑨

戊戌政变后,学会活动经历了短期的停顿之后又出现了空前的高潮,张玉法统计到的清末10年间的各种学会社团有668个,而桑兵估计要超过2000个。^⑩中国地学会正是在清末学会雨后春笋般兴起的背景下创办起来的。在近代中国地理学史上,中国地学会也是和张相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应直隶提学使傅增湘之聘,出任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教务长,旋任该校校长,兼授地理课程。他认为“近世以来,持帝国主义者,类能浮海辟新地,以蕃殖其种族。而我国地大物博,坐资强敌,外交失败,边事日亟,虽欲划疆自守,聊固吾圉,而尤不可得,呜呼!惰农荒亩,邻犁侵耕,老渔醉眠,窃人割网,同处漏舟之中,共集危巢之下”,“西力东

渐,万里神皋乃为他族权利竞争之场。数年以来,非惟边徼多事,内地亦几遭蹂躏而莫敢谁何。推原祸始,实由地学隔膜,有以增敌之骄而短我之气”。在教学的过程中,他深感“博稽载籍,既言人人殊,耳目所接,足迹所经,检查测量,又苦其有限”,因而“怀集思广益之心”。他指出:“乌获举鼎十步而喘,弱夫百人负之而趋;良工造车三日不成,漆斫不兼旬日而就,天下事独立则难,分工则易,昭昭然矣。”19世纪是世界地理学迅速发展的世纪,这与当时各国地理学会的出现密切相关。到1875年,欧洲已有了28个地理学会,1839年在巴西、墨西哥,1852年在美国,1879年在日本先后成立了地理学会。张相文以为“东西各国,考查地理,罔不有正式集会,领以亲贵之官,辅以探险之队,诚重其事而分其任也。”^⑧他希望联络全国地理教师以及其他热爱地学的知识界人士,组织研究地理学的共同体“中国地学会”,以借助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来推动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张相文邀集直隶提学使傅增湘等官员,以及张伯苓、白毓昆、陶懋立等学者百余人于宣统元年(1909)八月十五日(9月28日)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成立“中国地学会”。

中国地学会是一个体制比较严密的地理学共同体。该会明确表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是“以联合同志,研究本国地学为宗旨,旁及世界各国,不涉范围以外之事。”“凡有志研究地学者,或由本会会员介绍,或投函本会,由会员认可,皆得入会。”会员有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如每年须纳经常费二圆;除已担任本会职务者,都有调查报告的责任;一旦有关系重要的、或新的发明者,学会将“赠予相当之酬报”。在会会员如果损害了本会的名誉或过期不交纳会费而屡催不应者,皆

得退会。^⑤根据会章,该会设会长一人,编辑部长一人,编辑员若干人,评议员若干人,干事部长一人,会计员正副各一人,书记员一人。总理由傅增湘担任,蔡儒楷、袁希涛、顾琅、英华等官员和知名人士为评议员,会长张相文,编辑部长白毓昆,干事部长吴鼎昌等。除总会外,各地还设有分会。中国地学会还在国外派驻外交员,负责对外交流事务,1911年曾派王桐龄为驻东(日本)外交员,1912年派魏耀亨为驻法外交员。中国地学会还承担了为地学研究募集捐赠的社会职能,除义助银圆外,有不少是义赠图书的,所赠书有《中等地理》、《师范地理》、《会稽三赋》、《长白汇征录》、《望都县志》、《东安县乡土地理》、《蒙古说略》、《吉林调查局文报初编》、《奉天调查局公牍摘要初编》、《世界地理提要》、《日本地志》、《世界语发生史》、《英国地理杂志》;所赠图有《河南省图》一册、《河内地图》一幅、《奉天府厅州县图》十六幅、《京北县庭略图》四张、《世界大地图》一幅、《五洲列国图》一册,另有安阳矿石八种等等。^⑥

中国地学会有着发达的交流网络,会章规定有定期的常会和不定期的临时会两项,常会每月第一星期、第三星期开会,各会员均得陈述意见,讲演心得。临时会是在会中有急务或延请名人讲演,则由会长先期登报通告。名人演讲和出版学术杂志是清末地学会交流网络的两个主要方面。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十四日美国学者德瑞克讲师在地学会作了“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的特别演讲,由王世英口译、耿兆栋笔述。宣统二年(1910)四月初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璩伯作了“山西旅行谈”的特别演讲,由陶孟和口译、王延祉笔述。同年五月十三日的特别会上,陶孟和作了演讲。宣统三年(1911)四月二十三日的特别会上,王志一作了“加罗林、麻

绍耳二群岛民物生活情状”的讲演。这些都先后刊登在地学会的学会刊物《地学杂志》上。表明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地理学已能够与 20 世纪初的世界地理学界展开一定程度的学术对话交流。

《地学杂志》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地理专业的学术期刊。宣统二年(1910)正月二十日(3月1日)出版第1年第1号。月刊,第1、2年在天津出版,由中国地学会编辑及发行,1912年因为中国地学会迁往北京,第4年(1913)起,也迁至北京出版。^⑦根据《地学杂志叙例》,该刊为中国地学会会刊,“拟以见闻所得,汇录杂志,其体裁则略依史例,变易其规,经以中夏,纬以列邦,搜罗故实,博采新闻。其目的则注重民生之消长,物产之盈虚,疆圉之沿革。国际为尚,教材次焉。其文章则恢奇博丽,不限一格。撷精味腴者取之,追幽凿险者取之,崇论宏议者取之,其他民俗歌谣,蛮书虞志,凡有关于地学,足以发人深省亦汲汲焉取之。”^⑧该刊栏目设置共分七项:

1) 图迹: 每期在文章之前刊登地图及照片;如先后刊有邝荣光绘的《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另有《大连市街图》、《野狐岭南望》、《蒙古地汉人之村庄》、《实测塔里木盆地图》、《侏罗纪地质图》、《纬度总律图》、《唐贾耽禹迹图拓本》、《万里长城》等。

2) 论丛: 刊载学术论文,初以译文为多,如杜之堂译日人石井八万次郎著的《楚蜀之山形地质谈》,史廷扬译中村清二著的《极光之成因》、《梅雨发生论》,可权译佐藤传藏著《冰河原始论》,张星烺译美国斯坦福大学唐雷博士著《地轴移动说》等。以后中国人自著的日渐增多,如陶懋立《世界通商地之沿革》和《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章鸿

钊《论杭属以石灰代肥之隐患》，陶昌善《地力说》，白月恒《渤海过去与未来》，陈学熙《中国地理学家派》，熊秉穗《中国种族考》等。

3) 杂俎：分内外编，内编专登有关本国地理的各类文章，如傅增淞《承德府调查记》，李六生《筹广西》，赵允元《赤峰州调查记》，章甫《象山港游记》，陈恩荣《直隶黄河之历史及现象》，晏臣德《旅行四川记》，苏莘《中国铁路纪略》，马登瀛等《新疆行程记》，张相文《滦阳纪行》，英华《关外旅行小记》，张睿《复淮浚河标本兼治议》，孟森《调查东三省拓殖事宜之报告》等，其中也有若干译文，如张福年译《大探险家司伊芬黑丁氏中国旅行概略》，史廷扬译《钱塘江沿岸之地质》；外编刊登有关外国地理的各类文章，其中大多是译文，如史廷扬译《南极探险》和《阿非利加旅行记》，温继峤译《法领雷沟泥欧岛》，陶懋立译《欧北旅行记》，韩怀礼译《合众国雨量之分布》和《越南现状》等。

4) 说郭：包括议论和地学新闻与陆海资料；如邝荣光《地球说》、张相文《大梁访碑记》、汤捷南《苏彝士河》、李煜瀛《论大豆工艺为中国制造之特长》、佩玉《欧美飞行事业》等，其他还有《中国西北部游记》、《佛教史迹探险》、《中国古代之飞船》、《海底森林》、《湖底寺院》、《火星世界》、《地球结局》、《探险船之发见》、《欧洲科学之进步》、《佛国古迹》、《缅甸野象》、《土耳其风俗》等新闻报道的节录。

5) 邮筒：包括各种通讯与新旧问题的讨论；如黄海东海、亚细亚之名称、中国火山遗迹、中国河防等问题的讨论。

6) 本会记事：报道地学会的会务及各种消息。

7) 图书评价：介绍中外最新出版的各种图书；如介绍的

中国图书有白月恒著《挂幅中国分省图》(天津北洋师范学堂)、张相文著《新撰地文学》和《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均为文明书局)、陶懋立《世界读本》(文明书局)、顾琅编《(订正再版)中国矿产全图》(上海普及书局);外文图书有伦敦版的《马可孛罗游记》,德文版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支那》和《支那地质图》、德人孟斯德堡的《中国美术史》等。

地理学同行之间“集思广益、观善相摩”的互动,是清末地理学得以加速度发展所必需的要害。中国地学会为清末地理学界同行的定期接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种接触可以发展他们研究工作的共同规范。《地学杂志》又是清末地理学共同体信息快速传递和个体研究能力“智力碰撞”的一个重要的载体,通过不同观点的争论和论辩,新地理学逐渐明确了共同体的“范式”,^④新知识点由一个研究能力传递给另一个研究能力,使新地理学不断绘制出自己新的知识线,一种崭新的知识结构在地理学界新知识量不断地积累和增长的基础上开始形成。

六、中国地理学从传统到近代的学术 转型与近代地理学的确立

笔者已经指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新地理学区别于传统地理学的重要标志是地理学的学术独立、职业地理学者群体的出现、近代地理学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的建立。这三者都是在清末西方地理学传入的背景下形成的,中国地理学从传统向近代的学术转型,是与引进、吸收和融会西方地理学学术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近代地理学是中西地理学交融的产物。

中国有着悠久的地理研究的传统,《周易·系辞》中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表明早在先秦时代已经有了专指地表形态的“地理”一词。自东汉班固《汉书》有《地理志》始,正史中就有了以疆域政区的建置沿革为主要内容的“地理志”专篇,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地理学从一开始就侧重于地理沿革的考订和社会历史的记述,而比较忽视对于地理环境本身的形态及其变化规律的探索。尽管中国古代地理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与天文、数学、农学和水利工程等学科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传统地理学基本上是历史学的一个辅助学科,正如张相文所言:“吾国地理之学,素视为考据家专门之研究。且其所讲之地理,不过就经史上证据一二事实而已。”^④地理类的图书在中国传统目录分类学上是属于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史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撰写的汉文西方地理学西书,为中国人引入了不少西方地理学知识,但由于这些知识点的较为零散和知识量的相对不足,并未能对中国传统知识结构形成规模冲击,使不少异质知识点被融入传统知识体系而隐含不见。在明末清初西学和启蒙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也注意在地理学研究方法上采取实地考察的手段。如著名的地理探险家徐霞客、地理学家刘献廷、治河专家陈潢,都力图探讨地理现象的成因,刘献廷曾指出:“方輿之书所纪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闻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先后,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确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几句,传之后世,则天地相

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④他不以记述地理建置沿革为满足,进而探求“人地之故”。这些初萌的地理思想上的闪光点,因为考据学的勃兴而被渐渐淹没了。地理学的研究转向了以诠释释史为目的的校注、辑佚和整理古代地理著作为主,传统的地理研究方法仍占了主导地位。

清末地理学的学术独立首先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变化。面对着持有坚船利炮的西方列强,地理学家再度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地理译著中寻找这些“蛮夷”所在的位置。他们在这些几乎被遗忘的明末清初的汉文地理学文献中重新发现了一个辽广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的研究,使传统地理学无论在资料,还是在方法上都显得力不从心。借助于19世纪初以来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地理学译著,一个新的地理学文献的构成出现在《海国图志》里,一种新的研究规范由《瀛环志略》开始建立。继而出现的数量众多、范围广泛的西方地理学译著,^⑤使传统的知识结构无法简单地予以归类,中国地理学面临一个学科整合的问题。地理、地学开始从传统的史部中独立出来,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首先列出了“地理类”和“地学类”,用以归类地理、地质类译著。^⑥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在西学类中设有“地学类”,列出9种西书,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的“地学类”列出了31种西书。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所列的“地理类”收有45种西译和日译的地理学书籍。这多少表明了西方地理学译著的递增,使传统的目录分类已经无法完全容纳这些新增加的知识点。地理学从传统的史部中独立了出来,甚至出现了“商业地理学”这样的子分类。^⑦

地理学学术之独立,还有赖于有独立的职业地理学者群

体的出现。在中国古代没有学术独立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学术只是走向仕途的一个阶梯,因此传统学术重为官所需的通人之学。如果学术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学术就不会有独立性可言。没有独立学术的知识阶层总也难逃人身依附的地位,学者的独立人格便也无从谈起。随着近代化城市的兴起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开拓,清末文化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动向,即科举人仕不再是学者人生追求的唯一选择了。一批从旧式文人圈子中游离出来的没有功名的杰出人物和新式学堂里毕业的青年学生,如文学家(王韬等)、数学家(李善兰等)、地理学家(张相文等)、工程师(徐建寅等)、医学家(丁福保等)、翻译家(包天笑等)、记者编辑(蔡尔康等),正逐渐在清末的学术舞台上唱起了主角。特别是清末科举制的废除,从根本上动摇了政学统一的传统。追求学术本身的目的性,就必然走向专家之学。为官所需的通人之学与为学所用的专家之学,也就成了传统学术与近代学术分野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代学术的奠基人王国维曾指出:“今之世界,分业之世界也。一切学问,一切职事,无往而不需特别之技能、特别之教育。一习其事,终身以之。治一学者之不能使治他学,任一职者之不能使任他职,犹金工之不能使为木工,矢人之不能使为函人也。”^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梁廷枏等一批非体制化共同体的成员,走的还是通人之路。而稍晚出现的丁谦(1843—1919)、王锡祺(1855—1913)、邹代钧、张相文等都是职业地理学家的面目出现的,终身从事地理学的研究,西方传入的新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追求给这批对旧官僚体系、旧学术规范深感不满的游离者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共识也成了这一批职业学者构成地理学共同体群体意识的基核。正是由这批职业

学者的群体,建立并共同遵守了近代地理学学术的规范。学术独立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前提,清末非体制化共同体和体制化共同体使学术走向民间,它们为学术的自由思考和独立探索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把王国维的学术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正,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④用实验手段和文字资料互相释正,用域外文献与本国旧籍互相补正,用外来新理论研讨固有的资料,也可以看作是近代地理学研究的三大方法。

早期的地理学者就注意通过出访、考察等手段验证各种西书确切性。晚清外来人华的地理考察活动,如 1862 至 1865 年美国庞培烈(R. Pumpelly, 又译彭北莱)对东北和华北的地质考察;1868 至 1872 年德国李希霍芬在山西等地的地质矿产调查;1870 至 1889 年俄国普尔热瓦斯基等在内蒙古、新疆等地的地质、地理调查;1903 至 1904 年美国威理士(B. Willis)来华从事的地理调查;1904 至 1905 年美国庞培烈组队考察中亚,足迹达新疆、西藏等地,美国著名地理学家亨丁顿参加了这次考察。^⑤这些考察有不少是有着列强侵略扩张的不光彩的背景,但从实地观察,在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得出有价值的地理学结论,直接和间接地为中国地理学家作出了科学调查的示范。邹代钧也极为重视实地测绘考察,曾在湖北舆图总局把 32 个学生分为四路测绘湖北地图。他认为:“切于经世致用者莫若地理,当以今地为主,而钩稽古来疆域、战争、漕运、水道迁徙,以求贯通;至测天定度,测地定位,准率成图,并为军政农商关键。”^⑥中国地学会更是直接鼓励

会员从事实地考察,规定了会员的“调查报告之责任”。《地学杂志》上刊出的中外各种调查记就是有力的明证。

魏源、徐继畲、梁廷枏等都注意利用域外文献来补正中国地理资料的不足;邹代钧、丁谦、张相文、王先谦等共同体的成员更是普遍使用这一方法。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王先谦非常推崇英国雷文斯顿(Ravenstein)《万国新地志》(何育杰译,上海通社1902年版),认为其“纲领完密,英伦尤详”。并以该译本和《瀛环志略》为主,广泛参考了樋田保熙译《世界地理志》,出洋学生编辑所译矢津昌永著《(中学)万国地志》,周起凤译述、中村五六编纂的《万国地理志》,吴启孙编译、矢津昌永著《世界地理学》,以及谢洪赉的《瀛寰全志》、辻武雄著《五大洲志》、许彬等译《五洲图考》和学部编译图书局出版的区域地志,用这些域外舆地新志中的材料与传统地理著作相互合校印证。引用的中外文献多达近90种。^⑨

在用外来新理论研讨固有的资料方面,邹代钧等一批学者注意吸收日本地理学界的研究成果,他所编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讲义》分两编,初编的地理学总论讨论数理地理学(即天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即地文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即人文地理学)。卷一第一章为亚细亚洲总论,分14节,讨论释名、位置、境界、面积及人口、地势、海岸线、半岛及岛、海及海湾、高地、平原、沙漠、分水界江河、浸、气候;二编共35课研讨中国地理。第1课疆域、第2课至第5课地势、第6课至地35课为海岸。他讲课的重点放在“天生之舆地”,即数理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次讲“人置之舆地”,即人文地理学。他的思路给其学生周震鳞以很深的影 响,后者编述《明德学堂地

理》课本时“皆本师说，谨遵京师大学堂定章地理讲义办法，由地球经纬之理，以及全球大势，而后分讲本国外国，详略繁简，悉据外国新出教科图书，及我国先辈所著适用图书，斟酌采择。”^⑧丁谦在《汉书·匈奴传考证》中利用了西方人种学“鼻祖”、德国白勒门拔克（今译布鲁门巴哈，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 1752—1840）、法国葛得雷法和德国弗雷得力辣彩耳（即拉采尔）的学说。^⑨

在采用国外新学说研讨本国资料方面最突出的是张相文。1908年他推出的《新撰地文学》一书，就“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及已译善本，博采旁搜凡数十种”，重视引进国外新的地学理论，如述及太阳系的形成时，就介绍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说：“自德人康德《地球自然史》、法人拉普来《天体发生论》同时成书，而天地进化之理之明，为十八世纪以来民智一大进步。”^⑩《新撰地文学》非常重视中国的资料，该书例言指出：“讲地文须就中国事实教之”，“搜罗新闻杂志、名人游记，及游踪所至，得于耳目所亲接者，撮其精要，举为例证。其为中国所无，或调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关系者，乃兼及于他国。”^⑪该书讲到地质时代各界、系地层时，就指出其在中国的分布。《新撰地文学》的内容分星界（地球之成因、地球之形状、地球之运动、地表之测定、地磁力）、陆界（陆地之构成）、水界（海水、河湖、泉水）、气界（大气、气候、气流、气中之水分、气中之映象）、生物界（生物之分布、生物之变迁、人类之进化、人种之分布）五编。迄今所编的普通自然地理学的基本内容仍不出这五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在《新撰地文学》之前，中国虽已有了几种外国自然地理的译本，但其内容仅限于无机自然界。张相文别具一格，新增生物界一章，把无机自然和有机

自然联系起来,这在世界地学史上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创举。^⑧其实我们不难在《新撰地文学》中找到日本山上万次郎《地文学》所采用的地球星学、陆界学、气界、水界、地壳、生物地理学这六分法的影子。

在清末地理学史上,张相文是一个标志,他的《新撰地文学》、他所创建的中国地学会和《地学杂志》给近代地理学界所带来的新范式取代了逐渐消耗殆尽的传统范式,一种新的知识结构在清末的地理学共同体的成员中逐渐形成,而这种崭新的知识结构使近代地理学者的专门之学,从根本上与传统儒生的专治一经区别开来。这些标志了清末地理学已完成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中国地理学开始步入了近代学术的范畴。

注释:

- ① 近年来个案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成果有陈平原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 ② 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 1 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页 2。
-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 年,页 505。
- ④ 杨吾扬《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年,页 127—129。
- ⑤ 参见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页 359—369。
- ⑥ 载《原学》第 1 卷。
- ⑦ [美] 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页 7。
- ⑧ “共同体”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最早使用科学共同体概念的

- 是英国的物理化学家波朗依。他在 1942 年出版的《科学的自治》一书中对科学共同体概念进行了阐发。科学共同体概念成为科学社会学家普遍应用的概念,是在库恩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之后。受该书的影响,科学共同体一时成为社会科学家的重要研究主题(参见刘珺珺《科学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页 167—172)。
- ⑨ 钱大昕著、吕友仁标校《潜研堂集》卷 23,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页 377。
- ⑩ 参见[美]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第二章,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 ⑪ 《四洲志》全本收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页 223。
- ⑫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海国图志》百卷本,卷首。
- ⑬ 《海国图志》百卷本,卷 38。
- ⑭ 陈耀南《魏源研究》,乾惕书屋 1979 年,页 185。
- ⑮ 《瀛环志略》卷上,徐继畲识。
- ⑯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44 年,第 13 卷,页 236。
- ⑰ 潘振平《〈瀛环志略〉研究》,载任复兴主编《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 ⑱ 参见周振鹤《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载《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 1996 年。
- ⑲ 参见拙文《〈瀛环志略〉译名试评》,载任复兴主编《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 ⑳ 有学者怀疑《海国图志》的原作者是林则徐,参见林永侯《论林则徐组织的移译工作》,载《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朱维铮《魏源:尘梦醒否?》,载《音调未定的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 ㉑ 魏源《海国图志》序。

- ⑳ 《瀛环志略》卷上,徐继畲识。
- ㉑ 任复兴《〈瀛环志略〉若干稿本初探》,载《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 ㉒ 翟忠义《徐继畲》,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3 年,页 356。
- ㉓ 参见王家俭《〈海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载《大陆杂志》第 32 卷第 8 期。
- ㉔ 《海国图志》的刊刻本如下:
- (1) 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木活字本,50 卷。(《贩书偶记》)
 - (2) 道光二十四年(1844)邵阳魏氏古微堂木活字 50 卷本,20 册。
(上图藏)
 - (3) 道光二十七年(1847)邵阳魏氏古微堂木活字 60 卷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 (4) 道光二十九年(1849)邵阳魏氏古微堂木活字 60 卷本,20 册。
(北师大藏)
 - (5) 道光二十九年(1849)邵阳魏氏古微堂扬州增补 60 卷刻本,16 册。(上图藏)
 - (6) 咸丰二年(1852)邵阳魏氏古微堂 100 卷重刻本,24 册。(上图藏)
 - (7) 同治七年(1866)陈善圻据古微堂本重刊本。(台湾大学藏)
 - (8) 同治六年(1867)郴林陈氏刻本 100 卷,24 册。(上图藏)
 - (9) 光绪元年(1875)上海书局石印本 100 卷,14 册。(上图藏)
 - (10) 光绪二年(1876)平庆泾固道署刻本 100 卷,24 册。(复旦藏)
 - (11) 光绪六年(1880)邵阳急当务斋新镌重刻本 100 卷,34 册。(人民大学藏)
 - (12)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书局石印本,14 册。(上图藏)
 - (13) 光绪二十四年(1898)文贤阁石印本 100 卷,16 册。(人民大学藏)

(14) 光绪二十八年(1902)文贤阁石印本 100 卷,续集 25 卷,16 册。
(上图藏)

⑳ 《瀛环志略》的刊刻本如下:

- (1) 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氏刻本,6 册。(山西图书馆藏)
- (2) 道光三十年(1850)红杏山房刻本,6 册。(北师大藏)
- (3) 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本,6 册。(复旦藏)
- (4) 同治五年(1866)璧星泉鉴定重订本,6 册。(人民大学藏)
- (5) 同治十二年(1873)棧云楼刻本,6 册。(上图藏)
- (6) 同治十二年(1873)刊本,4 册。(人民大学藏)
- (7) 光绪六年(1880)楚南周鯤刻本,1 册合订本。(上图藏)
- (8) 光绪十年(1884)京都琉璃厂会经堂刊本。(台北“中央图书馆”藏)
- (9) 光绪十九年(1893)鸿宝斋石印本,4 册。(上图藏)
- (10)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宝文局石印本,3 册。(上海辞书出版社藏)
- (11)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书局石印本,4 册。(上图藏)
- (12) 光绪二十四年(1898)新化三味书室校刊本,6 册。(上图藏)
- (13)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老扫叶山房铅印本,8 册。(复旦藏)
- (14) 光绪二十八年(1902)汉读楼石印本,6 册。(北师大藏)
- (15) 出版年不详,崇明李氏刻本。(《增版东西学书录》附下之下)。
- (16) 出版年不详,槐里堂本。(潘振平文)
- (17) 出版年不详,广东书局石印本,4 册。(《涵芬楼旧书目录再续编》1919 年商务版)
- (18) 出版年不详,正续《瀛环志略》本,4 册。(人民大学藏)。

㉑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页 467。

㉒ 王韬《〈瀛环志略〉跋》,载《弢园文录外编》卷 9。

㉓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载《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 1953 年,

页 115。

- ⑳ 康有为《桂学答问》，中华书局 1988 年。
- ㉑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丙辰一月二十八日；光绪丙戌十二月二十日。
- ㉒ 《皇朝经世文四编》，光绪二十八年鸿宝书局版，卷 10。
- ㉓ 《商贾说外夷有裨正史》，载《康轺纪行》卷 12。
- ㉔ 《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载《东塾集》卷 2，光绪壬辰（1892 年）菊坡精舍版。
- ㉕ 杨坚点校《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 1984 年，页 94—95。
- ㉖ 田梓材、姚炳奎、舒润等文，载江标编校《沅湘通艺录》，卷 5 舆地，光绪二十三年（1897）长沙使院版。
- ㉗ 《逊斋文集》，南林刘氏求恕斋刊本，卷 8，转引自吴泽、黄丽镛《魏源〈海国图志〉研究》，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 4 期。
- ㉘ 参见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大立出版社 1984 年，页 145。
- ㉙ 梁启超《三十自述》，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 ㉚ 黎昌庶《西洋杂志》，岳麓书社 1985 年，页 540。
- ㉛ 斌椿《乘槎笔记》，岳麓书社 1985 年，页 102。
- ㉜ 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第 1 集《外夷传考证·元》，浙江图书馆 1915 年版；参见钟叔河著《书前书后》，海南出版社 1992 年，页 176—177。
- ㉝ 参见拙文《薛福成与〈瀛环志略〉续编》，载《学术集林》第 14 集。
- ㉞ 参见[日]大谷敏夫《〈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中国近代始刊启蒙地理书》，载《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页 197—198；马金科等《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页 39。
- ㉟ 《地理全志》1899 年益智书会版，慕维廉光绪九年识。
- ㊱ 参见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大立出版社 1984 年，页 145、176。

- ④⑧ 参见翟忠义《中国地理学家》，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年，页 388—393；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 1985 年，页 66—67。
- ④⑨ 高俊《明清两代全省和省区地图集概况》，《测绘学报》第 5 卷，第 4 期。
- ④⑩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 1984 年，页 206、455—459。
- ④⑪ 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例言》，载[日]陆军省编、姚文栋编译《日本地理兵要》，总理衙门印，同文馆 1884 年版。
- ④⑫ 葛子源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120，光绪十四年(1888)图书集成局。
- ④⑬ 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上附录》，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页 256。
- ④⑭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载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页 175。
- ④⑮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 1985 年，页 70。
- ④⑯ 邹代钧《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载《时务报》第 1 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十四日。
- ④⑰ 译图公会的成立时间至今说法不一，邹代钧《中外舆地全图》序言称：“甲午议和后……开局于黄鹄山头，招集同人或译或绘，钩稽年余成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地图九十四幅……”；1895 年邹代钧升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由鄂移湘工作，据此两点，张平《邹代钧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一文认为译图公会创立于 1895 年，张文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10 卷，第 1 期。(1991)
- ④⑱ 邹代钧致汪康年，载《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页 2766。
- ④⑲ 参见邹代钧《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载《时务报》第 1 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十四日。该文称共 410 幅，但笔者实际计算只有 409 幅。
- ④⑳ 邹代钧《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载《时务报》第 1 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十四日。

- ⑥1 参见周岩《邹氏家族和我国地图编绘出版事业》，载《出版史料》1989年，第2期。
- ⑥2 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附下之下。
- ⑥3 顾燮光辑《译书经眼录》卷8，地学第十六。
- ⑥4 张平《邹代钧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第1期。（1991）
- ⑥5 邹代钧《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载《时务报》第1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十四日。
- ⑥6 张元济1897年5月14日、6月5日、7月5日致汪康年，载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630—633。
- ⑥7 邹代钧《中外舆地全图序言》，湖北舆地学会1903年。
- ⑥8 邹永修《邹征君传》，1919年铅印本。
- ⑥9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页468。
- ⑦0 葛绥成《清季民初地图出版工作及出版物》，载《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页86；翟忠义称：“英人傅兰雅很佩服邹代钧的学识。”见《中国地理学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页420。
- ⑦1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页70—71。
- ⑦2 张平《邹代钧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第1期。（1991）
- ⑦3 周岩《邹氏家族和我国地图编绘出版事业》，载《出版史料》1989年，第2期。
- ⑦4 奚若编纂《世界新舆图·例言》，商务印书馆1909年。
- ⑦5 罗汝楠编《中国近世舆地图说·例言》，广东教忠学堂1909年。
- ⑦6 国民教育社编辑《（新体）高等小学中外地理·编辑趣意》，文明书局1910年。
- ⑦7 张謇语，参见《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载沈云龙主编《南园丛稿》，文

海出版社。

- ⑦ 周岩《邹氏家族和我国地图编绘出版事业》，载《出版史料》1989年，第2期。
- ⑧ 陈学熙《中国地理学家》，载《地学杂志》第2年(1911)第17期。
- ⑨ 参见张天麟《张相文》，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页312—313；《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载沈云龙主编《南园丛稿》，文海出版社，页2373—2390。
- ⑩ 顾燮光辑《译书经眼录》卷8，地学第十六。
- ⑪ 参见张天麟《张相文》，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
- ⑫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页274。
- ⑬ 《中国地学会启》，载《地学杂志》第1年(1910)创刊号。
- ⑭ 《中国地学会章程》，载《地学杂志》第1年(1910)创刊号。
- ⑮ 参见《地学杂志》第2年(1911)第16号、第17号。
- ⑯ 《地学杂志》第15卷(1924)起改为季刊，第20卷(1932)改为半年刊，第23卷(1935)起改为季刊。1937年3月停刊，共出至第25卷第1号。先后各卷所出期数不同，第1年10期，第2年8期，第3至第12年各12期，第13卷9期，第14卷6期，第15卷1期，第16至17卷各2期，第18至19卷各4期，第20至22卷各2期，第23至24卷各4期，第25卷1期。第1至第2年的期次互相连续，第3年起，期次按年另起，第4年第1号起，同时编有总期号。先后共出版了181期，共刊载地理学论文1600余篇。最后几期，附有西文提要(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载《历史地理》创刊号)。本文讨论的主要是第1至第2年的清末部分。
- ⑰ 《地学杂志叙例》，载《地学杂志》第1年(1910)创刊号。
- ⑱ “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共同具有现有各种专业的研究方法。库恩在《再论范式》一文中将其称为“专业母体的各种成分”(《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89—313)。笔者

以为也可泛指同行学者共同认定的研究指南,如研究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解决问题应该使用的方法是什么;想要观察的现象的类型是什么等等。

- ⑨ 张相文《编辑大意》,载《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 1906 年第 18 版。
- ⑩ 刘献廷《广阳杂记》,中华书局 1957 年,页 150—151。
- ⑪ 周昌寿统计了 1872 至 1911 年的 39 年间,共有 58 部西方地理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参见《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页 434);艾素珍统计了 19 世纪 70 年代至 1911 年的西方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译著共 80 多种(《中国科技史料》第 16 卷[1995 年]第 3 期、第 17 卷[1996 年]第 1 期)。笔者统计到的 1819 至 1911 年的西方地理学译著多达 208 种,涉及了地理学通论、地球与地文学、气象与气候学、文化与政治地理学、区域地志、商业地理学、交通与旅游地理学、军事地理学、地图册与地图解说等九大范围。
- ⑫ 参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 1953 年,页 24—25。
- ⑬ 王景沂编《科学书目提要初编》,北洋官书局 1903 年重刻本。
- ⑭ 参见《王国维遗书》第 5 册,《静安文集续编》页 64。
- ⑮ 《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页 219。
- ⑯ 参见杨吾扬《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年,页 122—123。
- ⑰ 参见朱有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页 410。
- ⑱ 王先谦著《五洲地理志略》卷首,湖南学务公所 1910 年。
- ⑲ 周震麟编述《明德学堂地理·绪言》,清末刻本。
- ⑳ 了谦《汉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载《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浙江图书馆 1915 年,页 25。
- ㉑ 张相文著《新撰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 1908 年,页 2。

- ⑬ 张相文著《新撰地文学·例言》，上海文明书局 1908 年。
- ⑭ 参见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1 卷，第 5 期。

附录一

晚清西方地理学译著知见录

凡 例

- (1) 本篇“译著”仅收单行本或收录丛书中的译著,不包括晚清报刊中的单篇译文。
- (2) 凡在中国出版,或国外出版而以中国人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外国人用中文撰写的作品,也作为译著酌情收录。
- (3) 本篇收录有汉文解说的外国人编的地图册,不收录单幅地图。
- (4) 本篇只收译作或编译的单行本,表明中国人自撰而实际上是编译作品一般不收录。
- (5) 在著译者一栏,凡外国人均用[×]标明国籍,国籍不详的用[?],不标明者均为中国人。
- (6) 本篇收录的大部分为笔者在中国各大图书馆所经眼,部分转录他人著述者均一一注明出处。所引资料均用英文字母的代号表示,代号后面 p 表示该书籍的页码,论文不列页码:
A1 代艾素珍《清末自然地理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载《中国科技史料》第 16 卷(1995 年)第 3 期。
A2 代艾素珍《清末人文地理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载《中国科技史料》第 17 卷(1996 年)第 1 期。

- D代徐维则、顾燮光编《(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上海石印本。
- H代商务印书馆编《涵芬楼藏书目录·中文新书分类目录》，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 J代[英]伟烈亚力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上海1867年版。
- K代《教科书之发刊概况》，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
- M代北京图书馆等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
- W代王家俭《十九世纪西方史地知识的介绍及其影响》，载《大陆杂志》第38卷第6期，1969年3月。
- X代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Y代顾燮光编《译书经眼录》，1927年印本。
- Z1代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1980年。
- Z2代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一、地理学通论与教科书

001-1. 《地理便童略传》(Geographical Catechism) [英]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编译 1819年出版于马六甲

该书共21页，是一本供学生用的简明教科书。全书分8回60问，1回论地分四分，即亚、欧、非、美四大洲；2回论中国；3回论印度等国；4回论亚拉彼亚及如氏亚等国；5回论英吉利国；6回论友罗巴列国；7回论亚非利加；8回论亚默利加。书中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边界、面积、物产、人口和宗教等作了介绍，如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埃及、

俄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对英美的历史与政治制度的特点也有所介绍。书中还附有若干地图。(Xp115、Jp27)

002 - 2. 《全地万国纪略》 (Sketch of the World) [美]米怜(William Milne)编译 1822年出版于马六甲

该书共30页,最初连载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一本简明地理读物。书中将世界分为四大洲,对各洲的面积、人口、国家、首都和语言,作了介绍。(Jp18)

003 - 3. 《万国地理全集》 (Universal Geography) [德]郭实猎(K. F. A. Gutzlaff)译述 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

该书内容连载于1833—1838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上,又参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Jp60)

004 - 4. 《外国地理备考》 (Geography of Foreign Nations) [葡]玛吉士(Machis)撰 1847年收入“海山仙馆丛书”24—28册

该书卷首又称“新释地理备考”。该书在收录丛书前是否有过单行本待考。全书分10卷,卷1、卷2论自然地理知识。卷1有地理志、地球论、地球循环论、地球时刻通论等20项;卷2有气论、云论、风论、雷电论、流星论、虹论、光环论、雨论、雪论、雾论、冰论、泉论、地震论、火山论等22项,文中附有地球循环图、四季寒暑图、经纬二度图、赤道图、黄道图、午线图、五道图、日月地球各星环道全图等16幅;卷3为邦国法度原由政治贸易根本总论;卷4至卷10为地球总论及欧、亚、非、美、澳五大洲全志。魏源对此书评价很高,认为其纲举目张,包罗宏富,诚欲扩知识而裨人生,则必读是书。《海国图志》引述该书凡91处,卷76全录《地理备考叙》和《地球总论》,卷96全录玛吉士的《七政》,置于《地球天文合论》之首。

005 - 5. 《地球图说》 (Illustrated Geography) [美]裨理哲(Richard Quanterman Way)编译 1848年出版

该书共53页,是一本世界地理的简明读物,书前附有各国国旗图样。《海国图志》引述此书凡34处。(Jp140、Xp173)

006 - 6. 《地理全志》 (Universal Geography) [英]慕维廉 (William Muirhead) 辑译 (上海) 墨海书馆 1853—1854 年版

该书分上下两编。共 15 卷, 上编出版于 1853 年, 下编出版于 1854 年。上编 5 卷, 书前有慕维廉写的英文序言、创造天地万物记和中文绪言, 首篇列有地理总志、地理名解、水土略分论, 卷之一亚西亚全志、卷之二欧罗巴全志、卷之三阿非利加全志、卷之四亚墨利加全志、卷之五大洋群岛全志。每一洲志均分为位置、界限、山脉、岛屿、海湾、河流、湖泊、矿藏、动植物、户口、教门、吏治、朝纲、文艺等, 洲志后面叙述各国地理, 系统而又简略。下编 10 卷, 论自然地理、数理地理和历史地理。卷 1 地质论, 论陆海变迁; 卷 2 地势论, 论洲岛、山谷、高原、冰山、火山、地震等; 卷 3 水论, 论江河湖海之水, 波浪、潮汐等; 卷 4 气论, 论风云雨雾、雪雹露霜等气候现象; 卷 5 光论, 论光环雾影、日月重光、虹等; 卷 6 草木总论; 卷 7 生物总论; 卷 8 人类总论; 卷 9 地文论, 地球椭圆广大论、行星轨道论、昼夜论、四时论、暑寒道论、地球圈线论、经纬二线论、地图论; 卷 10 地史论, 分上、中、下三篇, 是一篇西方地理学史的简介。下编参考了 Mrs. Somerville's < Physical Geography >、Milner's < Physical Atlas >、Reid's < Outlines of Geology and Astronomy >。日本安政五年(1858)有六册十卷本; 1859 年有柳夏新刊的爽快楼版, 内有盐谷世弘 1858 年序。该版分上下篇。共 10 册, 上篇第 1 册地球全图、地理总志、地理名解、水土略分论、亚细亚洲全志; 第 2 册欧罗巴洲全志; 第 3 册阿非利加洲全志; 第 4 册亚墨利加洲全志; 第 5 册大洋群岛全志。下篇第 1 册地质论、地势论; 第 2 册水论、气论; 第 3 册光论、草木总论、生物总论; 第 4 册人类总论、地文论; 第 5 册地史论。

007 - 7. 《地球说略》 (Illustrated Geography) [美] 裨理哲译述 宁波华花书房 1856 年版

该书共 3 卷, 是《地球图说》的增订本。涉及了地球圆体说、地球轮转说、地球图说、大洲图说、大洋图说, 以及亚洲、欧洲、非洲、澳洲、

南北美洲图说。书中介绍了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位置、人口、物产、风俗等特点,并附有各种建筑、交通工具、器物 and 奇禽异兽图片多幅。该书传入日本后被采用为教科书,庚申(1860年)春有东都江左老皂馆出版的箕作阮甫的训点本。

008 - 8. 《智环启蒙塾课》 (Graduated Reading) [英]理雅各 (James Legge) 编 1856 年出版

该书是作者执教于英华书院时所编的教科书。共分 24 类 200 课,内容分为人类、国政、贸易、居住、饮食等,其中第 13 类包括地面分形论、土之分形论、水汇论、地之质体论、天气诸天论、宇宙论、地极论、地之运动论、地球分域论、天气论、四方论、赤道论、热带论、二寒带论、二温带论、诸带土人论、寒暑道论、诸寒暑道土产论等。该书中英文对照。后删削英文,1859 年有广州版,1864 年香港再版,1867 年有日本江户开物社训点翻印本,题为《翻刻智环启蒙》;1870 年有沼津学校版,题为《智环启蒙》;1872 年有瓜生寅版,题为《启蒙智慧乃环》;1873 年有石川县学校版,题为《智环启蒙和解》。(Xp219)1883 年香港中华印务局有英汉对照本。

009 - 9. 《地理略论》 (Digese of Geography) [英]俾士 (George Piercy) 编 1859 年出版

该书是编者参照慕维廉《地理全志》一书编成的,主要介绍世界地理常识。(Xp152)

010 - 10. 《格致启蒙·地理小引》 [英]祁覲 (Archibald Geikie) 纂 [美]林乐知、郑昌棧译 (上海)江南制造局 1880 年刊本

该书不分卷,第一部分谈地圆及地球知识,第二部分论空气,第三部分论地质。《东西学书录》称其书“词虽简而论颇备”。

011 - 11. 《地理志略》 [美]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编译 赵如光笔述 (北京)美华书院 1882 年版

该书采用简明教科书的形式,不分卷,共 99 章,每章后均附有若干问题。1 至 16 章涉及地球知识、气候、动植物、人种民族、语言文

字、政事宗教;17至49章谈亚洲;50至68章谈欧洲;69至78章谈非洲;79至87章谈北美洲;88至99章谈南美洲。全书附有若干彩色地图和插图。该书1895年曾经谢子荣、丁辑五合校重订,1901年又经万卓志重订,编入公理会丛书,由华美书局出版,重订本对书中的非洲、美洲的内容多有增删和润饰,书后附“天下分段方里人民之数”。

012-12. 《地志须知》 [英]傅兰雅著 (上海)1882年刊本

该书分6章,第1章略释地势名义;第2章论亚细亚洲各国;第3章论欧罗巴洲各国;第4章论阿非利加洲各国;第5章论亚美利加洲各国;第6章论太平洋列岛。该书总说称:“所有各国止就近今而言,凡古有今无者,概不追述。又凡小区以及不甚紧要处,亦不赘成。”书中附有插图多幅。

013-13. 《地理志略》 [美]江德载辑 1882年刊本

该书“凡九十九章,先述情形,次设条答,亦为课蒙而设。”(《格致书院课艺》孙维新己丑年答卷)

014-14. 《地理全志》 [英]慕维廉著 (上海)美华书馆1883年版

该书又题“续瀛环志略”,全书仿《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共143章。第1章论地形、地动、地广、地线、地气、生物等,以及地理总论、地理名解、水土略分论;第2至40章为亚西亚全志,41至80章为欧罗巴全志,81至102章为阿非利加全志,103至129章为亚墨利加全志,130至143章为大洋群岛全志。该书后来曾多次再版,有1899年、1902年版。

015-15. 《地理问答》 [美]甘第德著 1886年修订本

全书83回,有问有答,甚便启蒙之用。(《格致书院课艺》孙维新己丑年答卷)

016-16. 《地理略说》 [美]戴集著 (上海)美华书馆1898年版

该书分114章,第1至第11章为普通自然地理;第12至54章论亚洲,其中第29至54章论大清国;第55至第73章论欧洲;第74至第90

章论非洲;第 91 至 98 章论北美洲;第 99 至第 113 章论南美洲;第 114 章论天下民数。

017 - 17. 《坤輿撮要问答》 孙文楨译 上海土山湾书馆 1898 年版

该书是一本从法文译出的地理读本。全书分 4 卷,卷 1 坤輿释名,分三章,论海洋、论陆土、论川泽;卷 2 万国版籍,分五章,论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澳洲;卷 3 中国考略,分二章,论中国形势和中国政治;卷 4 大清二十二直省府州厅县表,附编有多种比较图名目,一为五洲大国幅员图、二为五洲大国丁口图、三为五洲大国商务图、四为中国直省疆域人丁图、五为中国商埠丁口图、六为外洋各国土庶侨居中国图、俄英法德等国陆军比较图、俄英法德等国水师比较图、坤輿各名中法合璧对照表。全书数量单位均按法制。

018 - 18. 《训蒙地理志》 (Natural Elementary Geography) [美]潘雅丽(Alice S. Parker)编译 谢洪赅述 (上海)美华书馆 1901 年

该书取材于美国雷特回、福拉哀的儿童地理读物,全书 72 章,第 1 至 19 章谈东西方向、地球转动、读地图之法、论指南针、解说山江河湖等自然现象;第 20 至 69 章介绍各大洲各国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状况;第 71 至 73 章介绍各国经纬度和宗教等内容。后附各洲面积和人民表。全书解说简明,附图多幅。

019 - 19. 《地理学讲义》 [日]志贺重昂述 萨端译 (上海)金粟斋 1901 年版

该书一卷。在“论地理学之必要”中首先强调地理学对于商业、军事、航海及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在“论地理学之区分”中把地理学分成数理、自然、政治地理学三类;并阐明了研究地理学必要之关系,研究亚洲地理之法,研究欧洲地理之法,研究非洲、大洋洲、美洲地理之法,最后附有表说六种。前有汪德渊序。

020 - 20. 《万国地理统纪》 [日]若原撰 马汝贤、顾培基辑译 (苏州)励学译社 1902 年版

该书是世界自然地理的统计资料的汇编。分为太阳系、地球之

广袤、水陆之分划、大洋之面积深度、大洋之支派、大陆之位置、大陆之境界、列国位置、列国境界、列国之面积人口、著名岛屿、著名半岛、著名地角、著名地峡、著名高山、著名大河、著名大湖、著名都府之人口、各国大都离伦敦之程度、人种、宗教、政体、温度、军备、交通运输、物产等。杨学斌在序中称此书在“宗教之派别、政体之宽猛、军备之多寡、物产之丰歉，收罗既广，调查最新”。

021-21. 《六大洲輿地最新说略》 王辅廷译 (上海) 经世文社 1902 年石印本

该书分 4 卷，卷 1 为自然地理常识和亚洲大势，分原始、形势、运动、经纬线、四带五道、疆界陆地、咸水淡水、国度城邑、语言文字、政事教门、地球大势；亚西亚大势、大清国大势；卷 2 分云贵、青藏、高丽、印度等；卷 3 为欧罗巴大势；卷 4 为非洲和美洲。全书采用问答式，如卷 1 内有：“何六世界？曰有六大洲，一曰亚西亚洲；二曰欧罗巴洲；三曰亚非利加洲；四曰北亚美利加洲；五曰南亚美利加洲；六曰各海岛合成一大洲。”

022-22. 《(新编)世界地理》 作新译书局译纂 (上海) 作新社 1902 年版

该书是据西人的著作译纂的。全书分三部分二十九章，首编一章世界总论，论天文、地文、人文地理三部分；上编本国之部，分亚细亚总论和中国二部分，中国又分总论、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地方志四节；下编外国之部，分日本、朝鲜、西伯利亚、中部亚细亚、高加索、西部亚细亚、南部亚细亚、大洋洲、欧罗巴总论、俄罗斯、瑞典、挪威、丹麦、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法兰西、比利时、荷兰、英吉利群岛、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巴尔堪半岛、阿非利加、亚美利加总论、南亚美利加、北亚美利加、合众国、英领北亚美利加，下编每章各分总论与地方志二节。

023-23. 《世界地理志》 [日] 中村五六编纂 [日] 顿野广太郎修补 [日] 樋田保熙译 (上海) 金粟斋 1902 年版

部首分地理学总论、数理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四部分，

论地球的形状、方位、自转与公转、经度与纬度；水陆与大气、动物与植物、人类与人种等；然后分甲、乙、丙、丁、戊、己诸部，分别讨论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阿塞亚尼亚各国的政区、宗教与文明等状况。

024 - 24. 《(中学)万国地志》 [日]矢津昌永著 出洋学生编辑所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02 年版

该书是日本中学地理教科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分地球及天体、地球之运动、水陆、社会、人种、宗教、国家、国体，亚洲总论及各国地理分论；中卷分欧洲总论及各国地理分论；下卷分非洲总论及各国地理分论、美洲总论及各国地理分论、大洋洲总论及各国地理分论。每卷均有若干插图，书前有沧桑主人序。据(H)另有 1906 年美华书馆版。

025 - 25. 《万国地理志》(万国通志第六编) [日]中村五六编纂 [日]顿野广太郎修订 周起凤译述 (上海)广智书局 1902 年版

该书分七编，一编地理学分 3 章，第 1 章数理地理学，论地球之形状及大小、方位、地球的自转与公转、五带、经度与纬度；第 2 章自然地理学，论水陆、陆之区别、地面之变动、水之区别、海水之运动、大气、风、雨、气候、植物、动物、人类及人种、矿物；第 3 章政治地理学，论国民之生业、文明之等级、宗教、政体；二编亚细亚洲，分 12 章，论中国、日本、朝鲜、亚细亚部俄罗斯、印度支那、印度、阿富汗、俾路芝、波斯、阿剌伯、亚细亚土耳其；三编欧罗巴洲，分 19 章，论英吉利、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奥地利、匈牙利、瑞西、日耳曼、普鲁士王国、巴威里王国、乌尔丁堡王国、撒逊王国、诸小邦及自由都府、帝领、比利时、荷兰、丹麦、瑞西那威、俄罗斯；四编亚非利加洲，分 11 章，论埃及、亚培息尼、北海岸诸国、萨哈拉等地；五编北亚美利加洲，分 7 章，论绿岛、英领加奈多、合众国、墨西哥、中央共和诸国、西印度诸岛；六编南亚美利加洲，分 15 章，论哥伦比亚、维尼助拉、英领扼亚奈、法领扼亚奈、勃来如尔共和国、伊扣独亚共和国、秘露等地；七编澳西尼亚洲，论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纽裁伦岛、濮来尼亚。

026 - 26. 《万国新地志》 [英]雷文斯顿(Ravenstein)著 何育杰译
上海通社 1902 年版

该书为英国苏格兰爱丁堡舆地学会会员雷文斯顿 1902 年完成的著作,全书分前后两编共 71 章。依次为总论地球、大西洋、北冰洋、欧洲总论、英国、德意志帝国、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挪威、芬兰、奥地利与匈牙利、法兰西、埃比良半岛(西班牙、葡萄牙等)、意大利、巴尔肯半岛(土耳其、罗美尼亚等)、希腊、俄罗斯帝国、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各国都以次述其地形、气候、面积、人口、人种、宗教、教育、工业、商务、交通、政治、财政、兵备等内容。该书列入“通社丛书”乙编,又题《雷文斯顿万国新地志》。

027 - 27. 《外国地理问答》 卢藉刚编译 (上海)广智书局 1902 年版(M)

028 - 28. 《舆地启蒙》 曾广铨译 上海蒙学书报局 1902 年版

该书四册,列举世界各国国家面积、人口、教门、教育、政治、进出口货及交通等项,载明为 11 至 13 岁儿童所用。(K)

029 - 29. 《蒙学地理纪要》 蓝寅译 上海蒙学书报局 1902 年版(K)

030 - 30. 《小学地理·日本地理·外国地理》 [日]松林著 茅乃封校 上海蒙学书报局 1902 年版(K)

031 - 31. 《万国地志》 [日]矢津昌永著 樊炳清译 1903 年有成都志古堂版

该书是日本在 1896 年出版的中学课本,分上、中、下三卷。总叙论地球与天体、地球之运动、水陆之配置、社会、人种、宗教、国家与国体等。然后是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或澳大利亚洲的总论及每一个洲中各国家的分论。

032 - 32. 《改正世界地理学》 [日]矢津昌永著 吴启孙编译 (上海)文明书局 1903 年版

该书是译者据东京初译的《世界地理学》重编,“精心厘定,别为一编”,经京师大学堂审定,列为教科书颁行各省为学堂课本。卷首有吴启孙之父吴汝纶的序,贺松坡的评语和译者写的缘起。全书先通论后是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分洲介绍。1905年译者重加修订,分全书为六卷。“精心校正又加入最近新说”,补写了《再版改正世界地理学例言》,由文明书局再版,编译者署名吴岂生。

033 - 33. 《世界地理问答》 日本富山房编纂 范迪吉等译 会文学社 1903年《普通百科全书》本

该书分旧世界、新世界两篇,共六章。上篇三章,亚洲 199 问,欧洲 193 问,非洲 38 问;下篇三章,北美洲 28 问,南美洲 17 问,阿西尼亚洲 27 问。内容涉及山川、物产、贸易、宗教等。列入《普通百科全书》初级学类。

034 - 34. 《万国地理学新书》 [日]田边新之助著 范迪吉等译 会文学社 1903年《普通百科全书》本

该书总论介绍数理地学(星学地学)、自然地学(地文学)和政治地学(人文地学)三部分。并以五洲分章,以列国分节,介绍各国的土地、人口、风俗、宗教与政体的异同。列入《普通百科全书》普通学类。

035 - 35. 《万国新地理》 [日]佐藤传藏著 范迪吉等译 会文学社 1903年《普通百科全书》本

该书分六编,分论亚细亚、欧罗巴、北亚米利加、南亚米利加、亚弗利加、濠太刺西垭六洲。每编又各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多邦土地三部分详加论述。列入《普通百科全书》专门学类。

036 - 36. 《万国地理课本》 [日]辻武雄著 泰东同文局 1903 年版(H)

037 - 37. 《中学地理外国志》 [日]矢津昌永、角田政治著 刘邦骥译 汉川刘氏 1903 年刊本。(Z1)

038 - 38. 《新撰万国地理》 [日]山上万次郎、滨田俊三郎合编 林

子芹、林子恕合译 开明公社 1904 年版? (Z1)

该书 5 卷,顾燮光称:“分五编分记亚、欧、非、美、澳五洲诸国地理。每编各有总论,以记其要,体例虽善,措辞太简。译笔又复生涩,虽名新撰,实无胜人之处。”(Y)

039 - 39. 《地理学》 [日]矢津昌永讲述 朱杞编辑 “速成师范讲义丛录”1904 年版?

该书 1 卷,分亚细亚、大洋洲、欧罗巴、亚美利加、中国大势、世界交通等 7 节,“于六洲山川均胪列其要,篇末言世界交通、贸易进步,以铁路为枢纽,列表言之,足资考核。”(Y)

040 - 40. 《外国地理学教科书》 [日]白洋一夫译述 同文沪报馆 1904 年版?

该书分上、中、下 3 卷,共 7 章。“发明六洲位置、境界、地势、区画、邦国各情,颇为简明,译笔也清晰可读。附图若干,颇便引证。卷末所附‘世界各国面积比较表’、‘世界各国人口比较表’,尤便学者。”(Y)另有[日]渡边光次编《外国地理教科书》,百洋一夫译,东京同文编报馆版,(Z1)疑为同一书的另一印本。

041 - 41. 《地理初阶》 [美]李安德(Leander W. Pilcher)著 北京汇文书院 1904 年版?

该书 1 卷。“首论地球,次中国,三至八则论亚、欧、非、美、澳五洲各国,九总论。书中概以官话编成问答,附图画以资观览,另附地图若干幅,设以彩色,亦甚精细。”(Y)

042 - 42. 《地理教授法》 [日]斋藤鹿三郎著 陈由己译 东大陆译印局 1904 年版?

该书最初以《最新地理教授法》为题,连载于《湖北学报》1903 年 6 月的第 13 至 15 册上,后出单行本。“本书为小学教授地理之用,凡九章。述明地理科之意义、性质、要点、历史、目的,教授之时期、材料、地理、方法、器械、注意等类。作者系日人,所定课程多为日本地理,苟取为吾华教科书之用,当酌改之,庶免邻猫产子之诮。”(Y)

043 - 43. 《(最新)世界地理学》徐大煜编译 (湖北)竞南学社
1905年版

该书是以1904年日本地理教科书为蓝本,参考《五大洲地志》、1904年日本地志和世界年鉴编译的。全书分7卷,首卷为地球总论,述及地球之大洲、地球上之大洋、大洋中之流、地球上之风、大陆性气候及岛屿性气候、世界之人种、世界之宗教、国体与政体、世界之交通机构;卷2以后依次为亚细亚洲、澳大利亚洲、欧罗巴洲、亚美利加洲;最后为五大洲总论,有诸大洲比较、世界之邦国及都会、世界强国贸易之比较、世界之交通、列国军队之比较、列国财政之比较、列国国债之比较。末附日本普通地理学概论。该书附有地球面积表等31种。

044 - 44. 《地理》(江苏师范讲义第7编)[日]牧口常三郎讲授 江苏师范生编辑 (南京)江苏宁属学务处、江苏师范1906年版 该书附有图表。(M)

045 - 45. 《(最近)统合外国地理》[日]山上万次郎著 谷钟秀译编 清国留学生会馆1907年版

该书原本有中国而无日本,译本中的日本地理,是据矢津昌永的著作补译的。其中的统计,除原书据1905年英国政府年鉴外,有关中国的国债与日本的铁道,均据最新之论。全书分上、中、下3卷,上卷4编,第1编地理通说四章,分述地图、地文、人文和概说;第2编亚细亚总说,分述地文和人文;第3编亚细亚特论,分国叙述;第4编大洋洲。中卷第1编欧罗巴洲总论,分地文和人文;第2编欧罗巴特论,分国叙述。下卷共9编,第1、2编为阿非利加总论和特论;第3、4编为北阿美利加总论和特论;第5、6编为南阿美利加总论和特论;第7编两极地方;第8编大洋志;第9编人文地理通说,分述住民、生业、交通和政治。附表为1905年出版的英国政家年鉴。

046 - 46. 《外国地理讲义》[日]堀田璋编 曹典球译 思贤1907年版(Z1)

047 - 47. 《中等地理教本》[英]汉勃森(Herbertson)著 任廷旭、范

祎译述 (上海)广智书局 1907 年版

该书分上、中、下 3 卷,上卷绪论,分述发端、地球之远近与方向、地面之周围与其变动、地球之形状与大小、地球自转以分昼夜、地球公转以成四时、地球上之五带、地球之经纬度、地理学之分类;卷中地理概略,分形势地理、生物地理、人类地理 3 章,讲述水陆区分与江河山岭之成因,气候之变化,各种动物与植物的区别,全世界民数及其所居之地,人民之职业,通商之大要,人类的种族,各族的方言,各国的政体,人类的宗教;卷下世界通志,分为亚细亚洲、欧罗巴洲、阿斐利加洲、北亚美利加洲、南亚美利加洲、大洋洲 6 章。后附中西名目表。

048 - 48. 《外国地理》(女子师范讲义第九) [日]川上喜一讲述
孙清如编译 1908 年编者刊(M)

049 - 49. 《中等地理学举隅》 [日]中村五六撰 浙江官书局译
光绪宣统年间刊本

该书分 4 章,第 1 章总论;第 2 章数理地理学,论地球之形状、方位、地球之自转和公转、五带、经纬度等;第 3 章自然地理学,论水及陆、陆之区别、地面之变动、水之区别、海水之运动、大气、风、雨、气候、植物、动物、人类及人种、矿物等;第 4 章政治地理学,论国民之生业、文明之等级、宗教、政体等。

二、地球与地文学

050 - 1. 《万国纲鉴》 [美]麦嘉缔培端(Davis Bettune Mccarte)编
1850 年刊

该书共 132 页,系修订郭实猎《古今万国纲鉴》而成,主要言地球、天时、气候、潮汐、历法等。(W)

051 - 2. 《平安通书》(Peace Almanac) [美]麦嘉缔培端编 1850—
1853 年在宁波出版

该书年出一册,凡四册,每册30—40页。主要内容是天文地理常识,诸如太阳系知识、日晷图说、日月蚀图说、四时节气图说、时刻论、潮汐随日月图说、西洋历法缘起、镇海潮汐时刻表。每年日月蚀、节气、潮汐皆有不同,故每年麦氏都要修订,他注意将世界上关于天文、地理的新发现、新学说补充进去。如关于海王星的介绍即是一例。1846年法国天文学家勒威耶、英国天文学家亚当斯根据天体力学理论计算出海王星的位置,然后经德国天文学家伽勒用望远镜发现了它。1852年的《平安通书》被魏源《海国图志》征引了11段。《海国图志》卷100的《地球天文合论五》全由《平安通书》内容构成。(Xp171—172)

052-3. 《地理新志》 (New Treatise on Geography) [英]罗存德 (Wilhelm Lobscheid) 编 1855年出版

该书似乎是一部大型地理著作的第一部分。内容为序言、释教略论、地球理论、论地转动、论地昼夜,附有西班牙地图、葡萄牙地图和火轮机图。书中述西班牙的内容最详。罗存德在序言中批评以往的地理书“于地文则未言地球所以动,于地质则未言上世人物之所以生”,自称其书在这些方面要有所作为。(Jp185、Xp147)

053-4. 《绘地法原》 (Mathematical Geography by Hughes) [美]金楷理 (Carl T. Kerker) 口译 王德均笔述 (上海)江南制造局 1875年版

该书是一部数理地理学的著作。全书分12章,一论诸曜运行及地球形体;二论本轴旋转及纵横诸线;三论地循黄道分四季五带;四论月绕地球及朔望交食;五测定本处经纬;六考定地体扁圆;七论制造地球法;八论平面圆图式;九论绘平面圆图法;十论绘各洲各国分图法;十一论绘圆柱形全图法;十二画图余论,后附第一行星表等5种,附图多幅。

054-5. 《测地绘图》 [英]富路玛著 [英]傅兰雅口译 徐寿笔述 (上海)江南制造局 1876年

该书分11卷附1卷。卷1总论、卷2测量底线、卷3分地面为原三角形、卷4图内填补众物、行军揭要、卷6准平线以定高低、卷7证验高低诸器,卷8附英国浙蜜斯著、傅兰雅口译、江衡笔述的“照印法”(该节

即《译书事略》已刊书目中的《铸版印图》),卷9经画新疆属地、卷10球形相关之事、卷11天文相关之事,附卷天文解题。后附星时变为太阳平时表等共21表。

055-6.《地理须知》[英]傅兰雅著 (上海)1883年刊本

该书分6章,第1章略论地势,叙述陆地之形势、洲岛之来源、以及山岭峰峦天生之形状、火山地震自然之事理;第2章略论空气,叙述天时之所以冷热、气候之所以燥湿、风之所以动荡吹嘘、颶之所以狂旋猛掠的原因;第3章略论雨雪,叙述露、霜、雾、云、雨、雪、雹各理;第4章略论水源,剖释泉源、湖泊、洋海、江河的成因;第5章略论潮浪,叙述潮汐之涨退、波浪之大小、以及半流之情形等;第6章为地理总论,叙述地球各事。书中附有插图多幅。

056-7.《地理质学启蒙》[英]艾约瑟编译 (北京)总税务司署1886年版

该书分7卷。卷1总论,卷2论地球实形,叙述陆非正平、地圆确证等;卷3论昼夜,叙述昼夜相继,地旋故有明暗;卷4论风气,叙述气候的冷暖之由,露雾之形成,雨雪之原;卷5论水行于地之功用,叙述江河湖海沟渠等各种水的功用;卷6论海,叙述海陆地势,洋海之运动及海底;卷7论地球体内。《格致汇编》1891年夏季号认为此书“与林乐知所译《格致启蒙地理》似是一稿,惟彼略而此详耳”。

057-8.《地志启蒙》[英]艾约瑟编译 (北京)总税务司署1886年版

该书分4卷,卷1绘地球仪并地图定范,论绘地图的原理,述及默加多耳绘地图法等;卷2论地,指出地非正圆,大地水陆不均,以及各大洲形势;卷3论海,论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南北冰洋等各洋海之情形,包括风、水溜、海湾溜、海溜、潮等;卷4论地形状,论洲、岛、群岛、土角、山、山名释义、火山、谷、平原、湖、蓄水池、海滨、海湾、海峡、冰山的形势;后附诸里异同表、各纬度处每一经度所括海面里数多寡表、英国兵部绘图司所用以绘图之各准数表。

058-9. 《地势略解》 [美]李安德著 1893年汇文书院排印本

该书分12章,“凡洋海、陆地、风雨、时令、火山、冰川、飓风、空气及物类原质之理,并能参究其奥,训蒙最便。”(D)

059-10. 《八星之一总论》 [英]李提摩太译 蔡尔康述稿 广学会1896年?

该书不分卷共21节,是一本关于世界地理的通俗小册子。所谓八星是指当时仅知的除冥王星之外的太阳系八大行星,八星之一即地球。书中首先介绍地圆说,地球的体积、面积,各大行星的运行轨道、周期及其在太阳系中的位置。然后依次介绍地球生物与日光的关系,地球五大洲、五大洋概况,世界人种分布,基督教、印度教、回教、儒教、犹太教等各大宗教分布与人数,最后阐述了全地球之人应该大公无我、泯灭纷争、共臻至善的道理。(Xp592—593)该书初以《地球养民关系》为题连载于1881年3月至5月的《格致汇编》第4年第2至第4卷上;后以《八星之一总论》为题在1892年11月、12月的第46、47册《万国公报》上连载。

060-11. 《地理初栲》 [美]孟梯德著 [美]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编译 (上海)美华书馆1899年版

该书以孟梯德的原著《地理初栲》为底本,参据林乐知《地理小引》、傅兰雅《地理须知》译编。全书分18章,一论地学大旨、二论地壳、三论大洲、四论高山高原、五论冰川冰山、六论高山、七论火山地震、八论平原山谷、九论沙漠水草、十论海、十一论井泉、十二论江河、十三论湖、十四论空气、十五论各大洲天气、十六论植物、十七论动物、十八论人。前有中英对照的“中西舆地表”。

061-12. 《地球之过去及未来》 [日]横山又次郎撰 冯霭译 (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版

该书旨在阐明“地本圆球,为天空中一小游星之至理”。分总说、星辰世界、太阳、游星、水星、金星、火星、众小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月球、地球的去及未来。书中述及康德的《天然史及天之说》和拉

普拉斯的《世界解说》。

062 - 13. 《地球之过去未来》 [日]横山又次郎 秦毓婁、杨我江译
(上海)文明编译印书局 1902 年版

该书是上一书的同书异译本。分绪论、星辰世界、太阳、游星、月球、地球之过去未来等部分。该书局广告称此书是“当今一大奇书”。

063 - 14. 《(普通教育)地文学问答》 [日]富山房编纂 陈大棧译述
(上海)作新社 1903 年版

该书包括天体、关于地球之形状古人怀如何之谬见,昼夜及四季、空气及其运动、空中之水分、海洋、陆地及地势、陆界之组成、地热之作用、大气水及生物作用和生物之分布等 11 章共 305 问,附插图 5 幅。(A1)

064 - 15. 《地文学问答》 邵羲译述 商务印书馆 1903 年版

该书是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普及性丛书“普通学问答全书”之第 6 种。全书采用问答式,共分 11 章,依次为天体、地球之形状及经纬度、昼夜及四季、空气及其运动、空中之水分、海洋、陆地及地势、陆界之组成、地热之作用、大气水及生物之作用、生物之分布。《译书经眼录》称:研究地质学“不可不先求诸地文。若空中之水分,陆界之组成,生物之分布,皆地文学之显而易见者。”此书和上一书很可能是同书异译本。

065 - 16. 《地文学问答》 [日]富山房编纂 范迪吉等译 会文学社
1903 年《普通百科全书》本

全书分 11 章。一为天体、二地球之形状及经纬度、三昼夜及四季、四空气及其运动、五空气及水分、六海洋、七陆地及地势、八陆界之组成、九地热之作用、十大气水及生物之作用、十一生物之分布。列入《普通百科全书》初级学类。此书和上两书很可能是同书异译本。

066 - 17. 《地文学简易教科书》 樊炳清译 (武昌)江楚编译官书局 1903 年版(K)

067 - 18. 《中学地文教科书》 [日]神谷市郎著 汪郁年译补 陈

晃校阅 陆世芬复阅 (东京)教科书译辑社 1903 年版

该书分五编 30 章,首地球星学,分地球成因、形状、大小、内力、运动、日蚀及月蚀、历、地磁力和地图 9 章;次陆界,分陆地、海岸线、地势、陆地之变动和地壳之现状 5 章;三气界,分大气、气温、气压、大气运动、大气湿度、天气、气中映象 7 章;四水界,分海水、海底、海水温度、海中生物和海水运动 5 章;末为生物,分生物变迁、生物现象、生物传播和人类位置 4 章。书中附插页图六种,其中有全年平均等温线图、一月等温线图、七月等温线图、一月等压线图、七月等压线图、世界雨量配布图和世界海流图,另有插图 68 幅。(A1)

068 - 19. 《地文学新书》[日]富山房编纂 范迪吉等译 会文学社 1903 年《普通百科全书》本

该书共 9 章 18 节,分绪论、地球之形状、昼夜之别、四季五带、空气、水之循环、海洋、地球之内部,介绍了土壤之形、山川之根、河川之源、空气寒暖等地球表层的万种气象和无限变化。列入《普通百科全书》普通学类。

069 - 20. 《格致地理教科书》[英]阿克报尔著 仇光裕、严保诚同译 武昌翻译学塾 1904 年? 洋装本

“全书分八章,发明天地自然之理,由浅入深,秩然有序,为各专学必由之轨道。于地矿、格致汽机诸理,皆扼其要。盖地文学之书也。作者以教习率诸生于休息日清游,起设数问题,逐段解明,引人入胜于不觉,颇得循循善诱之理,惜译笔稍冗,当删润之。卷首附图。”(Y)

070 - 21. 《中等地文学教科书》沈仪熔译编 邱岩校阅 湖北教育部 1904 年版

该书分 6 章,天然篇、陆圈篇、水圈篇、生物篇、人类篇及附录。(M)

071 - 22. 《天地奇异》[英]华立熙撰 张文彬述 广学会 1904 年版?

顾燮光称:“书中胪举地文各学凡二十四节,各附以图以相印证。

所论格致各理尚不相悖,惟杂宗教语为可厌耳。”(Y)

072 - 23. 《(最近中等)地文学教科书》 沈仪熔编译 沈炯邱校阅
(上海)昌明公司 1904 年版

该书分 6 章,“凡例”称该书“依佐藤传藏与横山又次郎和文原著译出,又参考今村明恒、石川成章、神谷市郎、矢津昌永、永山万次郎、山崎直方、岩崎直三各理学家中等地文教科书”;书前有论地文学的意义,正文分述天然、陆圈、水圈、气圈、生物和人类。书中附插图 77 幅,另附插图 11 幅。该书至 1907 年发行了 4 版。(A1)

073 - 24. 《地文学教科书》 [日]横山又次郎著 [日]西师意译
(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编发,商务印书馆 1905 年代印(Z1)

074 - 25. 《最新中学教科书地文学》 (Hinmon's Physical Geography) [美]忻孟(Hinmon)著 王建极、奚若译订 商务印书馆 1906 年版

书前为序言和译例。正文首为发端,卷 1 论地球为行星之一,包括日系和地动 2 章;卷 2 论空气,包括成分、重、热、水汽、空气之流动、空中光线之现象 4 章;卷 3 论海,包括海水之深、成分、热度、潮浪、流淤积 3 章;卷 4 论陆地,包括陆地之区分、地面、地之构造、泉、流、流之功用、冰川、湖、山之构造、地之凹凸、地震、火山 10 章;卷 5 论气候;卷 6 论生物,包括各类生物、生物之分布和人 3 章。后附地文学中西名目表。书中附插图 148 幅,另附整页彩图 13 幅。

075 - 26. 《最新普通地文学》 [日]山上万次郎著 (上海)点石斋 1906 年版(H)

076 - 27. 《最近中学地理教科书地文之部》 [日]山上万次郎著 陈树藩译编 (上海)中国留学生会馆 1906 年版(M)

077 - 28. 《地文学》 梁致祥编译 黄培坤校 1906 年刊本

该书为广东高等学堂地文课本,以日本富山房编《地文问答》和英国文教治口译、李庆轩的《地学指略》及东西洋教科书分类编译。全书

12课,分形界、气界、水界和物类界等内容。

078-29.《地文学教科书》[日]山上万次郎著 邓毓怡译 (东京)合资会社三田印刷所 1906年版

该书分7篇,一为地球星学,包括太阳学、地球之外形及内部、地球之运动、地表之测定4章;二陆界学,包括陆界之分配、陆界之变化2章;三气界,包括气界之性质、气温、气压及风、气界之水分、天气及气候5章;四水界,包括海水之性质、海水之温度、海底和海水之运动4章;五地壳;六生物地理学;七结论。另附插图及插页地图若干。(A1)

079-30.《最新地文学教科书》[日]山上万次郎著 无锡译书公会译 (上海)科学书局 1907年版(H)

080-31.《(普通教育)地文学教科书》曾彦编译 (上海)科学会编译部 1910年版

该书是以日人山上万次郎所著《统合地文学》为范本,参考石川成章、山崎直方、神谷市郎所著的各种教科书和参考书编译的。书前有总论,记述地理学之定义、地理学之区分和地文学之区别。正文6篇,一为地球星学,包括太阳系、地球、地面之测定和地图4章;二为陆界,包括地面现象、火山、地震、造山作用和陆地之水5章;三为气界,包括气界之性质、气温、气压、风、气界之水分、气界光学之现象、天文及气候7章;四为水界,包括海水之性质、海水之温度、海底、海水之运动4章;五为地壳;六为生物地理;附篇地史;末为结论,人类天然之关系。此书编译时,“一切例证,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A1)

三、气象与气候学

081-1.《航海金针》(Treatise on Cyclones)[美]玛高温(John Macgowan)编 宁波爱华堂 1853年版

该书分3卷,谈气象为主的自然地理。主要部分译自 Colonel Reid

的论台风的著作。卷1包括推原、论气、论风、观兆、审方、趋避等七条。卷2包括飓风图说,飓风分十六角图说(表附)、戒词、记事等四条。卷3包括地球总论、海上测船所在法、量天气法、量水程法、西洋罗盘图说、杂说等6条。卷尾附有20幅参考图表及显示台风在中国沿海的行程图。(Jp133,W)

082-2. 《御风要术》 (Law of Storms) [英]白尔特(Paul Bert)著
[美]金楷理口译 华蘅芳笔述 (上海)江南制造局 1876年版

该书分3卷176节,论飓风旋转之顺逆、飓风之中枢能移动、风雨表所显之形、飓风移动之轨迹、南北半球风路、飓风欲来时之天气、易起飓风之时、飓风之海浪及横浪、大西洋飓风、印度洋飓风、中国东南洋飓风、印度洋飓风和气浪、飓风之先兆,附论介绍了日耳曼博士笃弗斯有关飓风与气候关系的实地考察。

083-3. 《测候丛谈》 (“Meteorology”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8th ed.) [美]金楷理口译 华蘅芳笔述 (上海)江南制造局 1877年版

该书分4卷。卷1分总论、日光为热之源、以化学重学之法论天空气、空气愈高热度愈小、论水陆传热散热之异和论空气中水气变化之理六部分;卷2分论风、海风陆风、温带内风改方向之理、论空气之浪、量风之法、论海水流行、论水气凝而降下、露霜雾、论散热之雾及水面之雾、松雾、成云之理、云之形状、成雨之理、冰雹、水雪线、雷电等部分;卷3分论推算天气中各事之变数、定函数之各变数及常数、定时中空气压力之变数、一昼夜压力之变数、昼夜热度之变并各处热度之变等部分;卷4分论空气含水量、空气中含水之数、空气水气压力热度与风之方向相关、空气中所现之形(虹霓、光环)、极光差、云之颜色、海市、电极光、陨星、旋风等部分。

084-4. 《气学丛谈》 (“Barometer”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8th ed. 1853—1860) [英]傅兰雅口译 华蘅芳笔述 (上海)时务报馆 1897年版

该书分上下卷,卷上简述历史上科学家对空气、压力的认识及所做

的主要试验。有总论、论古人之意见、论中古博物之士、论今近数百年内格致家之意见、迦离略初知空气有重、论都离惜里试知空气有压力、巴斯果试验之事、奴韦勒驳巴斯果之说、巴斯果再试验之事、教中人再驳巴斯果之说、革里该初作抽气筒、英吉利初设格致公会、晦正士所试之事、论泡形之风雨表、论双管风雨表之利弊、论胡克所造之双管之风雨表、斜管风雨表、短形风雨表、尖管风雨表、连管风雨表、分圆形风雨表等 12 种风雨表和 2 种寒暑表的基本原理和寒暑风雨合表的制作、使用及利弊的介绍；卷下叙述风雨表的测高之法，介绍了真空盒风雨表、金弧风雨表、自记之风雨表等 6 种风雨表及其多种测高方法；其中附图 11 幅。该书较系统和全面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有关温度计（即寒暑表）和湿度计（即风雨表）的沿革。

085 - 5. 《气候论》 [日]井上甚太郎著 罗振玉译 原载《农学报》第 60 至 63 册, 1899 年; (上海)农学会“农学丛书”初集, 光绪年间石印本

该书分 20 节, 前 3 节为绪论、本邦(即日本)地势、气候运用, 4 至 19 节分论气候与农业、渔业、工业、卫生、植物、稻禾、麦、蚕丝、制茶、棉、牲畜、麻、制盐、蓝、烟草的关系, 最后为结论。罗振玉在此书结尾称: “《气候论》虽日本言之, 然可资借镜, 故译之以为我邦讲气候学者之先导。”(A1)

086 - 6. 《气中现象学》 [日]小林义直著 范迪吉等译 会文学社 1903 年《普通百科全书》本

该书分 9 章 36 节。介绍氛围气的成分、构造; 氛围气的运动; 氛围气的蒸发, 如露、雾、云、雨、雪; 地面与大气的关系, 如平均温度、贸易风、海风、陆风、降雨; 天气之规则, 风之性质, 飓风、雨、暴雨; 气候, 如同温线、异种植物带、岛屿气候、陆地气候等; 大气之电气, 如雷电、极光; 光辉现象, 如虹、日月晕; 烧性现象, 如流星、火球等。列入《普通百科全书》普通学类。

087 - 7. 《气候及土壤论》 [日]佐佐木佑太郎著 范迪吉等译 会文学社 1903 年《普通百科全书》本

该书原本 2 编,译本为节译。详论气候风雨、土壤肥瘠、太阳光线、地球温度。列入《普通百科全书》专门学类。

088-8.《农业气象学》[日]中川源三郎著 原载《农学报》第 216 至 219 册,1903 年;(上海)农学会“农学丛书”续集第 5 册,光绪年间石印本

该书前有绪言,正文分 4 编,一气象概说、二农艺气象、三气象观测、四气象预报,附图 21 幅。(A1)

089-9.《农学校用气候教科书》[日]草野正行、中村纯生著 [日]中岛端译 原载《农学报》第 286 册,1905 年;(上海)江南总农会:“农学丛书”第 7 集,光绪年间石印本。

全书 5 篇,一绪论、二温度、三气压及风、四空气之水分、五气候带及植物带。后有附录,列四季二十四节急杂节、温度表。(A1)

090-10.《(中等农学校用)气象学》余宗农编译 庄景仲校阅 (上海)中新书局印刷、新学会社 1908 年版

该书前有总论,正文 2 编 16 章,第 1 编气象概况,包括空气、温热、空中温度、地中温度、空气压力及运动、空气中之水分、天气和气候 8 章;第 2 编农艺气象,包括热、光、湿气、降水、霜雪、风、电气和气候 8 章。(A1)

四、文化与政治地理学

091-1.《泰西城镇记》[美]丁韪良撰 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 11 帙,(上海)著易堂 1891 年版

该书简述欧洲城镇地理与风俗。

092-2.《旧金山记》[美]丁韪良撰 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 11 帙,(上海)著易堂 1891 年版

该书主要记述旧金山物产与中国闽、粤两省海运交通。

093-3.《日本政治地理》[日]矢津昌永编 陶镛译 商务印书馆
1902年版(Z1)

该书分7编,一国土、二人民、三邦制、四经济、五交通、六生业物
业、七外交。(《东方杂志》1904年第1期广告)

094-4.《国际地理学》[日]守屋荒美雄编 杨允昌译 商务印书馆
1903年印刷,(东京)闽学会《闽学会丛书》版

该书1卷,原载《游学译编》第5至7册,1903年4至5月;1903年
出版单行本,“此书特阐明地理与国际之关系,举近今国运大势、领地殖
民沿革,言之綦详,诚地理学之善本。”(Y)

095-5.《人种志》[日]鸟居龙藏编辑 林楷青译 闽学会发行 商
务印书馆1903年版

该书分五部分。一亚细亚系统人民,记支那和西比利亚种族;二欧
罗巴及亚非利加系统人民,记北地中海和南地中海种族;三南方亚非利
加系统人民,记尼孤利洛部及尼孤洛伊特部;四海洋诸岛屿人民,记类
似“黑奴”种族、马来种族和澳大利亚种族;五亚米利加系统人民,记亚
米利加种族、南亚米利加部和北亚米利加部。此书对上述种族的人类
学性质、分布区域等作了概括性介绍。

096-6.《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Woman In All Lands or China's
Place Among The Nations)[美]林乐知纂辑 任廷旭译 广学会1903
年版

该书分10集21卷,卷首有古人论地球之形、地球真形略论、地形
圆、日、地为行星、月、日月蚀、地球大小、地球旋转、四时、经纬界线、温
寒热五带、五洲、总论地球面人民教化等。第1集斐洲及各处未开化人
女俗考;第2集东亚旧教诸国人女俗考;第3集西亚并埃及回教诸国女
俗考;第4集西亚基督教犹太国女俗考;第5集南欧希腊罗马旧教人女
俗考;第7集欧洲各国长进女俗考;第8集欧洲家规女俗考;第9集美
国及美洲诸国女俗考;第10集中国与各国比较女俗考。书中有附图
1400多幅。

097-7.《世界诸国名义考》 [日]秋鹿见二著 沈诵清译 (上海)
广智书局 1904 年版

该书是一部简明地理学的入门书。全书分五节,第一亚细亚洲,第二欧罗巴洲,第三亚非利加洲,第四亚米利加洲,第五大洋洲。每节都分为约说与名义两部分,追溯名义的起源,犹如一部地名语源学词典,秋鹿骏东在《叙》中称:“以其地名过去之历史,及现在之影响,敷衍引用,用为资料,随示其名,并释其义。”

098-8.《政治地理》 [日]野村浩一等编著 刘鸿钧编译 (东京)
湖北法政编辑社 1905 年版

该书为《法政丛编》第 16 种,版权页题为“政治地理学”。该书主要依据野村浩一的讲授稿,同时参考了山本信博的《政治地理学》、辻武雄的《五大洲志》、佐藤传藏的《万国新地理》、辰巳的《万国宪法比较》诸书。该书共分 9 章,第 1 至第 3 章,泛论国家、国家之分类及政体;第 4 至第 8 章分述各国政略,如亚洲各国志、欧洲各国志、美洲各国志、亚美利加洲志、大洋洲和属地,其中第 9 章论列强之属地,是据山本信博《政治地理学》译辑而成。

099-9.《人生地理学》 [日]牧口常三郎著 江苏师范生编译
(南京)宁属学务处、苏属学务处 1906 年版

该书是《江苏师范讲义》第 7 编,全书 5 编,分论地球、气界、陆界、水界、人类和产业地理。这是中国最早以“人生地理学”命名的著作。
(A2)

100-10.《地理人文关系论》 金陵江楚编译官书局 1906 年版

该书是中等教育地理学科之参考书,全书分 8 章,一为地理学之要领;二为地理与历史;三为地理与人群;四为亚西亚论(附论犹太国);五为欧罗巴论;六为亚美利加论;七为东洋论(印度、日本、中国);八为南三大陆、南亚美利加、濠太利亚。

101-11.《最新人生地理学》 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译
(上海)群益书局 1907 年再版

该书据日本同名著作翻译,共3编34章,绪言3章,讨论地人关系之概观、为观察基点之乡土等;第一编人类生活处之地共13章讨论日月星辰、地球、岛屿、地峡、山岳、平原、河川、海洋等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第二编地人相关自然之媒介共6章论无生物、太气、气候、植物、动物及人类的相互关系;第三编人类以地球为舞台之生活现象共9章论社会、社会之分业生活地论、产业地论、国家地论、都会及村落地论、生存竞争地论、文明地论;结论3章详述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地理学意义及范围等。前有白洋叙,书后附有六大强国权力一览、国际势力分布略图、火山的活动、世界人种图、世界文明之中心等插图10幅。该书取材多来自日本资料。

102-12.《(和文汉译解释)世界读本》 [日]池边义象著 日语讲习会译释 (贵州)启智学社1907年版

该书是日本各中学练习语法用的世界读本,1902年初版后至1906年已印有20版。译本据新版译出,采用日汉对照,原文在前,译文次之,解释附后,以供中国留学生学习日文之用。全书分三编。第1编由西洋各国之衣食住、土耳其之风俗、巴里之凯旋门、露西亚之王宫四节组成;第2编由西洋人之公共道德、俄罗斯之风俗、伦敦之繁华、欧米之市街交通四节组成;第3编由伦敦之日曜日、柏林市、波达谟、巴里之花战、西洋之画端书五节组成。

103-13.《世界读本》(The World's Readers)[日]池边义象著 孙毓修编译 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

该书分上中下三卷,卷上分十一章,一航海、二热国之港埠、三苏彝士运河、四古罗马及新罗马、五瑞士之山水、六巴黎之所见、七巴黎之掷彩节、八伦敦之繁华、九伦敦人之休息日、十柏林市、十一柏林之宫殿与其民风;卷中分十三章,一奥地利及匈牙利、二俄国都门之风俗、三俄皇宫殿、四俄国之旅行、五俄国之农民、六黑海、七土耳其之情势、八纽约及其他邑之工商、九美国之政体、十美国民风杂记、十一加拿大铁路、十二日本之名城、十三日本之风俗;卷下分十章,一欧美人衣食居室之

道、二都会中之交通、三旅馆、四博物院、五题画明信片、六店肆、七游戏、八公园、九戏院、十公德,书中附有插图多幅。《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1910年)称此书“译者于原书之特色,既靡有所遗,复旁稽他籍,补其阙遗,正其谬误,于欧美诸国风俗习惯、民气国情、山川名胜、港埠景况,言之甚详,文笔雅饬,模范山水,益饶其趣。插画之后复加题辞,学者读其书、观其画、玩其题,而知译本之价值又在原本之上也。”

104-14.《人生地理学》 凌廷辉译编 (上海)新学会社 1909年版

该书共36章,前27章主要论述与人文地理有关的各种自然地理现象,后9章主要介绍各种人文地理知识(此据郭双林《晚清西方地理学东渐述论》,载《学人》第7辑)。

五、区域地志

105-1.《咬嚼吧总论》(General Discussion of Java)[英]麦都思著

1824年出版于巴达维亚

该书初连载于《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后出版单行本,共85页,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爪哇岛的地理、历史和风俗,附有地图,1825年、1829年、1833年和1834年先后重印。(Jp28)

106-2.《美理哥合省国志略》(A 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高理文(B. C Bridgman,又译裨治文)译撰

1838年新嘉坡坚夏书院刊,分两册。同年就重版(W)

该书初版125页,分27卷,一觅新土;二分野度数;三创国原由;四百姓自脱英吉利国之制;五开国以后史略;六原居苗人;七户口册;八山川(天时附);九土产(禽兽附);十田农;十一工作;十二贸易;十三至十七为国政一、二、三、四、五;十八济贫;十九辨教邪正;二十土畜本原;二十一学馆;二十二书籍(刊刷各器附);二十三各艺;二十四仁会;二十五伦;二十六礼仪规模;二十七推度将来。简要地介绍了美国地理、早

期历史、独立战争、土著居民及人口、自然景观、物产、农业、工业、商业、政府、法律、语言、文学、慈善事业、生活方式与国防等，卷首附有世界地图和美国地图。1846年该书在广州重版，题为《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共75页，仍分27节，另附地图，记事迄至修订之前。(Jp70)顾长声称另有1844年香港版，题为《亚墨理格合省国志略》(《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32)。王家俭称香港版题为《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是1838年下册的再版。(W)杨玉圣称1844年版为《亚美理格合省国志》(《中国人的美国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10)。《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和梁廷枏的《合省国志》的编写，都曾参考过此书。

107-3.《大美联邦志略》 [美]裨治文撰 管嗣复改译 (上海)墨海书馆1861年版

该书是《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修正版，前有被裨治文《重刻联邦志略叙》，宋小宋叙。内容较前完备，订为上下两卷，上卷总括全概，历叙拓地开国之原，风土人情之要，标题均采用四字一句：觅地原由、疆域度数、山川平原、邦都道路、天时地气、土产物类、开国原始、民脱英轭、建国立政、设官分职、理刑规制、语言文字、学馆书籍、教化说源、百工技艺、商贾贸易、善举述略、风俗人事。下卷按邦列国，每邦志载方域之广狭、物类之出产等，章节划分也较前合理。后有裨治文的学生、当年初版的译述者梁植跋。此版先后收入《西学大成》、《西史汇函》等丛中。

108-4.《犹太地理择要》 [美]纪好弼著 陈觉民述 1882年刊本

徐维则称此书“备采古书，言犹太地理者，辑录成书，尚有条理，读之可稍明国地沿革风俗大略。惟其叙述各事，必称引教书，以征彼教之非虚，亦其大弊。”(D)

109-5.《琉球地理志》 日本政府编 姚文栋辑译 1883年出版

该书全名《琉球小志并补遗附说略》，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中根淑所著的《琉球地理小志》、《琉球立国始末》、《琉球形势大略》、《冲绳岛总

论》；大规文彦所撰《琉球新志自序》；重野安绎所撰的《冲绳志后序》；以及译者将修史馆新纂的地理书中摘译了琉球一门，参以海军省实测图说，为《琉球小志》两卷。在译述过程中，译者对日本方面的伪造或误记、强词夺理的所谓考证，一一加以驳斥。

110-6.《英法俄德四国志略》 沈敦和辑译 1892年刻本

该书分四卷，英、法、俄、德各一卷。辑译者根据自己在国外游历时所获得的资料，按沿革、疆域、藩属、政治、财赋、文事、武备、风俗、气候物产货殖、制作诸条编成此书。书前有桂嵩庆序、江衡序、沈敦和自序；书后有崔鼎跋和何鏞识。1896年该书有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版，还有上海祥记书局石印本。

111-7.《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 [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著 铸铁生述 广学会1897年版(H)

该书亦名《三十一国志略》，不分卷，按各国1889年所入的赋税银数多少为先后，讨论了英国连属地、法国连属地、俄国、美国、奥地利、意大利、印度、德国、西班牙连属地、澳洲、土耳其、中国、和兰、巴西、日本、比利时、埃及、葡萄牙、坎拿大、瑞典、墨西哥、银国、南非洲、安南、希腊、瑞士、丹国、暹罗、小吕宋、波斯、高丽31国的地理、政治与经济，指出只有处理好道德、学问、律法、军法、新学、航海、机器、邮政、报馆、格物、传教、火轮机器、铁路、轮船、电报及德律风、电学、通商、万国如一家、新学这十九条关系，国家定能日益富强。

112-8.《法国新志》 [英]该勒低辑 [英]傅绍兰口译 潘松笔述 [英]秀耀春(F. Huberty James)、范熙庸同校 江南制造局1898年版

该书分17章，一为地面积人数、二为物产、三为商务与船、四为内地转运、五为度支、六为国政、七为教会、八为学校、九为刑律济贫、十为防务、十一为钱币、十二钱之分量、十三使臣、十四属地、十五阿非利加洲内属地、十六亚美利加洲内属地、十七澳大利亚洲内属地。该书附有多种年表，“悉照原书用横行，以便阅者披检。”

113-9.《英法义比国志译略》 吴宗濂等译 1899年无锡薛氏石

印本

该书封面题为《英法义比译略》。全书分4卷,卷1英吉利国志译略、卷2法兰西国志译略、卷3意大利国志译略、卷4比利时国志译略。其中英国较详,由吴宗濂译自法文、赵元益述,总述英伦三岛的史地,并附英伦国王年表;后三种国志较略,都由世增译自法文、顾锡爵述,意大利国译略中有一些薛莹中据大坂日报补充的内容。全书各卷都题有“无锡薛福成叔耘鉴定”。

114-10.《新编东亚三国地志》 [日]辻武雄著 东京合资会社普及舍 1900 版

该书分上下卷,上卷则收绪言、亚细亚总论、东亚三国总论和支那地理;下卷则收朝鲜、日本二国地理及结论。支那地理分总论、行省、外藩、外国交涉;朝鲜地理分总论、各道、外国交涉;日本地理分总论、各道、台湾等,作者以为外国交涉部分包含了自己许多独创性的见解。该书除参考中外舆地家的著作外,还包含了作者有关三国的实地考察。书前有中国李盛铎叙和韩使朴鏞和序,后有中国叶基楨跋。

115-11.《列国地说》(Geography for Home Readers)[美]卫罗氏译著 金向敷述录 1901年上海广学会新译 美华书馆版

该书分2卷,卷1大清国,卷2大英国。卷1分21章,论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山东、河南、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东三省、大清属地。卷2分13章,论英国之缘起、纪英国列岛、纪苏革兰、纪哀耳兰、纪支波拉德及数岛、纪印度国、纪西伦岛、纪阿典巫来由香港之属地、纪亚非利加洲英属地、纪美洲英国各属地、纪英属奥司大列洲、纪英属数海岛。全书有许多铜版画插图。扉页题有“小狄缙馆时务丛钞”。

116-12.《日本地理志》 [日]中村五六编纂 [日]顿野广太郎修补 王国维译 金粟斋 1901年版

该书分11篇,一总论、二畿内、三东海道、四东山道、五北陆道、六山阴道、七山阳道、八南海道、九西海道、十北海道、十一台湾,前有汪德

渊序,后附日本地理学名义。

117-13.《新撰大地志》(亚细亚洲之部) [日]山上万次郎编 叶瀚译 (上海)正记书局 1901 年译印

该书分 7 章,一为世界地理总论,分天文、地文、人文三部分;二至七为区域地理,都有地文、人文部分。地文地理论述地势、水志、气候;人文论述人民、政治、产业、交通等;二为亚细亚总论,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两部分;三为朝鲜,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及地方志;四为支那,分泛论、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和地方志;五为露领亚细亚,分西伯利、中亚细亚、高加索;六为南部亚细亚,分佛领印度支那、暹罗、英领海峡殖民地、英领印度(附锡兰、佛领印度、葡领印度、尼泊尔、不丹)、马来群岛;七为西部亚细亚,分义兰诸邦(皮路直斯坦、阿富汗斯坦、波斯)、亚刺比亚、亚细亚土耳其(附沙斯伯李司)。

118-14.《续瀛环志略初编》 薛福成主译 无锡传经楼 1902 年版

该书依《瀛环志略》体例,首亚洲、次欧洲、次非洲、次美洲、次澳洲,初编是亚细亚洲志。全书所据多为薛氏英文译稿和法文译本,分为《日本国志》(瞿昂来译)、《中国印度图说》、《暹罗志》(以上为世增等译)、《老挝》(薛福成译)、《江洪孟连景东汇译》、《越南国志译》(以上为世增等译)、《越南三圻考》(庆常译)、《柬埔寨》(薛福成译)、《柬埔寨考》(庆常译)、《缅甸国志》、《缅甸国志·缅甸诸城考》、《掸人地志》(以上为世增等译)、《印度史》(瞿昂来译)、《波斯国志》、《阿富汗国志》、《俾路芝国志》、《阿拉伯国志》、《西域回部志》、《帕米尔考》(以上为世增等译)。书中缺朝鲜、琉球的内容,越南、缅甸、暹罗的资料较多,其余稍略。有不少书都有直接译据的原本,如法国勒格雷《游历日记》、亚尔蕾格留斯《五洲地理新志》、杜西侯《天下舆地志》等;英国爱吴锡匹敌《地理新志》、乔恩斯登《地理志》。由于译笔出自多人之手,原著体例各异,虽每篇都题有“薛福成鉴定”,但实际上正如其子所言“译述非出一人,未经先公编定”。其他各国志有陆续编成者,但未统一编次。

119-15.《土耳其国志译略》(Geography of Turkey)吴宗濂、郭家骥、张美翊同译 无锡薛氏 1902年石印本

该书是对《瀛环志略》中相关部分的补译。据1893年法文版摘译了土耳其史地的资料。该书题有“无锡薛福成叔耘鉴定”。

120-16.《罗马尼亚国志》(Geography of Roumania)吴宗濂、郭家骥、张美翊同译 无锡薛氏 1902年石印本

该书还收录塞尔维亚国志、布加利亚国志、门得内各罗国志和希腊国志,希腊国志是世增和顾锡爵译述的。书前题有“无锡薛福成叔耘鉴定”。

121-17.《海国图志续集》 [英]麦高尔等辑著 [美]林乐知、瞿昂来等同译 文贤阁 1902年版

该书卷首有高丽洋关税务司邓铿的小序,认为东亚以高丽为枢纽,分三章谈了东亚日迫情事,俄人觊觎高丽证据和英国印度各报论俄人动静。全书分25卷,卷1至卷12是麦高尔辑著的有关英、俄、土、印度等国际关系的内容;卷13至卷25是傅兰雅口译、徐建寅笔述的英国贾密伦和裴路撰写的轮船布阵等内容。

122-18.《五大洲志》 [日]辻武雄著 东京泰东同文局 1902年版

该书分上中下3卷6编。一为五大洲概论、二为亚细亚洲志、三为欧罗巴洲志、四为阿西亚尼洲志、五为亚非利加洲志、六为亚美利加洲志。亚洲部分未收中国、日本和朝鲜,是因为撰者另有《东亚三国地志》一书。该书提纲挈领,收录了最新各国有关人口、兵备、贸易、铁路、轮船、电线、邮便的统计数据,各编末尾有沿革论略一章。全书译名发音采用北京口音为主。每卷末尾附有华英地名对照表。书前标有“大清国皇太后 皇帝御览 钦赐嘉奖”,有吴汝纶题词,周渤序、夏偕复序。

123-19.《中国地理课本》 [日]辻步雄著 日本株式会社普及社 1902年版(H)

124-20.《白山黑水录》 [日]小越平陆著 作新社 1902年版

该书原题《满洲旅行纪事》，刊载与 1898 年东京《朝日新闻》，后据新出通报，并参考了《辽史》、《金史》、《元史》、《圣武记》、《朔方备乘》、《水道提纲》及《满洲地志》等增补而成。全书分绪论、铁道志、道里志、风土志、沿革志五部分，内容涉及满洲铁路、松花江水运、满洲地理环境、水陆运、贸易风俗、农业、渔猎、牧畜、制造、气候、物产、山岳江河及历史沿革。

125 - 21.《阿非利加洲》(A Geography of Africa) 英国舆地学士地理原著 中国驻英使者命译 驻英使署翻译初稿 中西制造书局 1903 年印、经济书林发行

该书原有瞿昂来的英文译稿和世增的法文译稿，译稿成于光绪十九年。此书据瞿氏英文译稿，附录阿非利加洲西土译稿是据世增的法文译稿。全书分总论(各国疆域、形势、江河、矿产、户口、动植各物、气候、历史)、巴巴黎各国(摩洛哥、阿尔及耳、突尼斯、的黎波里)、埃及(奴比亚)、阿比西尼亚、撒哈拉、苏丹、西阿非利加(塞内冈比亚、上几内亚、下几内亚)、中阿非利加(康固、唐干尼开湖、维克利亚湖)、东阿非利加、南阿非利加、阿非利加附近诸岛。该书补充了《瀛环志略》的不足，增补了许多新资料。《译书经眼录》称“书中于非洲，皆缕晰言之”。但有些内容，“如意伐阿比西尼亚，英脱相争，法并马达嘎斯加岛之事，均未载人，然非洲地志尚少专书，得此读之，或亦足备考证乎。”

126 - 22.《蒙古地志》 [日]下村修介、关口长之编辑 王宗炎译 南京启新书局 1903 年版

该书为日本参谋本部官书，是日人游历蒙古游记，并参考了俄人布拉第挖斯奇氏记载和中国图籍。分位置、山脉、河江、湖泽、沙漠、气候、物产、风俗、政体、宗教、岁出岁入、教育、兵制、制造、贸易、区分、道路、电信、通货、都府、史略诸部分介绍了蒙古的部落、广狭、山川、险要、兵制、物产、道路、商业等。

127 - 23.《西伯利亚大地志》 [日]下村修介、加藤稚雄编纂 王履康、经家龄合译 金陵启新书局 1903 年版

此书为日本参谋本部所辑,分上下两册共5卷10编,分天然、国体、历史三大部,第1编总论分8章简述源流、位置、疆界、幅员、地势、气候、天产、人种及人口;第2编山岳及河湖;第3编海洋;第4编气候及天产;第5编人种;第6编教育及宗教;第7编行政及兵备;第8编疆域;第9编生业及通运;第10编历史。《译书经眼录》称:“凡该地沿革情形,言之綦详。并据中俄英法各国书籍、日人旅行报告等书,分门编入,其铁道关系极重。译者又将日本田边朔郎新著《西伯利亚铁道》一书内各线路截译载入,尤为最新最要。卷首另附‘中外货币度量衡比较表’、‘西伯利亚全图’、‘西伯利亚航海及陆行线路图’各一幅,精细如发,可资引证。按西伯利亚者,古之鲜卑遗地,今亚洲新造之邦土也。俄国经营此地,在十五世纪之末,迄今全归所有,为殖民工业、殖产兵备等,注入国币不可数计。迩来密林深菁,咸成村落;山谷河湖,悉开道路。然远溯太古各种民族之蕃息兴亡,迁徙者尤宜知其经过年代。此书于历史人种详加考证,以示变迁。至事物则取最近者改正之。全书凡五十余万言,可谓体大思精者矣。”

128-24.《特兰斯法尔》 [日]福本诚著 (杭州)合众译书局 1903年版

该书是南阿共和国的国志,共分4编。一地理及政志,二新建国史,三英阿最近之冲突,四余录,介绍了南阿的地理、政治与人物。

129-25.《日本地理问答》 [日]富山房编纂 范迪吉等译 会文学社 1903年《普通百科全书》本

该书共418问,是日本小学生的地理课本。分总国、东海、畿内、东山、北陆、山阴、山阳、南海、西海、北海等篇,共10章。列入《普通百科全书》初级学类。

130-26.《日本新地理》 [日]佐藤传藏著 范迪吉等译 会文学社 1903年《普通百科全书》本

该书属于省郡志体例。人文似种族志,族制似户口志,外交、政治似大事志,军备似武备志,教育似学校志,社寺似坛庙志,工商农鱼诸业

似杂志,铁道道路似地域志,地文类之位置、地势、海流、潮汐、五大岛及属岛似山川志,矿物、矿泉、植物、动物似物产志;气温及风雨雪似天文志;地方志之分道似省志之分郡。其中有不少文化地理的内容,如新闻纸及杂志的统计等。列入《普通百科全书》专门学类。

131 - 27.《满洲地志》 [日]参谋本部著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
商务印书馆 1904 年版

该书不分卷,主要论述了满洲的地理位置、山脉、海岸、岛屿、港湾、半岛、气候、物产、政体、宗教、区分、道路、电信、八旗练军、勇营、史略等。

132 - 28.《俄罗斯》 [法]波留著 [日]林毅陆译 [日]中岛端重译
商务印书馆校阅 商务印书馆 1904 年

该书分三卷,第一卷论俄罗斯地势、气候、人种;第二卷论俄国制度;第三卷论俄国宗教。

133 - 29.《中等亚洲地理教科书》 [美]敦内氏著 丁冕英编译
汤寿潜阅订 (上海)南洋官书局 1905 年版(H)、(M)

134 - 30.《(最新)中等欧洲地理教科书》 [英]祁尔著 陆守经
编译 (上海)南洋官书局 1905 年版

该书经两江学务处审定。目录页、卷端、书口题名“中学欧洲地理教科书”。(M)

135 - 31.《中国地輿志略》 [法]夏之时等著 孙文楨译 (上海)
土山湾印书馆 1906 年版

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十八直省总论共 5 卷。卷 1 中国北境 4 章,论黄河上中下游各省;卷 2 中国中境 4 章,论扬子淮河流域各省;卷 3 中国南境 4 章,论西江及滨海各流域;卷 4 滨海疆域 7 章,总论中国海疆,分论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滨城;卷 5 中国政治理财 6 章,论中国政体行政、丁口言语、种植牲畜渔业、矿务工艺、商务、交通道路。下编一卷 4 章,第 1 章论满洲、第 2 章论蒙古、第 3 章论新疆、第 4 章论西藏,以及大清二十二省府州厅县表和中法地名合璧,后有中国地

图、中国高低形显图、中国北境地质图、黄河源图、黄河蜀道图等分省附图共 50 幅。还有中国二十二省府州厅县检字表。

136 - 32.《土耳其志》(附新志) (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 1907 年编刊

该书由《土耳其国志》、《土耳其地志》、《土耳其新志》三部分组成。国志从倭斯曼诸朝的系统叙述土耳其的历史；地志讲述土耳其的地理、人口、动植物、商务进出口、农务、财政、陆军、水师、教育、交通；新志补充了人种、宗教、教育、水陆军、物产与工艺方面的不少新资料。

137 - 33.《印度志》(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 1907 年编刊

该书封里题为“印度国志”，不分章节，由论略、释名、位置、境界、形势、喜马拉雅山、流域、河系、五谷、风景、高南原、文得亚山、物产、矿产、教育、报章、税收、民俗、历史沿革等组成。

138 - 34.《印度新志》 (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 1907 年编刊

该书叙述了 1891 年以来印度的形势、户口、男女、宗教、城镇、农业、织业、别种制造、煤、金、石油、盐、财帛、沿海岸商务、边境商务、进款与出款、国债、储蓄银行、陆军、巡警与监狱、1900 年邮政与电报的统计、1896 - 7 年学校的统计、1880 年以来的历史。

139 - 35.《小亚细亚志》(附新志) (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 1907 年编刊

该书卷首题为“小亚西亚志”，由名称简介、位置、山脉、河流、湖、气候及出产、地质、古代之部分及民种、历史组成。新志介绍了山脉、河流、湖沼、行政与交通。

140 - 36.《俾路芝志 马留土股志 纽吉尼亚岛志 西里伯岛志》 (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 1907 年编刊

该书分别介绍了上述四地的位置、人种、气候、植物、动物、宗教、交易和历史。西里伯岛还附有新志，叙述该岛的地理、河流、人口和政府。

141 - 37.《缅甸国志 英领缅甸志 缅甸新志 暹罗国志

布哈尔志》（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 1907 年编刊

《缅甸国志》叙述了位置、物产、林木、矿产、兽类、鸟类、居民、政治、职官、赋税、制造、商业、货币、权量、历法、言语文字、宗教文学、历史。《英领缅甸志》介绍了物产、商业、财赋、气候、政体。《缅甸新志》用 1895 年的资料叙述了气候、官制、兵备、林木、商业、制造等。《暹罗国志》叙述了该国的位置、河流、气候、矿产、植物、动物、商业、赋税、水陆兵额、法律、城镇、教育、宗教、美术、节日、历史。《布哈尔志》介绍了该地的居民、植物、动物、历史。

142 - 38.《爪哇志 苏门答拉志》(附新志)（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 1907 年编刊

该书分别介绍了两国的位置、形势、气候、疆域、户口、宗教、教育、矿产、种植及物产、牲畜；新志介绍了爪哇的船只、商务、道路、铁道及苏门答拉的地质、地形、河流、居民、出口、道路和铁道，以及 1883 至 1894 年的历史。

143 - 39.《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志》（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 1907 年编刊

该书由《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志》、《阿富汗斯坦志》、《阿富汗新志》、《土耳其斯坦志》、《东土耳其斯坦志》五部分组成。《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志》分地理、行省及知名之地、居民、物产制造、历史、古迹；《阿富汗斯坦志》分地理界域、天然地理之分段、河流、湖、城邑、气候、天然物产、植物、动物、乳哺动物、猫类动物、狗类动物、鸟类、两栖类动物、家畜、商业、居民、政治、政府、税饷、兵力、语言文字、历史；《阿富汗新志》分诸河流域、山、地质、气候、行省、名城、自主各族、民种、历史；《土耳其斯坦志》分土耳其司丹志、大亚西亚高原、西土耳其司丹、东土耳其司丹、高原部、山部、天山湖底、低原、西土耳其司丹地势地形之改变、气候、动物、植物出产、农艺、工艺、民种、城镇、俄罗斯势力等；《东土耳其斯坦志》分界域、行使、塔里木河、气候、植物、生业及矿业、水泉、居民、历史。

144 - 40.《亚拉伯志》(附新志)（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 1907 年

编刊

该书是据 Niebuhr、Bure-Khaidt、Wallin、Welsted、Palgrave 诸君旅行亚拉伯的日记编译的。全书分幅员、西海滨、东南海滨、波斯湾海滨、形势、部分、西奈山土股、地质、黑夹斯部形势、麦加圣域、植物、猫、鸟、农业、牧场、矿业、渔业等部分。19 世纪后 50 年,一些西方旅行家进入亚拉伯地区进行测量与调查,新志即据这些新材料编译。

145 - 41.《阿达曼群岛志(附新志) 婆罗岛志》 (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 1908 年编刊

该书分三部分,《阿达曼群岛志》论述了阿达曼群岛的地理位置、居民、气候、地质、植物、动物、历史等;新志论述了阿达曼的测候学、林木、动物、土著与军犯羁留所;《婆罗岛志》论述了山脉、湖、气候、矿产、动物、植物、居民、大野克人、中国居民、居民总数、界域、荷兰界域、历史。

146 - 42.《亚细亚洲志》(附新志) (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 1908 年编刊

该书叙述了亚洲的位置、定名、面积、界址、岛屿、形势、山岭与地之关系、气候、居民等,并简介了中国、印度支那、英辖印度、锡兰、波斯高原、帕米尔等地的地理、气候、人种与历史。新志有 1870 年以来有关亚洲舆地的调查、亚洲普遍形势的分析、河流情形的描绘、地质与火山、古代通商的孔道及近代之铁路、工艺和灌溉的进步等等。

147 - 43.《开埔殖民地志》(附新志) (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 1908 年编刊

该书由英国所属的非洲最南端的开埔殖民地志和新志组成。地志研究了该地的土性、河流、海滨及港湾、气候、植物、动物、历史、分省及要埠、户口、政府、宗教、教育、公家建设、新闻纸;新志补充了 1880 至 1900 年的内容,以及矿产及矿业、农业、内地交通、邮政与电线等内容。

148 - 44.《西比利亚志》(附新志) (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 1908 年编刊

该书介绍西伯利亚全地大略情形、山脉、大高原、纵行谷地、多山

部、高平原、冰河、火山、矿产、河流、海滨线及海岛、植物、动物、居民、土著、西伯利亚之俄人、畜牧、猎业、渔业、制造、商务、交通、殖民、军犯、教育、行政分区、城镇、历史。新志补充了 1897 年有关居民的统计,1901 年的租法和 1900 年的农务、制造与矿业。

149 - 45.《汉口》 [日]水野幸吉著 刘鸿机译 昌明公司 1908 年版(H)

150 - 46.《欧洲新志》 [英]计罗撰 李家驹译述 光绪年间刻本

该书一卷,分总说、洲域、广轮、海岸、海洋、角、隅、峡、岛、地面、山、原、河、湖、天时、土宜、植物、动物、矿产、铁路、居民、言语、教门、邦国。

151 - 47.《亚斐利加洲志》(附新志) (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 1909 年编刊

该书一卷,前述从黑鲁忒斯到李文斯教的非洲发现史,继而论述非洲的位置、大草原、高山、地质之大略、矿产、林木、河流、大陆流域、风、热带中之雨水、岛、民族与宗教;新志利用了西方人有关非洲大陆结构、高原、流域、气候、物产、民族的最新调查,后附 1890 年非洲被瓜分的情状表。

六、商业地理学

152 - 1.《万国商业地理志》 [英]嘉植德氏著 广智书局译 (上海)广智书局 1902 年版(H)

153 - 2.《商工地理学》 [日]永井惟直著 范迪吉等译 会文学社 1903 年《普通百科全书》本

该书原本二编,译本是第一编。全书分两章论述商工地理学之概念与商工业盛衰的原因。指出盛衰的原因有地文的状态(地势及位置、自然力、地味及矿产之有无、人种及人口)和政治的状态(习惯、租税制度、政府之组织及方针、运输交通、货币制度、度量衡制度)两部分。列

入《普通百科全书》专门学类。

154-3.《商工地理学》 [日]永井惟直编辑 作新社 1903 年版

该书分 2 编 8 章,第 1 编总论,包括商工地理学之概念和商工业盛衰之原因 2 章;第 2 编各国商业之形势,包括亚细亚洲、阿非利加洲、欧罗巴洲、北亚美利加洲、南亚美利加洲和澳大利亚洲 6 章。(A2)

155-4.《最新商业地理教科书》 [英]贾萨德立著 张梦香译

(南京)南洋官书局 1905 年版

该书不分篇章,以亚、大洋、洋、欧、非、北美、南美为序介绍各国各地区的形势、山脉、流域、气候、海流、物产、工业、商业、港口、进口和钱币等内容。此书经两江学务处审定。(A2)

156-5.《最新世界商业地理教本》 [日]甲斐山留吉著 顾雪梅

编译 (上海)作新社印刷局 1906 年版,科学书局发行

该书分 5 章,分论欧、亚、美、澳、非各国和地区的面积、人口、农业、牲畜业、矿产业、制造业、商业、交通和港口。书后附译者编“万国面积人口比较表”和“万国输出人比较表”。(A2)

157-6.《最新韩国商业地理》 [日]矢津昌永著 李鸣谦译 (上

海)广智书局 1907 年版。(A2)

158-7.《中国商业地理》 [日]胜部国臣著 霍颖西译 (上海)广

智书局 1907 年版

该书分 2 编 13 章,前编包括中国总说,中国通商总说、中国通商四大别,列国之经营、中国之矿山、交通、金融机构、货币、度量衡、关税和商品 11 章;后编专述开港场和商业地。

159-8.《世界物产地志》(上册) [日]矢津昌永、杉浦隆次、桦岛驹

次、增山明合著 童世亨、俞镇合译 (上海)昌明公司 1907 年版

该书全本分农产、林产、畜产、水产、工产、矿产六编共 20 万字,分订上中下三册,上册农林产分二编共 5 章,第 1 编农产物,分食用农产物和工艺农产物 2 章;第 2 编林产物,分木材、药料类及香莘类、果实及

杂用类 3 章。书中每一物产均注明英文名和拉丁文名及异名,记述内容包括物产的性质、分布、输送、产额和用途等。童世亨在序言中称该书“出而于世界之富源得窥全豹。读之亦可知我国物产之一般矣。”

160-9.《富之满洲》 [日]松本敬之著 马为珑译、刘启晴校 政治转输社、普及书局 1907 年版

该书绪论论日本人口之增殖、日本移民之实相、今后日本移民地。本编分四编,第一编满洲经济地理,论述了东辽河、松花江、大辽河、鸭绿江、图门江、嫩江水域的经济地理;第二编满洲之富源,介绍满洲的物产、矿山、森林、农耕、渔猎、制造业;第三编满洲之贸易,论述满洲贸易之市场、满洲输出和输入贸易论;第四编满洲之交通运输,结论是个人之满洲经营。

161-10.《商业博物志》 [英]尼用椅子著 [日]瓜生寅译 湖北商务报馆光绪年间翻刻本

该书原本 1876 年再版于伦敦,1884 年瓜生寅据此版翻译。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门本国与近邻欧洲诸国英领殖民地之地理及外国贸易之关系,分生粗品论、本邦论、大貌利颠地质论、合众王国内爱尔兰论、合众王国内大貌利颠论、英国渔业论、论欧洲中与合众王国等类之地、貌列颠帝国英领殖民地及属地论、外邦产物论、亚细亚、新世界论、天然人为共为变化之论 12 篇;第二门植物界商品论,分食用植物、工业医药用植物 2 篇;第三门动物界商品论,分哺乳动物之产品、禽类之产品、爬虫类之产品、两生动物类产品、鱼类之产品、软体动物之产品、多腿动物之产品、多肢动物之产品、初等动物之产品 9 篇;第四门矿类生粗品,分金属、本然之矿类 2 篇。附录 1 篇,题为“食用及工业用植物之地理上之配置”,该文将植物地界划为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带、亚暖带、亚寒带、寒带、北极带八区。

162-11.《亚洲商业地理志》 [日]永野耕造著 刘世珩译 “五洲般编译时务丛书”1911 年版

该书又名《东洋贸易地理志》。(A2)

163 - 12.《北满洲商业地理论》 [日]青柳笃恒著 载王锡祺辑《中外游记汇编》。(A2)

七、交通与旅游地理学

164 - 1.《西游地球闻见略传》(Tour of the World)[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译述 1819年出版于马六甲

该书共29页,是一本地理游记的小册子。以一个四川旅游者的口吻写下了他越过西藏,经印度,到达法国游历,最后从美国返回中国的故事。书中涉及了欧洲人的教育、文学,西方人的宇宙观、地理意识,以及欧洲人的节日、人种、政事、风俗和宗教等,附有一幅有文字说明的世界地图。(Jp5)

165 - 2.《海道图说》(Chinese Sea Directory by Reed)[英]兵船部原书 [美]金约翰辑 [英]傅兰雅、[美]金楷理、王德均合译 (上海)江南制造局1874年版

该书分15卷,附长江图说1卷,卷1论大风与南海东海水性自流并行船要言;卷2海南琼洲府至珠江香港;卷3香港至福建厦门;卷4厦门至白犬列岛并澎湖各水道;卷5白犬列岛至浙江象山县泊船港;卷6象山港至扬子江口附舟山列岛并上海各水道;卷7扬子江口至山东直隶水道;卷8直隶辽东二海;卷9扑勒特司岛并浅滩与台湾水道;卷10朝鲜国西南与南面各海岸;卷11日本九修屿暨西各屿南岸大日本屿东南岸与东岸以及内海;卷12日本屿东岸;卷13论日本列岛暨日本与九修各屿西岸又自扬子江口至长崎;卷14楚家尔水道与也苏岛南岸并枯里尔列岛;卷15日本海。

166 - 3.《柬埔寨治以北探路记》 [法]晃西士加尼(Marie Joseph Francis Garnier)撰 1884年泰华楼居士钞校刊刻

原书完成于同治中,当时法国正好侵据越南之后,派遣船主特拉格

来探测西路。译本全书分 15 卷,卷 1 述探访游览远印度风景史迹政务总叙、派员游探各章程;卷 2 由盎高尔回柬埔寨隆又上溯至排沙格;卷 3 由排沙格复往南掌都城;卷 4 从文湘至郎泼拉彭;卷 5 游探郎泼拉彭以上各路梦央至克线航;卷 6 由线航进云南;卷 7 由云南至大理;卷 8 中国印度北境史迹;卷 9 远印度各部落经纬度;卷 10 自帅冈至叙州府测验日记表;卷 11 远印度左近山河形势;卷 12 安南并南掌矿说、中国矿说;卷 13 云南铜矿、金矿、铅厂、铁厂等;卷 14 论远印度种植土性;卷 15 山林树木花果药品。

167-4.《俄属游记》 [英]兰士德著 莫镇藩译 1894 年上海时务报馆石印本

该书分上下两卷,叙述 1882 年英国传教士兰士德由伦敦至乌拉尔、由乌拉尔山东溯至阿莫士克,经额尔齐斯河入伊犁,经敖罕观布哈尔略基发沙漠南及于木富临威海,对游历所到之处详加论述。该书前有张荫桓序,后有沈曾植记。

168-5.《黑蛮风土记》 [英]立温斯敦(David Livingstone)著 史锦镛译语 沈定年述文 陈以真校字 1879 年? 刊本

该书不分卷,共有 60 目。主要是立文斯敦寓居非洲的实地考察记录。如大狮、兽名氏族、养性妙法、廓老观猎、卵壳取水、狮牛斗、露坐听讼、农器、羚羊、热地、贩人陋俗、奴仆贱称、野牛等,前有沈定年 1879 年序,书中附有精美插图多种。该书有申报馆版,20 世纪初上海时务书局重印,改名为《泰西风土记》。

169-6.《斐洲游记》 [英]施登莱著 虚白斋主口译 邹翰飞笔录 (北京)汇报馆 1900 年刊印

该书译出后曾在《益闻录》上连载,是英国地理探险家施登莱应伦敦地学会聘,携巨资,纠同志数人及黑人 200 余人,历经艰险,首次全贯非洲腹地的探险记录。书中图文并茂,记录了非洲的山川物产、风土人情等。

170-7.《东亚各港口岸志》 [日]参谋本部编辑 广智书局译

(上海)广智书局 1902 年版

该书分 8 篇,首篇 23 章记中国的上海、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宜昌、重庆、天津、芝罘、牛庄、宁波、温州、汕头、福州、广州、厦门、北海、琼州、台湾、鸡笼、淡水、香港、澳门这 23 个通商港口;二篇 2 章记俄领沿海洲的乌拉地俄斯德和哥萨港;三篇 3 章记朝鲜的釜山、元山和仁川;四篇 1 章记法属的西贡;五篇记安南的海防;六篇 1 章记英属地新加坡;七篇 1 章记暹罗的盘谷;八篇 1 章记小吕宋群岛马尼拉。对于各港口位置、分界、沿革、行政、人口、兵备、风俗、气候、物产、贸易、街市、碇泊均有所叙述。

171 - 8.《满洲旅行记》 [日]小越平隆著 克斋译 (上海)广智书局 1902 年版(H)

172 - 9.《扬子江》 [日]林安繁著 商务印书馆 1902 年版(H)

该书原名《扬子江溪谷之研究》,曾连载于《清议报》1901 年 5 月至 8 月的 80 至 89 册上。较详细地记载了沿江的商业物产。

173 - 10.《扬子江流域现势论》 [日]林繁著 汪国屏译 广智书局 1903 年版(H)

174 - 11.《世界探险》 [日]樱井基峰等著 人演社译 (上海)文明书局 1903 年版

该书收录了 9 篇有关世界探险的文献。一希马拉耶山(樱井基峰)、二沙漠横断记、三瑞士之山光(青萍迂人)、四澳洲纪行(志贺重昂)、五南洋食人国(白龙江)、六南极冰中二千里、七北极探险谈、八太平洋中之乐园(枫堂环游日记)、九科罗拉特之峡路(山县悌三郎)。

175 - 12.《澳洲风土记》 [美]白雷特著 作新社译 (上海)作新社 1903 年版

该书是作者的澳洲游记。共分十九记。一记游西德亚及钮客斯特尔、二记树、三记游牧、四记澳洲人民原始、五记禽兽、六记游密伯昂城、七记金矿、八记埃乃城、九记达斯马尼亚岛、十记新西兰、十一记亚克兰岛、十二记新西兰矿源水源并火山、十三记南岛、十四记费几岛、十五记

新卡特尼亚岛、十六记檀香山岛、十七记克乐火山、十八记疯人岛、十九记太平洋群岛。

176-13.《美国漫游杂记》 [日]松井广吉著 宁波翰香家塾译
申庄汲绶斋 1903 年版

该书是美国风土人情的实地描述。记述了美国的房屋、道路、铁路、花园、水道、酒肆店铺、邮政电报、生活风俗、新奇之新发明,指出了美国是世界人种的荟萃地。

177-14.《日本旅行地理》 [日]山上万次郎著 范迪吉等译 会文学社 1903 年《普通百科全书》本

该书分两篇,前篇地理特说 15 章,介绍东京、大阪、马关、京都等城市以及北海道海岸与九州海岸。后篇地理总说 49 章,分地文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子目,叙述山川都邑、人物草木、幅员区划、政治兴革,附录地名总汇。列入《普通百科全书》普通学类。

178-15.《万国旅行地理》 [日]山上万次郎著 范迪吉等译 会文学社 1903 年《普通百科全书》本

该书分两章,一为亚洲和欧洲,一为南北美洲。后有地理总论,分天文地理、人文地理、地理学三部分。全书旨在介绍诸国海陆交通、政府兴废、气候温暖、工商盛衰,其中对中国介绍尤详。列入《普通百科全书》普通学类。

179-16.《最新日本全国漫游记》 [日]坪谷善四郎著 范迪吉、金煦译 叶邦俊、黄朝鉴、李思慎参阅 (上海)时中书局 1906 年版

该书分上下两卷。笔者见到的下卷是西部漫游的介绍,近畿地方分述京都市、奈良近旁、京阪奈良中间地方、界市、和歌山、熊野附近,大阪市、摄津之西北部;山阳道分述山阳铁道沿道附近、濑户内海、山丹地方;山阴道分述三丹地方、因伯地方、出云石见地方,九州及时所窃据之台湾岛。

180-17.《汉文日本游历必携》 [日]大桥新太郎编 (东京)东亚公司 1907 年版

该书是据坪谷善四郎的《日本漫游》摘编的,宗旨在资清国人游东之便。全书分东京游历指南和各地游历指南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自清国到日本东京行程及旅费,上岸地方驰名的客店,东京的沿革、地理、舟车之利便、市内客店、购物指南、市内各学堂、银行报馆、使馆、酒楼、青楼及不夜城、驰名医院,以及市内和市外的游历指南。第二部分分五区叙述了横滨、本牧、四国、山阳道、九州、北海道、房总内海岸游历的路线指南。未附日本各铁路火车及轮船的价目单。该书前有驻日使署马永宽的叙,未有邝继野跋。东亚公司在上海、汉口、天津、奉天、济南、扬州均有分号和该书的销售批发处。

181-18.《(谦本图旅行记)地理读本》(Carpenter's Geographical Reader) [美]谦本图原著 孙毓修译述商务印书馆 1908年版

该书分甲乙编,论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亚洲和非洲。译者一边译述,一边据《钱伯斯简明世界地名词典》、《威廉斯地名词典》和《世界地图册》改正错漏和补译缺略。其中不仅仅是地理,还有数学、自然、政治、历史、宗教、宪法、考古等内容,如北美洲分四十五节,述及北美之统观(附美国与欧洲诸国大小之比较)、纽约与外国之商业、大湖与大湖的矿产、落机山之奇观与其宝藏、黄石公园、印第安人之生活等。《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1910年)认为此书有四大特色:一是体例新颖。“地理书每嫌枯寂,此则引人入胜,不啻卧游。”二是考证确实。“谦氏本系亲历其境,采用他种亦非凿空之谈。”三是收罗宏富。“虽据谦氏一书,而参考之书,则不下数十种。”四是词笔渊雅。“不仅可作地志读,且可籍习国文研修辞之用。”

八、军事地理学

182-1.《行军测绘》(A Practucal Course of Military Surveying, Tev. By Col. Robt. Pltey, London, 1869)[英]连提(Auguste F. Lendy)著 [英]傅兰雅(John Fryer)口译 赵元益笔述 (上海)江南制造局 1873

年版

该书分 10 卷,卷首界说,卷 1 画行军图法、卷 2 地面分三角形、卷 3 测量之法、卷 4 测向罗盘用法、卷 5 平面桌用法、卷 6 纪限仪用法、卷 7 测高下各法、卷 8 相地画图依次总解、卷 9 论行军画草图各法、卷 10 测大地面之略法。书中附图百余幅,后附图一卷 6 种。

183 - 2.《防海新论》(A Treatise on Coast Defence)[布]希理哈(Victor E. K. R. von Scheliha)著 [英]傅兰雅译 华蘅芳述 (上海)江南制造局 1874 年版

该书 18 卷,又名《南北花旗战记》。卷 1 总论美国防海之事;卷 2 论近时之城垒不能用古法;卷 3 论泥沙筑城垒更胜于砖石;卷 4 论露置之炮;卷 5 论水路不可无阻船之物;卷 6 论船路若不全阻则虽有炮台不能阻多兵船行过;卷 7 论船路若用良法拦阻又有大炮台守之则无论有若干兵船总不能通过;卷 8 波尔特所论防海事宜;卷 9 论拦阻船路之理;卷 10 论沉物阻船之法;卷 11 论浮物阻船之法;卷 12 论水雷;卷 13、卷 14 论电线发火之法;卷 15 论水雷之力;卷 16 论排列水雷之法及水雷之利弊;卷 17 论攻船之水雷;卷 18 论明灯照路之法。《东西学书录》称该书“专记南北花旗交战水路攻守情形,大抵缀辑文报,而希氏复有所论断也。书中将所得新理新法一一指出门径,而藏伏水雷之法,论之独详,末于灯光照海之法,尤为致意。”

184 - 3.《日本地理兵要》 [日]陆军省编 姚文栋编译 (北京)总理衙门印、同文馆 1884 年版

该书 10 卷,主要是据日本陆军省所编《兵要地理小志》,参考近人航海记录和有关文献编成的。卷 1 疆域、卷 2 东海道、卷 3 畿内、卷 4 东山道、卷 5 北陆道、卷 6 山阴道、卷 7 山阳道、卷 8 南海道、卷 9 西海道、卷 10 北海道。

185 - 4.《美国地理兵要》 顾厚焜编译 上海仁记书局 1889 年版

该书分 4 卷 68 目,卷 1、卷 2 亚墨利加洲总论、全国形势总论、各邦各属志若干篇;卷 3 邦属山岛河湖及列郡民数表;卷 4 包括有全国经纬

度及水陆方里表、全国邦属四至表、邦属会城海口市镇表、美国正午时刻与他国时刻比较表、全国晴雨寒暑表、邦属建置先后考、邦属历年人数增益考、全国铁道表、邦属铁路历年增筑表、陆军志略、水师志略、十三邦立国记事、南北战争邦属塾师及经费数目表、邦属学生数目表、邦属方名审音表。前有黎庶昌序、俞樾《日本新政考》、孙点君序、陆润庠序及自序。

186-5.《巴西地理兵要》(附政治考) 顾厚焜、郑之骏编译 约1889年刊本

该书地理兵要分26目,有全国形势总论、寒暑考、晴雨考、疆域考、全国各部经纬度表、全国各部四至表、各部郡数民数学堂学生数表、各部学堂学生岁息岁费表、矿产考、泉性考、动物考、植物考、官铁路表、民铁路表、陆军兵制考、陆军兵数考、陆军学堂考、巡捕人数考、救火兵数考、军械制造局考、海军兵制考、海军制造局考、火药局考、灯台考、戎兵新地考、师船考。政治考分19目,有政令、各部政令、世系、国俗、王府、电信里数、官银行、各部海口、保险、文官岁俸、税法、岁用、海关、户口、钱法、民人利益、文艺、监狱、教门,书前有王韬序和孙点君序。

187-6.《地势学》 [德]特屯和恩撰 杨锦堂译 黄丙隆、沈厚圻编次 (南京)江南陆军学堂1899年刻本

该书列入《江南陆师学堂武备课程》第12册,全书分两卷,主要讲授军事地形学。卷1行军地势总论、山形说略、论水纪要、行军道路说、行军绘图说、侦探员弁大要、论行军宜先察看地势、设险大致、拦阻大要、各队行走地势利弊、各队渡水、各队行走速率、驻扎村镇与郊野、各种坡路与狭路、攻取与防守狭路、全军战场、山地防守要区、山路攻敌、树林地界攻守利弊、树林攻敌埋伏;卷2测绘地势总论、比例说、比例用法、量地尺、各种杂图、山图绘法、剖面用法、各队行山度数、求山度底线各法、山度成三角形图解、山形轻重图解、行军山度表数、绘各种山形图解、山图路径等。

188-7.《地势学》 [德]库司孟撰 湖北武备学堂《湖北武学丛书》

1900年版

该书第1至第3卷由[德]福克斯增补,詹贵珊译述,周家禄编订;第4至5卷由[德]斯泰老(Ernst von Strauch)、蒋煦同译,周家禄校订。全书分两部分,卷1至卷3共3章,为普通地势学(今称普通地貌学),分总论、地势释名;第1章地面学,第2章水学,第3章地土类(即地势分类学),附图81幅。卷4至卷5共29章,为武备地势学(今称军事地貌学),专论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地形、行军打仗驻扎地等内容。卷4共15章。第1章总论武备地势、第2章地势分类、第3章地土类、第4章周围地势、第5章平地、第6章高地、第7章凹地、第8章树林、第9章村庄、第10章道路、第11章铁路、第12章活水、第13章死水、第14章海、第15章战地;卷5共14章。第1章考察地势之用法、第2章考察地势之大略、第3章格外考察地势、第4章过河攻敌、第5章向后退过河、第6章扼守河岸不使敌人过河来攻、第7章窄地与关隘、第8章总论驻扎处、第9章前行护队驻扎处、第10章后行护队驻扎处、第11章断后驻扎处、第12章坐护队驻扎处、第13章敌人驻扎处、第14章帐篷驻扎处。

189-8.《行军测绘学》 德国武备原本 [德]何福满、杨其昌同译
闵广勋笔述 周家禄校订 载湖北武备学堂“湖北武学丛书”,湖北官书处1900年印本

该书分四卷,每卷分若干细目。卷一有武官探视地势说、探视法、测地势略说、行军绘图说、缩绘地图说、度量尺、各种大小比例尺、绘山线、论山之坡度、绘曲山线条例说、各种山线式、依样绘图法、绘稀图法等;卷二叙述了绘图着色法、步队各记号、马队记号、炮队记号、沟垒工程队记号;卷三测量地势用仪器、测量桌面、螺旋、拉太尺、测远法、纪限仪、观角度法、测焦点法、测量大地法、测树林法、测村庄城市法、测山谷法、测量条款、绘图应用器具、测量应用器具;卷四量地表、查表法、查山线法、查表推算法等。书前有1899年何福满序。

九、地图册与地图解说

190-1.《万国輿图》 英国原图 陈兆桐译绘 李节斋重绘 1886年刊本

该书收入人望船行之图,登高见远之图,经纬线之图,地球五带、昼夜、四季之图,地圆日月圆地图,月轮盈缺之图,日蚀月蚀总图等共15种;以及天下五大洲方图,平圆地球全图,亚细亚洲图,英吉利国图等洲国图24幅。其中许多图附有解说。书前有袁祖志识和陈兆桐自序。

191-2.《万国全地图》 [日]渡边忠久编辑 东京协诚堂1896年版(Y)

192-3.《支那疆域沿革略说》 [日]重野安绎、河田巖合著 日本富山房1896年版(H) 清末輿地学会刊本

该书是《支那疆域沿革图》的解说,实际上是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沿革史。全书据正史并参以通鉴等书,按时代先后叙述夏代、周代、秦代、两汉、三国、西东晋、南北朝、隋代、唐代、五代、宋辽、元代、明代、清代的疆域沿革。

193-4.《五洲图考》 龚柴、许彬辑译 上海徐家汇印书馆1898年版

该书前二卷述欧亚两洲事,是据龚柴80年代陆续刊载于《益闻录》的《地輿考略》改编的,后二卷述非墨澳三洲事,为许彬所译编。主要目次有地体浑圆说、地为行星说、测量地球说、地理形势释名、天下高山大川题名、天下五洲方域题名、亚细亚洲总论、中国方域考、中国形势考、中国海岛考、中国物产考、中国历代都邑考及各省考略;亚洲国家有日本、朝鲜、越南、暹罗、缅甸、阿富汗、印度、东土耳其等国;欧罗巴洲总论及罗马、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荷兰、比利时等国;亚默利加洲总论论及加拿他、亚拉斯加、米利坚、墨西哥、危地玛拉

等国；亚斐利加洲总论论及埃及、摩洛哥、撒哈拉、苏丹等国；澳削尼亚洲论及南洋群岛、东南洋群岛、太平洋群岛。书前有汪康年序、李大序、龚柴序与许彬自识。后有汇报馆本，顾燮光称：“原书附印于《益闻录》中，裒辑而成。举凡五大洲大小各国皆考证方隅、风俗、政事、物产、人材，以及山川险要、名胜要区，译自西书，言之缕析，附地图 57 幅，亦甚精细。”(Y)

194-5.《新案万国地图》 [日]吉仓次郎编辑 三松堂 1900 年增定 12 版

该册收图 12 幅，首行星轨道图，次发明月之盈亏、昼夜、气候、潮汐、日月蚀、各星现象图，三世界图，四地球，五亚洲，六非洲，七欧洲，八北美洲，九南美洲，十大洋洲，十一日本，十二朝鲜。后附教科书摘要，言地球水陆位置、气候、温度、雨量、政体、兵备、财政、物产、度量等，足辅图之未备。原书成于 1896 年，此次为增定本。(Y)

195-6.《(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 [英]海军海图官局原本 陈寿彭译 (上海)经世文社 1901 年版

该书节译自《中国海方向书》(China Sea Directory)中有关中国滨海的 10 卷内容。中译本全书共 22 卷。前有杨敏曾序、黄裳治序、陈季同序、自序和薛绍徽后序。第 1 卷陈叙、译例、编目外，还列出了原卷首、原叙和历届测量家姓氏官职年份表、原目、原例及航海要法。卷 2 至卷 5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中国沿海各口岸的地势、水道、湖、潮、天气、通商各口岸、邮政、电报、铁路；卷 6 至卷 9 讨论长江等沿江地势、水道等；卷 10 至卷 22 分析各口岸互相往来的水程、口岸、海湾等；补编 1 卷。附图多幅。

196-7.《中外舆地全图》 邹代钧译编 (湖北)舆地学会 1903 年版

该图册收录总图 3 幅，全国图 1 幅，分省图 24 幅，各洲各国图 38 幅，群岛图 2 幅，共 68 幅。在地图表现形式上采用经纬度、圆锥投影法，居民点按人口多少分级表示。

197-8.《近世万国新地图》 [日]服部悦次郎编纂 大阪田中宋

荣堂 1903 年版

“图极精细,每图之后附以各洲名胜影片若干幅,日本近出万国地图之最精本也。另有万国著名市街图一卷,地理统计表一卷,均极精详,亦附诸后。”(Y)

198 - 9.《东洋历史地图》 [日]市村瓊次郎监修 [日]石泽发身编辑 日本弘文馆第 5 版 1904 年?

该书“凡图二十幅,始亚细亚古代地图,迄现世亚细亚诸国略图,每幅各附小图一、二幅于其侧卷,末附参考图画九幅,以写真版印之,无不逼真,足备考阅。其第 6 版改名亚细亚历史地图,全图面积较第 5 版大及一倍,文字全用汉文。”(Y)

199 - 10.《东洋历史地图》 [日]小川银次郎著 张元济校订 商务印书馆 1904 年版

该书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等教科书之一。(Z1)

200 - 11.《西洋历史地图》 [日]小川银次郎著 张元济校订 商务印书馆 1904 年版

该书共 20 幅 38 图,自古代迄近世世界止,“凡欧洲历史变迁沿革有大关系者,皆有图以明之。”(Y)该书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等教科书之一,至 1914 年已发行了 6 版。

201 - 12.《最新地文图志》 [英]世爵崎冀撰 叶青译 高密、朱葆琛述 夏曾佑、许家惺校阅 (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 1906 年版

该书图文并茂,以图为主,分地质图、地文图、气候图、水学图、博物图五部分,共 24 版,地文图有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等图;气候图有腊月、六月地面天气压力均重线及风向、正月、六月地面同热线等图;水学图有各地雨雪之量、大比炭河盘广狭雨量多寡、全球海流形势方向等图;博物图有植物生理、动物生理、人族散处等图。

202 - 13.《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 周世堂、孙海环编译 (上海)新学会社 1906 年版

全图册据十多种中外文资料辑译而成。收入地文图、世界全图、洲

全图及各国分图、中国全国及分省区图等百余幅。地文图包括了天体图；地球测绘图；潮流、雨期及排水图；海面同温度图；夏至后气压及风位图；冬至后气压及风位图；磁石偏差图；植物分布图；世界水陆图；世界人种及宗教图等。在地图符号运用上注意采用西方近代科学地图符号。

203 - 14.《最新世界现势全地图》 [日]龟井忠一绘 (日本)东京三省堂编辑所 1906 年版(Z2)

204 - 15.《(汉译)世界读史地图略说》 [日]依田雄甫撰 (日本)富山房 1906 年版

该书是美国人补译的世界通史配套读物。全书共 33 图。依次为低格里地方古代诸国图、地中海沿岸古代诸国图、古代埃及亚拉伯图、古代希腊附希播战地图、波斯帝国并亚历山帝国图、古代意大利图、共和时代罗马战地图、罗马帝国图、古代东洋图、蛮人侵人时代之欧罗巴图、亚刺伯帝国最盛时代图、西晋迄五代图、十字军时代之欧罗巴图、蒙古帝国图、世界交通图、明时代之东洋图、第十六世纪之欧罗巴图、中央欧罗巴瑞典俄罗斯图、第十七八世纪之欧罗巴图、拿破伦及伯拉克和议时代之欧罗巴图、普法交战地图、合众国独立图、日清战地图、台湾征讨图、日俄战争图、世界现时之形势图、人种并宗教图、诸国源流图。后附世界独立国表。

205 - 16.《中外方輿全图》 [日]岸田吟香编 (日本)1906 年铜版印本(Z2)

206 - 17.《亚细亚历史地图》 [日]石泽发身编 (日本)1906 年铅印本(Z2)

207 - 18.《最新世界历史地图》 [日]东亚公司编纂局编 (日本)东京博文馆 1909 年版(Z2)

208 - 19.《五洲山川形势比较图说》 李孟实译 湖北洋务局清末刊本? (H)

附录二

晚清中国人编纂的 地理学教科书书目

(1) 本编收录 1897 年至 1911 年辛亥革命前出版的中国人在西方地理学影响下编纂的地理学教科书,未正式刊刻的不录。

(2) 本编所录凡未亲见的均注明资料线索,用英文字母的代号表示:

D代徐维则、顾燮光编《(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上海石印本。

H代商务印书馆编《涵芬楼藏书目录·中文新书分类目录》,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K代《教科书之发刊概况》,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 1953 年。

M代北京图书馆等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S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创业十年新厂落成纪念册》,商务印书馆 1907 年印本。

Y代顾燮光编《译书经眼录》,1927 年印本。

一、童蒙读物与小学教材

001. 《地理问答》 王亨统编 美华书馆 1893 年版(K)

002. 《天文地学歌略》 叶瀚、叶澜著 1897 年周氏刊本

003. 《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 蔡和铿编辑 李文铨校正 宁波汲绶斋出版处 1898 年版
004. 《地球韵言》 张上瀛编 鄂垣务急书馆 1898 年刊本
005. 《初等地理教科书》 张相文辑 (上海)南洋公学 1901 年版
006. 《小学万国地理新编》 陈乾生编辑 商务印书馆 1902 年版
007. 《五洲歌略》 贾恩绂辑 五求实学社 1902 年重刊本
008. 《亚洲全图简明略说》 叶瀚著 上海蒙学书报局 1902 年版(K)
009. 《亚洲山势略说》 叶瀚著 上海蒙学书报局 1902 年版(K)
010. 《亚洲水流略说》 叶瀚著 上海蒙学书报局 1902 年版(K)
011. 《地理》 姚祖晋编 商务印书馆 1902 年版(K)
012. 《蒙学历史與地歌括》 周峨卿、姚文楠著 沈恩孚编 一新书局 1903 年版
013. 《蒙学地文教科书》 钱承驹著 (上海)文明书局 1903 年 8 月初版
014. 《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 张相文著 文明书局 1903 年 9 月版
015. 《蒙学外国地理教科书》 张相文著 (上海)文明书局本 1903 年版(H)
016. 《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张国维著 (上海)文明书局 1903 年版(M)
017. 《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文明书局编 (上海)文明书局 1903 年版(H)
018. 《小学万国地理教科书》 学海指针社编 江苏编译官书局 1903 年版(K)
019. 《初级地文学》 胡绍曾编 开明书店排印大字本 1904 年? (Y)
020. 《高等地理小学教科书》 钮永建编 (上海)文明书局本 1904 年? (Y)
021. 《小学万国地理教科书之一》 黄斌 上海公学排印本 1904 年? (Y)

022. 《地理质学问答》 徐继高 “便民丛书”本 1904 年? (Y)
023. 《地理学》 北洋学校司编 北洋官报馆蒙学课本 1904 年? (Y)
024. 《绘图中国白话地理》 (上海)彪蒙书局 1905 年版(M)
025. 《绘图蒙学中国地理实在易》 (上海)彪蒙书局 1905 年版
026. 《绘图蒙学外国地理实在易》 (杭州)彪蒙书局 1905 年版
027. 《最新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 商务印书馆 1905 年版
028. 《(再版)最新地理教科书》 [日]长尾慎太郎编 徐仁镜、张元济校订 商务印书馆 1905 年版
029. 《最新地理教科书》 谢洪赉编纂 商务印书馆 1905 年版
030. 《(最新)初等小学本国地理教科书》 何琪编 (上海)会文学社 1905 年版(H)
031. 《中国地理问答》 马晋羲编 (南通)州翰墨林印书局 1905 年版 (H)
032. 《最新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谢洪赉编 商务印书馆 1905 年版
033. 《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谢洪赉编 商务印书馆 1905 年版
034. 《蒙学地理教科书》 黄英著 (上海)南洋官书局 1906 年版
035. 《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经家龄著 (上海)普及书局 1906 年版
036. 《高等小学地理教授用书》 经家龄著 (上海)普及书局 1906 年版
037. 《初版简易地理课本》 童振藻编辑 商务印书馆 1906 年版
038. 《初等小学中国地理教科书》 何孟庐编辑 (上海)彪蒙书室 1906 年版
039. 《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白雅雨编 震东学社 1906 年版(H)
040. 《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王纳善编 有正书局 1906 年版(H)
041. 《初等中国地理教科书》 王邦枢编辑 (上海)南洋官书局 1906 年版
042. 《初等小学地文教科书》 黄世基编 胡宗懋校 (上海)南洋官

书局 1906 年版

043. 《本国地理教科书》 澄衷学堂编 (上海)澄衷学堂 1906 年版
044. 《小学地理教科书》(本国之部) 辜天佑编 (上海)修业学堂 1906 年版(H)
045. 《高等小学地理》 辜天佑编 修业学堂 1906 年版(H)
046. 《初等小学中国地理新教科书教授法》 管圻编辑 (上海)乐群书店 1906 年版
047. 《初等小学中国新地理教科书》 许正衡编 启文社 1906 年版(H)
048. 《(初等小学)简明地理教科书》 周世棠编 新学会社 1906 年版(H)
049. 《简明中国地理教科书》 曹同文编 科学书局 1906 年版(H)
050. 《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 刘师培编著 (上海)国学保存会 1906 年版
051. 《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 刘师培编 乡土教科书发行所 1906 年版(H)
052. 《(初等小学)浙江地理教科书》 启文社编 启文社 1906 年版(H)
053. 《(初等小学)乡土地理模范教科书》 储丙鹑编 震东学社 1906 年版(H)
054. 《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杜芝庭编 会文学社 1906 年版(H)
055. 《(简明)小学实用中国地理读本》 胡建藩编 校经山房 1906 年版(H)
056. 《本国地理教科书》 姚明辉编 澄衷学堂 1906 年版(H)
057. 《小学地理课本》 王亨统编 (上海)美华书馆 1906 年版(H)
058. 《天文地理问答》 (上海)美华书馆 1906 年版(K)
059. 《(高等小学)中国地理教科书》 项翰编 震东学社 1906 年版

(H)

060. 《中国地理新教科书》 管圻编辑 杨天骥、陆保睿校订 (上海) 乐群图书编译局 1906 年版

061. 《中外国地理教科书》 谢洪赉著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07 年?

(S)

062. 《小学地理教科书》 童世高编 (上海) 昌明公司 1907 年版(M)

063. 《附图初等小学地名韵语》 陈子褒编 广州蒙学书局 1907 年版

(H)

064. 《简易地理教本》 沈祖绵编 中国图书公司 1907 年版(H)

065. 《初等本国地理教科书》 曹同文编 科学书局 1907 年版(H)

066. 《湖北乡土地理教科书》 陈庆林编著 (上海) 国学保存会 1907 年版

067. 《江西乡土地理教科书》 陈庆林编著 (上海) 国学保存会 1907 年版

068. 《直隶乡土地理教科书》 陈庆林编著 (上海) 国学保存会 1907 年版

069. 《江宁乡土地理教科书》 刘师培编著 (上海) 国学保存会 1907 年版(《政艺通报》1907 年第 16 号)

070. 《(初等小学)江苏省地理教科书》 启文社编 启文社 1907 年版(H)

071. 《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 黄晦闻编 乡土教科书发行所 1907 年版(H)

072. 《乐山地理教科书》 1907 年刊本(H)

073. 《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姚明辉编辑 (上海) 中国图书公司 1907—1911 年版(M)

074. 《高等小学地理课本》 姚明辉编 中国图书公司 1908 年版(H)

075. 《高等小学地理教授本》 姚明辉编 中国图书公司 1908 年版(H)

076. 《简明小学地理教科书》 谢观编纂 商务印书馆 1908 年版
077. 《(小学教科)初等地理教科书》 黄守恒编 集成图书公司 1908 年版(H)
078. 《(小学教科)初等地理教授案》 黄守恒编 集成图书公司 1908 年版(H)
079. 《(第一简明)地理启蒙》 胡朝阳编 新学会社 1908 年版(H)
080. 《松江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沈宗祉著 时中书局 1908 年版(H)
081. 《(最新初等)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 蔡和铿编 千顷堂 1908 年版(H)
082. 《湖南乡土地理》 辜天佑编 (长沙)集益群智书社 1908 年版(H)
083. 《泸州乡土地理教科书》 李正华等编 1908 年刊本(H)
084. 《(初等小学)会城地理教科书》 陈受恩编 福州新闻报馆 1908 年版(H)
085. 《(初等小学)本省地理教科书》 陈受恩编 福州新闻报馆 1908 年版(H)
086. 《地理志略》 学部编书局纂 1908 年刊于武昌
087. 《高等小学地理课本》 姚明辉编辑 (上海)中国图书公司 1908—1911 年版
088. 《普通教育新地理外国之部》 杨文询编述 胡鹿阁校订 (上海)会文学社 1908 年版(M)
089. 《新宁乡土地理》 雷泽普编 1909 年初版
090. 《松江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沈宗祉著 王毅存、陈庭兰重订 (上海)时中书局 1909 年版
091. 《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 辜天佑编辑 群益图书社 1909 年版
092. 《天台小学地理教科书》 张廷琛编 1909 年刊本(H)
093. 《高等小学最新中外地理教科书》 谢洪赉编 徐仁镜、张元济校

商务印书馆 1909 年版

094. 《(高等小学用)最新地理教科书详解》 谭廉编纂 沈颐校订
商务印书馆 1909 年版
095. 《中国地理教科书》 贺尹东编 (北京)求是中学堂 1909 年版
(M)
096. 《地理学初步》 李廷翰编 中国图书公司 1910 年再版本
097. 《(新体)高等小学中外地理》 国民教育社等编 (上海)文明书局 1910 年版
098. 《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 学部编译图书局 1910 年版(M)
099. 《地文学教科书》 曾彦编 (上海)科学会编译部 1910 年版(M)
100. 《中国地理》 王振尧、李景濂编纂 直隶学务处版
101. 《地文学》 直隶学校司编译处编 (天津)北洋官报局清末铅印本

二、中学教材

102. 《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 张相文编 上海兰陵社 1901 年版(H)
(Y)
103. 《世界读本》 陶懋立编 (上海)文明书局 1902 年版(K)
104. 《瀛寰全志》 谢洪赉编 赵玉森重订 商务印书馆 1903 年版
105. 《中学中国地理教科书》 夏清贻编 教科书辑译社本 1904 年?
(Y)
106. 《中国地理略述》 瞿继昌 开封木刻本 1904 年? (Y)
107. 《中学中国地理志》 王达著 北洋官报排印本 1904 年? (Y)
108. 《中国地理教科书》 屠寄著 商务印书馆 1905 年版
109. 《(中学用)世界地理教科参考书》(第 1 编) 广智书局编辑部编述
广智书局 1905 年版
110. 《中等亚洲地理教科书》 丁冕英编译 汤寿潜阅订 (上海)南

洋官书局 1905 年版

111. 《简要地理讲义》 沈祖绵著 开明书店 1905 年版(H)
112. 《中国地理学讲义》 汪钦编 普益书局 1905 年版(H)
113. 《中国地理教科书》 刘师培编著 (上海)国粹学报馆 1906 年版(H)
114. 《本国地理》 陆费逵纂辑 (上海)昌明公司 1906 年版(M)
115. 《地理课程》 翰文社 1906 年版(H)
116. 《(中学用)世界地理教科书》(第 1 编) 广智书局编辑部编纂 广智书局 1906 年版
117. 《地理撮要》 孙文楨编 上海土山湾印书馆 1907 年版
118. 《中等地理教科书》 侯鸿鉴著 文明书局 1907 年版
119. 《简易(中学)地理教本》 沈祖绵编辑 夏日盖校订 (上海)中国图书公司 1907 年版(M)
120. 《(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 沈祖绵编 会文学社 1907 年版(H)
121. 《统合外国地理书》 邢之襄等编 河北译书局 1907 年版(K)
122. 《(普通教育)新地理》 杨文洵 会文学社 1908 年版(H)
123. 《新体中国地理》 臧励稣编纂 商务印书馆 1908 年版
124. 《中国地理教科书》 王达著 1910 年订正四版
125. 《(增订)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 张相文著 (上海)南洋公学版(M)
126. 《涿江公立中学堂地理讲义》 胡师澹编 清末刊本

三、师范专科教材

127. 《华英地理问答》 商务印书馆 1900 年版
128. 《普通地理读本》 夏清贻编 王氏育材学堂编译所 1901 年版(M, Y, H)
129. 《经心书院舆地学课程》 姚炳奎著 经心书院 1903 年 4 月版

130. 《中国地理讲义》 马晋羲著 (江苏)翰墨林编译印书局 1904 年版
131. 《中国地理课本》 马晋羲著 (江苏)翰墨林编译印书局 1904 年版(H)
132. 《地文学》 北洋学校司编纂 北洋官报局排印本 1904 年? (Y)
133. 《地文学教科书》 新民书局本 1904 年? (Y)
134. 《中国地理学》 北洋学报编 北洋学报汇编本 1904 年? (Y)
135. 《中国近世地理志》 王亨统编 美华书馆 1904 年版(H)
136. 《两广速成师范地理学讲义》 张相文讲述 两广学务处 1905 年版(M)
137. 《初级师范学校教科书 中国地理》 徐念慈编纂 商务印书馆 1906 年版
138. 《最新商学地理教科书》 严鸿基编 千顷堂书局 1908 年版(H)
139. 《新撰地文学》 张相文著 胡尔霖校 (上海)文明书局 1908 年版
140. 《(两江优级师范学堂选科)中国地理讲义》 姚明辉编 中国图书公司 1909 年版(H)
141. 《中国近世舆地图说》 罗汝楠编 广东教忠学堂 1909 年版
142. 《中国商业地理》 李哲浚、景学铃著 江宁劝业道 1910 年版(H)
143. 《明德学堂地理》 周震麟编述 清末刻本
144. 《地理学讲义》 黄辉编辑 江西抚州初级师范学堂版(M)
145. 《中国地理讲义》 庄俞述 师范讲习所版

四、大学教材

146. 《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讲义》 邹代钧撰 商务印书馆大学堂讲义本 1904 年?
147. 《(京师大学堂)本国中等教科地理志》 北京学务处官书局 1904

年版(H)

148. 《京师译学馆舆地学讲义》 韩仆存编 京师译学馆 1905 年版
149. 《山西大学堂地理课程》 汪嘏鸾著 1905 年铅印本
150. 《高等学堂舆地学课程初编》 周振麟编 大文书局 1906 年版
(H)
151. 《地理讲义》 姚明辉撰 柳肇嘉释补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1909 年版
152. 《舆地学教科书》 江南高等学堂编 清光绪间刊本

五、参考图册类

153. 《世界各国险要维新舆图》 蔡麟编绘 1902 年?
154. 《(最新)万国舆地韵编》 齐忠甲编 京都 1903 年自印本
155. 《世界地理学表解》 上海科学书局编辑所编 (上海)科学书局
1906 年版
156. 《福音舆地问答》 陈金墉著 (上海)美华书馆 1909 年版
157. 《世界地理统计表》 邹兴觉编 武昌亚新地学社 1909 年版
158. 《新撰瀛寰全图》 商务印书馆 1910 年(商务印书馆广告)
159. 《世界新舆图》 奚若编 商务印书馆 1910 年版

续表

年代	地理学通论与教科书	地球与地文学	气象与气候学	文化与政治地理学	区域地志	商业地理学	交通与旅游地理学	军事地理学	地图与地图解说	合计(种)
1897			1		1		1			3
1898	2				1				1	4
1899		1	1		1			1		4
1900					1		1	2	1	5
1901	2				3				1	6
1902	11	2		1	7	1	3			25
1903	7	6	3	3	6	1	6		2	34
1904	5	4		1	2				3	15
1905	1	1	1	1	2	1				7
1906	1	5		2	1	1	1		7	18
1907	3	1		2	9	4	1			20
1908	1		1		5		1			8
1909				2	1					3
1910		1								1
1911						2				2
不详	1				1	2			1	5
总计	49	31	10	14	47	12	18	8	19	208

表二： 晚清中国人编纂的地理学教科书
出版年代分类统计表

年代	童蒙读物与 小学教材	中学教材	师范专科	大学教材	参考图册	合计(种)
1893	1					1
1896	1					1
1898	2					2
1900			1			1
1901	1	1	1			3
1902	6	1			1	8
1903	7	1	1		1	10
1904	5	3	6	2		16
1905	10	5	1	2		18
1906	27	4	1	1	1	34
1907	13	5				18
1908	15	2	2			19
1909	7		2	1	2	12
1910	4	1	1		2	8
不详	2	2	3	1		8
总计	101	25	19	7	7	159

附录四

引用文献

- (1) 本篇所录文献以所引著译的中文书名的汉语拼音的顺序,按英文字母的前后排列,依次著录著译者、出版处、出版时间。
- (2) 凡外文书则著录外文原书名,以便查核。
- (3) 已收入论文集的单篇论文,凡论文集已列出者就不另列出。

A

001. 《爱国主义与近代中国史学》,俞旦初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002.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所藏彩绘绢本南怀仁〈坤輿全图〉》,[澳]王省吾著,纪念谭其骧先生八十五周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1996 年复旦大学。
003. 《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刘师培著,国学保存会 1906 年。

B

004. 《必要的张力》,[美]托马斯·库恩著,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C

005. 《采西学议》,冯桂芬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006.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全卷, 复旦大学新闻系藏缩微胶卷。
007. 《乘槎笔记》, 斌椿著, 岳麓书社 1985 年。
008. 《辞源》, 商务印书馆 1988 年合订本。
009. 《从理学到朴学》, [美] 艾尔曼著, 赵刚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010.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顾长声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011. 《从〈张元济日记〉说商务印书馆》, 林熙著, 载《出版史料》1986 年第 5 辑。
01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文庆等编纂, 卷 46、卷 47;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辑, 文海出版社。
01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宝璜编, 卷 100;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辑, 文海出版社。
014. 《畴人传》, 阮元著,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015. 《徂徕石先生文集》, 石介著, 陈植锺点校, 中华书局 1984 年。
016. 《钏影楼回忆录》, 包天笑著, 香港大华出版社 1971 年。

D

017. 《大陆》1902 年 12 月, 第 1 期。
018. 《大美联邦志略》, [美] 裨治文著, 墨海书馆 1861 年。
019. 《地理初桃》, [美] 卜舛济编译, 上海美华书馆 1899 年。
020. 《地理全志》, [英] 慕维廉编著, 上下编, 墨海书馆 1853~1854 年。
021. 《地理全志》, [英] 慕维廉编著, (日本) 爽快楼 1859 年版。
022. 《地理全志》, [英] 慕维廉编著, 益智书会 1899 年。
023. 《地理人文关系论》, 金陵江楚编译官书局 1906 年。
024. 《地理探险、地理学与西方文化》, 王晓伦著, 载《复旦学报》1998 年第 3 期。
025. 《地理须知》, 傅兰雅编译, 1883 年刊本。
026. 《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 [德] 阿尔夫雷德·赫特纳

- 著,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027. 《地理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年。
028. 《地理学讲义》,[日]志贺重昂著,萨端译,金粟斋 1901 年。
029. 《地理学思想简史》,杨吾扬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030. 《地理学思想史》,[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著,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增订本。
031. 《地理学思想史》,刘盛佳编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032. 《地理学用语的系谱(1)——以中国洋学书为中心》,[日]荒川清秀,载《文学论丛》(爱知大学)1996 年。
033. 《地理质学启蒙》,[英]艾约瑟译编,总税务司署 1886 年印本。
034. 《地球说略》,[美]裨理哲编著,宁波华花书房 1856 年。
035. 《地球说略》,[美]裨理哲编著,[日]箕作阮甫训点,庚申(1860 年)春东都江左老皂馆版。
036. 《地球图说》,[法]蒋友仁著,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037. 《地球英雄论》,陈伯龙著,新民书局 1904 年。
038. 《地图学》,张奠坤、杨凯元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039. 《地学杂志》第 1 年(1910)、第 2 年(1911)。
040. 《地志启蒙》,艾约瑟译编,上海著易堂书局 1898 年。
041. 《地志须知》,傅兰雅编译,1882 年刊本。
042. 《东塾集》,陈澧著,菊坡精舍版光绪壬辰(1892 年)。
043.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黄时鉴整理,中华书局 1997 年。
044. 《东游丛录》,吴汝纶著,日本三省堂书店 1902 年。

F

045. 《贩书偶记》,孙殿起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046. 《翻译研究论文集 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年。
047. 《梵蒂冈出版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读后记》,方豪著,载《方豪六十自订稿》,台湾学生书局 1969 年。

048. 《傅兰雅译著考略》(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美] 贝内特 (Adrian Arehar Bennett),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1967 年英文版。

G

049. 《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 [美] 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 著, 企鹅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80 年英文版。
050. 《改正世界地理学》, [日] 矢津昌永著, 吴启孙译, 文明书局 1903 年。
051. 《高等小学地理教授用书》, 经家龄著, 上海普及书局 1907 年。
052. 《各国名人事略》, 雷曜辑, 砚耕山庄 1905 年再版。
053. 《格物入门》, [美] 丁韪良著, 同文馆 1868 年版。
054. 《格致书院课艺》, 王韬编, 上海书局 1897 年。
055. 《古史辨》,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 第七册(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056. 《广方言馆全案》, 陈正清标点, “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057. 《广智书局历史》, 载《国民日报》1903 年 8 月 17 日。
058. 《广智书局(1901—1915)——维新派文化事业机构之一》, 张朋园著, 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 期。
059. 《广阳杂记》, 刘献廷著, 中华书局 1957 年。
060. 《桂学答问》, 康有为著, 中华书局 1988 年。
061. 《郭嵩焘日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062. 《郭嵩焘诗文集》, 杨坚点校, 岳麓书社 1984 年。
063. 《国粹学报》1907 年第 27 期。

H

064. 《海国图志》, 魏源撰,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书局石印本。

065. 《〈海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王家俭著，载《大陆杂志》第32卷，第8期。
066. 《海录》，杨炳南编，载“海山仙馆丛书”。
067. 《韩国的古世界地图研究》，[韩]卢祯埴著，韩国晓星女子大学博士论文，1992年。
068. 《涵芬楼旧书目录再续编》，1919年商务版。
069. 《涵芬楼藏书目录·中文新书分类目录》，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070. 《汉声》1903年第6期，台湾国际印刷厂1968年影印本。
071. 《汉书·地理志》，班固著，《二十五史》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072. 《汉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丁谦著，载“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浙江图书馆1915年。
073. 《汉语史稿》，王力著，载《王力文集》，第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
074. 《洪业论学集》，洪业著，中华书局1981年。
075. 《湖北乡土地理教科书》，陈庆林编著，国学保存会1907年。
076. 《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
077. 《皇朝经世文四编》，何良栋辑，光绪二十八年(1902)鸿宝书局版。
078. 《皇朝经世文续编》，葛子源辑，光绪十四年(1888)图书集成局。
079. 《浑天仪图注》，张衡著，载洪颐煊撰录《经典集林》卷27，陈氏慎初堂影印本。

J

080. 《几何原本》，[意]利玛窦译，徐光启笔受，同治四年(1865)金陵书局版。
081. 《基督教在中国》(Christianity in China)，[美]巴纳特(Suzanne Wilson Barnett)、[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编，哈佛大学

1985年英文版。

082. 《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李志刚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083.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英]伟烈亚力著，上海1867年英文版。
084. 《简明地质学史》，王子贤、王恒礼编著，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085. 《剑桥中国晚清史》，[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086.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英]傅兰雅，载《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
087. 《江苏》1903年第4期。
088. 《江苏翻译出版史略》，邹振环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089. 《教会新报》1868年第1期。
090.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
091. 《教育杂志》1909年，第1年第1期。
092. 《近百年湖南学风》，钱基博著，岳麓书社1985年。
093. 《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英]罗伯特·迪金森著，葛以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094.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 1860—1910》，乐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095. 《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第一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
096. 《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第四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8年。
097. 《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第五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0年。

098. 《近代中国留学史》，舒新城著，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 年影印本。
099. 《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林治平编，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81 年。
100. 《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王晓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101. 《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中心》（近代日中学术用语の形成と伝播——地理学用语を中心に），〔日〕荒川清秀著，日本白帝社 1997 年日文版。
102. 《近代最早百科全书的编译与清末文献中的狄德罗》，邹振环著，载《复旦学报》1998 年第 3 期。
103. 《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钱存训著，戴文伯译，《文献》1986 年，第 2 期。
104. 《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朱联保编，学林出版社 1993 年。
105. 《晋书》，房玄龄等撰，载《二十五史》第 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年。
106. 《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107. 《觉民》1904 年第 1 至第 5 期合本。

K

108. 《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有为著，载《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 1953 年。
109. 《康轶纪行》，姚莹著，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110. 《康有为全集》，姜义华等编校，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111. 《康有为全集》，姜义华编，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112. 《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 1981 年。
113.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洪业著，载《禹贡》第 5 卷（1936 年），第 3、4 期合刊。
114. 《客观知识》，〔英〕波普尔著，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

115. 《科学社会学》，刘珺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116. 《科学书目提要初编》，王景沂编，北洋官书局 1903 年重刻本。
117. 《坤舆图说及其他一种》，[比利时]南怀仁撰，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118. 《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著，禹贡学会 1933 年影印本。
119. 《坤舆撮要问答》，孙文楨著，上海土山湾印书馆 1898 年。

L

120. 《历史研究》，[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21. 《利玛窦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陈观胜著，载《禹贡半月刊》第 5 卷(1936 年)第 3、4 合期。
122. 《利玛窦评传》，[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 1993 年。
123. 《利玛窦中国札记》，[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 1983 年。
124.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125.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26. 《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27. 《六合丛谈》1857 年第 1 卷、1858 年第 2 卷。
128. 《鲁迅革命活动考述》，倪墨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年。
129.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
130. 《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安志敏著，载《考古》1979 年第 5 期。
131. 《伦敦会史 1795—1895》(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英]洛弗特(Richard Lovett)，第 2 卷，牛津大学出版社 1899 年英文版。
132. 《伦敦与巴黎日记》，郭嵩焘著，岳麓书社 1984 年。

M

1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134. 《漫谈商务印书馆》，章锡琛著，《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
135. 《漫游随录》，王韬著，岳麓书社1985年。
136.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王立新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137. 《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张相文著，上海文明书局1906年。
138. 《孟德斯鸠与中国》，许明龙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139. 《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北京图书馆等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
140. 《明德学堂地理》，周震鳞编述，清末刻本。
141.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徐宗泽编著，中华书局1949年，1989年影印本。
142. 《明清两代全省和省区地图集概况》，高俊著，《测绘学报》第5卷，第4期。
143. 《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张维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44. 《慕维廉与〈新工具〉》，邹振环著，载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45. 《慕牧师木铎记》(The Life of the Rev. William Muirhead, D. D., for 53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of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22—1900) by his widow), [英]季理斐译，温和光述，广学会1909年。

O

146. 《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李孝聪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

P

147. 《普通百科全书》，范迪吉主译，上海会文学社1903年。
148. 《普通百科新大词典》，黄人编，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

Q

149.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葛兆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50. 《气象学略史》，虞和钦著，载《科学世界》1903 年第 5 期。
151. 《潜研堂集》，钱大昕著，吕友仁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152. 《钦定热河志》，乾隆四十六年(1781)。
153. 《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康有为著，载《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
154. 《清碑传合集》，上海书店 1988 年。
155. 《清季外交史料》卷 45；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6 年。
156. 《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倪海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
157. 《清末人文地理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艾素珍著，载《中国科技史料》第 17 卷(1996 年)第 1 期。
158. 《清末自然地理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艾素珍著，载《中国科技史料》第 16 卷(1995 年)第 3 期。
159.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桑兵著，三联书店 1995 年。
160. 《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谭其骧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61. 《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美]林乐知、任廷旭编译，上海广学会 1903 年。
162. 《全唐诗》，彭定求等编校，中华书局 1990 年。

R

163. 《人论》，[德]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著，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
164. 《日本地理兵要》，[日]陆军省编，姚文栋编译，总理衙门印，同文

馆 1884 年。

165. 《日本地理志》, [日]中村五六编纂, [日]顿野广太郎修补, 王国维译, 金粟斋 1901 年。
166. 《日本教习》, 汪向荣著, 三联书店 1988 年。
167. 《日知录集释》, 顾炎武著, 黄汝成集释, 岳麓书社 1996 年。
168. 《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 [日]依田熹家, 卞立强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169. 《日本日记》, 罗森著, 载《遐迩贯珍》1854 年 11 月, 岳麓书社 1985 年有王晓秋校点本。

S

170. 《三十自述》, 梁启超著, 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171. 《上海学艺概要》(二), 载《上海通志馆期刊》第 1 年。
172. 《商工地理学》, 载范迪吉主译《普通百科全书》, 会文学社 1903 年。
173.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商务印书馆 1987 年。
174. 《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 商务印书馆 1992 年。
175. 《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 汪家熔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年。
176. 《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 1897—1949》, 商务印书馆编印。
177. 《十九世纪西方史地知识的介绍及其影响》, 王家俭著, 载《大陆杂志》第 38 卷第 6 期, 1969 年 3 月。
178.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79 年。
179. 《史记》, 司马迁著, 中华书局 1977 年。
180. 《世界地理》, 作新译书局译纂, 上海作新社 1902 年。
181. 《世界地理学史》, 杨文衡主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182. 《世界探险史》, [苏]约·彼·马吉多维奇, 屈瑞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
183. 《世界新輿图》, 奚若编纂, 商务印书馆 1909 年。
184. 《世界诸国名义考》, [日]秋鹿见二著, 沈诵清译, 广智书局

1904年。

185. 《世载堂杂忆》，刘禹生著，中华书局 1960 年。
186. 《书前书后》，钟叔河著，海南出版社 1992 年。
187. 《书生从政——翁文灏》，李学通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8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等撰，中华书局 1981 年。
189. 《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张星烺著，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所收《南园丛稿》本，文海出版社。
190. 《思问录内外篇》，王夫之著，同治四年(1865)湘乡曾氏刊本。
191. 《随无涯之旅》，周振鹤著，三联书店 1996 年。
192. 《孙兰的地理学贡献》，韩光辉，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 年)第 11 卷，第 3 期。

T

193. 《泰西各国名人言行录》，张兆蓉著，明达圣教会 1903 年。
194. 《泰西名人传》，上海徐汇报馆原本，徐心镜增订，鸿宝斋 1903 年。
195. 《泰西政治学者列传》，[日]杉山藤次郎著，中国广东青年译，广智书局 1902 年。
196. 《〈堂吉诃德〉译余琐掇》，杨绛著，载《读书》1984 年第 9 期。
197. 《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著，载“四部丛刊三编·史部”，上海书店 1985 年影印本。

W

198. 《万国地理统纪》，[日]若原著，马汝贤等译，励学译社 1903 年。
199. 《万国公报》1889 年 6 月第 5 册；第 108 期，1890 年 1 月；《万国公报》第 143 册，1900 年 12 月。
200. 《晚清西方地理学东渐述论》，郭双林著，载《学人》第 7 辑。
201. 《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郑师渠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202.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桑兵著，学林出版社 1995 年。
203. 《忘山庐日记》，孙宝瑄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204. 《王国维遗书》第 5 册，《静安文集续编》。
205. 《王韬日记》，方行、汤志钧整理，中华书局 1987 年。
206.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207. 《外国地理备考》，[葡]玛吉士编著，“海山仙馆丛书”版。
208. 《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王家俭著，大立出版社 1984 年。
209. 《魏源〈海国图志〉研究》，吴泽、黄丽镛著，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 4 期。
210. 《魏源研究》，陈耀南著，乾惕书屋 1979 年。
211. 《伟烈亚力传略》，[英]托马斯(Rev James Thomas)，载[英]伟烈亚力著《中国研究录》(Chinese Researches)，上海 1897 年英文版。
212. 《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丁钢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213. 《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武安隆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214. 《五杂俎》，谢肇淛著，中华书局 1959 年。
215. 《五洲地理志略》，王先谦著，湖南学务公所 1910 年。
216. 《五洲歌略》，贾恩绂辑，五求实学社 1902 年重刊本。
217. 《五洲风俗异同考》，易鼎著，载《湘学新报》1898 年 5 月 1 日，第 35 册。
218.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

X

219. 《西学东渐记》，容闳著，岳麓书社 1985 年。
220.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熊月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221. 《西学东渐与中日文化交流》，[日]增田涉著，由其民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年。

222. 《西学略述》, [英] 艾约瑟著, 总税务司署 1886 年印本。
223. 《西学三通》, 袁清舫、晏海澜编, 萃新书馆 1902 年。
224. 《西洋杂志》, 黎昌庶著, 岳麓书社 1985 年。
225. 《遐途贯珍》1853 年至 1855 年。
226. 《霞外撝屑》, 平步青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227.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 [意] 马西尼著, 黄河清译,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 年。
228.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王锡祺编, 上海著易堂本。
229.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主编, 第一集,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230. 《新地理》, 梁启超著, 一元学会 1903 年出版。
231. 《新尔雅》, 汪荣宝、叶澜编纂, 上海明权社 1903 年。
232. 《新教育》第 5 卷(1922)第 4 期。
233. 《(新体) 高等小学中外地理》, 国民教育社编辑, 文明书局 1910 年。
234. 《新体中国地理》, 臧励和编纂, 商务印书馆 1908 年。
235. 《新学会社书目提要》, 清末刊本。
236. 《新政革命与日本》, [美] 任达著, 李仲贤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237. 《新撰地文学》, 张相文著, 上海文明书局 1908 年。
238. 《谢洪赉先生纪念册》, 1926 年印本。
239. 《徐光启集》, 王重民辑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240. 《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任复兴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241. 《学部编译图书局备览》, 载《学部官报》1908 年第 68 期、69 期。
242. 《薛福成与〈瀛环志略〉续编》, 邹振环著, 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 14 集。

Y

243. 《鸦片战争后的香港报刊》, 潘贤模著, 载《新闻研究资料》第 11 辑,

- 展望出版社 1982 年。
244. 《严复集》，王栻主编，中华书局 1986 年。
245. 《严几道年谱》，上遽常著，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246. 《洋教士看中国朝廷》，朱静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247. 《逸言殊语》，周振鹤著，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8 年。
248. 《译书经眼录》，顾燮光编，1927 年印本。
249. 《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邹代钧著，载《时务报》第 1 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十四日。
250. 《音调未定的传统》，朱维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251. 《印刷术“反馈”与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胡道静著，载《出版史料》1987 年第 4 期、1988 年第 1 期。
252. 《瀛环志略》，徐继畲著，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本。
253. 《瀛环志略》，徐继畲著，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老扫叶山房铅印本。
254. 《〈瀛环志略〉跋》，王韬著，载《弢园文录外编》卷 9。
255. 《瀛壖杂志·瓮牖余谈》，王韬著，岳麓书社 1988 年。
256. 《英国文明史》，[英]勃克鲁原本，南洋公学译，南洋公学 1903 年。
257. 《英华萃林韵府》(A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美]卢公明(R. J. Doolittle)编，福州 1872 年刊印。
258. 《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英]罗存德(W. Lobscheid)编，香港 Daily Press Office 1866—1869。
259.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邹振环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 年。
260. 《语言与文化》，罗常培著，语文出版社 1989 年。
261. 《舆论学》(Public Opinion,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U. S. A., 1965)，[美]W.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著，林珊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
262. 《元史》，载《二十五史》第 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年。

263. 田梓材、姚炳奎、舒润等文,载江标编校《沅湘通艺录》,卷5舆地,光绪二十三年(1897)长沙使院版。
264.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商务印书馆1920年原稿本影印本。

Z

265. 《(再版)最新地理教科书》,[日]长尾慎太郎编,徐仁镜、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1905年。
266. 《在华伦敦会印书馆》(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英]麦金托什(Gilbert McIntosh)著,美华书馆1895年英文版。
267.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年。
268.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法]荣振华著,耿升译,中华书局1995年。
269. 《(增版)东西学书录》,徐维则、顾燮光编,1902年上海石印本。
270.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辑,商务印书馆1937年。
271. 《张文襄公全集》,王树楠编,卷17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
272. 《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
273. 《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张树年、张人凤编,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
274. 《郑观应集》,夏东元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75. 《浙江潮》1903年第2期。
276. 《职方外纪校释》,[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
277. 《中等地理教本》,[英]汉勃森著,任廷旭、范祎译述,广智书局1907年。
278. 《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三联书店1955年。

279. 《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章鸿钊著，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280.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44 年，第 13 卷；1849 年，第 18 卷，第 10 期。
281. 《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282.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 年。
283. 《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汪向荣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284. 《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屠寄纂，商务印书馆 1905 年。
285. 《中国地理学史》，王庸著，上海书店 1984 年影印本。
286. 《中国地理学史(清代)》，赵荣、杨正泰著，商务印书馆 1998 年。
287. 《中国地图学史》，卢志良著，测绘出版社 1984 年。
288. 《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李约瑟著，中译本，科学出版社 1976 年。
289. 《中国古代测量学史》，冯立升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290. 《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童书业著，中华书局 1962 年。
291. 《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史组主编，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292. 《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略》，刘金沂、赵澄秋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年。
293. 《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王宝平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294. 《中国教会大学史》，[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295. 《中国教会学校史》，高时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296.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张静庐辑注，群联出版社 1953 年。
297. 《中国近代教育史》，陈景磐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
298.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陈学恂主编，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299. 《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王建军著，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300.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孙石月著，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5 年。

301.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图书馆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302.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马金科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303.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张岂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304.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
305.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朱有琳主编，第一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306.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朱有琳主编，第一辑(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307.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朱有琳主编，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308.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朱有琳主编，第二辑(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309.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朱有琳、高时良主编，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310. 《中国近世舆地图说》，罗汝楠编，广东教忠学堂1909年。
311.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董光璧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
312. 《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谭其骧主编，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
313. 《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郑文光、席泽宗著，人民出版社1975年。
314. 《中国人的美国观》，杨玉圣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315.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三联书店1983年。
316. 《中国商业地理》，先后署名洁忱、显彰、南村等，载《直隶白话报》

- 1905年第1、第4、第6、第10、第13期。
317. 《中国文化史》，陈登原著，世界书局1935年。
318.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张静庐辑注，丁编(下)，中华书局1959年。
319. 《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林超著，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5期。
320.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21.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主编，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322. 《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谭汝谦主编，香港中文大学1980年。
323. 《中西交通史》，方豪著，岳麓书社1987年。
324. 《中西普通书目表》，黄庆澄编，算学报馆1898年。
325. 《(中学用)世界地理教科书》，广智书局1906年初版。
326. 《(中学)万国地志》，沧桑主人著，商务印书馆1902年。
327. 《中外比较教育史》，[加拿大]许美德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328. 《重学》，[英]胡威立著，[英]艾约瑟、李善兰译，1859年钱氏活字版。
329. 《周髀算经》，赵君卿注，周甄鸾重述，李淳风注释，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8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330. 《诸蕃志校释》，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
331. 《庄子集释》，《诸子集成》第三册，上海书店1986年。
332. 《邹代钧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张平著，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第1期。(1991)
333. 《邹氏家族和我国地图编绘出版事业》，周岩著，载《出版史料》1989年第2期。
334. 《邹征君传》，邹永修著，1919年铅印本。
335. 《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

-
336. 《最新地文图志》, [英]世爵崎冀撰, 叶青译, 高密、朱葆琛述, 夏曾佑、许家惺校阅, 山西大学堂译书院 1906 年。
337. 《最新人生地理学》, 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译, (上海)群益书局 1907 年再版本。

后 记

本书是我1998年12月提交给复旦大学的历史学历史地理专业(文化地理研究方向)的博士论文的修订稿。本书选题确立在1995年。80年代以来,我先后在陈匡时、朱维铮先生指导下完成了《近代译书及其特点》的学士论文和《晚清西书中译与文化界》的硕士论文。1985年毕业留校后一直在从事中国文献学的教学和明清以来翻译文化史的研究,这是我得以完成本书的学术基础。本书从确定选题、清理资料和形成思路,都深深地得益于导师周振鹤先生的严谨和博识。最初我设定的目标,是拟对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作一次“竭泽而渔”式的全面清理。按照这一选题涉及的范围,最完整的工作应从西方地理学译著和用西方新式方法绘制的地图两方面入手。但经过一年双管齐下的资料调研,我发现这一最初设定的目标在时间和能力上都难以企及。因为时贤统计的清末西方地理学译著只有80多种,而我最终完成的统计是208种,而用新式方法绘制的地图的数量,又远远超过这一数字,加之单幅地图的收集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我本人又缺乏地图学的专门训练,难以对晚清地图技术的变革作出确切的分析。于是,本书是用副标题对这一选题研究的范围作了明确的限定。

从学士论文到博士论文,我在西书中译的研究思路上,基本上是走着一条从“林”到“木”,而又由“木”到“叶”的过程。在学术兴趣上我是属于“杂食”类的,但20年与书为伍的经验告诉我:学术研究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范围不断限定的过程。无窄无深,无尖无专,漫无边际就难以钻之弥深。同时,为了不使自己囿于一隅之见,我在从“林”到“叶”的钻研过程中,一直没有忘记保持对“林”的气候与土壤等总体生态环境的把握。因为有了“林”,对“木”与“叶”分析是不可能全面和深入的。希望自己的研究即使不能有“一叶知秋”的效应,起码也应该有“一叶见林”、以小见大的追求。我要感谢上述诸位导师,在我所从事的从“林”到“叶”的钻研和对“一叶见林”的学术探索中,得到了他们的悉心指导。

繁复的晚清地理学文献尚未得到系统的清理,是至今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中国近代地理学史的主要原因。因此,赋予本书的首要任务是对晚清庞杂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清理。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利用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上海基督教协会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地的藏书。1997年5月至7月访韩期间,还利用了汉城大学奎章阁、高丽大学图书馆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部分藏书。在清理资料的过程中,我借助了文献学、文化传播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自然,这些方法是否成功地在研究中得以运用,笔者没有足够的自信。由于一边在历史系教书、一边在史地所读书,本书的撰写时断时续,由于时间和条件的局限,加之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搬迁和北京图书馆分馆(北海)的整修,许多资料至今未能目睹。面对晚清浩瀚的文献,我常

常深感客观知识的无限和人的求知能力的有限。受笔者所见资料及功力的限制,对于西方地理学如何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的问题,目前笔者没有能够贡献一种解释模式和若干精彩的结论。记得歌德在《格言与感想》一书中讲过:“一切事实的真实都包含着理论的真实。”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来说,我认为事实的描述分析和资料的论证过程,也许比提供某种理论解释模式更为重要,精彩的结论应当是在大量资料论证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目前的资料清理尚未能够“逼”出一些精彩结论的话,我想还是不要去刻意创造一种解释模式为好。

本书中很多粗浅的分析,也都受到笔者视域的限制,文中一些“首出”、“最早”、“首次”的判断,都只是笔者据所见资料作出的论证。目前的这一研究与我内心的期待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将作品交付出版,很多情况下是自己与自己所追求的学术高度进行妥协的结果,因为没有这种妥协,自己可能永远只能做一个眼高手低的人。本书所做的初步研究,表明了这一选题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从新式地图绘制的角度、新式地理学教科书编纂的角度切入,能把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推进到更深更广的层面。如果说本书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可能就是在这重意义上,这一研究把零乱的文献浇铸成了新的经络骨架,把沉寂的客观知识变成了活生生的信息,如果说,这一骨架和这些信息能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近代地理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起到一定推进作用的话,我想这一研究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也是我有决心将这本不成熟的小书交付出版的理由。

作为博士论文的本书初稿完成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朱维铮、姜义华、樊树志、陈绛教授和史地所的张修桂教授;浙江

大学的黄时鉴教授；北京大学的李孝聪教授；清华大学的葛兆光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熊月之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俞立中、王家范教授等校内外专家，对本书提出了非常中肯的评议。本书修订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上述专家的意见。同时我还要感谢复旦大学文博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的两届院系领导给予我在职攻读博士的机会；三年多的学习期间，我得到了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邹逸麟、葛剑雄、赵永复等先生；历史系的汤纲、许道勳等先生，以及张伟然、金光耀、傅德华、胡礼忠、王海良、马勇、汪家熔、李长林、陈应年、吴义雄、张人凤、田文载等校内外诸先生以及家慈和亲友们的热情帮助。1999年12月6日至9日，我应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系郎宓榭(Michael LACKNER)教授的邀请，参加了由哥廷根大学和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联合主办的“晚清西学译介”(Translating Western Knowledge Into Late Imperial China)国际学术讨论会，本书第四章“晚清地理学文献中西方自然地理学新词”作为会议论文在“文献与术语”的专题中宣读并进行了讨论，法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贝罗贝(Alain PEYRAUBE)教授、日本爱知大学荒川清秀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叶凯蒂(Catherine YEH)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研究员、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徐文堪编审等都对该文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荒川清秀教授在会后还专门就文中的细节与本人进行了切磋，并提供了若干国内难以寻觅的资料。第四章的最后修改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他们的意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张晓敏先生，三年多来始终关心着本书的写作，并为其顺利出版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江建忠、李剑雄、王纯先生在本书编校过程中出力甚多，并提出了许多有益

的建议,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写完本书的初稿正好是我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的二十周年,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使我从一个青年学生成了一个中年学者。历史学只能解释过去,无法预告未来,这就决定了历史学没有什么功利的用途。但是,人类生活的变异性决定了人们要深刻的理解现在必然要回溯到过去,人们为自己的过去感到惊奇,为了“知其然”而去探究知识,为了“知其所以然”而去进行历史的思考。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学使一个人生命的时间和空间得到了拓展,她是一个民族开拓自己文化前途而进行的思接千载的心智探险。想想自己有幸成为这一丰富人类精神资源学科中的一个跨世纪的探索者,想想这部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定稿的小书,能在新世纪初面世,未免感到分外的激动!我真诚地希望自己给出一条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崭新线索,能为未未的研究者提供一种较之前人更为全面和更为清晰的历史脉络;我热切地希望这部小书,不仅能成为我个人“西书中译与中国文化”系列研究的一个新起点,也能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外地理学交流史的一个新台阶。

邹振环

1998年10月初稿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1999年12月三改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晚清学术书系

求索真文明

——晚清学术史论 朱维铮(著) 24.20 元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以 1815 至 1911 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
与影响为中心 邹振环(著) 24.40 元

晚清经济史事编年

李允俊(主编) 78 元